



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一九五二年·北京

毛澤東選集

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發行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平裝本定價一萬五千元

一九五一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二年七月北京第二版

一九五二年七月上海第四次印刷

累計印數 800,001—1,100,000 冊

書號 1—1

本書出版的說明

這部選集，包括了毛澤東同志在中國革命各個時期中的重要著作。幾年前各地方曾經出過幾種不同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都是沒有經過著者審查的，體例頗爲雜亂，文字亦有錯訛，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沒有收進去。現在的這部選集，是按照中國共產黨成立後所經歷的五個歷史時期並且按照著作年月次序而編輯的。這部選集盡可能地搜集了一些爲各地方過去印行的集子還沒有包括在內的重要著作。選集中的各篇著作，都經著者校閱過，其中有些地方著者曾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正，也有個別的文章曾作了一些內容上的補充和修改。

下面有幾點屬於出版事務的聲明：

第一，現在出版的這個選集，還是不很完備的。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對於革命文獻的毀滅，由於在長期戰爭中革命文獻的散失，我們現在還不能夠找到毛澤東同志的全部著作，特別是毛澤東同志所寫的許多書信和電報（這些在毛澤東同志著作中佔很大的部分）。

第二，有些曾經流行的著作，例如『農村調查』，遵照著者的意見，沒有編入；又如『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也遵照著者的意見，只編進了其中的第一章（即『關於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

第三，選集中作了一些註釋。其中一部分是屬於題解的，附在各篇第二頁的邊行；其他部分，有屬於政治性質的，有屬於技術性質的，都附在文章的末尾。

第四，本選集有兩種裝訂的本子。一種是各時期的著作合訂的一卷本，另一種是四卷本。四卷本的第一卷包括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著作；第二卷和第三卷包括抗日戰爭時期的著作；第四卷包括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的著作。

中共中央毛澤東選集出版委員會

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目 錄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九二六年三月）	三一—二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三一—四
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一三
組織起來	一四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一五
『糟得很』和『好得很』	一六
所謂『過分』的問題	一七
所謂『痞子運動』	一九
革命先鋒	二〇
十四件大事	二三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夠存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四九

一 國內的政治狀況…………… 四九

二 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存在的原因…………… 五〇

三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的失敗…………… 五三

四 湘贛邊界的割據局面在湘鄂贛三省的地位…………… 五四

五 經濟問題…………… 五五

六 軍事根據地問題…………… 五五

井岡山的鬥爭（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五九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失敗…………… 五九

割據地區的現勢…………… 六〇

軍事問題…………… 六〇

土地問題…………… 六〇

政權問題…………… 六四

黨的組織問題…………… 六五

革命性質問題…………… 六九

割據地區問題	八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八七—九
關於單純軍事觀點	八七
關於極端民主化	九〇
關於非組織觀點	九二
關於絕對平均主義	九三
關於主觀主義	九四
關於個人主義	九五
關於流氓思想	九六
關於盲動主義殘餘	九七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一〇一—二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一二三—二六
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九三三年十月）	一二三—二四
我們的經濟政策（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一二五—一三〇
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一二三—一三六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一三七—一四三

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

一三七

民族統一戰綫

一四〇

人民共和國

一四一

國際援助

一四一—一四二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四三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

第一節 戰爭規律是發展的

一四三

第二節 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

一四六

第三節 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

一四七

第四節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一四九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

一五〇

第三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

一五一

第一節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一五一

第二節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

一五二

第三節 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略戰術

一五三

第四章 『圍剿』和反『圍剿』——中國內戰的主要形式

一五三

第五章 戰略防禦……………一九〇

第一節 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一九一

第二節 反「圍剿」的準備……………一九四

第三節 戰略退却……………一九七

第四節 戰略反攻……………二〇八

第五節 反攻開始問題……………二二一

第六節 集中兵力問題……………二二七

第七節 運動戰……………二三三

第八節 速決戰……………二三八

第九節 殲滅戰……………二三三

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二三七—二四二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二四三—二六〇

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二四三

爲民主和自由而鬥爭……………二四七

我們的領導責任……………二五三

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二六一—二七〇

和平問題	三六
民主問題	三四
革命前途問題	三六
幹部問題	三七
黨內民主問題	三六
大會的團結和全黨的團結	三六
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	三九
實踐論（一九三七年七月）	三七—三六
矛盾論（一九三七年八月）	三七—三六
一 兩種宇宙觀	三八
二 矛盾的普遍性	三九
三 矛盾的特殊性	三九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四〇
五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	四一
六 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四二
七 結論	四四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革命的問題
是分清敵我。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一九二六年三月)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中國過去一切革命鬥爭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以攻擊真正的敵人。革命黨是羣衆的嚮導，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的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作一個大概的分析。

一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情況是怎樣的呢？

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產階級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屬於帝國主義的。這些階級代表中國最落後的和最反動的生產關係，阻礙中國生產力的發展。他們和中國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別是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國家主義派（一）和國民黨右派。

中產階級。這個階級代表中國城鄉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中產階級主要是指民族資產階級，他們

對於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着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於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其政治主張爲實現民族資產階級一階級統治的國家。有一個自稱爲戴季陶『『真實信徒』』的，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這兩句話，畫出了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他們反對以階級鬥爭學說解釋國民黨的民生主義，他們反對國民黨聯俄和容納共產黨^①及左派分子。但是這個階級的企圖——實現民族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是完全行不通的，因爲現在世界上的局面，是革命和反革命兩大勢力作最後鬥爭的局面。這兩大勢力豎起了兩面大旗：一面是紅色的革命的大旗，第三國際高舉着，號召全世界一切被壓迫階級集合於其旗幟之下；一面是白色的反革命的大旗，國際聯盟高舉着，號召全世界一切反革命分子集合於其旗幟之下。那些中間階級，必定很快地分化，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沒有他們『獨立』的餘地。所以，中

* 毛澤東同志此文是爲反對當時黨內「在着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爲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爲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毛澤東同志指出中國無產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這樣就解決了中國革命中的最主要同盟軍問題。毛澤東同志並且預見到當時的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動搖的階級，他們在革命高漲時將要分化，其右翼將要跑到帝國主義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發生的事變，證明了這一點。

國的中產階級，以其本階級為主體的『獨立』革命思想，僅僅是一個幻想。

小資產階級。如自耕農〔自耕農〕，手工業主，小知識階層——學生界，中小學教員，小員司、小事務員、小律師，小商人等都屬於這一類。這一個階級，在人數上，在階級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自耕農和手工業主所經營的，都是小生產的經濟。這個小資產階級內的各階層雖然同處在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但有三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餘錢剩米的，即用其體力或腦力勞動所得，除自給外，每年有餘剩。這種人發財觀念極重，對趙公元帥〔趙公〕禮拜最勤，雖不妄想發大財，却總想爬上中產階級地位。他們看見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財東，往往垂着一尺長的涎水。這種人胆子小，他們怕官，也有點怕革命。因為他們的經濟地位和中產階級頗接近，故對於中產階級的宣傳頗相信，對於革命取懷疑的態度。這一部分人在小資產階級中佔少數，是小資產階級的右翼。第二部分是在經濟上大體上可以自給的。這一部分人比較第一部分人大不相同，他們也想發財，但是趙公元帥總不讓他們發財，而且因為近年以來帝國主義、軍閥、封建地主、買辦大資產階級的壓迫和剝削，他們感覺現在的世界已經不是從前的世界。他們覺得現在如果只使用和從前相等的勞動，就會不能維持生活。必須增加勞動時間，每天起早散晚，對於職業加倍注意，方能維持生活。他們有點罵人了，罵洋人叫『洋鬼子』，罵軍閥叫『搶錢司令』，罵土豪劣紳叫『爲富不仁』。對於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運動，僅懷疑其未必成功（理由是：洋人和軍閥的來頭那麼大），不肯貿然參加，取了中立的態度，但是絕不反對革命。這一部分人數甚多，大概佔小資產階級的一半。第三部分是生活下降的。這一部分人好些大概原先是所謂殷實人家，漸漸

變得僅僅可以保住，漸漸變得生活下降了。他們每逢年終結賬一次，就吃驚一次，說：「咳，又虧了！」這種人因為他們過去過着好日子，後來逐年下降，負債漸多，漸次過着淒涼的日子，「瞻念前途，不寒而慄」。這種人在精神上感覺的痛苦很大，因為他們有一個從前和現在相反的比較。這種人在革命運動中頗要緊，是一個數量不小的羣衆，是小資產階級的左翼。以上所說小資產階級的三部分，對於革命的態度，在平時各不相同；但到戰時，即到革命潮流高漲、可以看得見勝利的曙光時，不但小資產階級的左派參加革命，中派亦可參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挾，也只得附和着革命。我們從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三〕}和各地農民運動的經驗看來，這個斷定是不错的。

半無產階級。此處所謂半無產階級，包含：（一）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四〕}，（二）貧農，（三）小手工業者，（四）店員^{〔五〕}，（五）小販等五種。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是農村中一個數量極大的羣衆。所謂農民問題，主要就是他們的問題。半自耕農、貧農和小手工業者所經營的，都是更細小的、小生產的經濟。絕大部分半自耕農和貧農雖同屬半無產階級，但其經濟狀況仍有上、中、下三個細別。半自耕農，其生活苦於自耕農，因其食糧每年大約有一半不夠，須租別人田地，或者出賣一部分勞動力，或經營小商，以資彌補。春夏之間，青黃不接，高利向別人借債，重價向別人籴糧，較之自耕農的無求於人，自然景遇要苦，但是優於貧農。因為貧農無土地，每年耕種只得收穫之一半或不足一半；半自耕農則租於別人的部分雖只收穫一半或不足一半，然自有的部分却可全得。故半自耕農的革命性優於自耕農。

而不及貧農。貧農是農村中的佃農，受地主的剝削。其經濟地位又分兩部分。一部分貧農有比較充足的農具和相當數量的資金。此種農民，每年勞動結果，自己可得一半。不足部分，可以種雜糧、撈魚蝦、飼雞豕，或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勉強維持生活，於艱難竭蹶之中，存聊以卒歲之想。故其生活苦於半自耕農，然較另一部分貧農爲優。其革命性，則優於半自耕農而不及另一部分貧農。所謂另一部分貧農，則既無充足的農具，又無資金，肥料不足，土地歉收，送租之外，所得無幾，更需要出賣一部分勞動力。荒時暴月，向親友乞哀告憐，借得幾斗幾升，敷衍三日五日，債務叢集，如牛負重。他們是農民中極艱苦者，極易接受革命的宣傳。小手工業者所以稱爲半無產階級，是因爲他們雖然自有簡單的生產手段，且係一種自由職業，但他們也常常被迫出賣一部分勞動力，其經濟地位略與農村中的貧農相當。因其家庭負擔之重，工資和生活費用之不相稱，時有貧困的壓迫和失業的恐慌，和貧農亦大致相同。店員是商店的僱員，以微薄的薪資，供家庭的費用，物價年年增長，薪給往往須數年一增，偶與此輩傾談，便見叫苦不迭。其地位和貧農及小手工業者不相上下，對於革命宣傳極易接受。小販不論肩挑叫賣，或街畔攤售，總之本小利微，吃着不够。其地位和貧農不相上下，其需要一個變更現狀的革命，也和貧農相同。

無產階級。現代工業無產階級約二百萬人。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現代工業無產階級人數不多。二百萬左右的產業工人中，主要爲鐵路、礦山、海運、紡織、造船五種產業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個數量是在外資產業的奴役下。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却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

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我們看四年以來的罷工運動，如海員罷工〔一〕、鐵路罷工〔二〕、開灤和焦作煤礦罷工〔三〕、沙面罷工〔四〕以及『五卅』後上海香港兩處的大罷工〔五〕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中國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個原因是集中。無論那種人都不如他們的集中。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了生產手段，剩下兩手，絕了發財的希望，又受着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的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戰鬥。都市苦力工人的力量也很可注意。以碼頭搬運夫和人力車夫佔多數，糞夫清道夫等亦屬於這一類。他們除雙手外，別無長物，其經濟地位和產業工人相似，惟不及產業工人的集中和在生產上的重要。中國尙少新式的資本主義的農業。所謂農村無產階級，是指長工、月工、零工等僱農而言。此等僱農不僅無土地，無農具，又無絲毫資金，只得營工度日。其勞動時間之長，工資之少，待遇之薄，職業之不安定，超過其他工人。此種人在鄉村中是最感困難者，在農民運動中和貧農處於同一緊要的地位。

此外，還有數量不小的游民無產者，爲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閩粵的『三合會』，湘鄂黔蜀的『哥老會』，皖豫魯等省的『大刀會』，直隸及東三省的『在理會』，上海等處的『青幫』〔六〕，都曾經是他們的政治和經濟鬥爭的互助團體。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

綜上所述，可知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大地主階級以及附屬於他們的一部

分反動知識界，是我們的敵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綫。

〔註釋〕

〔一〕國家主義派，指當時組織「中國國家主義青年團」後來又改名「中國青年黨」的一小撮法西斯主義的無恥政客。他們以反對共產黨和反對蘇聯、而向各種當權的反動派及帝國主義領取津貼爲其反革命的職業。

〔二〕戴季陶，早年參加國民黨，曾經和蔣介石共同經營交易所的投機事業。一九二五年孫中山逝世之後，他即從事於反共的煽惑工作，爲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舉行反革命政變作了精神上的準備。在長期中，他都是蔣介石反革命的忠實走狗。一九四九年二月，他看到蔣介石的統治即將崩潰，前途已經絕望，因而自殺。

〔三〕北京「晨報」爲當時在政治上擁護北洋軍閥統治的政團之一——研究系的機關報。

〔四〕一九二三年，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決定改組國民黨，實行國共合作，容納共產黨人參加該黨，並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廣州召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當時毛澤東同志和李大釗、林伯渠、瞿秋白等同志都參加了這個大會，對於幫助國民黨走上革命的道路，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們並被選爲當時國民黨中央的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

〔五〕毛澤東同志在這裏是指中農。

〔六〕趙公元帥是中國民間傳說的財神，叫趙公明。

〔七〕指一九二五年全國人民抗議五月三十日上海英國巡捕屠殺中國人民事件的反帝國主義運動。一九二五年五月間，青島上海各地日本紗廠先後發生工人罷工的鬥爭，規模很大，遭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北洋軍閥的鎮壓。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紗廠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傷工人十餘人。二十八日青島工人被反動政府屠殺八人。三十日，上海學生二千餘人在租界內宣傳聲援工人，號召收回租界，隨後集合羣衆萬餘人，在英租界捕房門首，高呼「打倒帝國主義」和「全中國人民團結起

來「等口號」。英帝國主義巡捕旋即開槍屠殺，死傷許多學生，是爲著名的「五卅慘案」。這個大屠殺事件發生後，即引起全國人民的公憤，到處發生遊行示威、罷工、罷課和罷市，形成極大規模的反帝國主義運動。

（八）毛澤東同志在這裏是指半自耕半租佃的貧苦農民。

（九）中國店員有不同的階層。毛澤東同志這裏所指的是在店員中比較佔多數的人，還有一部分下層店員則是過着無產階級的生活。

（十）指一九二二年初的香港海員罷工和長江船員的罷工。香港海員罷工堅持了八個星期，經過激烈的流血的鬥爭，最後香港英帝國主義當局被迫承認增加工資，恢復原工會，釋放被捕工人，撫卹死難工人。長江船員工人繼起發動罷工，堅持兩星期，也得到勝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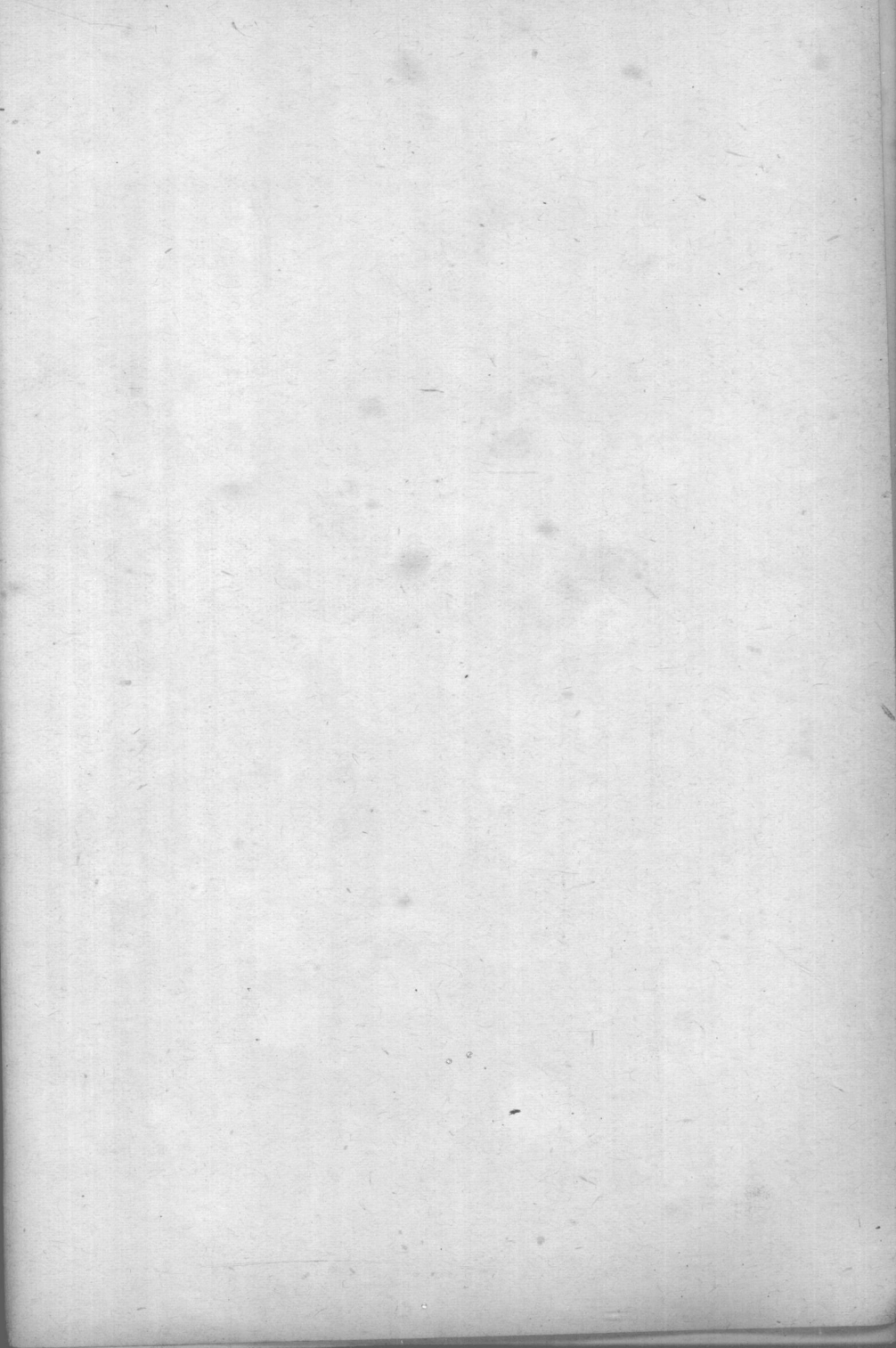
（十一）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建立後，就在鐵路工人中進行組織工作，在一九二二年和一九二三年，各個主要鐵路綫上，都在共產黨領導下有過罷工鬥爭。最著名的一次，是一九二三年二月四日京漢鐵路（即北京到漢口的鐵路）工人們爲爭取組織總工會的自由而舉行的總罷工。爲英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北洋軍閥吳佩孚、蕭耀南，在二月七日對罷工工人實行了殘酷的屠殺，是爲歷史上有名的「二七慘案」。

（十二）開灤煤礦，是開平灤州兩個煤礦區的總稱，在中國的河北省，是互相聯繫的大煤礦區，礦工五萬餘人。英帝國主義在一九〇〇年義和團運動時候掠奪了開平煤礦，中國人乃另組灤州煤礦公司，後來又併入開灤礦務總局，兩礦遂都爲英帝國主義所獨佔。開灤罷工，是指一九二二年十月間的罷工。焦作煤礦原屬河南省，在現在平原省的西部，是中國著名的煤礦區。焦作罷工，是指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至八月九日的罷工。

（十三）沙面當時是英帝國主義在廣州的租借地。一九二四年七月，統治沙面的英帝國主義者，頒佈一新警律，規定沙面中國人出入租界，必須攜帶貼有本人像片的執照，但外國人却可自由出入。沙面工人於七月十五日宣佈罷工，抗議這個無理措施。結果英帝國主義者被迫取消了新警律。

（十四）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的上海事件後，六月一日開始上海總罷工，六月十九日開始香港總罷工。前者參加罷工的人數爲二十餘萬，後者爲二十五萬。香港大罷工在全國人民的支援下，堅持了一年零四個月，是世界工人運動史中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

〔五〕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在理會、青幫，是一些原始形式的民間秘密團體，這些組織的組成分子主要的是破產農民、失業手工業者、流氓無產者等。在中國封建時代，這類成份常常以宗教迷信爲聯繫紐帶，而在家長制的組織形式下，形成種種名目不同的組織，有的還擁有武裝。他們曾經用這種組織去求在社會生活中的互相援助，並在一定時期中曾經用以發動鬥爭，去反抗壓迫他們的官僚和地主。但很顯然，農民和手工業者是不可能從這種落後性的組織中得到出路的。這種落後性的組織又往往容易被地主豪強勢力所操縱和利用，加上他們帶有盲目的破壞性，因此有的就變成了反動的力量。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舉行反革命政變的時候，曾經利用過這種落後的組織作爲破壞勞動人民團結和破壞革命的工具。當近代工業無產階級的力量盛大興起以後，農民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逐步地建立了完全新式的組織，這類原始的落後的組織就失掉了它們的存在價值。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一九二七年三月)

農民問題的嚴重性

我這回到湖南，實地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情況。從一月四日起至二月五日止，共三十二天，在鄉下，在縣城，召集有經驗的農民和農運工作同志開調查會，仔細聽他們的報告，所得材料不少。許多農民運動的道理，和在漢口、長沙從紳士階級那裏聽得的道理，完全相反。許多奇事，則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想這些情形，很多地方都有。所有各種反對農民運動的議論，都必須迅速矯正。革命當局對農民運動的各種錯誤處置，必須迅速變更。這樣，才於革命前途有所補益。因爲目前農民運動的興起是一個極大的問題。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麼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他們將衝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土豪劣紳，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一切革命的黨派、革命的同志，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站在他們的前頭領

導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後頭指手畫腳地批評他們呢？還是站在他們的對面反對他們呢？每個中國人對於這三項都有選擇的自由，不過時局將強迫你迅速地選擇罷了。

組織起來

湖南的農民運動，就湘中、湘南已發達的各縣來說，大約分爲兩個時期。去年一月至九月爲第一期，即組織時期。此時期內，一月至六月爲秘密活動時期，七月至九月革命軍驅逐趙恆惕^(一)，爲公開活動時期。此時期內，農會會員的人數總計不過三、四十萬，能直接領導的羣衆也不過百餘萬，在農村中還沒有什麼鬥爭，因此各界對它也沒有什麼批評。因爲農會會員能作嚮導，作偵探，作挑夫，北伐軍的軍官們還有說幾句好話的。十月至今年一月爲第二期，即革命時期。農會會員激增到二百萬，能直接領導的羣衆增加到一千萬。因爲農民入農會大多數每家只寫一個人的名字，故會員二百

* 毛澤東同志此文是爲了答覆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而寫的。爲了答覆這些責難，毛澤東同志到湖南做了三十二天的考察工作，並寫了這一篇報告。當時黨內以陳獨秀爲首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不願意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而堅持自己的錯誤見解。他們的錯誤，主要地是被國民黨的反動潮流所嚇倒，不敢支持已經起來和正在起來的偉大的農民革命鬥爭。爲了遷就國民黨，他們寧願拋棄農民這個最主要的同盟軍，使工人階級和共產黨處於孤立的無援的地位。一九二七年夏季國民黨之所以敢於叛變，發動「清黨運動」和反人民的戰爭，主要地就是乘了共產黨的這個弱點。

萬，羣衆便有約一千萬。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組織了一半。如湘潭、湘鄉、瀏陽、長沙、醴陵、寧鄉、平江、湘陰、衡山、衡陽、耒陽、郴縣、安化等縣，差不多全體農民都集合在農會的組織中，都立在農會領導之下。農民既已有了廣大的組織，便開始行動起來，於是在四個月中造成一個空前的農村大革命。

打倒土豪劣紳，一切權力歸農會

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裏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這個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地主的體面威風，掃地以盡。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連兩公婆吵架的小事，也要到農民協會去解決。一切事情，農會的人不到場，便不能解決。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在農會威力之下，土豪劣紳們頭等的跑到上海，二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五等以下土豪劣紳崽子則在鄉裏向農會投降。

『我出十塊錢，請你們准我進農民協會。』小劣紳說。

『嘻！誰要你的臭錢！』農民這樣回答。

好些中小地主、富農乃至中農，從前反對農會的，此刻求入農會不可得。我到各處，常常遇到這種人，這樣向我求情：『請省裏來的委員作保！』

前清地方造了口冊，有正冊、另冊二種，好人入正冊，匪盜等壞人入另冊。現在有些地方的農民便拿了這事嚇那些從前反對農會的人：『把他們入另冊！』

那些人怕入另冊，便多方設法求入農會，一心要想把他們的名字寫上那農會的冊子才放心。但他們往往遭農會嚴厲拒絕，所以他們總是懸心吊膽地過日子，擠在農會的門外，好像無家可歸的樣子，鄉裏話叫做『打零』。總之，四個月前被一般人看不起的所謂『農民會』，現在却變成頂榮耀的東西。從前拜倒在紳士權力下面的人，現在却拜倒在農民權力之下。無論什麼人，都承認去年十月以前和十月以後是兩個世界。

『糟得很』和『好得很』

農民在鄉裏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裏消息傳到城裏來，城裏的紳士立刻大譁。我初到長沙時，會到各方面的人，聽到許多的街談巷議。從中層以上社會至國民黨右派，無不一言以蔽之曰：『糟得很。』即使是很革命的人吧，受了那班『糟得很』派的滿城風雨的議論的壓迫，他閉眼一想鄉村

的情況，也就氣餒起來，沒有法子否認這『糟』字。很進步的人也只是說：『這是革命過程中應有的事，雖則是糟。』總而言之，無論什麼人都無法完全否認這『糟』字。實在呢，如前所說，乃是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乃是鄉村的民主勢力起來打翻鄉村的封建勢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牆腳。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麼『糟』，完全不是什麼『糟得很』。『糟得很』，明明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擊農民起來的理論，明明是地主階級企圖保存封建舊秩序，阻礙建設民主新秩序的理論，明明是反革命的理論。每個革命的同志，都不應該跟着瞎說。你若是一個確定了革命觀點的人，而且是跑到鄉村裏去看過一遍的，你必定覺到一種從來未有的痛快。無數萬成羣的奴隸——農民，在那裏打翻他們的吃人的仇敵。農民的舉動，完全是對的，他們的舉動好得很！『好得很』是農民及其他革命派的理論。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

所謂『過分』的問題

又有一般人說：『農會雖要辦，但是現在農會的舉動未免太過分了。』這是中派的議論。實際怎樣呢？的確的，農民在鄉裏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羣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牀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

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這就是一些人的所謂『過分』，所謂『矯枉過正』，所謂『未免太不成話』。這派議論貌似有理，其實也是錯的。第一，上述那些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自己逼出來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歷來憑藉勢力稱霸，踐踏農民，農民才有這種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亂子鬧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爲惡最甚的地方。農民的眼睛，全然沒有錯的。誰個劣，誰個不劣，誰個最甚，誰個稍次，誰個懲辦要嚴，誰個處罰從輕，農民都有極明白的計算，罰不當罪的極少。第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農村革命是農民階級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的權力的革命。農民若不用極大的力量，決不能推翻幾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權力。農村中須有一個大的革命熱潮，才能鼓動成千成萬的羣衆，形成一個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所謂『過分』的舉動，都是農民在鄉村中由大的革命熱潮鼓動出來的力量所造成的。這些舉動，在農民運動第二時期（革命時期）是非常需要的。在第二時期內，必須建立農民的絕對權力。必須不准人惡意地批評農會。必須把一切紳權

都打倒，把紳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腳踏上去。所有一切所謂『過分』的舉動，在第二時期都有革命的意義。質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四)。這一派的議論，表面上和前一派不同，但其實質則和前一派同站在一個觀點上，依然是擁護特權階級利益的地主理論。這種理論，阻礙農民運動的興起，其結果破壞了革命，我們不能不堅決地反對。

所謂『痞子運動』

國民黨右派說：『農民運動是痞子運動，是惰農運動。』這種議論，在長沙頗盛行。我跑到鄉下，聽見紳士們說：『農民協會可以辦，但是現在辦事人不行，要換人啦！』這種議論，和右派的話是一個意思，都是說農運可做（因農民運動已起來，無人敢說不可做），但是現在做農運的人不行，尤其痛恨下級農民協會辦事人，說他們都是些『痞子』。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爲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裏，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裏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遊鄉（湘潭、湘鄉叫遊團，醴陵叫遊壩）。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裏去。

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

革命先鋒

對於一件事或一種人，有相反的兩種看法，便出來相反的兩種議論。『糟得很』和『好得很』，『痞子』和『革命先鋒』，都是適例。

前面說了農民成就了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事業，農民做了國民革命的重要工作。但是這種革命大業，革命重要工作，是不是農民全體做的呢？不是的。農民中有富農、中農、貧農三種。三種狀況不同，對於革命的觀感也各別。當第一時期，富農耳裏聽得的是所謂江西一敗如水，蔣介石打傷了腳^(註)，坐飛機回廣東^(註)了。吳佩孚^(註)重新佔了岳州。農民協會必定立不久，三民主義^(註)也興不起，因為這是所謂從來沒有的東西。鄉農民協會的辦事人（多屬所謂『痞子』之類），拿了農會的冊子，跨進富農的大門，對富農說：『請你進農民協會。』富農怎樣回答呢？『農民協會麼？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種了幾十年田，沒有見過什麼農民協會，也吃飯。我勸你們不辦的好！』富農中態度好點的這樣說。『什麼農民協會，砍腦殼會，莫害人！』富農中態度惡劣的這樣說。新奇得很，農民協會居然成立了好幾個月，而且敢於反對紳士。鄰近的紳士因為不肯繳鴉片槍，被農民協會捉了去遊鄉。縣城裏並且殺了大紳士，例如湘潭的晏容秋，寧鄉的楊致澤。十月革命紀念大會，反英大會，北伐勝利總慶祝，每鄉都

有上萬的農民舉起大小旗幟，雜以扁担鋤頭，浩浩蕩蕩，出隊示威。這時，富農才開始惶惑起來。在北伐勝利總慶祝中，他們聽見說，九江也打開了，蔣介石沒有傷脚，吳佩孚究竟打敗了。而且『三民主義萬歲』，『農民協會萬歲』，『農民萬歲』等等，明明都寫在『紅綠告示』（標語）上面。『農民萬歲，這些人也算作萬歲麼？』富農表示很大的惶惑。農會於是神氣十足了。農會的人對富農說：『把你們入另冊！』或者說：『再過一個月，入會的每人會費十塊錢！』在這樣的形勢之下，富農才慢慢地進了農會，有些是繳過五角錢或一塊錢（本來只要一百錢）入會費的，有些是託人說情才邀了農會允許的。亦有好些頑固黨，至今還沒有入農會。富農入會，多把他那家裏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到農會去上一個名字，因為他們始終怕『抽丁』。入會後，也並不熱心替農會做事。他們的態度始終是消極的。

中農呢？他們的態度是游移的。他們想到革命對他們沒有什麼大的好處。他們鍋裏有米煮，沒有人半夜裏敲門來討賬。他們也根據從來有沒有的道理，獨自皺着眉頭在那裏想：『農民協會果然立得起來麼？』『三民主義果然興得起來麼？』他們的結論是：『怕未必！』他們以為這全決於天意：『辦農民會，曉得天意順不順咧？』在第一時期內，農會的人拿了冊子，進了中農的門，對着中農說道：『請你加入農民協會！』中農回答道：『莫性急啦！』一直到第二時期，農會勢力大盛，中農方加入農會。他們在農會的表現比富農好，但暫時還不甚積極，他們還要看一看。農會爭取中農入會，向他們多作解釋工作，是完全必要的。

鄉村中一向苦戰奮鬥的主要力量是貧農。從秘密時期到公開時期，貧農都在那裏積極奮鬥。他們

最聽共產黨的領導。他們和土豪劣紳是死對頭，他們毫不遲疑地向土豪劣紳營壘進攻。他們對着富農說：『我們早進了農會，你們爲什麼還遲疑？』富農帶着譏笑的聲調說道：『你們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有什麼不進農會！』的確，貧農們不怕失掉什麼。他們中間有很多人，確實是『上無片瓦，下無插針之地』，他們有什麼不進農會？據長沙的調查：鄉村人口中，貧農佔百分之七十，中農佔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農佔百分之十。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中，又分赤貧、次貧二類。全然無業，即既無土地，又無資金，完全失去生活依據，不得不出外當兵，或出去做工，或打流當乞丐的，都是『赤貧』(一)，佔百分之二十。半無業，即略有土地，或略有資金，但吃的多，收的少，終年在勞碌愁苦中過生活的，如手工工人、佃農(富佃除外)、半自耕農等，都是『次貧』(二)，佔百分之五十。這個貧農大羣衆，合共佔鄉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農民協會的中堅，打倒封建勢力的先鋒，成就那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業的元勳。沒有貧農階級(照紳士的話說，沒有『痞子』)，決不能造成現時鄉村的革命狀態，決不能打倒土豪劣紳，完成民主革命。貧農，因爲最革命，所以他們取得了農會的領導權。所有最下一級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委員，在第一第二兩個時期中，幾乎全數是他們(衡山縣鄉農民協會職員，赤貧階層佔百分之五十，次貧階層佔百分之四十，窮苦知識分子佔百分之十)。這個貧農領導，是非常之需要的。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他們的革命大方向始終沒有錯。他們損傷了土豪劣紳的體面。他們打翻了大小土豪劣紳在地上，並且踏上一隻腳。他們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湖南有些縣的縣政府、縣黨部(三)和

縣農會，已經做了若干錯處，竟有循地主之請，派兵拘捕下級農會職員的。衡山、湘鄉二縣的監獄裏，關了好多個鄉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這個錯誤非常之大，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燄。只要看拘捕了農民協會委員長、委員，當地的不法地主們便大高興，反動空氣便大增高，就知道這事是否錯誤。我們要反對那些所謂『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反革命議論，尤其要注意不可做出幫助土豪劣紳打擊貧農階級的錯誤行動。事實上，貧農領袖中，從前雖有些確是有缺點的，但是現在多數都變好了。他們自己在那裏努力禁牌賭，清盜匪。農會勢盛，地方牌賭禁絕，盜匪潛踪。有些地方真個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據衡山的調查，貧農領袖百人中八十五人都變得很好，很能幹，很努力。只有百分之十五，尚有些不良習慣。這只能叫做『少數不良分子』，決不能跟着土豪劣紳的口白，籠統地罵『痞子』。要解決這『少數不良分子』的問題，也只能在農會整頓紀律的口號之下，對羣衆做宣傳，對他們本人進行訓練，把農會的紀律整好，決不能隨便派兵捉人，損害貧農階級的威信，助長土豪劣紳的氣勢。這一點是非常要注意的。

十四件大事

一般指摘農會的人說農會做了許多壞事。我在前面已經指出，農民打土豪劣紳這件事完全是革命行爲，並沒有什麼可指摘。但是農民所做的事很多，爲了答覆人們的指摘，我們須得把農民所有的

行動過細檢查一遍，逐一來看他們的所作所爲究竟是怎麼樣。我把幾個月來農民的行動分類總計起來，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總共作了十四件大事，如下所記。

第一件 將農民組織在農會裏

這是農民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像湘潭、湘鄉、衡山這樣的縣，差不多所有的農民都組織起來了，幾乎沒有那一隻『角暗裏』的農民沒有起來，這是第一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大部分，尚有一小部分沒有組織，如益陽、華容等縣，這是第二等。有些縣，農民組織起來了一小部分，大部分尚未組織起來，如城步、零陵等縣，這是第三等。湘西一帶，在袁祖銘（言）勢力之下，農會宣傳未到，許多縣的農民還全未組織起來，這是第四等。大概以長沙爲中心的湘中各縣最發展，湘南各縣次之，湘西還在開始組織中。據去年十一月省農民協會統計，全省七十五縣中，三十七縣有了組織，會員人數一百三十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七人。此數中，約有一百萬是去年十月、十一月兩個月內農會勢力大盛時期組織的，九月以前還不過三、四十萬人。現又經過十二月、一月兩個月，農民運動正大發展。截至一月底止，會員人數至少滿了二百萬。因入會一家多只登記一人，平均每家以五口計，羣衆便約有一千萬。這種驚人的加速度的發展，是所以使一切土豪劣紳貪官污吏孤立，使社會驚爲前後兩個世界，使農村造成大革命的原因。這是農民在農民協會領導之下所做的第一件大事。

第二件 政治上打擊地主

農民有了組織之後，第一個行動，便是從政治上把地主階級特別是土豪劣紳的威風打下去，即是從農村的社會地位上把地主權力打下去，把農民權力長上來。這是一個極嚴重極緊要的鬥爭。這個鬥爭是第二時期即革命時期的中心鬥爭。這個鬥爭不勝利，一切減租減息，要求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等的經濟鬥爭，決無勝利之可能。湖南許多地方，像湘鄉、衡山、湘潭等縣，地主權力完全推翻，形成了農民的獨一權力，自無問題。但是醴陵等縣，尚有一部分地方（如醴陵之西南兩區），表面上地主權力低於農民權力，實際上因為政治鬥爭不激烈，地主權力還隱隱和農民權力對抗。這些地方，還不能說農民已得了政治的勝利，還須加勁作政治鬥爭，至地主權力被農民完全打下去為止。綜計農民從政治打擊地主的方法有如下各項：

清算。土豪劣紳經手地方公款，多半從中侵蝕，賬目不清。這回農民拿了清算的題目，打翻了很多的土豪劣紳。好多地方組織了清算委員會，專門向土豪劣紳算賬，土豪劣紳看了這樣的機關就打顫。這樣的清算運動，在農民運動起來的各縣做得很普遍，意義不重在追回款子，重在宣佈土豪劣紳的罪狀，把土豪劣紳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打下去。

罰款。清算結果，發現舞弊，或從前有魚肉農民的劣跡，或現在有破壞農會的行為，或違禁牌賭，

或不繳煙槍。在這些罪名之下，農民議決，某土豪罰款若干，某劣紳罰款若干，自數十元至數千元不等。被農民罰過的人，自然體面掃地。

捐款。向爲富不仁的地主捐款救濟貧民，辦合作社，辦農民貸款所，或作他用。捐款也是一種懲罰，不過較罰款爲輕。地主爲免禍計，自動地捐款給農會的，亦頗不少。

小質問。遇有破壞農會的言論行動而罪狀較輕的，則邀集多人湧入其家，提出比較不甚嚴重的質問。結果，多要寫個『休息字』，寫明從此終止破壞農會名譽的言論行動了事。

大示威。統率大衆，向着和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在他家裏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穀，此類事頗不少。最近湘潭馬家河，有率領一萬五千羣衆向六個劣紳問罪，延時四日，殺豬百三十餘個的事。示威的結果，多半要罰款。

戴高帽子遊鄉。這種事各地做得很多。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着，前後簇擁着一大羣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意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故有錢的多願罰款，不願戴高帽子。但農民不依時，還是要戴。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天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黑了臉。但是，農會議決，今天不給他戴高帽子。因爲今天給他戴過了，這劣紳橫了心，不畏罪了，不如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高帽子，每日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關進縣監獄。這是比戴高帽子更重的罪。把土豪劣紳捉了，送進知事公署的監獄，關起來，要知事辦他的罪。現在監獄裏關人和從前兩樣，從前是紳士送農民來關，現在是農民送紳士來關。

驅逐。土豪劣紳中罪惡昭著的，農民不是要驅逐，而是要捉他們，或殺他們。他們怕捉怕殺，逃跑出外。重要的土豪劣紳，在農民運動發達縣份，幾乎都跑光了，結果等於被驅逐。他們中間，頭等的跑到上海，次等的跑到漢口，三等的跑到長沙，四等的跑到縣城。這些逃跑的土豪劣紳，以逃到上海的爲最安全。逃到漢口的，如華容的三個劣紳，終被捉回。逃到長沙的，更隨時有被各縣旅省學生捕獲之虞，我在長沙就親眼看見捕獲兩個。逃到縣城的，資格已是第四等了，農民耳目甚多，發覺甚易。湖南政府財政困難，財政當局曾歸咎於農民驅逐閩人，以致籌款不易，亦可見土豪劣紳不容於鄉里之一斑。

槍斃。這必是很大的土豪劣紳，農民和各界民衆共同做的。例如寧鄉的楊致澤，岳陽的周嘉淦，華容的傅道南、孫伯助，是農民和各界人民督促政府槍斃的。湘潭的晏容秋，則是農民和各界人民強迫縣長同意從監獄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的。醴陵的彭志蕃，益陽的周天爵、曹雲，則正待『審判土豪劣紳特別法庭』判罪處決。這樣的大劣紳、大土豪，槍斃一個，全縣震動，於肅清封建餘孽，極有效力。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多的有幾十個，少的也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土豪劣紳勢盛時，殺農民真是殺人不要命。長沙新康鎮團防局長何邁泉，辦團十年，在他手裏殺死的貧苦農民將近一千人，美其名曰『殺匪』。

我的家鄉湘潭縣銀田鎮團防局長湯峻岩、羅叔林二人，民國二年以來十四年間，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被殺的五十多人中，最先被殺的兩人是完全無罪的乞丐。湯峻岩說：『殺兩個叫化子開張！』這兩個叫化子就是這樣一命嗚呼了。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

第三件 經濟上打擊地主

不准穀米出境，不准高抬穀價，不准囤積居奇。這是近月湖南農民經濟鬥爭上一件大事。從去年十月至現在，貧農把地主富農的穀米阻止出境，並禁止高抬穀價和囤積居奇。結果，貧農的目的完全達到，穀米阻得水洩不通，穀價大減，囤積居奇的絕跡。

不准加租加押，宣傳減租減押。去年七八月間，農會還在勢力弱小時期，地主依然按照剝削從重老例，紛紛通知佃農定要加租加押。但是到了十月，農會勢力大增，一致反對加租加押，地主便不敢再提加租加押四字。及至十一月後，農民勢力壓倒地主勢力，農民乃進一步宣傳減租減押。農民說：可惜去秋交租時農會尙無力量，不然去秋就減了租了。對於今秋減租，農民正大大做宣傳，地主們亦在問減租辦法。至於減押，衡山等縣目下已在進行。

不准退佃。去年七八月間，地主還有好多退佃另佃的事。十月以後，無人敢退佃了。現在退佃另

佃已完全不消說起，只有退佃自耕略有問題。有些地方，地主退佃自耕，農民也不准。有些地方，地主如自耕，可以允許退佃，但同時發生了佃農失業問題。此問題尙無一致的解決辦法。

減息。安化已普遍地減了息，他縣亦有減息的事。惟農會勢盛地方，地主懼怕『共產』，完全『卡借』，農村幾無放債的事。此時所謂減息，限於舊債。舊債不僅減息，連老本也不許債主有逼取之事。貧農說：『怪不得，年歲大了，明年再還吧！』

第四件 推翻土豪劣紳的封建統治——打倒都團〔四〕

舊式的都團（即區鄉）政權機關，尤其是都之一級，即接近縣之一級，幾乎完全是土豪劣紳佔領。『都』管轄的人口有一萬至五六萬之多，有獨立的武裝如團防局，有獨立的財政徵收權如畝捐〔五〕等，有獨立的司法權如隨意對農民施行逮捕、監禁、審問、處罰。這樣的機關裏的劣紳，簡直是鄉裏王。農民對政府如總統、督軍〔六〕、縣長等還比較不留心，這班鄉裏王才真正是他們的『長上』，他們鼻子裏哼一聲，農民曉得這是要十分注意的。這回農村造反的結果，地主階級的威風普遍地打下來，土豪劣紳把持的鄉政機關，自然跟了倒塌。都總團總躲起不敢出面，一切地方上的事都推到農民協會去辦。他們應付的話是：

『不探（管）閒事！』

農民們相與議論，談到都團總，則憤然說：

『那班東西麼，不作用了！』

『不作用』三個字，的確描畫了經過革命風潮地方的舊式鄉政機關。

第五件 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湖南地主階級的武裝，中路較少，西南兩路較多。平均每縣以六百枝步槍計，七十五縣共有步槍四萬五千枝，事實上或者還要多。農民運動發展區域之中南兩路，因農民起來形勢甚猛，地主階級招架不住，其武裝勢力大部分投降農會，站在農民利益這邊，例如寧鄉、平江、瀏陽、長沙、醴陵、湘潭、湘鄉、安化、衡山、衡陽等縣。小部分站在中立地位，但傾向於投降，例如寶慶等縣。再一小部分則站在和農會敵對地位，例如宜章、臨武、嘉禾等縣，但現時農民正在加以打擊，可能於不久時間消滅其勢力。這樣由反動的地主手裏拿過來的武裝，將一律改爲『挨戶團常備隊』^(註)，放在新的鄉村自治機關——農民政權的鄉村自治機關管理之下。這種舊武裝拿過來，是建設農民武裝的一方面。建設農民武裝另有一個新的方面，即農會的梭鏢隊。梭鏢——一種接以長柄的單尖兩刃刀，單湘鄉一縣有十萬枝。其他各縣，如湘潭、衡山、醴陵、長沙等，七八萬枝、五六萬枝、三四萬枝不等。凡有農民運動各縣，梭鏢隊便迅速地發展。這種有梭鏢的農民，將成爲『挨戶團非常備隊』。這個廣大的梭鏢勢力，大

於前述舊武裝勢力，是使一切土豪劣紳看了打顫的一種新起的武裝力量。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這種武裝力量確實普及於七十五縣二千餘萬農民之中，應使每個青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而不應限制它，以爲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胆小鬼！只有土豪劣紳看了害怕，革命黨決不應該看了害怕。

第六件 推翻縣官老爺衙門差役的政權

縣政治必須農民起來才能澄清，廣東的海豐已經有了證明。這回在湖南，尤其得到了充分的證明。在土豪劣紳霸佔權力的縣，無論什麼人去做知事，幾乎都是貪官污吏。在農民已經起來的縣，無論什麼人去，都是廉潔政府。我走過的幾縣，知事遇事要先問農民協會。在農民勢力極盛的縣，農民協會說話是『飛靈的』。農民協會要早晨捉土豪劣紳，知事不敢捱到中午，要中午捉，不敢捱到下午。農民的權力在鄉間初漲起來的時候，縣知事和土豪劣紳是勾結一起共同對付農民的。在農民的權力漲至和地主權力平行的時候，縣知事取了向地主農民兩邊敷衍的態度，農民協會的話，有一些被他接受，有一些被他拒絕。上頭所說農會說話飛靈，是在地主權力被農民權力完全打下去了的時候。現在像湘鄉、湘潭、醴陵、衡山等縣的縣政治狀況是：

(一) 凡事取決於縣長和革命民衆團體的聯合會議。這種會議，由縣長召集，在縣署開。有些縣

名之曰『公法團聯席會議』，有些縣名之曰『縣務會議』。出席的人，縣長以外，爲縣農民協會、縣總工會、縣商民協會、縣女界聯合會、縣教職員聯合會、縣學生聯合會以及國民黨縣黨部^(一)的代表們。在這樣的會議裏，各民衆團體的意見影響縣長，縣長總是唯命是聽。所以，在湖南採用民主的委員制縣政治組織，應當是沒有問題的了。現在的縣政府，形式和實質，都已經是頗民主的了。達到這種形勢，是最近兩三個月的事，即農民從四鄉起來打倒了土豪劣紳權力以後的事。知事看見舊靠山已倒，要做官除非另找靠山，這才開始巴結民衆團體，變成了上述的局面。

(二) 承審員沒有案子。湖南的司法制度，還是知事兼理司法，承審員助知事審案。知事及其僚佐要發財，全靠經手錢糧捐派，辦兵差和在民刑訴訟上顛倒敲詐這幾件事，尤以後一件爲經常可靠的財源。幾個月來，土豪劣紳倒了，沒有了訟棍。農民的大小事，又一概在各級農會裏處理。所以，縣公署的承審員，簡直沒有事做。湘鄉的承審員告訴我：『沒有農民協會以前，縣公署平均每日可收六十件民刑訴訟稟帖；有農會後，平均每日只有四五件了。』於是知事及其僚佐們的荷包，只好空着。

(三) 警備隊、警察、差役，一概斂跡，不敢下鄉敲詐。從前鄉裏人怕城裏人，現在城裏人怕鄉裏人。尤其是縣政府豢養的警察、警備隊、差役這班惡狗，他們怕下鄉，下鄉也不敢再敲詐。他們看見農民的梭鏢就發抖。

第七件

推翻祠堂族長的族權和城隍土地菩薩的神權以至丈夫的男權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國、一省、一縣以至一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爲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之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一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一概跟着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裏『打屁股』、『沉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一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一批貧農擁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着農民運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佔了神的廟宇做會所。一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遊香。渌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菩薩，因爲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够，把大小菩薩堆於一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爲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煮肉

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一個老年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勢力佔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年和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一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一起，許多地方，婦女跟着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一切封建的宗法思想和制度，都隨着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但是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集中於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這一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道男女關係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是這種進攻，現在到底還在『開始』，要完全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鬥爭全部勝利之後。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鬥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係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那就必被土豪劣紳借爲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會主張共妻』等反革命宣傳口號，來破壞農民運動。湖南的湘鄉、湖北的陽新，最近都發生地主利用了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證。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去

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

我在鄉裏也曾向農民宣傳破除迷信。我的話是：

「信八字望走好運，信風水望墳山貫氣。今年幾個月光景，土豪劣紳貪官污吏一齊倒台了。難道這幾個月以前土豪劣紳貪官污吏還大家走好運，大家墳山都貫氣，這幾個月忽然大家走壞運，墳山也一齊不貫氣了麼？土豪劣紳形容你們農會的話是：『巧得很囉，如今是委員世界呀，你看，屙屎都碰了委員。』的確不錯，城裏、鄉裏、工會、農會、國民黨、共產黨無一不有執行委員，確實是委員世界。但這也是八字墳山出的麼？巧得很！鄉下窮光蛋八字忽然都好了！墳山也忽然都貫氣了！神明麼？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農民會，只要關聖帝君、觀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紳麼？那些帝君、大士們也可憐，敬了幾百年，一個土豪劣紳不會替你們打倒！現在你們想減租，我請問你們有什麼法子，信神呀，還是信農民會？」

我這些話，說得農民都笑起來。

第八件 普及政治宣傳

開一萬個法政學校，能不能在這樣短時間內普及政治教育於窮鄉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現在農會

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樣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紳，這幾個政治口號，真是不翼而飛，飛到無數鄉村的青年壯年老頭子小孩子婦女們的面前，一直鑽進他們的腦子裏去，又從他們的腦子裏流到了他們的嘴上。比如有一羣小孩子在那裏玩吧，如果你看見一個小孩子對着另一個小孩子鼓眼瞪腳揚手動氣時，你就立刻可以聽到一種尖銳的聲音，那便是：『打倒帝國主義！』

湘潭一帶的小孩子看牛時打起架來，一個做唐生智，一個做葉開鑫(三)，一會兒一個打敗了，一個跟着追，那追的就是唐生智，被追的就是葉開鑫。『打倒列強……』這個歌，街上的小孩子固然幾乎人人曉得唱了，就是鄉下的小孩子也有很多曉得唱了的。

孫中山先生的那篇遺囑，鄉下農民也有些曉得念了。他們從那篇遺囑裏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義』、『不平等條約』這些名詞，頗生硬地應用在他們的生活上。一個紳士模樣的人在路上碰了一個農民，那紳士擺格不肯讓路，那農民便憤然說：『土豪劣紳！曉得三民主義麼？』長沙近郊菜園農民進城賣菜，老被警察欺負。現在，農民可找到武器了，這武器就是三民主義。當警察打罵賣菜農民時，農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義以相抵制，警察沒有話說。湘潭一個區的農民協會，爲了一件事和一個鄉農民協會不和，那鄉農民協會的委員長便宣言：『反對區農民協會的不平等條約！』

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據農村工作同志的報告，政治宣傳在反

英示威、十月革命紀念和北伐勝利總慶祝這三次大的羣衆集會時做得很普遍。在這些集會裏，有農會的地方普遍地舉行了政治宣傳，引動了整個農村，效力很大。今後值得注意的，就是要利用各種機會，把上述那些簡單的口號，內容漸漸充實，意義漸漸明瞭起來。

第九件 農民諸禁

共產黨領導農會在鄉下樹立了威權，農民便把他們所不喜歡的事禁止或限制起來。最禁得嚴的便是牌、賭、鴉片這三件。

牌：農會勢盛地方，麻雀、骨牌、紙葉子，一概禁絕。

湘鄉十四都地方一個區農會，曾燒了一担麻雀牌。

跑到鄉間去，什麼牌都沒有打，犯禁的即刻處罰，一點客氣也沒有。

賭：從前的『賭痞』，現在自己在那裏禁賭了，農會勢盛地方，和牌一樣弊絕風清。

鴉片：禁得非常之嚴。農會下令令繳煙槍，不敢稍違抗不繳。醴陵一個劣紳不繳煙槍，被捉去遊鄉。

農民這個『繳槍運動』，其聲勢不弱於北伐軍對吳佩孚、孫傳芳（二）軍隊的繳槍。好些革命軍軍官家裏的年尊老太爺，煙癮極重，靠一桿『槍』救命的，都被『萬歲』（劣紳譏諷農民之稱）們繳了去。『萬

歲』們不僅禁種禁吃，還要禁運。由貴州經寶慶、湘鄉、攸縣、醴陵到江西去的鴉片，被攔截焚燒不少。這一來，和政府的財政發生了衝突。結果，還是省農會爲了顧全北伐軍餉，命令下級農會『暫緩禁運』。但農民在那裏憤憤不樂。

三者以外，農民禁止或限制的東西還有很多，略舉之則有：

花鼓。一種小戲，許多地方禁止演唱。

轎子。許多縣有打轎子的事，湘鄉特甚。農民最恨那些坐轎子的，總想打，但農會禁止他們。辦農會的人對農民說：『你們打轎子，反倒替闊人省了錢，轎工要失業，豈非害了自己？』農民們想清楚了，出了新法子，就是大漲轎工價，以此懲富人。

煮酒熬糖。普遍禁止用穀米煮酒熬糖，糟行糖行叫苦不迭。衡山福田鋪地方，不禁止煮酒，但限定酒價於一極小數目，酒店無錢賺，只好不煮了。

豬。限制每家餵豬的數目，因爲豬吃去穀米。

雞鴨。湘鄉禁餵雞鴨，但婦女們反對。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餵三個，福田鋪地方只准餵五個。好些地方完全禁止餵鴨，因爲鴨比雞更無用，它不僅吃掉穀，而且搓死禾。

酒席。豐盛酒席普遍地被禁止。湘潭韶山地方議決客來吃三牲，即只吃雞魚豬。筍子、海帶、南粉都禁止吃。衡山則議決吃八碗，不准多一碗。醴陵東三區只准吃五碗，北二區只准吃三葷三素，西三區禁止請春客。湘鄉禁止『蛋糕席』——一種並不豐盛的席面。湘鄉二都有一家討媳婦，用了蛋糕

席，農民以他不服從禁令，一羣人湧進去，攪得稀爛。湘鄉的嘉謨鎮實行不吃好飲食，用果品祭祖。

牛。這是農民的寶貝。『殺牛的來生變牛』，簡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殺不得的。農民沒有權力時，只能用宗教觀念反對殺牛，沒有實力去禁止。農會起來後，權力管到牛身上去了，禁止城裏殺牛。湘潭城內從前有六家牛肉店，現在倒了五家，剩下一家是殺病牛和廢牛的。衡山全縣禁絕了殺牛。一個農民他有一頭牛跌脫了腳，問過農會，才敢殺。株州商會冒失地殺了一頭牛，農民上街問罪，罰錢而外，放爆竹賠禮。

游民生活。如打春、讚土地、打蓮花落，醴陵議決禁止。各縣有禁止的，有自然消滅沒人幹這些事的。有一種『強告化』又叫『流氓』者，平素非常之兇，現在亦只得屈服於農會之下。湘潭韶山地方有個雨神廟，素聚流氓，誰也不怕，農會起來，悄悄地走了。同地湖堤鄉農會，捉了三個流氓挑土燒窖。拜年陋俗，議決禁止。

此外各地的小禁令還很多，如醴陵禁攤神遊香，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禁中元燒衣包，禁新春貼瑞籤。湘鄉的穀水地方水煙也禁了。二都禁放鞭炮和三眼銃，放鞭炮的罰洋一元二角，放銃的罰洋二元四角。七都和二十都禁做道場。十八都禁送奠儀。諸如此類，不勝枚舉，統名之曰農民諸禁。

這些禁令中，包含兩個重要意義：第一是對於社會惡習之反抗，如禁牌賭鴉片等。這些東西是跟了地主階級惡劣政治環境來的，地主權力既倒，這些東西也跟着掃光。第二是對於城市商人剝削之自衛，如禁吃酒席，禁買南貨齋果送情等等。因為工業品特貴，農產品特賤，農民極為貧困，受商人剝

削厲害，不得不提倡節儉，藉以自衛。至於前述之農民阻穀出境，是因為貧農自己糧食不夠吃，還要向市上買，所以不許糧價高漲。這都是農民貧困和城鄉矛盾的緣故，並非農民拒絕工業品和城鄉貿易，實行所謂東方文化主義^(三)。農民爲了經濟自衛，必須組織合作社，實行共同買貨和消費。還須政府予以援助，使農民協會能組織信用（放款）合作社。如此，農民自然不必以阻穀爲限制食糧價格的方法，也不會以拒絕某些工業品入鄉爲經濟自衛的方法了。

第十件 清 匪

從禹湯文武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國總統，我想沒有那一個朝代的統治者有現在農民協會這樣肅清盜匪的威力。什麼盜匪，在農會勢盛地方，連影子都不見了。巧得很，許多地方，連偷小菜的小偷都沒有了。有些地方，還有小偷。至於土匪，則我所走過的各縣全然絕了跡，那怕從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原因：一是農會會員漫山遍野，梭鏢短棍一呼百應，土匪無處藏踪。二是農民運動起後，穀子價廉，去春每担六元的，去冬只二元，民食問題不如從前那樣嚴重。三是會黨^(三)加入了農會，在農會裏公開地合法地逞英雄，吐怨氣，『山、堂、香、水』^(三)的秘密組織，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殺豬宰羊，重捐重罰，對壓迫他們的土豪劣紳階級出氣也出够了。四是各軍大招兵，『不逞之徒』去了許多。因此，農運一起，匪患告絕。對於這一點，紳富方面也同情於農會。他們的議論是：『農民協會麼？講

良心話，也有一點點好處。』

對於禁牌、賭、鴉片和清匪，農民協會是博得一般人的同情的。

第十一件 廢苛捐

全國未統一，帝國主義軍閥勢力未推翻，農民對政府稅捐的繁重負擔，質言之，即革命軍的軍費負擔，還是沒有法子解除的。但是土豪劣紳把持鄉政時加於農民的苛捐如畝捐等，却因農民運動的興起，土豪劣紳的倒塌而取消，至少也減輕了。這也要算是農民協會的功績之一。

第十二件 文化運動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裏面，最大多數是農民。農村裏地主勢力一倒，農民的文化運動便開始了。試看農民一向痛惡學校，如今却在努力辦夜學。『洋學堂』，農民是一向看不慣的。我從前做學生時，回鄉看見農民反對『洋學堂』，也和一般『洋學生』、『洋教習』一鼻孔出氣，站在洋學堂的利益上面，總覺得農民未免有些不對。民國

十四年在鄉下住了半年，這時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有了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方才明白我是錯了，農民的道理是對的。鄉村小學校的教材，完全說些城裏的東西，不合農村的需要。小學教師對待農民的態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農民的幫助者，反而變成了農民所討厭的人。故農民寧歡迎私塾（他們叫『漢學』），不歡迎學校（他們叫『洋學』），寧歡迎私塾老師，不歡迎小學教員。如今他們却大辦其夜學，名之曰農民學校。有些已經舉辦，有些正在籌備，平均每鄉有一所。他們非常熱心開辦這種學校，認為這樣的學校才是他們自己的。夜學經費，提取迷信公款、祠堂公款及其他開公產。這些公款，縣教育局要提了辦國民學校即是那不合農民需要的『洋學堂』，農民要提了辦農民學校，爭議結果，各得若干，有些地方是農民全得了。農民運動發展的結果，農民的文化程度迅速地提高了。不久的時間內，全省當有幾萬所學校在鄉村中湧出來，不若知識階級和所謂『教育家』者流，空喚『普及教育』，喚來喚去還是一句廢話。

第十三件 合作社運動

合作社，特別是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確是農民所需要的。他們買進貨物要受商人的剝削，賣出農產要受商人的勒抑，錢米借貸要受重利盤剝者的剝削，他們很迫切地要解決這三個問題。去冬長江打仗，商旅路斷，湖南鹽貴，農民爲鹽的需要組織合作社的很多。地主『卡借』，農民因借錢

而企圖組織『借貸所』的，亦所在多有。大問題，就是詳細的正規的組織法沒有。各地農民自動組織的，往往不合作社的原則，因此做農民工作的同志，總是殷勤地問『章程』。假如有適當的指導，合作社運動可以隨農會的發展而發展到各地。

第十四件 修道路，修塘壩

這也是農會的一件功績。沒有農會以前，鄉村的道路非常之壞。無錢不能修路，有錢的人不肯拿出來，只好讓它壞。略有修理，也當作慈善事業，從那些『肯積陰功』的人家化募幾個，修出些又狹又薄的路。農會起來了，把命令發出去，三尺、五尺、七尺、一丈，按照路徑所宜，分等定出寬狹，勒令沿路地主，各修一段。號令一出，誰敢不依？不久時間，許多好走的路都出來了。這却並非慈善事業，乃是出於強迫，但是這一點子強迫實在強迫得還可以。塘壩也是一樣。無情的地主總是要從佃農身上取得東西，却不肯花幾個大錢修理塘壩，讓塘乾旱，餓死佃農，他們却只知收租。有了農會，可以不客氣地發命令強迫地主修塘壩了。地主不修時，農會却很和氣地對地主說道：『好！你們不修，你們出穀吧，斗穀一工！』地主爲斗穀一工划不來，趕快自己修。因此，許多不好的塘壩變成了好塘壩。

總上十四件事，都是農民在農會領導之下做出來的。就其基本的精神說來，就其革命意義說來，請讀者們想一想，那一件不好？說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紳們吧！很奇怪，南昌方面（三）

傳來消息，說蔣介石、張靜江（三）諸位先生的意見，頗不以湖南農民的舉動爲然。湖南的右派領袖劉嶽峙（三）輩，與蔣、張諸公一個意見，都說：『這簡直是赤化了！』我想，這一點子赤化若沒有時，還成個什麼國民革命！嘴裏天天說『喚起民衆』，民衆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這和葉公好龍（三）有什麼兩樣！

〔註釋〕

（一）湖南是當時全國農民運動的中心。

（二）趙恆惕是當時北洋軍閥統治湖南的代理人。一九二六年北伐軍推翻了他的統治。

（三）辛亥革命即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專制朝廷的革命。該年十月十日，一部分新軍在當時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團體的策動下，起義於武昌，其後各省亦相繼起義，滿清的統治很快即土崩瓦解。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選舉孫中山爲臨時大總統。這次革命是經過資產階級和農民、工人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同盟而取得勝利的。但這次革命又由於革命領導集團的妥協性，沒有給農民以真正的利益，並接受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壓力，因而使政權落入北洋軍閥袁世凱之手，革命遂告失敗。

（四）『矯枉過正』是一句成語，原意是糾正錯誤而超過了應有的限度。但舊時有人常用這句話去拘束人們的活動，要人們只在修正舊成規的範圍內活動，而不許完全破壞舊成規。在修正舊成規的範圍內活動，叫做合乎『正』，如果完全破壞舊成規，就叫做『過正』。這也正是改良派和革命隊伍內機會主義者的理論。毛澤東同志在這裏駁斥了這類改良派的理論。所謂『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就是說，要終結舊的封建秩序，必須用羣衆的革命方法，而不是用修正的——改良的方法。

（五）一九二六年冬季及一九二七年春季北伐軍進到長江流域的時候，蔣介石的反革命面目還沒有充分地暴露出來，農民羣衆還認爲他是革命的。地主富農則不高興他，造出了北伐軍打敗仗及蔣介石傷腳的謠言。蔣介石反革命面目的充分暴

露，是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他在上海等地舉行反革命政變，實行屠殺工人，鎮壓農民和打擊共產黨以後。從這時起，地主富農就對他改取擁護態度了。

(六) 廣東是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最早的革命根據地。

(七) 吳佩孚是北洋軍閥著名的代表之一，與一九二三年著名的暗選總統曹錕同屬於北洋軍閥中的直系（即直隸省派系），並奉曹錕為首領，世合稱「曹吳」。吳佩孚從一九二〇年戰敗皖系軍閥段祺瑞後，即左右北洋軍閥政府的政局，為英美帝國主義的代理人，曾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大殺京漢鐵路的罷工工人。一九二四年在與張作霖的戰爭（一般人叫做「直奉戰爭」）中失敗，吳佩孚乃失却北京政權。但一九二六年，經過日英帝國主義的策動，他又和張作霖聯合，因而再起。一九二六年北伐軍從廣東出發，首先直接打倒的敵人即吳佩孚。

(八) 三民主義即孫中山對於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提出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的原則和綱領。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在「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重新解釋三民主義，把民族主義解釋為反對帝國主義，並表示積極擁護工農運動，舊三民主義因此發展為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這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成為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共產黨與國民黨合作的政治基礎。請參看本書第二卷「新民主主義論」第十節。

(九) 不應當容許富農加入農會。一九二七年時期，農民羣衆還不知道這一點。

(十) 毛澤東同志在這裏所指的「赤貧」，是包括雇農（鄉村無產者）和鄉村游民無產者而言。

(一) 指鄉村半無產階級。

(二) 指當時的國民黨縣黨部。

(三) 袁祖銘是當時盤據湘西的一個貴州軍閥。

(四) 湖南的都和團相當於區和鄉。舊式都團的鄉政機關是地主統治農民的工具。都、團的負責人稱「都總」、「團總」。

(五) 指當時豪紳政權除抽收原有田賦外，另行苛剝農民的田畝捐。

(六) 督軍是北洋軍閥的統治在各省所設置的軍事首腦的稱號。督軍實際上總攬全省軍事政治大權，為一省範圍內的獨裁者。他們和帝國主義者相勾結，實行地方性的封建軍事割據。

(七) 挨戶團常備隊，是當時農村武裝組織的一種。「挨戶」是形容幾乎每一戶人家都要參加的意思。在一九二七年革命

失敗後，許多地方的「挨戶團」被地主所奪取，變成了反革命的武裝組織。

〔二〕當時在武漢國民黨中央領導下的各地國民黨縣黨部，很多是屬於執行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組織，是共產黨人、左派國民黨員和其他革命分子的革命聯盟。

〔三〕這句話是從「孟子」上引來的，大意是說善於教人射箭的人，引滿了弓，不射出去，却擺着躍躍欲動的姿勢。在這裏是借來比喻共產黨應當引導農民得到充分的政治覺悟，然後便等待農民自願地自動地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正確的風俗習慣，而不自已發號施令，代替農民去破除。

〔四〕唐生智是當時站在革命方面參加北伐戰爭的一個將軍。葉開鑫是當時站在北洋軍閥方面反對革命的一個將軍。

〔五〕孫傳芳，當時統治江南五省的軍閥，鎮壓上海工人起義的創子手。他的軍隊主力於一九二六年冬天在江西的南昌、九江爲北伐軍所打垮。

〔六〕東方文化主義，是以保存東方落後的農業生產和封建文化爲滿足，而排斥近代科學文明的一種反動思想。

〔七〕請參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註一五。

〔八〕山、堂、香、水，是原始秘密結社的一些宗派的稱號。

〔九〕北伐軍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間佔領南昌，蔣介石利用機會把他的總司令部設在這個地方，集合了國民黨右派和一部分北洋軍閥的政客，勾結帝國主義，佈置反革命的陰謀，以對抗當時革命的武漢。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終於在上海發動了叛變革命的大屠殺的政變。

〔十〕張靜江是當時國民黨右派的頭子之一，爲蔣介石設謀畫策的人。

〔十一〕劉嶽時是湖南當時一個重要的反共團體「左社」的頭子。

〔十二〕葉公好龍，是漢朝劉向所作「新序」一書中講的一個故事：「葉公子高好龍，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施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毛澤東同志在這裏用以比喻蔣介石輩的口談革命，實際則畏懼革命，反對革命。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

(一九二八年十月五日)

一 國內的政治狀況

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對內以新軍閥代替舊軍閥，對工農階級的經濟的剝削和政治的壓迫比從前更加厲害。從廣東出發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到半路被買辦豪紳階級篡奪了領導權，立即轉向反革命路上，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

國民黨新軍閥蔣桂馮閻四派，在北京天津沒有打下以前，有一個對張作霖的臨時的團結。北京天津打下以後，這個團結立即解散，變爲四派內部激烈鬥爭的局面，蔣桂兩派且在醞釀戰爭中。中國內部各派軍閥的矛盾和鬥爭，反映着帝國主義各國的矛盾和鬥爭。故只要各國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狀況存在，各派軍閥就無論如何不能妥協，所有妥協都是暫時的。今天的暫時的妥協，即醞釀着明天的更大的戰爭。

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

中國革命性質仍
然是資產階級民主
革命。

中國革命一方面一天
在進步，中國各派軍閥，
亦作此一天和事，因為
中國是半殖民地國家。

毛澤東選集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五〇

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從廣東出發向長江發展的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為無產階級沒有堅決地執行自己的領導權，被買辦豪紳階級奪取了領導，以反革命代替了革命。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乃遭遇到暫時的失敗。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在此次失敗中，受到很大的打擊，中國資產階級（非買辦豪紳階級）也受了打擊。但最近數個月來，工農階級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的有組織的城市罷工和農村暴動，在南北各地發展起來。軍閥軍隊中的士兵因飢寒而醞釀着很大的不安。同時資產階級在汪精衛、陳公博一派鼓動之下，亦在沿海沿江各地發展着頗大的改良主義運動⁽³⁾。這種運動的發展是新的事實。

中國的民主革命的內容，依國際及中央的指示，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並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這種革命的實際運動，在一九二八年五月濟南慘案⁽⁴⁾以後，是一天一天在發展的。

二 中國紅色政權發生的原因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

* 這是毛澤東同志爲湘贛邊區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寫的決議的一部分，原題爲「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

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第一，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¹⁾，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為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着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爭。帝國主義和國內買辦豪紳階級支持着的各派新舊軍閥，從民國元年以來，相互間進行着繼續不斷的戰爭，這是半殖民地中國的特徵之一。不但全世界帝國主義國家沒有一國有這種現象，就是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也沒有一處有這種現象，僅僅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中國這樣的國家才有這種現象。這種現象產生的原因有兩種，即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因為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够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湘贛邊界的割據，就是這許多小塊中間的一小塊。有些同志在困難和危急的時候，往往懷疑這樣的紅色政權的存在，而發生悲觀的情緒。這是沒有找出這種紅色政權所以發生和存在的正確的解釋的緣故。我們只須知道中國白色政權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不斷的，則紅色政權的發生、存在並且日益發展，便是無疑的了。第二，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够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並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例如四川、貴州、雲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羣衆會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這些省份的許多地方，曾經有過很廣大的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有過工農階級對地主豪紳階級和

紅軍在長江
中的作用是

資產階級的許多經濟的政治的鬥爭。所以廣州產生過三天的城市民衆政權，而海陸豐、湘東、湘南、湘贛邊界、湖北的黃安等地都有過農民的割據。至於此刻的紅軍，也是由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和接受過工農羣衆影響的國民革命軍中分化出來的。那些毫未經過民主的政治訓練、毫未接受過工農影響的軍隊，例如閻錫山、張作霖的軍隊，此時便決然不能分化出可以造成紅軍的成份來。第三，小地方民衆政權之能否長期地存在，則決定於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這一個條件。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不但沒有疑義，而且必然地要作爲取得全國政權的許多力量中間的一個力量。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繼續地向前發展，而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停頓，則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是不可能的。現在中國革命形勢是跟着國內買辦豪紳階級和國際資產階級的繼續的分裂和戰爭，而繼續地向前發展的。所以，不但小塊紅色區域的長期存在沒有疑義，而且這些紅色區域將繼續發展，日漸接近於全國政權的取得。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若只有地方性質的赤衛隊而沒有正式的紅軍，則只能對付挨戶團，而不能對付正式的白色軍隊。所以雖有很好的工農羣衆，若沒有相當力量的正式武裝，便決然不能造成割據局面，更不能造成長期的和日益發展的割據局面。所以『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共產黨和割據地方的工農羣衆必須充分具備的一個重要的思想。第五，紅色政權的長期的存在並且發展，除了上述條件之外，還須有一個要緊的條件，就是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他的政策的不錯誤。

三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的失敗

軍閥間的分裂和戰爭，削弱了白色政權的統治勢力。因此，小地方紅色政權得以乘時產生出來。但軍閥之間的戰爭不是每天不停的。每當一省或幾省之間的白色政權有一個暫時穩定的時候，那一省的統治階級或幾省的統治階級必然聯合起來用盡力量來消滅這個紅色政權。在爲建立和堅持紅色政權所必須的各種條件尚不完備的地方，便有被敵人推倒的危險。本年四月以前乘時而起的許多紅色政權，如廣州、海陸豐、湘贛邊界、湘南、醴陵、黃安各地，都先後受到白色政權的摧殘，就是這個道理。四月以後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軍隊，隨時都有八、九個團以上的兵力，多的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鬥爭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衆政權的組織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壯大，原因就在於湘贛邊界的共產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黨的特委和軍委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創造羅霄山脈（即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正規軍隊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集中紅軍相機應付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爲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上地形之利於鬥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之不盡一致，於是才有四月至七

月四個月中的各次勝利。雖以數倍於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並且不能阻止此割據的日益擴大，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加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志不明瞭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的時候，反而採取統治階級政治破裂時候的戰略，分兵冒進，致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同志不察當時環境，不顧特委、軍委及永新縣委聯席會議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意見，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這種失敗的形勢，因為九月以後特委和軍委採取了糾正錯誤的步驟，而挽救過來了。

四 湘贛邊界的割據局面在湘鄂贛三省的地位

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其意義決不限於邊界數縣，這種割據在湘鄂贛三省工農暴動奪取三省政權的過程中是有很大的意義的。使邊界土地革命和民衆政權的影響遠及於湘贛兩省的下游乃至於湖北，使紅軍從鬥爭中日益增加其數量和提高其質量，能在將來三省總的暴動中執行它的必要的使命，使各縣地方武裝即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的數量增加質量提高起來，此時能夠與挨戶團和小量軍隊作戰，將來能够保全邊界政權，使地方工作人材逐漸減少依靠紅軍中工作人材的幫助，能完全自立，以邊界的人材任邊界的工作，進一步能够供給紅軍的工作人材和擴大割據區域的工作人材——這些都是邊界黨在湘鄂贛三省暴動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任務。

五 經濟問題

在白色勢力的四面包圍中，軍民日用必需品和現金的缺乏，成了極大的問題。一年以來，邊界政權割據的地區，因為敵人的嚴密封鎖，食鹽、布疋、藥材等日用必需品，無時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貴之中，因此引起工農小資產階級（二）羣衆和紅軍士兵羣衆的生活的不安，有時真是到了極度。紅軍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籌餉。每天除糧食外的五分錢伙食費都感到缺乏，營養不足，病的甚多，醫院傷兵，其苦更甚。這種困難，在全國總政權沒有取得以前當然是不能免的，但是這種困難的比較地獲得解決，使生活比較地好一點，特別是紅軍的給養使之比較地充足一點，則是迫切地需要的。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期間的條件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的困難。這個經濟問題的相當的解決，實在值得每個黨員注意。

六 軍事根據地問題

邊界黨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大小五井（三）和九隴兩個軍事根據地的鞏固。永新、酃縣、寧岡、遂川四縣交界的大小五井山區，和永新、寧岡、茶陵、蓮花四縣交界的九隴山區，這兩個地形優越的地方，

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

特別是既有民衆擁護、地形又極險要的大小五井，不但在邊界此時是重要的軍事根據地，就是在湘鄂贛三省暴動發展的將來，亦將仍然是重要的軍事根據地。鞏固此根據地的方法：第一，修築完備的工事；第二，儲備充足的糧食；第三，建設較好的紅軍醫院。把這三件事切實做好，是邊界黨應該努力的。

〔註釋〕

〔一〕毛澤東同志在這裏指的是民族資產階級。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和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作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對於買辦大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區別，曾作了詳細的說明。

〔二〕蔣派指蔣介石派。桂派指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派。馮派指馮玉祥派。閻派指山西軍閥閻錫山派。他們曾聯合對張作霖作戰，於一九二八年六月佔領了北京和天津。

〔三〕張作霖是奉系軍閥首領。一九二四年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被打敗後，張作霖成爲北方最有勢力的一個軍閥。一九二六年他聯合吳佩孚入據北京。一九二八年六月從北京退回東北，在路上被向來利用他做工具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炸死。

〔四〕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日寇佔領濟南及蔣介石公開無恥地對日妥協之後，曾經追隨過一九二七年反革命政變的民族資產階級，有一部分因爲自己的利益，開始逐步形成蔣介石政權的在野反對派。當時汪精衛陳公博等這個投機的反革命政派，曾在這個運動中進行活動，形成了國民黨中的所謂「改組派」。

〔五〕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在英美帝國主義支持下，北上攻打張作霖，日本帝國主義爲阻止英美勢力向北方發展，出兵佔山東省會濟南，截斷津浦鐵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軍在濟南屠殺很多的中國人。這個屠殺稱爲「濟南慘案」。

〔六〕中國紅色政權的組織形式近似於蘇維埃政權。蘇維埃即代表會議，爲俄國工人階級於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創造的一種政治制度。列寧斯大林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出發而得出結論，認爲蘇維埃的共和國是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中最適當的社會政治組織形式。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列寧斯大林的布爾塞維克黨的領導之下，第一次在世界上實現了這種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的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國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之後，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同志爲首所領導的各地民衆革命起義，即以代表會議爲民衆政權的形式。但在中國這個革命階段，這種政權的性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人民民主專政，這是和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的政權性質有區別的。

(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原來屬於英、美、法、荷各帝國主義統治下的東方許多殖民地，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佔領，那裏的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及民族資產階級分子在共產黨領導下，利用英、美、法、荷各帝國主義與日本帝國主義的矛盾，組織了反法西斯侵略的廣泛統一戰綫，建立了抗日根據地，進行了艱苦的抗日游擊戰爭，已開始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政治情況。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逐出，英、美、法、荷各帝國主義企圖繼續原來的殖民地統治，但各殖民地人民已在抗日戰爭中鍛鍊出了一種相當有力的武裝力量，他們不願意照舊生活下去，而由於蘇聯的強大，由於除美國以外的一切帝國主義國家在戰爭中或被推翻或被削弱，更由於中國革命的勝利使帝國主義陣綫在中國被突破，因而使整個帝國主義制度已在世界上發生很大的動搖。這樣，就使東方各殖民地至少是某些殖民地的人民也和中國差不多一樣地有可能長期堅持大小不一的革命根據地和革命政權，有可能長期堅持由鄉村包圍城市的革命戰爭，並有可能由此逐步推進而取得城市，取得該殖民地全國範圍內的勝利。根據這種新的情況，毛澤東同志於一九二八年對於在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條件下這一個問題上所作的觀察，已有了改變。

(八) 這是指在一九二七年蔣介石汪精衛相繼叛變革命後，各地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最初爆發起來的對反革命勢力的反擊行動。在廣州，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工人和革命士兵聯合起義，建立了人民的政權，曾和那在帝國主義直接援助下的反革命軍隊進行激烈的戰鬥，但因力量相差很大，這個人民的起義是失敗了。廣東省東部沿海的海豐、陸豐等地的農民，在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在共產黨員彭湃同志的領導下，已經形成了強大的運動，對於廣州國民革命軍兩次東征反革命派陳炯明的勝利，給了很大的幫助。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反革命後，該地農民於四月、九月、十月，先後舉行三次起義，在海豐、陸豐一帶建立過革命政權，一直堅持到一九二八年四月。在湖南省東部，一九二七年九月，起義的農民曾經佔據過瀏陽、平江、醴陵、株州一帶。與此同時，在湖北省東北部的孝感、麻城、黃安等地，曾有數萬農民的武裝起義，佔領黃安縣城三十餘日。在湖南南部，一九二八年一月，宜章、郴州、耒陽、永興、資興等縣的起義農民，建立過革命政權達三

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够存在？

月之久。

〔九〕赤衛隊是革命根據地中羣衆的武裝組織，不脫離生產。

〔一〇〕羅霄山脈是江西湖南兩省邊界的大山脈，井岡山居於羅霄山脈的中段。

〔一一〕毛澤東同志這裏所說的小資產階級，是指農民以外的手工業者、小商人、各種自由職業者和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中國此等社會成份主要在城鎮，但在鄉村中也佔有相當數量。參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

〔一二〕大小五井山區就是指界於江西西部的永新、寧岡、遂川和湖南東部的酃縣四縣之間的井岡山，因爲在井岡山上有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等地。

井岡山的鬥爭*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湘贛邊界的割據和八月失敗

一國之內，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間，產生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紅色政權區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國有這種事。我們分析它發生的原因之一，在於中國有買辦豪紳階級間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只要買辦豪紳階級間的分裂和戰爭是繼續的，則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也將是能够繼續的。此外，工農武裝割據的存在和發展，還需要具備下列的條件：(1)有很好的羣衆；(2)有很好的黨；(3)有相當力量的紅軍；(4)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5)有足夠給養的經濟力。

在統治階級政權的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割據地區對四圍統治階級必須採取不同的戰略。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例如兩湖在李宗仁唐生智戰爭時期(1)，廣東在張發奎李濟深戰爭時期(2)，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用軍事發展割據的地方可以比較地廣大。但是仍然需要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備白色恐怖到來時有所恃而不恐。若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例

如今年四月以後的南方各省，則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這時在軍事上最忌分兵冒進，在地方工作方面（分配土地，建立政權，發展黨，組織地方武裝）最忌把人力分得四散，而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各地許多小塊紅色區域的失敗，不是客觀上條件不具備，就是主觀上策略有錯誤。至於策略之所以錯誤，全在未曾把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和破裂的時期這兩個不同的時期分別清楚。有些同志在統治階級政權暫時穩定的時期，也主張分兵冒進，甚至主張只用赤衛隊保衛大塊地方，好像完全不知道敵人方面除了挨戶團之外還有正式軍隊集中來打的一回事。在地方工作方面，則完全不注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的基礎，不顧主觀力量的可能，只圖無限量的推廣。如果遇到什麼人在軍事方面主張採取逐步推廣的政策，在地方工作方面主張集中力量建立中心區域的堅實基礎，以求自立於不敗之地，則謚之曰『保守主義』。他們的這種錯誤意見，就是今年八月湘贛邊界失敗以及同時紅軍第四軍在湘南失敗的根本原因。

湘贛邊界的工作，從去年十月做起。開頭，各縣完全沒有了黨的組織，地方武裝只袁文才、王佐各六十枝壞槍在井岡山附近，永新、蓮花、茶陵、酃縣四縣農民自衛軍槍枝全數繳給了豪紳階級，羣衆革命情緒已經被壓下去了。到今年二月，寧岡、永新、茶陵、遂川都有了黨的縣委，酃縣有了特別區委，蓮花亦開始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萬安縣委發生了關係。地方武裝，除酃縣外，各縣都有了少數。

在寧岡、茶陵、遂川、永新，特別是遂川、永新二縣，進行了很多次打倒豪紳、發動羣衆的游擊暴動，成績都還好。這個時期，土地革命還沒有深入。政權機關稱爲工農兵政府。軍中組織了士兵委員會（二部隊分開行動時，則組織行動委員會指揮之。這時黨的高級指導機關，是秋收起義時湖南省委任命的前敵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三月上旬，前委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而取消，改組爲師委（何挺穎爲書記），變成單管軍中黨的機關，對地方黨不能過問。同時毛部又因湘南特委的要求調往湘南，遂使邊界被敵佔領者一個多月。三月底湘南失敗，四月朱、毛兩部及湘南農軍退到寧岡，再開始邊界的割據。

四月以後，湘贛邊界的割據，正值南方統治勢力暫時穩定的時候，湘贛兩省派來『進剿』的反動軍隊，至少有八、九個團，多的時候到過十八個團。然而我們以不足四個團的兵力，和敵人鬥爭了四個月之久，使割據地區一天一天擴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衆政權一天一天推廣，紅軍和赤衛隊一天一天擴大，原因就在於邊界黨（地方的黨和軍隊的黨）的政策是正確的。當時邊界特委（毛澤東爲書記）和軍委（陳毅爲書記）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鬥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羣衆的割據，佈置長期鬥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採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因爲這些策略的適當，加以邊界地形的利於鬥爭，湘贛兩省進攻軍隊的不盡一致，於是才有四月至七月四個月的各次軍事勝利和羣衆割據的發展。雖以數倍

於我之敵，不但不能破壞此割據，且亦不能阻止此割據的發展。此割據對湘贛兩省的影響，則有日益擴大之勢。八月失敗，完全在於一部分同志不明瞭當時正是統治階級暫時穩定時期，反而採取在統治階級破裂時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進，致使邊界和湘南同歸失敗。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和省委派充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乘力持異議的毛澤東、宛希先諸人遠在永新的時候，不察當時的環境，不顧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聯席會議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張的決議，只知形式地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紅軍第二十九團（成份是宜章農民）逃避鬥爭欲回家鄉的情緒，因而招致邊界和湘南兩方面的失敗。

原來七月中旬，湖南敵人第八軍吳尚侵入寧岡，再進永新，求戰不得（我軍從間道出擊不值），畏我羣衆，倉卒經蓮花退回茶陵。這時紅軍大隊正由寧岡進攻酃縣、茶陵，並在酃縣變計折赴湘南，而江西敵人第三軍王均、金漢鼎部五個團，第六軍胡文斗部六個團，又協力進攻永新。此時我軍只有一個團在永新，在廣大羣衆的掩護之下，用四面游擊的方式，將此十一團敵軍困在永新縣城附近三十里內至二十五天之久。最後因敵人猛攻，才失去永新，隨後又失去蓮花、寧岡。這時江西敵人忽然發生內訌，胡文斗的第六軍倉皇退去，隨即和王均的第三軍戰於樟樹。留下的贛軍五個團，亦倉皇退至永新城內。設我大隊不往湘南，擊潰此敵，使割據地區推廣至吉安、安福、萍鄉，和平江瀏陽啣接起來，是完全有可能的。大隊已不在，我一團兵復疲憊不堪，乃決留一部分會同袁、王兩部守井岡山，而我率兵一部往桂東方向迎還大隊。此時大隊已由湘南退向桂東，八月二十三日我們在桂東得到會合。

紅軍大隊七月中剛到酃縣時，第二十九團官兵即因政治動搖，欲回湖南家鄉，不受約束；第二十八團反對往湘南，欲往贛南，但也不願回永新。杜修經導揚第二十九團的錯誤意見，軍委亦未能加以阻止，大隊遂於七月十七日由酃縣出發，向郴州前進。七月二十四日與敵范石生戰於郴州，先勝後敗，撤出戰鬥。第二十九團隨即自由行動，跑向宜章家鄉，結果一部在樂昌被土匪胡鳳章消滅，一部散在郴宜各地，不知所終，當日收集的不過百人。幸主力第二十八團損失不大，於八月十八日佔領桂東。二十三日，會合從井岡山來的部隊，議決經崇義、上猶重回井岡山。當到崇義時，營長袁崇全率一步兵連一砲兵連叛變，雖然追回了這兩個連，但犧牲了團長王爾琢。八月三十日敵湘贛兩軍各一部乘我軍欲歸未歸之際，攻擊井岡山。我守軍不足一營，憑險抵抗，將敵擊潰，保存了這個根據地。

此次失敗的原因是：（1）一部官兵動搖思家，失掉戰鬥力；一部官兵不願往湘南，缺乏積極性。（2）盛暑遠征，兵力疲憊。（3）從酃縣冒進數百里，和邊界失去聯繫，成了孤軍。（4）湘南羣衆未起來，成了單純的軍事冒險。（5）敵情不明。（6）準備不好，官兵不了解作戰的意義。

割據地區的現勢

今年四月以來，紅色區域逐漸推廣。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永新寧岡交界）一戰，第四次擊破江西敵人之後，我區有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縣東南部，是爲

邊界全盛時期。在紅色區域，土地大部分配了，小部在分配中。區鄉政權普遍建立。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都有縣政府，並成立了邊界政府。鄉村普遍組織了工農暴動隊，區縣兩級則有赤衛隊。七月贛敵進攻，八月湘贛兩敵會攻井岡山，邊界各縣的縣城及平原地區盡爲敵據。爲虎作倀的保安隊、挨戶團橫行無忌，白色恐怖佈滿城鄉。黨的組織和政權的組織大部塌台。富農和黨內的投機分子紛紛反水。八月三十日井岡山一戰，湘敵始退往酃縣，贛敵仍盤踞各縣城及大部鄉村。然而山區是敵人始終無法奪取的，這在寧岡有西北兩區，在永新有北鄉的天龍區，西鄉的小西江區，南鄉的萬年山區，在蓮花有上西區，在遂川有井岡山區，在酃縣有青石岡和大院區。七八兩月，紅軍一個團配合各縣赤衛隊大小數十戰，僅失槍三十枝，最後退入山區。

我軍經崇義、上猶向井岡山回軍之際，贛南敵軍獨立第七師劉士毅部追至遂川。九月十三日，我軍擊敗劉士毅，繳槍數百，佔領遂川。九月二十六日回到井岡山。十月一日，與敵熊式輝部周渾元旅戰於寧岡獲勝，收復寧岡全縣。此時湘敵駐桂東的閻仲儒部有一百二十六人投入我軍，編爲特務營，畢占雲爲營長。十一月九日，我軍又擊破周旅一個團於寧岡城和龍源口。翌日進佔永新，隨即退回寧岡。目前我區南自遂川井岡山南麓，北至蓮花邊界，包括寧岡全縣，遂川、酃縣、永新各一部，成南北狹長的整塊。蓮花的上西區，永新的天龍區、萬年山區，則和整塊不甚連屬。敵人企圖以軍事進攻和經濟封鎖消滅我們的根據地，我們正在準備打破敵人的進攻。

軍事問題

邊界的鬥爭，完全是軍事的鬥爭，黨和羣衆不得不一齊軍事化。怎樣對付敵人，怎樣作戰，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問題。所謂割據，必須是武裝的。那一處沒有武裝，或者武裝不夠，或者對付敵人的策略錯了，地方就立即被敵人佔去了。這種鬥爭，一天比一天激烈，問題也就非常地繁複和嚴重。

邊界紅軍的來源：（一）潮汕葉賀舊部⁽⁵⁾；（二）前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⁶⁾；（三）平瀏的農民⁽⁷⁾；（四）湘南的農民⁽⁸⁾和水口山的工人⁽⁹⁾；（五）許克祥、唐生智、白崇禧、朱培德、吳尚、熊式輝等部的俘虜兵；（六）邊界各縣的農民。但是葉賀舊部、警衛團和平瀏農民，經過一年多的戰鬥，只剩下三分之一。湘南農民，傷亡也大。因此，前四項雖然至今還是紅軍第四軍的骨幹，但已遠不如後二項多。後二項中又以敵軍俘虜爲多，設無此項補充，則兵員大成問題。雖然如此，兵的增加和槍的增加仍不相稱，槍不容易損失，兵有傷、亡、病、逃，損失甚易。湖南省委答應送安源工人⁽¹⁰⁾來此，亟盼實行。紅軍成份，一部是工人、農民，一部是游民無產者。游民成份太多，當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戰鬥，傷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戰鬥力，能找到游民補充已屬不易。在此種情形下，只有加緊政治訓練的一法。

紅軍士兵大部分是由僱傭軍隊來的，但一到紅軍即變了性質。首先是紅軍廢除了僱傭制，使士兵

感覺不是爲他人打仗，而是爲自己爲人民打仗。紅軍至今沒有什麼正規的薪餉制，只發糧食、油鹽柴菜錢和少數的零用錢。紅軍官兵中的邊界本地人都分得了土地，只是遠籍人分配土地頗爲困難。

經過政治教育，紅軍士兵都有了階級覺悟，都有了分配土地、建立政權和武裝工農等項常識，都知道是爲了自己和工農階級而作戰。因此，他們能在艱苦的鬥爭中不出怨言。連、營、團都有了士兵會，代表士兵利益，並做政治工作和民衆工作。

黨代表制度（二），經驗證明不能廢除。特別是在連一級，因黨的支部建設在連上，黨代表更爲重要。他要督促士兵委員會進行政治訓練，指導民運工作，同時要担任黨的支部書記。事實證明，那一個連的黨代表較好，那一個連就較健全，而連長在政治上却不易有這樣大的作用。因爲下級幹部死傷太多，敵軍俘虜兵往往過來不久，就要當連排長；今年二三月間的俘虜兵，現在有當了營長的。從表面看，似乎既稱紅軍，就可以不要黨代表了，實在大謬不然。第二十八團在湘南曾經取消了黨代表，後來又恢復了。改稱指導員，則和國民黨的指導員相混，爲俘虜兵所厭惡。且易一名稱，於制度的本質無關。故我們決定不改。黨代表傷亡太多，除自辦訓練班訓練補充外，希望中央和兩省委派可充黨代表的同志至少三十人來。

普通的兵要訓練半年一年才能打仗，我們的兵，昨天入伍今天就要打仗，簡直無所謂訓練。軍事技術太差，作戰只靠勇敢。長時間的休息訓練是不可能的，只有設法避開一些戰鬥，爭取時間訓練，看可能否。爲着訓練下級軍官，現在辦了一個百五十人的教導隊，準備經常辦下去。希望中央和兩省

委多派連排長以上的軍官來。

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些。現在則相反，除糧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鹽柴菜錢，還是難乎爲繼。僅僅發油鹽柴菜錢，每月也需現洋萬元以上，全靠打土豪供給^(二)。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有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麼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伙伕，除糧食外一律吃五分錢的伙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三)。因此士兵也不怨恨什麼人。

作戰一次，就有一批傷兵。由於營養不足、受凍和其他原因，官兵病的很多。醫院設在山上，用中西兩法治療，醫生藥品均缺。現在醫院中共有八百多人。湖南省委答應辦藥，至今不見送到。仍祈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西醫和一些碘片來。

紅軍的物質生活如此菲薄，戰鬥如此頻繁，仍能維持不敵，除黨的作用外，就是靠實行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官長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廢除煩瑣的禮節，經濟公開。士兵管理伙食，仍能從每日五分的油鹽柴菜錢中節餘一點作零用，名曰『伙食尾子』，每人每日約得六七文。這些辦法，士兵很滿意。尤其是新來的俘虜兵，他們感覺國民黨軍隊和我們軍隊是兩個世界。他們雖然感覺紅軍的物質生活不如白軍，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中國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義，軍隊也需要民主主義。軍隊內的民主主義制度，將是破壞封建僱傭軍隊的一個重要

的武器〔四〕。

黨的組織，現分連支部、營委、團委、軍委四級。連有支部，班有小組。紅軍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五〕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現在紅軍中黨員和非黨員約爲一與三之比，即平均四個人中有一個黨員。最近決定在戰鬥兵中發展黨員數量，達到黨員非黨員各半的目的〔六〕。現在連支部缺乏好的書記，請中央從各地不能立足的活動分子中派遣多人來此充當。湘南來的工作人員，幾乎盡數在軍中做黨的工作。可是八月間在湘南跑散了一些，所以現在不能調出人去。

地方武裝有赤衛隊和工農暴動隊。暴動隊以梭鏢、鳥槍爲武器，鄉爲單位，每鄉一隊，人數以鄉的大小爲比例。職務是鎮壓反革命，保衛鄉政權，敵人來了幫助紅軍或赤衛隊作戰。暴動隊始於永新，原是秘密的，奪取全縣以後，公開了。這個制度現已推行於邊界各縣，名稱未改。赤衛隊的武器主要是五響槍，也有九響和單響槍。各縣槍數：寧岡百四十，永新二百二十，蓮花四十三，茶陵五十，酃縣九十，遂川百三十，萬安十，共六百八十三。大部是紅軍發給的，小部是自己從敵人奪取的。各縣赤衛隊大都經常地和豪紳的保安隊、挨戶團作戰，戰鬥力日益增強。馬日事變〔七〕以前，各縣有農民自衛軍。槍數：攸縣三百，茶陵三百，酃縣六十，遂川五十，永新八十，蓮花六十，寧岡（袁文才部）六十，井岡山（王佐部）六十，共九百七十。馬日事變後，除袁、王兩部無損失外，僅遂川保存六枝，蓮花保存一枝，其餘概被豪紳繳去。農民自衛軍如此沒有把握槍枝的能力，這是機會主義路綫的結果。

現在各縣赤衛隊的槍枝還是很不够，不如豪紳的槍多，紅軍必須繼續在武器上給赤衛隊以幫助。在不降低紅軍戰鬥力的條件之下，必須盡量幫助人民武裝起來。我們業經規定紅軍每營用四連制，每連步槍七十五枝，加上特務連，機關槍連，迫擊砲連，團部和三個營部，每團有步槍一千零七十五枝。作戰繳獲的槍，則盡量武裝地方。赤衛隊的指揮官，由各縣派人進紅軍所辦的教導隊受訓後充當。由紅軍派遠地人到地方去當隊長，必須逐漸減少。朱培德亦在武裝他的保安隊和挨戶團，邊界各縣豪紳武裝的數量和戰鬥力，頗爲可觀。我們紅色地方武裝的擴大，更是刻不容緩。

紅軍以集中爲原則，赤衛隊以分散爲原則。當此反動政權暫時穩定時期，敵人能集中大量軍力來打紅軍，紅軍分散是不利的。我們的經驗，分兵幾乎沒有一次不失敗，集中兵力以擊小於我或等於我或稍大於我之敵，則往往勝利。中央指示我們發展的游擊區域，縱橫數千里，失之太廣，這大概是對我們力量估計過大的緣故。赤衛隊則以分散爲有利，現在各縣赤衛隊都採取分散作戰辦法。

對敵軍的宣傳，最有效的方法是釋放俘虜和醫治傷兵。敵軍的士兵和營、連、排長被我們俘虜過來，即對他們進行宣傳工作，分爲願留願去兩種，願去的即發路費釋放。這樣就把敵人所謂『共匪見人就殺』的欺騙，立即打破。楊池生的『九師旬刊』，對於我們的這種辦法有『毒矣哉』的驚歎。紅軍士兵們對於所捉俘虜的撫慰和歡送，十分熱烈，在每次『歡送新弟兄大會』上，俘虜兵演說也回報我們以熱烈的感激。醫治敵方傷兵，效力也很大。聰明的敵人例如李文彬，近來也仿效我們的辦法，不殺俘虜，醫治被俘傷兵。不過，在再作戰時，我們的人還是有拖槍回來的，這樣的事已有過兩回。此

外，文字宣傳，如寫標語等，也盡力在做。每到一處，壁上寫滿了口號。惟缺繪圖的技術人材，請中央和兩省委送幾個來。

軍事根據地：第一個根據地是井岡山，介在寧岡、酃縣、遂川、永新四縣之交。北麓是寧岡的茅坪，南麓是遂川的黃坳，兩地相距九十里。東麓是永新的拿山，西麓是酃縣的水口，兩地相距八十里。四周從拿山起經龍源口（以上永新）、新城、茅坪、大龍（以上寧岡）、十都、水口、下村（以上酃縣）、營盤圩、戴家埔、大汾、堆子前、黃坳、五斗江、車坳（以上遂川）到拿山，共計五百五十里。山上大井、小井、上井、中井、下井、茨坪、下莊、行州、草坪、白泥湖、羅浮各地，均有水田和村莊，爲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但人口不滿兩千，產穀不滿萬担，軍糧全靠寧岡、永新、遂川三縣輸送。山上要隘，都築了工事。醫院、被服廠、軍械處、各團留守處，均在這裏。現在正從寧岡搬運糧食上山。若有充足的給養，敵人是打不進來的。第二個根據地是寧岡、永新、蓮花、茶陵四縣交界的九隴山，重要性不及井岡山，爲四縣地方武裝的最後根據地，也築了工事。在四圍白色政權中間的紅色割據，利用山險是必要的。

土地問題

邊界土地狀況：大體說來，土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在地主手裏，百分之四十以下在農民手裏。江

西方面，遂川的土地最集中，約百分之八十是地主的。永新次之，約百分之七十是地主的。萬安、寧岡、蓮花自耕農較多，但地主的土地仍佔比較的多數，約百分之六十，農民只佔百分之四十。湖南方面，茶陵、酃縣兩縣均有約百分之七十的土地在地主手中。

中間階級問題：在上述土地狀況之下，沒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二)，是能得到大多數人擁護的。但農村中略分爲三種階級，即大、中地主階級，小地主、富農的中間階級，中農貧農階級。富農往往與小地主利害聯在一起。富農土地在土地總額中佔少數，但與小地主土地合計，則數量頗大。這種情形，恐全國亦差不多。邊界對於土地是採取全部沒收、徹底分配的政策；故在紅色區域，豪紳階級和中間階級，同被打擊。政策是如此，實際執行時却大受中間階級的阻礙。當革命初期，中間階級表面上投降貧農階級，實際則利用他們從前的社會地位及家族主義，恐嚇貧農，延長分田的時間。到無可延宕時，即隱瞞土地實數，或自據肥田，把瘠田讓人。此時期內，貧農因長期地被摧殘及感覺革命勝利無保障，往往接受中間階級的意見，不敢積極行動。必待進至革命高漲，如得了全縣甚至幾縣政權，反動軍隊幾次戰敗，紅軍的威力幾次表現之後，農村中才有對於中間階級的積極行動。如永新南鄉，是中間階級最多的地方，延宕分田及隱瞞土地也最厲害。到六月二十三日龍源口紅軍大勝之後，區政府又處理了幾個延宕分田的人，才實際地分下去。但是無論那一縣，封建的家族組織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個村子，或一姓幾個村子，非有一個比較長的時間，村子內階級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義不能戰勝。

白色恐怖下中間階級的反水：中間階級在革命高漲時受到打擊，白色恐怖一來，馬上反水。引導反動軍隊大燒永新、寧岡革命農民的房子的，就是兩縣的小地主和富農。他們依照反動派的指示，燒屋、捉人，十分勇敢。紅軍再度到寧岡、新城、古城、贛市一帶時，有數千農民聽信反動派的共產黨將要殺死他們的宣傳，跟了反動派跑到永新。經過我們『不殺反水農民』、『歡迎反水農民回來割禾』的宣傳之後，才有一些農民慢慢地跑回來。

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的過重打擊是主因。然若全國在革命高漲中，貧農階級有所恃而增加勇氣，中間階級亦有所懼而不敢亂爲。當李宗仁唐生智戰爭向湖南發展時，茶陵的小地主向農民求和，有送豬肉給農民過年的（這時紅軍已退出茶陵向遂川去了）。李唐戰爭結束，就不見有這等事了。現在全國是反革命高漲時期，被打擊的中間階級在白色區域內幾乎完全附屬於豪紳階級去了，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一九）。

日常生活壓迫，影響中間階級反水：紅區白區對抗，成爲兩個敵國。因爲敵人的嚴密封鎖和我們對小資產階級的處理失當這兩個原因，兩區幾乎完全斷絕貿易，食鹽、布疋、藥材等項日常必需品的缺乏和昂貴，木材、茶、油等農產品不能輸出，農民斷絕進款，影響及於一般人民。貧農階級比較尚能忍受此苦痛，中等階級到忍不住時，就投降豪紳階級。中國豪紳軍閥的分裂和戰爭若不是繼續進行的，全國革命形勢若不是向前發展的，則小塊地區的紅色割據，在經濟上將受到極大的壓迫，割據的

長期存在將成問題。因為這種經濟壓迫，不但中等階級忍不住，工人貧農和紅軍亦恐將有耐不住之時。永新、寧岡兩縣沒有鹽吃，布疋、藥材完全斷絕，其他更不必說。現在鹽已有賣，但極貴。布疋、藥材仍然沒有。寧岡及永新西部、遂川北部（以上均目前割據地）出產最多的木材和茶、油，仍然運不出去（107）。

土地分配的標準：以鄉爲分配土地的單位。山多田少地方，如永新之小江區，以三、四鄉爲一個單位去分配的也有，但極少。所有鄉村中男女老幼，一律平分。現依中央辦法，改以勞動力爲標準，能勞動的比不能勞動的多分一倍（117）。

向自耕農讓步問題：尙未詳細討論。自耕農中之富農，自己提出要求，欲以生產力爲標準，即人工和資本（農具等）多的多分田。富農覺得平均分和按勞動力分兩種方法都於他們不利。他們的意思，在人工方面，他們願意多努力，加上資本的力量，他們可以多得收穫。若照普通人一樣分了，蔑視了（閒置了）他們的特別努力和多餘的資本，他們是不願意的。此間仍照中央辦法執行。但此問題，仍當討論，候得結論再作報告。

土地稅：寧岡收的是百分之二十，比中央辦法多收半成，已在徵收中，不好變更，明年再減。此外，遂川、贛縣、永新各一部在割據區域內，都是山地，農民太苦，不好收稅。政府和赤衛隊用費，靠向白色區域打土豪。至於紅軍給養，米暫可從寧岡土地稅取得，錢亦完全靠打土豪。十月在遂川游擊，籌得萬餘元，可用一時，用完再講。

政權問題

縣、區、鄉各級民衆政權是普遍地組織了，但是名不副實。許多地方無所謂工農兵代表會。鄉、區兩級乃至縣一級，政府的執行委員會，都是用一種羣衆會選舉的。一哄而集的羣衆會，不能討論問題，不能使羣衆得到政治訓練，又最便於知識分子或投機分子的操縱。一些地方有了代表會，亦僅認爲是對執行委員會的臨時選舉機關；選舉完畢，大權攬於委員會，代表會再不談起。名副其實的工農兵代表會組織，不是沒有，只是少極了。所以如此，就是因爲缺乏對於代表會這個新的政治制度的宣傳和教育。封建時代獨裁專斷的惡習慣深中於羣衆乃至一般黨員的頭腦中，一時掃除不淨，遇事貪圖便利，不喜歡麻煩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一定要在革命鬥爭中顯出了它的效力，使羣衆了解它是最能發動羣衆力量和最利於鬥爭的，方能普遍地真實地應用於羣衆組織。我們正在制訂詳細的各級代表會組織法（依據中央的大綱），把以前的錯誤逐漸糾正。紅軍中的各級士兵代表會議，現亦正在使之經常建立起來，糾正從前只有士兵委員會而無士兵代表會的錯誤。

現在民衆普遍知道的『工農兵政府』，是指委員會，因爲他們尚不認識代表會的權力，以爲委員會才是真正的權力。沒有代表大會作依靠的執行委員會，其處理事情，往往脫離羣衆的意見，對沒收及分配土地的猶豫妥協，對經費的濫用和貪污，對白色勢力的畏避或鬥爭不堅決，到處發現。委員會

也很少開全體會，遇事由常委處決。區鄉兩級政府則常委會也少開，遇事由主席、秘書、財務或赤衛隊長（暴動隊長）各自處理決定，這四個人是經常駐會的。所以，民主集中主義，在政府工作中也用得不習慣。

初期的政府委員會中，特別是鄉政府一級，小地主富農爭着要幹。他們掛起紅帶子，裝得很熱心，用騙術鑽入了政府委員會，把持一切，使貧農委員只作配角。只有在鬥爭中揭破了他們的假面，貧農階級起來之後，方能去掉他們。這種現象雖不普遍，但在很多地方都發現了。

黨在羣衆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却差得多。這是由於許多事情爲圖省便，黨在那裏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情形是很多的。政權機關裏的黨團組織有些地方沒有，有些地方有了也用得不完滿。以後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國民黨直接向政府下令的錯誤辦法，是要避免的。

黨的組織問題

與機會主義鬥爭的經過：馬日事變前後，邊界各縣的黨，可以說是被機會主義操縱的。當反革命到來時，很少堅決的鬥爭。去年十月，紅軍（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到達邊界各縣時，只剩下若干避難藏匿的黨員，黨的組織全部被敵人破壞了。十一月到今年四月，爲重新建黨時期，五月

以後爲大發展時期。一年以來，黨內機會主義現象仍然到處發現，一部分黨員無鬥爭決心，敵來躲入深山，叫做『打埋伏』。一部分黨員富有積極性，却又流於盲目的暴動。這些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這種情形，經過長期的鬥爭鍛鍊和黨內教育，逐漸減少了。同時，在紅軍中，這種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也是存在的。敵人來了，主張拚一下，否則就要逃跑。這兩種思想，往往在討論作戰時由一個人說出來。經過了長時間黨內的鬥爭和客觀事實的教訓，例如拚一下遭了損傷，逃跑遭了失敗，才逐漸地改變過來。

地方主義：邊界的經濟，是農業經濟，有些地方還停留在杵臼時代（山地大都用杵臼舂米，平地方有許多石碓）。社會組織是普遍地以一姓爲單位的家族組織。黨在村落中的組織，因居住關係，許多是一姓的黨員爲一個支部，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在這種情形下，『鬥爭的布爾塞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各縣之間地方主義很重，一縣內的各區乃至各鄉之間也有很深的地方主義。這種地方主義的改變，說道理，至多發生幾分效力，多半要靠白色勢力的非地方主義的壓迫。例如反革命的兩省『會剿』，使人民在鬥爭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漸地打破他們的地方主義。經過了許多這樣的教訓，地方主義是減少了。

土客籍問題：邊界各縣還有一件特別的事，就是土客籍的界限。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着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鬥爭。這種客籍人從

閩粵邊起，沿湘、贛兩省邊界，直至鄂南，大概有幾百萬人。客籍佔領山地，爲佔領平地的土籍所壓迫，素無政治權利。前年和去年的國民革命，客籍表示歡迎，以爲出頭有日。不料革命失敗，客籍被土籍壓迫如故。我們的區域內，寧岡、遂川、酃縣、茶陵，都有土客籍問題，而以寧岡的問題爲最嚴重。前年至去年，寧岡的土籍革命派和客籍結合，在共產黨領導之下，推翻了土籍豪紳的政權，掌握了全縣。去年六月，江西朱培德政府反革命，九月，豪紳帶領朱培德軍隊『進剿』寧岡，重新挑起土客籍人民之間鬥爭。這種土客籍的界限，在道理上講不應引到被剝削的工農階級內部來，尤其不應引到共產黨內部來。然而在事實上，因爲多年遺留下來的習慣，這種界限依然存在。例如邊界八月失敗，土籍豪紳帶領反動軍隊回寧岡，宣傳客籍將要殺土籍，土籍農民大部分反水，掛起白帶子，帶領白軍燒屋搜山。十月、十一月紅軍打敗白軍，土籍農民跟着反動派逃走，客籍農民又去沒收土籍農民的財物。這種情況，反映到黨內來，時常發生無謂的鬥爭。我們的辦法是一面宣傳『不殺反水農民』，『反水農民回來一樣得田地』，使他們脫離豪紳的影響，安心回家；一面由縣政府責令客籍農民將沒收的財物退還原主，並出佈告保護土籍農民。在黨內，加緊教育，務使兩部分黨員團結一致。

投機分子的反水：革命高漲時（六月），許多投機分子乘公開徵收黨員的機會混入黨內，邊界黨員數量一時增到一萬以上。支部和區委的負責人多屬新黨員，不能有好的黨內教育。白色恐怖一到，投機分子反水，帶領反動派捉拿同志，白區黨的組織大半塌台。九月以後，厲行洗黨，對於黨員成份加以嚴格的限制。永新、寧岡兩縣的黨組織全部解散，重新登記。黨員數量大爲減少，戰鬥力反而增

加。過去黨的組織全部公開，九月以後，建設秘密的組織，準備在反動派來了也能活動。同時多方伸入白區，在敵人營壘中去活動。但在附近各城市中還沒有黨的基礎。其原因一因城市中敵人勢力較大，二因我軍在佔領這些城市時太損害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致使黨員在那裏難於立足。現在糾正錯誤，力求在城市中建設我們的組織，但成效尙不多見。

黨的領導機關：支部幹事會改稱委員會。支部上爲區委，區委上爲縣委。區委縣委之間因特別情況有組織特別區委的，如永新的北鄉特區及東南特區。邊區共有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酃縣五個縣委。茶陵原有縣委，因工作做不進去，去冬今春建設的許多組織大部被白色勢力打塌了，半年以來只能在靠近寧岡永新一帶的山地工作，因此將縣委改爲特別區委。攸縣、安仁均須越過茶陵，派人去過，無功而返。萬安縣委一月間曾和我們在遂川開過一次聯席會議，大半年被白色勢力隔斷，九月紅軍游擊到萬安，才又接一次頭。有八十個革命農民跟隨到井岡山，組織萬安赤衛隊。安福沒有黨的組織。吉安鄰接永新，吉安縣委僅和我們接過兩次頭，一點幫助不給，奇怪得很。桂東的沙田一帶，三月八日兩度分配土地，建設了黨的組織，屬於以龍溪十二洞爲中心的湘南特委管轄。各縣縣委之上爲湘贛邊界特委。五月二十日，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寧岡茅坪開會，選舉第一屆特委會委員二十三

人，毛澤東爲書記。七月湖南省委派楊開明來，楊代理書記。九月楊病，譚震林代理書記。八月紅軍大隊往湘南，白色勢力高壓邊界，我們曾在永新開過一次緊急會議。十月紅軍返至寧岡，乃在茅坪召集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十月十四日起開會三天，通過了『政治問題和邊界黨的任務』等決議，選

舉了譚震林、朱德、陳毅、龍超清、朱昌偕、劉天千、圓盤珠、譚思聰、譚兵、李卻非、宋亦岳、袁文才、王佐農、陳正人、毛澤東、宛希先、王佐、楊開明、何挺穎等十九人爲第二屆特委會的委員。五人爲常委，譚震林（工人）爲書記，陳正人（知識分子）爲副書記。十一月十四日紅軍第六次全軍大會，選舉二十三人組織軍委，五人爲常委，朱德爲書記。特委及軍委統轄於前委。前委是十一月六日重新組織的，依中央的指定，以毛澤東、朱德、地方黨部書記（譚震林）、一工人同志（宋喬生）、一農民同志（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爲書記。前委暫設秘書處、宣傳科、組織科和職工運動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前委管理地方黨。特委仍有存在的必要，因爲前委有時要隨軍行動。我們感覺無產階級思想領導的問題，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份的黨，若不給以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其趨向是會要錯誤的。除應積極注意各縣城和大市鎮的職工運動外，並應在政權機關中增加工人的代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也應增加工人和貧農的成份。

革命性質問題

我們完全同意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中國現時確實還是處在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階段。中國澈底的民權主義革命的綱領，包括對外推翻帝國主義，求得澈底的民族解放；對內肅清買辦階級的在城市的勢力，完成土地革命，消滅鄉村的封建關係，推翻軍閥政府。必定要經過這樣的民權主義

革命，方能造成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真正基礎。我們一年來轉戰各地，深感全國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面有少數小塊地方的紅色政權，一方面全國人民還沒有普通的民權，工人農民以至民權派的資產階級，一概沒有言論集會的權利，加入共產黨是最大的犯罪。紅軍每到一地，羣衆冷冷清清，經過宣傳之後，才慢慢地起來。和敵軍打仗，不論那一軍都要硬打，沒有什麼敵軍內部的倒戈或暴動。馬日事變後招募『暴徒』最多的第六軍，也是這樣。我們深深感覺寂寞，我們時刻盼望這種寂寞生活的終了。要轉入到沸熱的全國高漲的革命中去，則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在內的政治的經濟的民權主義鬥爭的發動，是必經的道路。

對小資產階級的政策，我們在今年二月以前，是比較地執行得好的。三月湘南特委的代表到寧岡，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於是改變原來前委的領導人，政策一變。四月全軍到邊界後，燒殺雖仍不多，但對城市中等商人的沒收和鄉村小地主富農的派款，是做得十分厲害的。湘南特委提出的『一切工廠歸工人』的口號，也宣傳得很普遍。這種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使他們掛起白帶子反對我們。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在遂川特別收到了好的效果，縣城和市鎮上的商人不畏避我們了，頗有說紅軍的好話的。草林圩上逢圩（日中爲市，三天一次），到圩兩萬人，爲從來所未有。這件事，證明我們的政策是正確的了。豪紳對人民的稅捐很重，遂川靖衛團（三）在黃垆到草林七十里路上要抽五道稅，無論什麼農產都不能免。我們打掉靖衛團，取消這些稅，獲得了農民和中小商

人全體的擁護。

中央要我們發佈一個包括小資產階級利益的政綱，我們則提議請中央制訂一個整個民權革命的政綱，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

以農業爲主要經濟的中國的革命，以軍事發展暴動，是一種特徵。我們建議中央，用大力做軍事運動。

割據地區問題

廣東北部沿湖南江西兩省邊界至湖北南部，都屬羅霄山脈區域。整個的羅霄山脈我們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較起來，以寧岡爲中心的羅霄山脈的中段，最利於我們的軍事割據。北段地勢不如中段可進可守，又太迫近了大的政治都會，如果沒有迅速奪取長沙或武漢的計劃，則以大部兵力放在瀏陽、醴陵、萍鄉、銅鼓一帶是很危險的。南段地勢較北段好，但羣衆基礎不如中段，政治上及於湘贛兩省的影響也小些，不如中段一舉一動可以影響兩省的下游。中段的長處：（1）有經營了一年多的羣衆基礎。（2）黨的組織有相當的基礎。（3）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創造了富有鬥爭經驗的地方武裝，這是十分難得的；這個地方武裝的力量，加上紅軍第四軍的力量，是任憑什麼敵人也不能消滅的。（4）有很好的軍事根據地——井岡山，地方武裝的根據地則各縣都有。（5）影響兩省，且能影響兩省的下游，

比較湘南贛南等處只影響一省，且在一省的上游和僻地者，政治意義大不相同。中段的缺點，是因割據已久，『圍剿』軍多，經濟問題，特別是現金問題，十分困難。

湖南省委對於此間的行動計劃，六七月間數星期內，曾三變其主張。第一次袁德生來，贊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計劃。第二次杜修經、楊開明來，主張紅軍毫不猶豫地向湘南發展，只留二百枝槍會同赤衛隊保衛邊界，並說這是『絕對正確』的方針。第三次袁德生又來，相隔不過十天，這次信上除罵了我們一大篇外，却主張紅軍向湘東去，又說是『絕對正確』的方針，而且又要我們『毫不猶豫』。我們接受了這樣硬性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當第二次信到時，軍委、特委、永新縣委舉行聯席會議，認為往湘南危險，決定不執行省委的意見。數天之後，却由杜修經楊開明堅持省委意見，利用第二十九團的鄉土觀念，把紅軍拉去攻郴州，致邊界和紅軍一齊失敗。紅軍數量上約損失一半；邊界則被焚之屋、被殺之人不可勝數，各縣相繼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復。至於往湘東，在湘鄂贛三省豪紳政權尚未分裂之前，亦決不宜用紅軍的主力去。設七月無去湘南一舉，則不但可免邊界的八月失敗，且可乘國民黨第六軍和王均戰於江西樟樹之際，擊破永新敵軍，席捲吉安、安福，前鋒可達萍鄉，而與北段之紅第五軍取得聯絡。即在這種時候，也應以寧岡為大本營，去湘東的只能是游擊部隊。因豪紳間戰爭未起，湘邊萍鄉、茶陵、攸縣尚有大敵，主力北向，必為所乘。中央要我們考慮往湘東或往湘南，實行起來都很危險，湘東之議雖未實現，湘南則已有證驗。這種痛苦的經驗，是值得我們時時記着的。

現在是豪紳階級統治還沒有破裂的時期，環邊界而『進剿』的敵軍，尚有十餘團之多。但若我們於現金問題能繼續找得出路（糧食衣服已不成大問題），則憑藉邊界的基礎，對付此數敵人，甚至更多的敵人，均有辦法。爲邊界計，紅軍若走，則像八月那樣的蹂躪，立可重來。赤衛隊雖不至完全消滅，黨和羣衆的基礎將受到極大的摧殘，除山頭割據可以保存一些外，平地均將轉入秘密狀態，如八九月間一樣。紅軍不走，以現在的基礎可以逐漸向四周發展，前途的希望是很大的。爲紅軍計，欲求擴大，只有在有羣衆基礎的井岡山四周即寧岡、永新、酃縣、遂川四縣，利用湘贛兩敵利害不一致，四面防守，無法集中的情況，和敵人作長期的鬥爭。利用正確的戰術，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必有俘獲，如此可以逐漸擴大紅軍。以四月至七月那時邊界羣衆的準備，紅軍大隊若無湘南之行，則八月間紅軍的擴大是沒有疑義的。雖然犯了一次錯誤，紅軍已捲土重來此地利人和之邊界，前途希望還是不惡。紅軍必須在邊界這等地方，下鬥爭的決心，有耐戰的勇氣，才能增加武器，練出好兵。邊界的紅旗子，業已打了一年，雖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贛三省乃至全國豪紳階級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漸漸引起了附近省份工農士兵羣衆的希望。以士兵論，因軍閥們把向邊界『剿匪』當做一件大事，『剿匪經年，耗費百萬』（魯滌平），『人稱二萬，槍號五千』（王均），如此等類的話，逐漸引起敵軍士兵和無出路的下級官長對我們注意，自拔來歸的將日益增多，紅軍擴充，又是一條來路。並且邊界紅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所以我們始終認爲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創造和擴大，是十分必要和十分正確的。

〔註釋〕

〔一〕這個戰爭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十月間。

〔二〕這個戰爭發生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二月間。

〔三〕紅軍士兵代表會議和士兵委員會制度，後來廢除了。到一九四七年，又採用了由幹部領導的軍人會議和士兵委員會的制度。

〔四〕「反水」意爲叛變。

〔五〕即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義的葉挺、賀龍二同志的舊部（葉部見本文註一五）。這些部隊在向潮州汕頭進軍失敗後，其一部分由朱德林彪陳毅諸同志率領退出廣東，經過江西，轉入湖南南部，進行游擊戰爭。一九二八年四月間到達井岡山與毛澤東同志會合。

〔六〕一九二七年革命時代的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其幹部多爲共產黨員。汪精衛等叛賣革命後，這個警衛團於七月底離開武昌，準備到南昌參加起義軍。行至中途，聞南昌起義軍已經南下，乃到修水與平瀏農軍會合。

〔七〕湖南平江、瀏陽一帶在一九二七年春形成了相當有力的農民武裝。五月二十一日許克祥在長沙發動反革命事變（即『馬日事變』），屠殺革命羣衆。五月三十一日，平瀏一帶的農軍會向長沙前進，準備向反革命還擊，但因被機會主義的陳獨秀所阻止，又向後撤退。一部分農民隊伍隨即組成獨立團，進行游擊戰爭。八月一日南昌起義後，平瀏農軍在修水、銅鼓、平江、瀏陽一帶與前武昌國民政府警衛團會合，和萍鄉煤礦工人的武裝相配合，舉行秋收起義。起義部隊在十月間由毛澤東同志率領到井岡山。

〔八〕一九二八年初，朱德同志在湖南進行革命游擊戰爭，原來農民運動有基礎的宜章、郴州、耒陽、永興、資興五縣，這時都組織了農軍。後來這部分農軍由朱德同志率領到井岡山與毛澤東同志會合。

〔九〕湖南常寧縣水口山爲重要鉛礦產地。那裏的礦工，一九二二年即在共產黨領導之下，組織了工會，歷年與反革命鬥爭。一九二七年秋收起義後，許多工人參加了紅軍。

〔一〇〕安源煤礦爲漢冶萍公司之一部，在江西省萍鄉縣境內。當時有礦工一萬二千人。一九二二年起中國共產黨湖南省

委即派人到安源工作，建立了黨和工會的組織。

(二) 紅軍中的黨代表一九二九年起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一九三一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

(三) 用「打土豪」罰款的方法籌措軍費，只能是臨時的和部分的。軍隊大了，地域寬了，就必須而且可能用收稅的方法籌措軍費。

(四) 此種辦法在紅軍中施行了一個很長時期，在當時曾是必要的，後來改變為按等級略有一些區別。

(五) 毛澤東同志在這裏特別着重地指出了革命軍隊內部一定的民主生活的必要，這是因為當時紅軍初建，非強調民主，不足以鼓舞新入伍的農民和俘虜過來的白軍士兵的革命積極性，不足以肅清幹部中由反動軍隊傳來的軍閥主義習氣的緣故。當然，部隊中的民主生活必須是在軍事紀律所許可的範圍內，必須是為着加強紀律而不是為着削弱紀律，所以在部隊中提倡必要的民主的時候，必須同時反對要求極端民主的無紀律現象。而這種現象在初期的紅軍中曾經一度嚴重地存在過。關於毛澤東同志反對軍隊中極端民主化的鬥爭，請看「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一文。

(六) 一九二六年北伐時，葉挺同志的部隊為一個獨立團，以共產黨員為骨幹，是北伐中有名的戰鬥部隊。革命軍佔領武昌以後，擴大為第二十四師，南昌起義後，又擴大為第十一軍。

(七) 事實上紅軍中的黨員人數佔全軍三分之一左右即好，後來在紅軍和人民解放軍中大體上都是如此。

(八)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蔣介石汪精衛等唆使湖南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許克祥何鍵等，在長沙圍攻湖南省工會、省農民協會及一切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人及革命的工農羣衆。講中國詩韻的書把「馬」字和與「馬」同韻的字列在上聲第二十一韻，以「馬」為該韻韻目，故二十一日舊時簡稱「馬日」，而五月二十一日發生的湖南事變亦簡稱為「馬日事變」。這個事變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反革命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開合流的信號。

(九) 這是一九二八年湘贛邊區規定的土地法的一條。毛澤東同志後來指出：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是一種錯誤，這種錯誤是由於當時缺乏土地鬥爭的經驗而來的。一九二九年四月與國縣土地法把「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土地」。

(十) 鑒於爭取農村中間階級的重要，毛澤東同志隨即糾正了打擊中間階級過重的錯誤政策。毛澤東同志對中間階級的政策主張除見於本文外，又見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紅軍第六次代表大會提案（內有「禁止盲目焚殺」，「保護中小商人利益」

等項），一九二九年一月紅軍第四軍佈告（內有『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餘皆不論』等語），一九二九年四月興國縣土地法（見本文註一八），等等。

（二〇）此種情況，依靠革命戰爭的發展，根據地的擴大和革命政府保護工商業的政策，是可以改變的，後來也已經改變了。這裏的關鍵是堅決地保護民族工商業，反對過左的政策。

（二一）以勞動力為標準的分配土地的方法，是不妥當的。事實上在紅色區域長期中都是以按人口平分為原則。

（二二）靖衛團是反革命的地方武裝。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紅軍第四軍的共產黨內存在着各種非無產階級的思想，這對於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妨礙極大。若不徹底糾正，則中國偉大革命鬥爭給予紅軍第四軍的任務，是必然擔負不起來的。四軍黨內種種不正確思想的來源，自然是由於黨的組織基礎的最大部分是由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成份所構成的，但是黨的領導機關對於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堅決的鬥爭，缺乏對黨員作正確路線的教育，也是使這些不正確思想存在和發展的重要原因。大會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的精神，指出四軍黨內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的表現，來源及其糾正的方法，號召同志們起來徹底地加以肅清。

關於單純軍事觀點

單純軍事觀點在紅軍一部分同志中非常發展。其表現如：

(一) 認為軍事政治二者是對立的，不承認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甚至還有說『軍

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事好，政治自然會好，軍事不好，政治也不會好』的，則更進一步認為軍事領導政治了。

(二) 以爲紅軍的任務也和白軍相彷彿，只是單純地打仗的。不知道中國的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特別是現在，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滅敵人軍事力量之外，還要負擔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幫助羣衆建立革命政權以至於建立共產黨的組織等項重大的任務。紅軍的打仗，不是單純地爲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爲了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並幫助羣衆建設革命政權才去打仗的，離了對羣衆的宣傳、組織、武裝和建設革命政權等項目標，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義，也就是失去了紅軍存在的意義。

(三) 因此，在組織上，把紅軍的政治工作機關隸屬於軍事工作機關，提出『司令部對外』的口號。這種思想如果發展下去，便有走到脫離羣衆、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的道路一樣。

* 這是毛澤東同志爲紅軍第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寫的決議。中國人民軍隊的建設，是經過了艱難的道路的。中國紅軍（抗日時期是八路軍、新四軍，現在是人民解放軍）從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義時期創始，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經過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這個時期內，紅軍中的共產黨和各種錯誤思想作鬥爭，學到了許多東西，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毛澤東同志寫的這個決議，就是這些經驗的總結。這個決議使紅軍完全建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礎上，將一切舊式軍隊的影響都肅清了。這個決議不但在紅軍第四軍實行了，後來各部分紅軍都先後不等地照此做了，這樣就使整個中國紅軍完全成爲真正的人民軍隊。二十幾年來，中國人民軍隊中的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有廣大的發展和創造，現在的面貌和過去大不相同了，但是基本的路線還是這個決議的路線。

(四) 同時，在宣傳工作上，忽視宣傳隊的重要性。在羣衆組織上，忽視軍隊士兵會的組織和對地方工農羣衆的組織。結果，宣傳和組織工作，都成了被取消的狀態。

(五) 打勝仗就驕傲，打敗仗就消極。

(六) 本位主義，一切只知道爲四軍打算，不知道武裝地方羣衆是紅軍的重要任務之一。這是一種放大了的小團體主義。

(七) 有少數同志囿於四軍的局部環境，以爲除此就沒有別的革命勢力了。因此，保存實力、避免鬥爭的思想非常濃厚。這是機會主義的殘餘。

(八) 不顧主客觀條件，犯着革命的急性病，不願意艱苦地做細小嚴密的羣衆工作，只想大幹，充滿着幻想。這是盲動主義的殘餘〔1〕。

單純軍事觀點的來源：

(一) 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認識軍隊中政治領導的作用，不認識紅軍和白軍是根本不同的。

(二) 僱傭軍隊的思想。因爲歷次作戰俘虜兵甚多，此種分子加入紅軍，帶來了濃厚的僱傭軍隊的思想，使單純軍事觀點有了下層基礎。

(三) 因有以上兩個原因，便發生第三個原因，就是過分相信軍事力量，而不相信人民羣衆的力量。

(四) 黨對於軍事工作沒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也是形成一部分同志的單純軍事觀點的原因。

糾正的方法：

(一) 從教育上提高黨內的政治水平，肅清單純軍事觀點的理論根源，認清紅軍和白軍的根本區別。同時，還要肅清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的殘餘，打破四軍本位主義。

(二) 加緊官兵的政治訓練，特別是對俘虜成份的教育要加緊。同時，盡可能由地方政權機關選派有鬥爭經驗的工農分子，加入紅軍，從組織上削弱以至去掉單純軍事觀點的根源。

(三) 發動地方黨對紅軍黨的批評和羣衆政權機關對紅軍的批評，以影響紅軍的黨和紅軍的官兵。

(四) 黨對於軍事工作要有積極的注意和討論。一切工作，在黨的討論和決議之後，再經過羣衆去執行。

(五) 編制紅軍法規，明白地規定紅軍的任務，軍事工作系統和政治工作系統的關係，紅軍和人民羣衆的關係，士兵會的權能及其和軍事政治機關的關係。

關於極端民主化

紅軍第四軍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後，極端民主化的現象，減少了不少。例如黨的決議比較地能夠執行了，要求在紅軍中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權制』、『先交下級討論，再由上級決議』等項錯誤

主張，也沒有人再提了。但是在實際上，這種減少，只是一時的和表面的現象，還不是極端民主化的思想的肅清。這就是說，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還深種在許多同志的思想中。例如對於決議案的執行，表示種種勉強的態度，就是證據。

糾正的方法：

(一) 從理論上剷除極端民主化的根苗。首先，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危險，在於損傷以至完全破壞黨的組織，削弱以至完全毀滅黨的戰鬥力，使黨担负不起鬥爭的責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敗。其次，要指出極端民主化的來源，在於小資產階級的自由散漫性。這種自由散漫性帶到黨內，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組織上的極端民主化的思想。這種思想是和無產階級的鬥爭任務根本不相容的。

(二) 在組織上，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線是：

- 1 黨的領導機關要有正確的指導路線，遇事要拿出辦法，以建立領導的中樞。
- 2 上級機關要明瞭下級機關的情況和羣衆生活的情况，成爲正確指導的客觀基礎。
- 3 黨的各級機關解決問題，不要太隨便。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
- 4 上級機關的決議，凡屬重要一點的，必須迅速地傳達到下級機關和黨員羣衆中去。其辦法是開活動分子會，或開支部以至縱隊的黨員大會（須看環境的可能），派人出席作報告。
- 5 黨的下級機關和黨員羣衆對於上級機關的指示，要經過詳盡的討論，以求澈底地了解指示的意義，並決定對它的執行方法。

關於非組織觀點

四軍黨內存在着的非組織的觀點，其表現如下：

甲 少數不服從多數。例如少數人的提議被否決，他們就不誠意地執行黨的決議。

糾正的方法：

(一) 開會時要使到會的人盡量發表意見。有爭論的問題，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調和敷衍。一次不能解決的，二次再議（以不妨礙工作爲條件），以期得到明晰的結論。

(二) 黨的紀律之一是少數服從多數。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得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

乙 非組織的批評：

(一) 黨內批評是堅強黨的組織、增加黨的戰鬥力的武器。但是紅軍黨內的批評有些不是這樣，變成了攻擊個人。其結果，不但毀壞了個人，也毀壞了黨的組織。這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表現。糾正的方法，在於使黨員明白批評的目的是增加黨的戰鬥力以達到階級鬥爭的勝利，不應當利用批評去做攻擊個人的工具。

(二) 許多黨員不在黨內批評而在黨外去批評。這是因爲一般黨員還不懂得黨的組織（會議等）

的重要，以爲批評在組織內或在組織外沒有什麼分別。糾正的方法，就是要教育黨員懂得黨的組織的重要性，對黨委或同志有所批評應當在黨的會議上提出。

關於絕對平均主義

紅軍中的絕對平均主義，有一個時期發展得很厲害。例如：發給傷兵用費，反對分傷輕傷重，要求平均發給。官長騎馬，不認爲是工作需要，而認爲是不平等制度。分物品要求極端平均，不願意有特別情形的部分多分去一點。措米不問大人小孩體強體弱，要平均措。住房子要分得一樣平，司令部住了一間大點的房子也要罵起來。派勤務要派得一樣平，稍微多做一點就不肯。甚至在一副担架兩個傷兵的情況，寧願大家抬不成，不願把一個人抬了去。這些都證明紅軍官兵中的絕對平均主義還很嚴重。

絕對平均主義的來源，和政治上的極端民主化一樣，是手工業和小農經濟的產物，不過一則見之於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於物質生活方面罷了。

糾正的方法：應指出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因爲這是現時

鬥爭環境所需要的。但是必須反對不問一切理由的絕對平均主義，因為這不是鬥爭的需要，適得其反，是於鬥爭有妨礙的。

關於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在某些黨員中濃厚地存在，這對分析政治形勢和指導工作，都非常不利。因為對於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的分析和對於工作的主觀主義的指導，其必然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至於黨內的主觀主義的批評，不要證據的亂說，或互相猜忌，往往釀成黨內的無原則糾紛，破壞黨的組織。

關於黨內批評問題，還有一點要說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評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們不明白批評的主要任務，是指出政治上的錯誤和組織上的錯誤。至於個人缺點，如果不是與政治的和組織的錯誤有聯繫，則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們無所措手足。而且這種批評一發展，黨內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點方面，人人變成了謹小慎微的君子，就會忘記黨的政治任務，這是很大的危險。

糾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黨員使黨員的思想和黨內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學化。要達到這個目的，就要：（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鬥爭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

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

關於個人主義

紅軍黨內的個人主義的傾向有如下各種表現：

(一)報復主義。在黨內受了士兵同志的批評，到黨外找機會報復他，打罵就是報復的一種手段。在黨內也尋報復，你在這次會議上說了我，我就在下次會議上找岔子報復你。這種報復主義，完全從個人觀點出發，不知有階級的利益和整個黨的利益。它的目標不在敵對階級，而在自己隊伍裏的別的個人。這是一種削弱組織、削弱戰鬥力的銷蝕劑。

(二)小團體主義。只注意自己小團體的利益，不注意整體的利益，表面上不是為個人，實際上包含了極狹隘的個人主義，同樣地具有很大的銷蝕作用和離心作用。紅軍中歷來小團體風氣很盛，經過批評現在是好些了，但其殘餘依然存在，還須努力克服。

(三)僱傭思想。不認識黨和紅軍都是執行革命任務的工具，而自己是其中的一員。不認識自己是革命的主體，以為自己僅僅對長官個人負責任，不是對革命負責任。這種消極的僱傭革命的思想，也是一種個人主義的表現。這種僱傭革命的思想，是無條件努力的積極活動分子所以不很多的原

因。僱傭思想不肅清，積極活動分子便無由增加，革命的重担便始終放在少數人的肩上，於鬥爭極為不利。

(四) 享樂主義。個人主義見於享樂方面的，在紅軍中也有不少的人。他們總是希望隊伍開到大城市去。他們要到大城市不是爲了去工作，而是爲了去享樂。他們最不樂意的是在生活艱難的紅色區域裏工作。

(五) 消極怠工。稍不遂意，就消極起來，不做工作。其原因主要是缺乏教育，但也有是領導者處理問題、分配工作或執行紀律不適當。

(六) 離隊思想。在紅軍工作的人要求脫離隊伍調地方工作的與日俱增。其原因，也不完全是個人的，尚有一，紅軍物質生活過差；二，長期鬥爭，感覺疲勞；三，領導者處理問題、分配工作或執行紀律不適當等項原因。

糾正的方法：主要是加強教育，從思想上糾正個人主義。再則處理問題、分配工作、執行紀律要得當。並要設法改善紅軍的物質生活，利用一切可能時機休息整理，以改善物質條件。個人主義的社會來源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思想在黨內的反映，當進行教育的時候必須說明這一點。

關於流寇思想

由於紅軍中游民成份佔了很大的數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游民羣衆的存在，就在紅軍中產生了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這種思想表現在：一，不願意做艱苦工作建立根據地，建立人民羣衆的政權，並由此去擴大政治影響，而只想用流動游擊的方法，去擴大政治影響。二，擴大紅軍，不走由擴大地方赤衛隊、地方紅軍到擴大主力紅軍的路綫，而要走『招兵買馬』『招降納叛』的路綫。三，不耐煩和羣衆在一塊作艱苦的鬥爭，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凡此一切流寇思想的表現，極大地妨礙着紅軍去執行正確的任務，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爲紅軍黨內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目標。應當認識，歷史上黃巢^(一)、李闖^(二)式的流寇主義，已爲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

糾正的方法：

- (一) 加緊教育，批評不正確思想，肅清流寇主義。
- (二) 對現有紅軍基本隊伍和新來的俘虜兵，加緊反流氓意識的教育。
- (三) 爭取有鬥爭經驗的工農積極分子加入紅軍隊伍，改變紅軍的成份。
- (四) 從鬥爭的工農羣衆中創造出新的紅軍部隊。

關於盲動主義殘餘

紅軍黨內對盲動主義已經做了鬥爭，但尙不充分。因此，紅軍中還有盲動主義思想的殘餘存在

着。其表現如：一，不顧主觀和客觀條件的盲幹。二，城市政策執行得不充分，不堅決。三，軍紀鬆懈，特別是打敗仗時。四，還有某些部隊有燒屋行爲。五，槍斃逃兵的制度和肉刑制度，也是帶着盲動主義性質的。盲動主義的社會來源是流氓無產者的思想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的綜合。

糾正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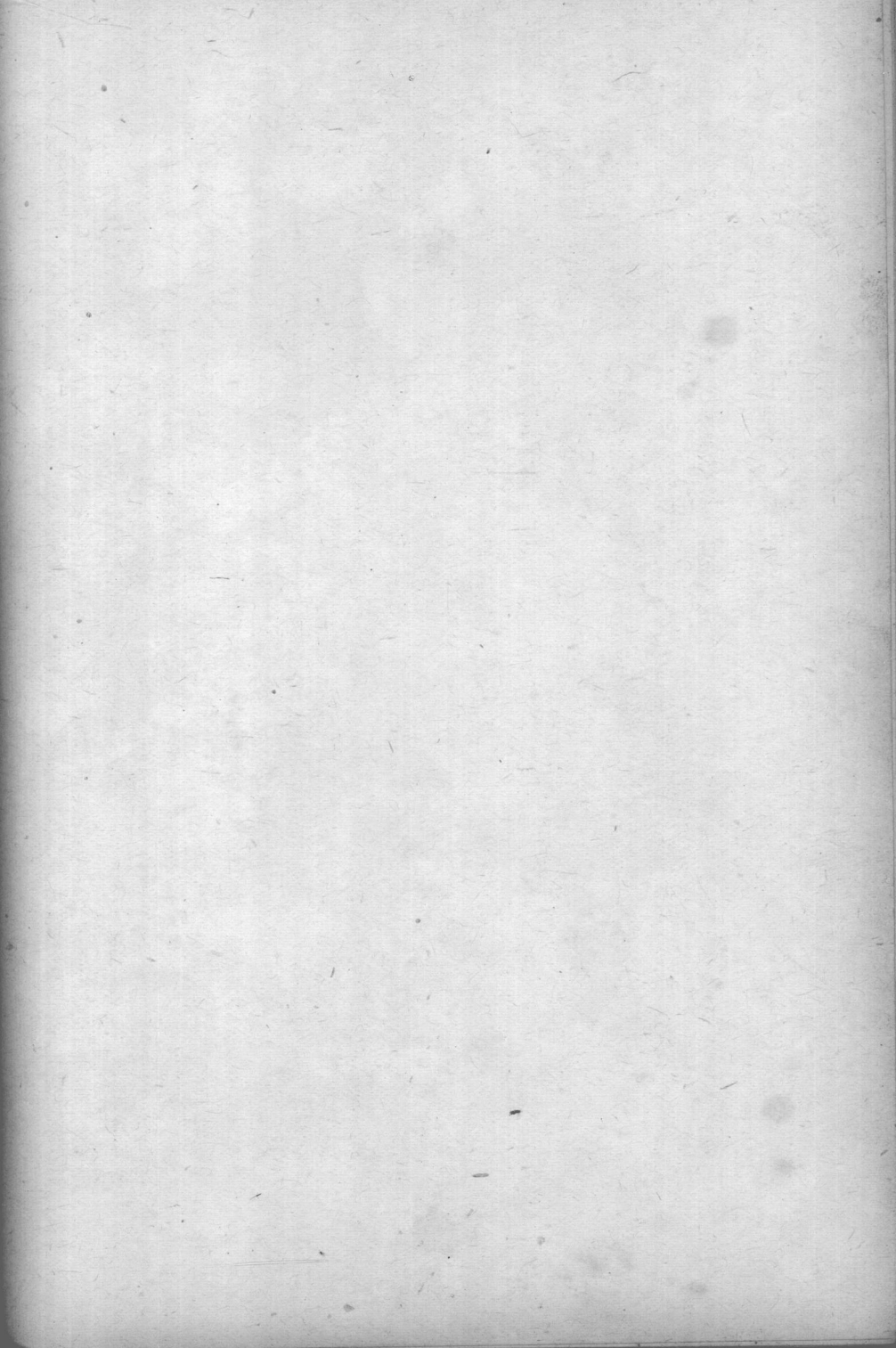
- (一) 從思想上肅清盲動主義。
- (二) 從制度上和政策上糾正盲動的行爲。

〔註釋〕

(一)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短期間，在共產黨內曾經出現一種「左」傾盲動主義傾向，認爲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所謂「不斷革命」，中國革命的形勢是所謂「不斷高漲」，因而不肯去組織有秩序的退却，錯誤地用命令主義的方法，企圖依靠少數黨員和少數羣衆在全國組織毫無勝利希望的許多的地方起義。這種盲動主義的行動曾經在一九二七年底流行過，到了九二八年初漸漸地停止了下來。但有些黨員也還存在着這種情緒。盲動主義就是冒險主義。

(二) 黃巢是唐朝末年農民起義的領袖，曹州冤句（今平原省菏泽縣）人。公元八七五年，即唐僖宗乾符二年，黃巢聚衆響應王仙芝領導的起義。王仙芝被殺後，黃巢收集王的餘部，號「衝天大將軍」。黃巢帶領的起義隊伍曾經兩次出山東流動作戰。第一次由山東到河南，轉入安徽和湖北，由湖北回到山東。第二次又由山東到河南，轉到江西，經浙東到福建及廣東，轉廣西經湖南到湖北，再由湖北東進安徽浙江等地，然後渡淮入河南，克洛陽，攻破潼關。據有長安。黃巢入長安後建立齊國，稱皇帝。後因內部分裂（大將朱溫降唐），又被沙陀族酋長李克用的軍隊進攻，黃巢失長安，又入河南，由河南回到山東，終於失敗自殺。黃巢的戰爭繼續了十年，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農民戰爭之一。舊統治階級的史書稱：當時「民之困於重斂者爭歸之」。但他只是簡單地進行流動的戰爭，沒有建立過比較穩固的根據地，所以被稱爲「流寇」。

〔三〕李闡即李自成，是明朝末年農民起義的領袖，陝西米脂人。公元一六二八年，即明思宗崇禎元年，陝西北部農民形成起義的潮流。李自成參加高迎祥的起義隊伍，曾經由陝西入河南，到安徽，折回陝西。一六三六年高迎祥死，李自成被推爲闡王。李自成在羣衆中的主要口號是「迎闡王，不納糧」。他約束隊伍的紀律，曾有「殺一人如殺我父，淫一婦如淫我母」的口號。因此，擁護他的人很多，成爲當時農民起義的主流。但他也沒有建立過比較穩固的根據地，總是東流西竄。他於被推爲闡王後，率部入川，折回陝南，經湖北又入河南，旋佔湖北襄陽，再經河南攻陝西西安，於一六四四年經山西攻入北京。不久爲明將吳三桂勾引清兵聯合進攻而失敗。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

在對於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上，我們黨內有一部分同志還缺少正確的認識。他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却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他們不贊成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在福建、廣東、江西之間的三個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同時也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因此也就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他們似乎認為在距離革命高潮尚遠的時期做這種建立政權的艱苦工作爲徒勞，而希望用比較輕便的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政治影響，等到全國各地爭取羣衆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個地步了，然後再來一個全國武裝起義，那時把紅軍的力量加上去，就成爲全國範圍的大革命。他們這種全國範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羣衆後建立政權的理論，是於中國革命的實情不適合的。他們的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則一，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二，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就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三，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四，就會明白相應於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着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於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五，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鬥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鬥爭發展的必然結果；並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六，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二）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綫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必須這樣，才能樹立全國革命羣衆的信仰，如蘇聯之於全世界然。必須這樣，才能給反動統治階級以甚大的困難，動搖其基礎而促進其內部的分解。也必須這樣，才能真正地創造紅軍，成爲將來大革命的主要工具。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三），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這種估量，

* 這是毛澤東同志的一篇通信，是爲批判當時黨內的一種悲觀思想而寫的。

①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這樣就可以解釋現在西歐各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現在中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也許要強些，但因為它們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更要強大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因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對地弱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

多半是從主觀主義出發。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這也是一種不切當的估量，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因此，在判斷中國政治形勢的時候，需要認識下面的這些要點：

（一）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於中國落後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這樣就可以解釋現在西歐各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比現在中國的革命的主觀力量也許要強些，但因為它們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比中國的反動統治階級的力量更要強大許多倍，所以仍然不能即時爆發革命。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因為反革命力量也是相對地弱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

（二）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後，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剩下的一點小小的力量，若僅依據某些現象來看，自然要使同志們（作這樣看法的同志們）發生悲觀的念頭。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裏用得着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就是說，現在雖只有一點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發展會是很快的。它在中國的環境裏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後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三）對反革命力量的估量也是這樣，決不可只看它的現象，要去看它的實質。當湘贛邊界割據的初期，有些同志真正相信了當時湖南省委的不正確的估量，把階級敵人看得一錢不值；到現在還傳

爲笑談的所謂『十分動搖』、『恐慌萬狀』兩句話，就是那時（一九二八年五月至六月）湖南省委估量湖南的統治者魯滌平^{〔三〕}的形容詞。在這種估量之下，就必然要產生政治上的盲動主義。但是到了同年十一月至去年二月（蔣桂戰爭^{〔四〕}尚未爆發之前）約四個月期間內，敵人的第三次『會剿』^{〔五〕}臨到了井岡山的時候，一部分同志又有『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提出來了。其實，那時英、美、日在中國的鬥爭已到十分露骨的地步，蔣桂馮混戰的形勢業已形成，實質上是反革命潮流開始下落，革命潮流開始復興的時候。但是在那個時候，不但紅軍和地方黨內有一種悲觀的思想，就是中央那時也不免爲那種表面上的情況所迷惑，而發生了悲觀的論調。中央二月來信^{〔六〕}就是代表那時候黨內悲觀分析的證據。

（四）現時的客觀情況，還是容易給只觀察當前表面現象不觀察實質的同志們以迷惑。特別是我們在紅軍中工作的人，一遇到敗仗，或四面被圍，或強敵跟追的時候，往往不自覺地把這種一時的特殊的小的環境，一般化擴大化起來，彷彿全國全世界的形勢概屬未可樂觀，革命勝利的前途未免渺茫得很。所以有這種抓住表面拋棄實質的觀察，是因爲他們對於一般情況的實質並沒有科學地加以分析。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決定。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

展起來。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伴隨着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伴隨着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羣衆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並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於一天，使得士兵羣衆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於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後，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要到來。中國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譁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上面的話的大意，在去年四月五日前委給中央的信中，就已經有了。那封信上說：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中央此信（去年二月九日）對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國民黨三次「進剿」井岡山，表示了反革命的最高潮。然至此為止，往後便是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革命潮流逐漸升漲。黨的戰鬥力組織力雖然弱到如中央所云，但在反革命潮流逐漸低落的形勢之下，恢復一定很快，黨內幹部分子的消極態度也會迅速消滅。羣衆是一定歸向我們的。屠殺主義（）固然是爲淵驅魚，改良主義也再不能號召羣衆了。羣衆對國民黨的幻想一定很快地消滅。在將來的形勢之下，什麼黨派都是不能和共產黨爭羣衆的。黨的六次大會（）所指示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是對的：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黨（按：應加「在大城市中」五個字）的目前任務是爭取羣衆而不是馬上舉行暴動。但是革命的發展將是很快的，武裝暴動的宣傳和準備應該採取積極的態度。在大混亂的現局之下，只有積極的口號積極的態度才能領導羣衆。黨的戰鬥力的恢復也一定要在這種積極態度之下才有可能。……無產階級領導是革命勝利的唯一關鍵。黨的無產階級基礎的建立，中心區域產業支部的創造，是目前黨在組織方面的重要任務；但是在同時，農村鬥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尤其是幫助城市鬥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所以，拋棄城市鬥爭，是錯誤的；但是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爲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如果黨員中有這種意見，我們以爲也是錯誤的。因爲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鬥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鬥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於革命本身的。』

這封信對紅軍的行動策略問題有如下的答覆：

『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於保存紅軍和發動羣衆。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以連或營爲單位，單獨行動，分散在農村中，用游擊的戰術發動羣衆，

避免目標，我們從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計劃過，而且多次實行過，但是都失敗了。因爲：（一）主力紅軍多不是本地人，和地方赤衛隊來歷不同。（二）分小則領導不健全，惡劣環境應付不來，容易失敗。（三）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四）愈是惡劣環境，隊伍愈須集中，領導者愈須堅決奮鬥，方能團結內部，應付敵人。只有在好的環境裏才好分兵游擊，領導者也不如在惡劣環境時的刻不能離。」

這一段話的缺點是：所舉不能分兵的理由，都是消極的，這是很不夠的。兵力集中的積極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滅大一點的敵人，才能佔領城鎮。消滅了大一點的敵人，佔領了城鎮，才能發動大範圍的羣衆，建立幾個縣聯在一塊的政權。這樣才能聳動遠近的視聽（所謂擴大政治影響），才能於促進革命高潮發生實際的效力。例如我們前年幹的湘贛邊界政權，去年幹的閩西政權⁽²⁾，都是這種兵力集中政策的結果。這是一般的原則。至於說到也有分兵的時候沒有呢？也是有的。前委給中央的信上說了紅軍的游擊戰術，那裏面包括了近距離的分兵：

「我們三年來從鬥爭中所得的戰術，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戰術都不同。用我們的戰術，羣衆鬥爭的發動是一天比一天廣大的，任何強大的敵人是奈何我們不得的。我們的戰術就是游擊的戰術。大要說來是：「分兵以發動羣衆，集中以應付敵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固定區域的割據⁽³⁾，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追，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時間，很好的方法，發動很大的羣衆。」這種戰術正如打網，要隨時打開，又要隨時收攏。打開以爭取羣衆，收攏以應付敵人。三年以來，都是用的這種戰術。」

這裏所謂『打開』，就是指近距離的分兵。例如湘贛邊界第一次打下永新時，二十九團和三十一團在永新境內的分兵。又如第三次打下永新時，二十八團往安福邊境，二十九團往蓮花，三十一團往吉安邊界的分兵。又如去年四月至五月在贛南各縣的分兵，七月在閩西各縣的分兵。至於遠距離的分兵，則要在好一點的環境和在比較健全的領導機關兩個條件之下才有可能。因為分兵的目的，是爲了更能爭取羣衆，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權，更能擴大紅軍和地方武裝。若不能達到這些目的，或者反因分兵而遭受失敗，削弱了紅軍的力量，例如前年八月湘贛邊界分兵打郴州那樣，則不如不分爲好。如果具備了上述兩個條件，那就無疑地應該分兵，因為在這兩個條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

中央二月來信的精神是不好的，這封信給了四軍黨內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響。中央那時還有一個通告，謂蔣桂戰爭不一定會爆發。但從此以後，中央的估量和指示，大體上說來就都是對的了。對於那個估量不適當的通告，中央已發了一個通告去更正。對於紅軍的這一封信，雖然沒有更正，但是後來的指示，就沒有那些悲觀的論調了，對於紅軍行動的主張也和我們的主張一致了。但是中央那個信給一部分同志的不良影響是仍然存在的。因此，我覺得就在現時仍有對此問題加以解釋的必要。

關於一年爭取江西的計劃，也是去年四月前委向中央提出的，後來又在零都有一次決定。當時指出的理由，見之於給中央信上的，如下：

『蔣桂部隊在九江一帶彼此逼近，大戰爆發即在眼前。羣衆鬥爭的恢復，加上反動統治內部矛盾的擴大，使革命高潮可能快要到來。在這種局面之下來佈置工作，我們覺得南方數省中廣東湖南兩省買辦地主的軍

力太大，湖南則更因黨的盲動主義的錯誤，黨內黨外羣衆幾乎盡失。閩贛浙三省則另成一種形勢。第一，三省敵人軍力最弱。浙江只有蔣伯誠（二）的少數省防軍。福建五部雖有十四團，但郭旅（三）已被擊破，陳盧（三）兩部均土匪軍，戰鬥力甚低，陸戰隊兩旅在沿海從前並未打過仗，戰鬥力必不大，只有張貞（四）比較能打，但據福建省委分析，張亦只有兩個團戰力較強。且福建現在完全是混亂狀態，不統一。江西朱培德（五）、熊式輝（六）兩部共有十六團，比閩浙軍力爲強，然比起湖南來就差得多。第二，三省的盲動主義錯誤比較少。除浙江情況我們不大明瞭外，江西福建兩省黨和羣衆的基礎，都比湖南好些。以江西論，贛北之德安、修水、銅鼓尚有相當基礎，贛西寧岡、永新、蓮花、遂川，黨和赤衛隊的勢力是依然存在的，贛南的希望更大，吉安、永新、興國等縣的紅軍第二第四團有日益發展之勢，方志敏的紅軍並未消滅。這樣就造成了向南昌包圍的形勢。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羣衆的割據，以一年爲期完成此計劃。」

上面爭取江西的話，不對的是規定一年爲期。至於爭取江西，除開江西的本身條件之外，還包含有全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條件。因爲如果不相信革命高潮快要到來，便決不能得到一年爭取江西的結論。那個建議的缺點就是不該規定爲一年，因此，影響到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所謂『快要』，也不免伴上了一些急躁性。至於江西的主觀客觀條件是很值得注意的。除主觀條件如給中央信上所說外，客觀條件現在可以明白指出的有三點：一是江西的經濟主要是封建的經濟，商業資產階級勢力較小，而地主的武裝在南方各省中又比那一省都弱。二是江西沒有本省的軍隊，向來都是外省軍隊來此駐防。外來軍隊『剿共』『剿匪』，情形不熟，又遠非本省軍隊那樣關係切身，往往不很熱心。三是距離帝

國主義的影響比較遠一點，不比廣東接近香港，差不多什麼都受英國的支配。我們懂得了這三點，就可以解釋爲什麼江西的農村起義比那一省都要普遍，紅軍游擊隊比那一省都要多了。

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問題。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間。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註釋〕

〔一〕方志敏同志，江西弋陽人，中國共產黨第六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是江西東北部紅色區域和紅軍第十軍的創造者。一九三四年他帶領紅軍抗日先遣隊北上。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與國民黨反革命軍隊作戰中被捕。同年七月，在南昌英勇犧牲。

〔二〕毛澤東同志這裏所說的『革命的主觀力量』，是指有組織的革命力量。

〔三〕魯滌平，國民黨軍閥，一九二八年時任國民黨湖南省主席。

〔四〕蔣桂戰爭，指一九二九年三四月間，國民黨南京軍閥蔣介石和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的戰爭。

〔五〕指一九二八年末至一九二九年初湖南和江西的國民黨軍閥對紅軍根據地井岡山的第三次進犯。

〔六〕『中央二月來信』，指中共中央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給前敵委員會的信。本文中引錄的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前敵委員會給中央的信上，曾大略地摘出該信的內容，主要地是關於當時形勢的估計和紅軍的行動策略問題。中央的這封信所提出的意見是不適當的，所以前委在給中央的信中提出了不同的意見。

〔七〕指反革命勢力對付人民的革命力量採用血腥屠殺的手段。

〔八〕『黨的六次大會』，即一九二八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次大會指出在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失敗後，中國的革命性質仍舊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指出新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但這新的革命高潮尚未到來，所以當時的革命總路線是爭取羣衆。六次大會清算了一九二七年的陳獨秀右的投降主義，也批判了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在一九二七年底一九二八年初在黨內發生的『左』的盲動主義。參看本書第三卷附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三部分。

〔九〕一九二九年，紅軍自井冈山東征福建，開闢新的革命根據地，在福建西部的龍巖、永定、上杭等縣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政權。

〔一〇〕『固定區域的割據』，指工農紅軍建立比較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一一〕蔣伯誠，當時任國民黨浙江省的保安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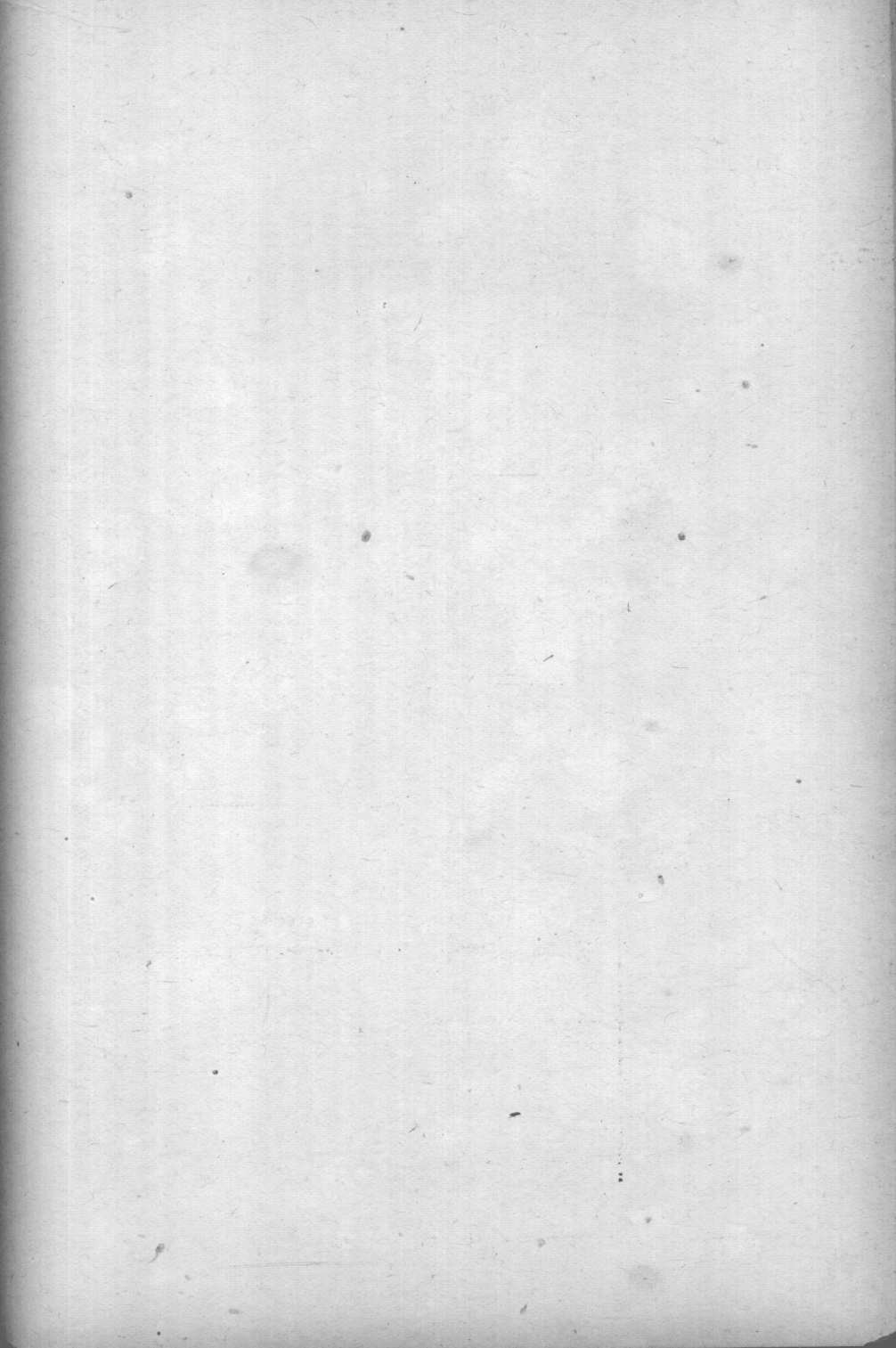
〔一二〕『郭旅』指福建的國民黨軍隊郭鳳鳴旅。

〔一三〕『陳盧』即福建的著匪陳國輝和盧興邦，他們的部隊被國民黨收編。

〔一四〕張貞，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師長。

〔一五〕朱培德，國民黨的軍閥，當時任江西省國民黨省政府主席。

〔一六〕熊式輝，當時是駐江西的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師長。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日)

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羣衆，立即開展經濟戰綫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爲什麼？現在我們的一切工作，都應當爲着革命戰爭的勝利，首先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戰爭的澈底勝利；爲着爭取物質上的條件去保障紅軍的給養和供給；爲着改善人民羣衆的生活，由此更加激發人民羣衆參加革命戰爭的積極性；爲着在經濟戰綫上把廣大人民羣衆組織起來，並且教育他們，使戰爭得着新的羣衆力量；爲着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去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爲着這一切，就需要進行經濟方面的建設工作。這是每個革命工作人員必須認識清楚的。過去有些同志認爲革命戰爭已經忙不了，那裏還有閒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因此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爲『右傾』。他們認爲在革命戰爭環境中沒有進行經濟建設的可能，要等戰爭最後勝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靜的環境，才能進行經濟建設。同志們，這些意見是不對的。抱着這些意見的同志，他們不了解如果不進行經濟建設，革命戰爭的物質條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長期的戰爭中就會感覺疲憊。你們看，敵人在進行經濟封鎖，奸商和反動派在破壞我們的金融和商

業，我們紅色區域的對外貿易，受到極大的妨礙。我們如果不把這些困難克服，革命戰爭不是要受到很大的影響嗎？鹽很貴，有時買不到。穀子秋冬便宜，春夏又貴得厲害。這些情形，立即影響到工農的生活，使工農生活不能改良。這不是要影響到工農聯盟這一個基本路綫嗎？工農羣衆如果對於他們的生活發生不滿意，這不是要影響到我們的擴大紅軍、動員羣衆參加革命戰爭的工作嗎？所以，這種以爲革命戰爭的環境不應該進行經濟建設的意見，是極端錯誤的。有這種意見的人，也常說一切應服從戰爭，他們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經濟建設，這就不是服從戰爭，而是削弱戰爭。只有開展經濟戰綫方面的工作，發展紅色區域的經濟，才能使革命戰爭得到相當的物質基礎，才能順利地開展我們軍事上的進攻，給敵人的『圍剿』以有力的打擊；才能使我們有力量去擴大紅軍，把我們的戰綫開展到幾千里路的地方去，使我們的紅軍毫無顧慮地在將來順利的條件下去打南昌，打九江，使我們的紅軍減少自己找給養的這一部分工作，專心一意去打敵人；也才能使我們的廣大羣衆都得到生活上的相當的滿足，而更加高興地去當紅軍，去做各項革命工作。必須這樣幹才叫做服從戰爭。現在各地革命工作人員中，還有許多人不明瞭經濟建設工作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還有許多地方政府沒有着重討論經濟建設的問題。各地政府的國民經濟部的組織還不健全，有些連部長還沒有找到，或者也只拿工作能力較差的人去湊數。合作社的發展還只在開始的階段，調劑糧食的工作也還只在一部分地方做

* 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三年八月在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所作的演說。

起來。各地還沒有把經濟建設這個任務宣傳到廣大羣衆中去（這是十分緊要的），還沒有在羣衆中造成爲着經濟建設而鬥爭的熱烈的空氣。這些情形，都是由於忽視經濟建設的重要性而來的。我們一定要經過同志們在這次會議上的討論和會後回去的傳達，在全體政府工作人員中，在廣大工農羣衆中，造成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要大家懂得經濟建設在革命戰爭中的重要性，努力推銷經濟建設公債，發展合作社運動，普遍建設穀倉，建設備荒倉。每個縣要設立一個糧食調劑分局，重要的區，重要的圩場〔三〕，要設糧食調劑支局。一方面要使我們的糧食，在紅色區域內有餘的地方流通到不足的地方，不使有的地方成了堆，有的地方買不到，有的地方價格過低，有的地方價格又過高；一方面要把我區多餘的糧食，有計劃地（不是無限制地）運輸出口，不受奸商的中間剝削，從白區購買必需品進來。大家要努力去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的生產，多造農具，多產石灰，使明年的收穫增多，恢復鎬砂、木頭、樟腦、紙張、菸葉、夏布、香菸、薄荷油等特產過去的產量，並把它們大批地輸出到白區去。

從出入口貿易的數量來看，我們第一個大宗出口是糧食。每年大約有三百萬担穀子出口，三百萬羣衆中每人平均輸出一担穀交換必需品進來，不會是更少的吧。這筆生意是什麼人做的？全是商人在做，商人在這中間進行了殘酷的剝削。去年萬安、泰和兩縣的農民五角錢一担穀賣給商人，而商人運到贛州賣四塊錢一担，賺去了七倍。又看三百萬羣衆每年要吃差不多九百萬塊錢的鹽，要穿差不多六百萬塊錢的布。這一千五百萬元鹽、布的進口，過去不消說都是商人在那裏做的，我們沒有去管過。商人在這中間的剝削真是大得很。比如商人到梅縣買鹽，一塊錢七斤，運到我區，一塊錢賣十二

兩。這不是嚇死人的剝削嗎？像這樣的事情，我們再不能不管了，以後是一定要管起來。我們的對外貿易局在這方面要盡很大的努力。

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的發行怎樣使用呢？我們打算這樣使用：一百萬供給紅軍作戰費，兩百萬供給合作社、糧食調劑局、對外貿易局做本錢。其中又以小部分用去發展生產，大部分用去發展出入口貿易。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並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羣衆，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羣衆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

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鬥爭。但是我們問一問，這個任務在激烈的戰爭環境內，是不是能完成呢？我想是能完成的。我們並不是說要修一條鐵路通龍巖，暫時也不是說要修一條汽車道通贛州。我們不是說糧食完全專賣，也不是說一千五百萬元鹽布生意都由政府經營不准商人插手。我們不是這樣說，也不是這樣做的。我們說的做的，是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產，輸出糧食和錫砂，輸入食鹽和布疋，暫時從兩百萬資金再加上羣衆的股本做起。這些是不應做、不能做、做不到的事嗎？這些工作我們已經開始做了，並且已經做出了成績。今年秋收比去年秋收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超過了增加兩成秋收的預計。手工業方面，農具和石灰的生產在恢復過程中，錫砂的生產開始恢復。煙、紙和木頭的生產也開始有了點生氣。糧食調劑今年有了不少的成績。食鹽入口也開始有

部分的工作了。這些成績，就是我們堅信將來能够發展的基礎。人們說要到戰爭完結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而在現在則是不可能的，這不是明顯的錯誤觀點嗎？

因此也就明白，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着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革命戰爭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經濟建設事業是爲着它的，是環繞着它的，是服從於它的。那種以爲經濟建設已經是當前一切任務的中心，而忽視革命戰爭，離開革命戰爭去進行經濟建設，同樣是錯誤的觀點。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後，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爲一切任務的中心。在國內戰爭中企圖進行和平的，爲將來所應有而現在所不應有的，爲將來的環境所許可而現在的環境不許可的那些經濟建設工作，只是一種瞎想。當前的工作是戰爭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這些工作每件都是爲着戰爭，而不是離開戰爭的和平事業。如果同志們中間有離開戰爭進行經濟建設的想法，那就應立刻改正。

沒有正確的領導方式和工作方法，要迅速地開展經濟戰綫上的運動，是不可能的。這也是一個重要的問題，也要在這次會議得到解決。因爲同志們回去，不但要立即動手去做許多工作，並且要指導許多工作人員一道去做。尤其是鄉和市這一級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糧食局、貿易局、採辦處這些機關裏的同志，他們是親自動員羣衆組織合作社、調劑和運輸糧食、管理出入口貿易的實際工作人員，如果他們的領導方式不對，不能採取各種正確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會立刻影響到工作的成效，使我們各項工作不能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不能在今年秋冬和明年春夏完成中央政府在經濟建設上的整個計劃。因此，我要向同志們指出下面的幾點：

第一，從組織上動員羣衆。首先是各級政府的主席團、國民經濟部和財政部的同志，要把發行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發展生產，發展貿易這些工作，經常地放在議事日程上面去討論，去督促，去檢查。其次，要推動羣衆團體，主要的是工會和貧農團。要使工會動員它的會員羣衆都加入經濟戰綫上來。貧農團是動員羣衆發展合作社、購買公債的一個有力的基礎，區政府和鄉政府要用大力去領導它。其次，要經過以村子、屋子爲單位的羣衆大會去做經濟建設的宣傳，在宣傳中要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關係講得十分明白，要把改良羣衆的生活，增加鬥爭的力量，講得十分實際。號召羣衆購買公債，發展合作社，調劑糧食，鞏固金融，發展貿易，號召他們爲着這些口號而鬥爭，把羣衆的熱情提高起來。假如不這樣地從組織上去動員羣衆和宣傳羣衆，即是說，各級政府的主席團、國民經濟部和財政部不着力抓着經濟建設的工作去討論、檢查，不注意推動羣衆團體，不注意開羣衆大會做宣傳，那末，要達到目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動員羣衆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傢伙拋到糞缸裏去，因爲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羣衆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鬥爭。另一種是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表面上不忘工，好像在那裏努力幹。實際上，命令主義地發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暫時在形式上發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結果是失去信用，妨礙了合作社的發展。命

令主義地推銷公債，不管羣衆了解不了解，買不買得這樣多，只是蠻橫地要照自己的數目字去派，結果是羣衆不喜歡，公債不能好好地推銷。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義，我們要的是努力宣傳，說服羣衆，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羣衆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

第三，經濟建設運動的開展，需要有很大數量的工作幹部。這不是幾十幾百人的事，而是要有幾千人幾萬人，要把他們組織起來，訓練起來，送到經濟建設的陣地上去。他們是經濟戰綫上的指揮員，而廣大羣衆則是戰鬥員。人們常常歎氣沒有幹部。同志們，真的沒有幹部嗎？從土地鬥爭、經濟鬥爭、革命戰爭中鍛鍊出來的羣衆，湧出來了無數的幹部，怎麼好說沒有幹部呢？丟掉錯誤的觀點，幹部就站在面前了。

第四，經濟建設在今天不但和戰爭的總任務不能分離，和其他的任務也是不能分離的。只有深入地查田運動⁽³⁾，才能澈底地消滅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發展農民的生產的積極性，使廣大農民迅速地走入經濟建設的戰綫上來。只有堅決地實行勞動法，才能改善工人羣衆的生活，使工人羣衆積極地迅速地參加經濟建設事業，而加強他們對於農民的領導作用。只有正確地領導選舉運動和跟着查田運動的開展而開展的檢舉運動⁽⁴⁾，才能健全我們的政府機關，使我們的政府更有力地領導革命戰爭，領導各方面的工作，領導經濟工作。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羣衆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這對於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至於一天也不要忽略擴大紅軍的工作，那更不待說了。大家都明白，沒有

紅軍的勝利，經濟封鎖就要更加厲害。另一方面，發展了國民經濟，改良了羣衆生活，無疑地就會極大地幫助擴大紅軍的工作，使廣大羣衆踴躍地開向前綫上去。總起來說，假如我們爭取了上述的一切條件，包括經濟建設這個新的極重要的條件，並且使這一切的條件都服務於革命戰爭，那末，革命戰爭的勝利，無疑是屬於我們的。

〔註釋〕

〔一〕從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四年，蔣介石軍隊對以江西瑞金爲中心的紅色區域，共發動了五次大規模的軍事進攻，叫做五次「圍剿」。第五次「圍剿」的正式開始是在一九三三年十月間，但從一九三三年夏季，蔣介石即在積極部署這次進攻。

〔二〕圩場，江西農村中定期舉行的交易市場。

〔三〕查田運動是當時紅色區域在分配土地後所進行的清查土地的運動，目的是在檢查土地分配得是否完全確當。

〔四〕檢舉運動，是由廣大人民自下而上地檢舉民主政府工作人員的某些不良行爲的一種民主運動。

怎樣分析農村階級

(一九三三年十月)

一 地 主

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爲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剝削的方式，主要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債，或兼僱工，或兼營工商業。但對農民剝削地租是地主剝削的主要的方式。管公堂和收學租(二)也是地租剝削的一類。

有些地主雖然已破產了，但破產之後仍不勞動，依靠欺騙、掠奪或親友接濟等方法爲生，而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者，仍然算是地主。

軍閥、官僚、土豪、劣紳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別兇惡者。富農中亦常有較小的土豪、劣紳。

幫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剝削農民爲主要的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的一些人，應和地主一例看待。

依靠高利貸剝削爲主要生活來源，其生活狀況超過普通中農的人，稱爲高利貸者，應和地主一例看待。

二 富 農

富農一般佔有土地。但也有自己佔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也有自己全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富農一般都佔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爲其生活來源的一部或大部。富農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剝削僱傭勞動（請長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剝削地租，或兼放債，或兼營工商業。富農多半還管公堂。有的佔有相當多的優良土地，除自己勞動之外並不僱工，而另以地租債利等方式剝削農民，此種情況也應以富農看待。富農的剝削是經常的，許多富農的剝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並且是主要的。

三 中 農

* 這個文件，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三年十月爲糾正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發生的偏向、正確地解決土地問題而寫的，曾由當時中央工農民主政府通過，作爲劃分農村階級成份的標準。

中農許多都佔有土地。有些中農只佔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有些中農並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中農自己都有相當的工具。中農的生活來源全靠自己勞動，或主要靠自己勞動。中農一般不剝削別人，許多中農還要受別人小部分地租債利等剝削。但中農一般不出賣勞動力。另一部分中農（富裕中農）則對別人有輕微的剝削，但非經常的和主要的。

四 貧 農

貧農有些佔有一部分土地和不完整的工具；有些全無土地，只有一些不完整的工具。一般都須租入土地來耕，受人地租、債利和小部分僱傭勞動的剝削。

中農一般不要出賣勞動力，貧農一般要出賣小部分的勞動力，這是區別中農和貧農的主要標準。

五 工 人

工人（僱農在內）一般全無土地和工具，有些工人有極小部分的土地和工具。工人完全地或主要地以出賣勞動力爲生。

〔註釋〕

〔二〕中國農村中有許多的公共土地。有些是政治性的，例如一些區鄉政府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族性的，例如各姓祠堂所有的土地。有些是宗教性的，例如佛教道教天主教回教寺廟所有的土地。有些是社會救濟或社會公益性的，例如義倉的土地和爲修橋補路而設置的土地。有些是教育性的，例如學田。所有這些土地，大多數都掌握在地主富農手裏，只有一小部分農民有權干預。

我們的經濟政策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只有最無恥的國民黨軍閥，才會在他們自己統治的區域內弄到差不多民窮財盡的地步，還會天天造謠，說紅色區域如何破壞不堪。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目的，在於破壞紅色區域，破壞正在前進的紅色區域的經濟建設工作，破壞已經得到解放的千百萬工農民衆的福利。因此，他們不但組織了武裝力量進行軍事上的『圍剿』，而且在經濟上實行殘酷的封鎖政策。然而我們領導廣大的羣衆和紅軍，不但屢次擊潰了敵人的『圍剿』，而且從事於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建設，去衝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的毒計。我們的這一個步驟，現在也着着勝利了。

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原則，是進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須的經濟方面的建設，集中經濟力量供給戰爭，同時極力改良民衆的生活，鞏固工農在經濟方面的聯合，保證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領導，爭取國營經濟對私人經濟的領導，造成將來發展到社會主義的前提。

我們的經濟建設的中心是發展農業生產，發展工業生產，發展對外貿易和發展合作社。

紅色區域的農業，現在顯然是在向前發展中。一九三三年的農產，在贛南閩西區域，比較一九三

二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五（一成半），而在閩浙贛邊區則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川陝邊區的農業收成良好。紅色區域在建立的頭一二年，農業生產往往是下降的（二）。但是經過分配土地後確定了地權，加以我們提倡生產，農民羣衆的勞動熱情增長了，生產便有恢復的形勢了。現在有些地方不但恢復了而且超過了革命前的生產量。有些地方不但恢復了在革命起義過程中荒廢了的土地，而且開發了新的土地。很多的地方組織了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三），以調劑農村中的勞動力；組織了犁牛合作社，以解決耕牛缺乏的問題。同時，廣大的婦女羣衆參加了生產工作。這種情形，在國民黨時代是決然做不到的。在國民黨時代，土地是地主的，農民不願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只有在我們把土地分配給農民，對農民的生產加以提倡獎勵以後，農民羣衆的勞動熱情才爆發了起來，偉大的生產勝利才能得到。這裏應當指出：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面，對於某些重要農產作出相當的生產計劃，動員農民爲着這樣的計劃而努力，這是容許的，而且是必須的。我們在這一方面，應該有進一步的注意和努力。關於農業生產的必要條件方面的困難問題，如勞動力問題，耕牛問題，肥料問題，種子問題，水利問題等，我們必須用力領導農民求得解決。這裏，有組織地調劑勞動

力和推動婦女參加生產，是我們農業生產方面的最基本的任務。而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的組織，在春耕夏耕等重要季節我們對於整個農村民衆的動員和督促，則是解決勞動力問題的必要的方法。不少的一部分農民（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缺乏耕牛，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組織犁牛合作社，動員一切無牛人家自動地合股買牛共同使用，是我們應該注意的事。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也應予以極大的注意。目前自然還不能提出國家農業和集體農業的問題，但是爲着促進農業的發展，在各地組織小範圍的農事試驗場，並設立農業研究學校和農產品展覽所，却是迫切地需要的。

因爲敵人的封鎖，使得我們的貨物出口發生困難。紅色區域的許多手工業生產是衰落了，煙、紙等項是其最著者。但是這種出口困難，不是完全不可克服的。因爲廣大羣衆的需要，我們自己即有廣泛的市場。應該首先爲着自給，其次也爲着出口，有計劃地恢復和發展手工業和某些工業。兩年以來，特別是一九三三年上半年起，因爲我們開始注意，因爲羣衆生產合作社的逐漸發展，許多手工業和個別的工業現在是在開始走向恢復。這裏重要的是煙、紙、鎢砂、樟腦、農具和肥料（石灰等）。而且自己織布，自己製藥和自己製糖，也是目前環境中不可忽視的。在閩浙贛邊區方面，有些當地從來就缺乏的工業，例如造紙、織布、製糖等，現在居然發展起來，並且收得了成效。他們爲了解決食鹽的缺乏，進行了硝鹽的製造。工業的進行需要有適當的計劃。在散漫的手工業基礎上，全部的精密計劃當然不可能。但是關於某些主要的事業，首先是國家經營和合作社經營的事業，相當精密的生產計劃，却是完全必需的。確切地計算原料的生產，計算到敵區和我區的銷場，是我們每一種國營工業和合作社工

業從開始進行的時候就必須注意的。

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並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疋的輸入，食糧和錫砂的輸出，以及糧食在內部的調劑等，現在是異常需要的了。這一工作，閩浙贛邊區方面實行得較早，中央區則開始於一九三三年的春季。由於對外貿易局等機關的設立，已經得到初步的成績。

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

國家經營的經濟事業，在目前，只限於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國營的工業或商業，都已經開始發展，它們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我們對於私人經濟，只要不出於政府法律範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因為目前私人經濟的發展，是國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所需要的。私人經濟，不待說，現時是佔着絕對的優勢，並且在相當長的期間內也必然還是優勢。目前私人經濟在紅色區域是取着小規模經營的形式。

合作社事業，是在極迅速的發展中。據一九三三年九月江西福建兩省十七個縣的統計，共有各種合作社一千四百二十三個，股金三十餘萬元。發展得最盛的是消費合作社和糧食合作社，其次是生產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的活動剛才開始。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佔優勢並取得領導的地位。所以，盡可能地發展國營經濟和大規模地發展合作社經濟，應該是與獎勵私人經濟發展，同時並進的。

爲着發展國營經濟和幫助合作社經濟，我們在羣衆擁護之下，發行了三百萬元經濟建設公債。這樣依靠羣衆的力量來解決經濟建設的資金問題，乃是目前唯一的和可能的方法。

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是我們財政政策的基本方針，明顯的效驗已在閩浙贛邊區表現出來，在中央區也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這一方針的着重的執行，是我們財政機關和經濟機關的責任。這裏必須充分注意：國家銀行發行紙幣，基本上應該根據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單純財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

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反對貪污和浪費的鬥爭，過去有了些成績，以後還應用力。節省每一個銅板爲着戰爭和革命事業，爲着我們的經濟建設，是我們的會計制度的原則。我們對於國家收入的使用方法，應該和國民黨的方法有嚴格的區別。

在全中國捲入經濟浩劫，數萬萬民衆陷入飢寒交迫的困難地位的時候，我們人民的政府却不顧一切困難，爲了革命戰爭，爲了民族利益，認真地進行經濟建設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只有我們實行了有計劃的有組織的經濟建設工作，才能挽救全國人民出於空前的浩劫。

〔註釋〕

〔一〕農業生產在紅色區域建立的頭一二年，往往有些下降，主要地是由於在分配土地期間，地權還沒有確定，新的經濟秩序還沒有走上軌道，以致農民的生產情緒還有些波動。

〔二〕勞動互助社和耕田隊，是當時紅色區域農民在個體經濟的基礎上，為調劑勞動力以便進行生產所建立的勞動互助組織。加入這種勞動互助組織是自願的，而且必須是互利的：工數對除，少做了的按工找算工錢於多做了的。勞動互助社除了社員互助外，還優待紅軍家屬，幫助孤老（幫助孤老做工的只要吃飯，不要工錢）。因為這種勞動互助組織對於生產起了很大的作用，採取的辦法又很合理，所以得到羣衆熱烈的擁護。毛澤東同志的『長岡鄉調查』和『才溪鄉調查』，對此都有記載。

關心羣衆生活，注意工作方法。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

有兩個問題，同志們在討論中沒有着重注意，我覺得應該提出來說一說。

第一個問題是關於羣衆生活的問題。

我們現在的中心任務是動員廣大羣衆參加革命戰爭，以革命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國民黨，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去。誰要是看輕了這個中心任務，誰就不是一個很好的革命工作人員。我們的同志如果把這個中心任務真正看清楚了，懂得無論如何要把革命發展到全國去，那末，我們對於廣大羣衆的切身利益問題，羣衆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因為革命戰爭是羣衆的戰爭，只有動員羣衆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羣衆才能進行戰爭。

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當然不能。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鬥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發展對外貿易；解決羣衆的穿衣問題，吃飯問題，住房問題，柴米油鹽問題，疾病衛生問題，婚姻問題。總之，一切羣衆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

應當注意的問題。假如我們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解決了，滿足了羣衆的需要，我們就真正成了羣衆生活的組織者，羣衆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同志們，那時候，我們號召羣衆參加革命戰爭，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在我們的工作人員中，曾經看見這樣的情形。他們只講擴大紅軍，擴充運輸隊，收土地稅，推銷公債，其他事情呢，不講也不管，甚至一切都不管。比如以前有一個時期，汀州市政府只管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對於羣衆生活問題一點不理。汀州市羣衆的問題是沒有柴燒，資本家把鹽藏起來沒有鹽買，有些羣衆沒有房子住，那裏缺米，米價又貴。這些是汀州市人民羣衆的實際問題，十分盼望我們幫助他們去解決。但是汀州市政府一點也不討論。所以，那時，汀州市工農代表會議改選了以後，一百多個代表，因為幾次會都只討論擴大紅軍和動員運輸隊，完全不理羣衆生活，後來就不高興到會了，會議也召集不成了。擴大紅軍、動員運輸隊呢，因此也就極少成績。這是一種情形。

同志們，送給你們的兩個模範鄉的小冊子，你們大概看到了吧。那裏是相反的情形。江西的長岡鄉（一），福建的才溪鄉（二），擴大紅軍多得很呀！長岡鄉青年壯年男女百個人中有八十個當紅軍去了，才溪鄉百個人中有八十八個當紅軍去了。公債也銷得很多，長岡鄉全鄉一千五百人，銷了四千五百塊錢公債。其他工作也得到了很大的成績。什麼理由呢？舉幾個例子就明白了。長岡鄉有一個貧苦農

* 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

民被火燒掉了一間半房子，鄉政府就發動羣衆捐錢幫助他。有三個人沒有飯吃，鄉政府和互濟會就馬上捐米救濟他們。去年夏荒，鄉政府從二百多里的公略縣^{（三）}辦了米來救濟羣衆。才溪鄉的這類工作也做得非常之好。這樣的鄉政府，是真正模範的鄉政府。他們和汀州市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是絕對的不相同。我們要學習長岡鄉、才溪鄉，反對汀州市那樣的官僚主義的領導者！

我鄭重地向大會提出，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羣衆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羣衆要學習犁耙，找什麼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麼辦法呢？一切這些羣衆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羣衆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要使他們從這些事情出發，了解我們提出來的更高的任務，革命戰爭的任務，擁護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國去，接受我們的政治號召，爲革命的勝利鬥爭到底。長岡鄉的羣衆說：『共產黨真正好，什麼事情都替我們想到了。』模範的長岡鄉工作人員，可尊敬的長岡鄉工作人員！他們得到了廣大羣衆的真心實意的愛戴，他們的戰爭動員的號召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要得到羣衆的擁護麼？要羣衆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綫上去麼？那末，就得和羣衆在一起，就得去發動羣衆的積極性，就得關心羣衆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爲羣衆謀利益，解決羣衆的生產和生活的問題，鹽的問題，米的問題，房子的問題，衣的問題，生小孩子的問題，解決羣衆的一切問題。我們是這樣做了麼，廣大羣衆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

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國民黨要來進攻紅色區域，廣大羣衆就要用生命同國民黨決鬥。這是無疑的；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不是實實在在地被我們粉碎了麼？

國民黨現在實行他們的堡壘政策^(B)，大築其烏龜殼，以爲這是他們的銅牆鐵壁。同志們，這果然是銅牆鐵壁麼？一點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麼？羣衆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俄國皇帝是世界上最兇惡的一個統治者，當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起來的時候，那個皇帝還有沒有呢？沒有了。銅牆鐵壁呢？倒掉了。同志們，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羣衆，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羣衆。這是真正的銅牆鐵壁，什麼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羣衆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工作方法的問題。

我們是革命戰爭的領導者、組織者，我們又是羣衆生活的領導者、組織者。組織革命戰爭，改良羣衆生活，這是我們的兩大任務。在這裏，工作方法的問題，就嚴重地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不注意擴大紅軍的領導，不講究擴大紅軍的方法，儘管把擴大紅軍念一千遍，結果還是不能成功。其他如查田工作、經濟建設工作、文化教育工作、新區邊區的工作，一切工作，如果僅僅提出任務而不注意實行時候的工

作方法，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實際的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耐心說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麼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

興國的同志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值得我們稱讚他們爲模範工作者。同樣，贛東北的同志們也有很好的創造，他們同樣是模範工作者。像興國和贛東北的同志們，他們把羣衆生活和革命戰爭聯繫起來了，他們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問題和革命的工作任務問題同時解決了。他們是認真地在那裏進行工作，他們是仔細地在那裏解決問題，他們在革命面前是真正負起了責任，他們是革命戰爭的良好組織者和領導者，他們又是羣衆生活的良好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其他，如福建的上杭、長汀、永定等縣的一些地方，贛南的西江等處地方，湘贛邊區的茶陵、永新、吉安等縣的一些地方，湘鄂贛邊區陽新縣的一些地方，以及江西還有許多縣裏的區鄉，加上瑞金直屬縣，那裏的同志們都有進步的工作，同樣值得我們大家稱讚。

一切我們領導的地方，無疑有不少的積極幹部，羣衆中湧現出來的很好的工作同志。這些同志負擔着一種責任，就是應該幫助那些工作薄弱的地方，幫助那些還不善於工作的同志們作好工作。我們是在偉大的革命的戰爭面前，我們要衝破敵人的大規模的『圍剿』，我們要把革命推廣到全國去。全體革命工作人員負擔着絕大的責任。大會以後，我們一定要用切實的辦法來改善我們的工作，先進的地方應該更加前進，落後的地方應該趕上先進的地方。要造成幾千個長岡鄉，幾十個興國縣。這些就是我們的鞏固的陣地。我們佔據了這些陣地，我們就能從這些陣地出發去粉碎敵人的『圍剿』，去打倒

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在全國的統治。

〔註 釋〕

〔一〕長岡鄉是江西省興國縣的一個鄉。

〔二〕才溪鄉是福建省上杭縣的一個鄉。

〔三〕公略縣是當時江西紅色區域的一個縣，以吉安縣東南的東固鎮爲中心。紅軍第三軍軍長黃公略同志於一九三一年十月在此犧牲，因設此縣以紀念他。

〔四〕一九三三年七月蔣介石在江西廬山軍事會議上決定在紅色區域周圍建築碉堡，作爲第五次「圍剿」中的新的軍事策略。據統計，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底，江西共築碉堡二千九百座。後來日本侵略者在中國和八路軍新四軍作戰，亦採用蔣介石這種堡壘政策。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戰爭的戰略，這種反革命的堡壘政策是完全可以打破和戰勝的，這已爲歷史的事實所充分證明。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

同志們！目前的政治形勢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根據這種變化了的形勢，我們的黨已經規定了自己的任務。

目前的形勢是怎樣的呢？

目前形勢的基本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爲它的殖民地。

大家知道，差不多一百年以來，中國是好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的國家。由於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和帝國主義國家相互間的鬥爭，中國還保存了一種半獨立的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戰曾經在一個時期內給了日本帝國主義以獨霸中國的機會。但是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國家的干涉，使得經過那時的賣國頭子袁世凱〔一〕簽了字的對日屈服投降的條約二十一條〔二〕，不得不宣告無效。一九二二年美國召集的華盛頓九國會議簽訂了一個公約〔三〕，又

使中國回復到幾個帝國主義國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沒有很久，這種情況又起了變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變^(B)，開始了變中國爲日本殖民地的階段。只是日本侵略的範圍暫時還限於東北四省^(C)，就使人們覺得似乎日本帝國主義者不一定再前進了的樣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顯示他們要向中國本部前進了，他們要佔領全中國。現在是日本帝國主義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爲日本獨佔的殖民地狀態。最近的冀東事變^(D)和外交談判^(E)，顯示了這個方向，威脅到了全國人民的生存。這種情形，就給中國一切階級和一切政治派別提出了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毛澤東同志的這個報告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之後作的。這一次政治局會議批評了黨內那種認爲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和中國工人農民聯合抗日的錯誤觀點，決定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綫的策略，是一次極關重要的中央會議。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央決議在這裏充分地說明了和民族資產階級在抗日的條件下重新建立統一戰綫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產黨和紅軍在這個統一戰綫中的具有決定意義的領導作用，指出了中國革命的長期性，批判了黨內在過去長時期內存在着的狹隘的關門主義和對於革命的急性病——這些是黨和紅軍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遭受嚴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時，毛澤東同志喚起黨內注意一九二七年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引導革命歸於失敗的歷史教訓，指出了蔣介石必然要破壞革命勢力的趨勢，這樣就保證了後來我黨在新環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頭腦，在蔣介石的無窮欺騙和很多次的武裝襲擊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損失。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舉行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新的中央的領導，改變了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但那次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夠對於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書記處、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織問題做了決議。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黨中央才獲得可能去有系統地說明政治策略上的諸問題。對於這類政治策略上的問題，毛澤東同志的這篇報告作了最完整的分析。

『怎麼辦』的問題。反抗呢？還是投降呢？或者游移於兩者之間呢？

現在，我們來看一看中國各個階級怎樣來回答這個問題。

中國的工人和農民都是要求反抗的。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反日浪潮，證明中國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是中國革命的最堅決的力量。

〇二六

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也是要反抗的。青年學生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不是已經發動了一個廣大的反日運動麼？中國的這些小資產階級成份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和農民一樣，他們有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小生產的經濟地位。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曾經給了他們以重大的損害，使他們中的很多人陷於失業、破產或半破產的境地。現在他們眼看就要當亡國奴了，除了反抗，再沒有出路。

〇二七

問題擺在民族資產階級、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面前，擺在國民黨面前，又是怎樣的呢？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麼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麼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綫，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羣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民族資產階級是一個複雜的問題。這個階級曾經參加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隨後又爲這個革命的火燄所嚇壞，站到人民的敵人即蔣介石集團那一方面去了。問題是在今天的情況下，民族資產階級有沒有發生變化的可能性呢？我們認爲是有這種可能性的。這是因爲民族資產階級同地主階級、買辦階級不是同一的東西，他們之間是有分別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地主階級那樣多的封建性，沒有買辦階級那樣多的買辦性。民族資產階級內部有同外國資本和本國土地關係較多的一部分人，這一部分人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右翼，我們暫且不去估計他們的變化的可能性。問題是在沒有那些關係或者關係較少的那些部分。我們認爲在殖民地化威脅的新環境之下，民族資產階級的這些部分的態度可能發生變化。這個變化的特點就是他們的動搖。他們一方面不喜歡帝國主義，一方面又怕革命的徹底性，他們在這二者之間動搖着。這就說明，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時期他們爲什麼參加了革命，及到這一時期之末，他們又爲什麼站到蔣介石方面去了。現在的時期，同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叛變革命的時期有什麼分別呢？那時的中國還是一個半殖民地，現在正在走向殖民地。九年以來，他們拋棄了自己的同盟者工人階級，和地主買辦階級做朋友，得了什麼好處沒有呢？沒有什麼好處，得到的只不過是民族工商業的破產或半破產的境遇。因爲這些情況，我們認爲民族資產階級的態度，在今天的時局下，有起變化的可能性。變化的程度怎樣呢？總的特點是動搖。但在鬥爭的某些階段，他們中間的一部分（左翼）是有參加鬥爭的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則有由動搖而採取中立態度的可能。

蔡廷鍇等人領導的十九路軍(一)是代表什麼階級的利益呢？他們是代表着民族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鄉村的富農和小地主。蔡廷鍇們不是同紅軍打過死仗的嗎？可是後來又同紅軍訂立了抗日反蔣同盟。他們在江西，向紅軍進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到了福建，便同紅軍成立了妥協，向蔣介石開起火來。無論蔡廷鍇們將來的事業是什麼，無論當時福建人民政府還是怎樣守着老一套不去發動民衆鬥爭，但是他們把本來向着紅軍的火力掉轉去向着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不能不說是有益於革命的行為。這是國民黨營壘的破裂。九一八事變以後的環境能够使國民黨營壘分裂出這樣一部分人，爲什麼今天的環境反倒不能造成國民黨的分裂呢？我們黨內持這樣一種論點的人是不對的，他們說，整個地主資產階級的營壘是統一的，固定的，任何情況下也不能使它起變化。他們不但不認識今天的嚴重環境，並且連歷史也忘記了。

讓我再講一點歷史。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當着革命軍向武漢前進，以至打到武漢、打到河南的時候，發生了唐生智、馮玉祥(二)參加革命的事情。馮玉祥於一九三三年在察哈爾還曾經和共產黨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軍。

再一個明顯的例子，就是曾經和十九路軍一道進攻江西紅軍的第二十六路軍，不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舉行了寧都起義(三)，變成了紅軍嗎？寧都起義的領導者趙博生、董振堂等人成了堅決革命的同志。

馬占山在東三省的抗日行爲(四)，也是統治者營壘中的一個分裂。

所有這些例子都指明：在日本炸彈的威力圈及於全中國的時候，在鬥爭改變常態而突然以洶湧的陣勢向前推進的時候，敵人的營壘是會發生破裂的。

同志們，現在讓我們把問題轉到另一點。

如果有人拿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軟弱性這一點來反對我們的論點，認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處在新環境，還是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認為也是不對的。如果不能改變態度的原因，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那末，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為什麼改變了他們的常態，不僅是動搖，簡直是參加了革命呢？難道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是後來才得的新毛病，而不是他們從娘肚子裏帶出來的老毛病嗎？難道今天軟弱，那時就不軟弱嗎？半殖民地的政治和經濟的主要特點之一，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正是因為這樣，帝國主義敢於欺負他們，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不喜歡帝國主義的特點。自然，我們不但否認，並且完全承認：又是因為這一點，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容易拿某種臨時的賄賂為釣餌將他們拉了過去，而這也就規定了他們對於革命的不徹底性。可是總不能說，在今天的情況下，他們同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沒有任何的分別。

所以我們着重地指出：國民黨營壘中，在民族危機到了嚴重關頭的時候，是要發生破裂的。這種

破裂，表現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表現於馮玉祥、蔡廷鍇、馬占山等風頭一時的抗日人物。這種情況，基本地說來是不利於反革命，而有利於革命的。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的不平衡，以及由此而生的革命發展的不平衡，增大了這種破裂的可能性。

同志們！這個問題的正面，已經說完了。讓我再來說一說它的反面，那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某些分子常常是欺騙民衆的好手這樣一個問題。爲什麼？因爲他們中間除了那些真正擁護人民革命事業的人們而外，有許多人在一個時期內能够以革命的或半革命的面目出現，所以他們同時就具備着欺騙民衆的資格，使得民衆不容易認識他們的不澈底性以及裝模作樣的假相。這就增加了共產黨批評同盟者、揭破假革命、爭取領導權的責任。如果我們否認民族資產階級在大震動中有動搖及參加革命的可能性，那也就取消了至少也減輕了我們黨對於爭取領導權的任務。因爲，如果民族資產階級是同地主買辦一模一樣，以賣國賊的猙獰面孔出現，爭取領導權的任務就大可取消，至少也可以減輕了。

在整個地分析中國地主資產階級在大震動中的姿態時，還有一個方面應該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也不是完全統一的。這是半殖民地的環境，即許多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環境所造成的。當鬥爭是向着日本帝國主義的時候，美國以至英國的走狗們是有可能遵照其主人的叱聲的輕重，同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暗鬥以至明爭的。過去這種狗打架的事情多得很，我們不去說它。於今只說被蔣介石禁閉過的國民黨政客胡漢民〔二〕，不久以前也簽名於我們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六大綱領的文件〔三〕。胡漢民所依託的兩廣派軍閥〔四〕，也在所謂『收復失地』和『抗日剿匪』〔五〕並重（蔣介石的是『先剿匪，後抗日』）的欺騙口號之下，同蔣介石對立。你們看，不是有點奇怪嗎？並不奇怪，這不過是大狗小狗飽狗餓狗之間的一點特別有趣的爭鬥，一個不大不小的缺口，一種又癢又痛的矛盾。但是這點爭鬥，這個缺口，這種矛盾，對於革命的人民却是有用的。我們要把敵人營壘中間的一切爭

門、缺口、矛盾，統統收集起來，作爲反對當前主要敵人之用。

把這個階級關係問題總起來說，就是：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係，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現在我們來說中國民族革命營壘裏的情形。

首先是紅軍的情形。同志們，你們看，差不多一年半以來，中國的三支主力紅軍都在作陣地的大轉移。從去年八月任弼時同志〔一〕等率領第六軍團向賀龍同志的地方開始轉移〔二〕起，接着就是十月開始的我們的轉移〔三〕。今年三月，川陝邊區的紅軍也開始轉移〔四〕。這三支紅軍，都放棄了原有陣地，轉移到新地區去。這個大轉移，使得舊區域變爲游擊區。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着整個局面中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爲是對的，因爲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五〕）：中央紅軍〔三〕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爲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一個蝦蟆坐在井裏說：『天有一個井大。』這是不對的，因爲天不止一個井大。如果它說：『天的某一部分有一個井大。』這是對的，因爲合乎事實。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佔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爲我們完成了長征。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經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麼？十二個月光陰中間，天上每日幾十架飛機偵察轟炸，地下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却開動了每人的兩隻腳，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請問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麼？沒有，從來沒有的。長征又是宣言書。它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帝國主義者和他們的走狗蔣介石等輩則是完全無用的。長征宣告了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圍追堵截的破產。長征又是宣傳隊。它向十一個省內大約兩萬萬人民宣佈，只有紅軍的道路，才是解放他們的道路。不因此一舉，那麼廣大的民衆怎會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還有紅軍這樣一篇大道理呢？長征又是播種機。它散佈了許多種子，在十一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穫的。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誰使長征勝利的呢？是共產黨。沒有共產黨，這樣的長征是不可能設想的。中國共產黨，它的領導機關，它的幹部，它的黨員，是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的。誰懷疑我們領導革命戰爭的能力，誰就會陷進機會主義的泥坑裏去。長征一完結，新局面就開始。直羅鎮一仗，中央紅軍同西北紅軍兄弟般的團結，粉碎了賣國賊蔣介石向着陝甘邊區的『圍剿』，給黨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的任務，舉行了一個奠基禮。

主力紅軍如此，南方各省的游擊戰爭怎麼樣呢？南方的游擊戰爭，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並沒有被消滅。許多部分，正在恢復、生長和發展（五）。

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人的鬥爭正在從廠內向着廠外，從經濟鬥爭向着政治鬥爭。工人階級的反日反賣國賊的英勇鬥爭，現在是在深刻地醞釀着，看樣子離爆發的時候已不遠了。

農民的鬥爭沒有停止過。在外禍、內難、再加天災的壓迫之下，農民廣泛地發動了游擊戰爭、民變、鬧荒等等形態的鬥爭。東北和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二)，正在回答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

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將來一定還要有更大的發展。但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要衝破賣國賊的戒嚴令，警察、偵探、學棍、法西斯蒂的破壞和屠殺政策，只有和工人、農民、兵士的鬥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

民族資產階級、鄉村富農和小地主們的動搖以至參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前面已經說過了。

少數民族，特別是內蒙民族，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直接威脅之下，正在起來鬥爭。其前途，將和華北人民的鬥爭和紅軍在西北的活動，匯合在一起。

所有這些都指明，革命的陣勢，是由局部性轉變到全國性，由不平衡狀態逐漸地轉變到某種平衡狀態。目前是大變動的前夜。黨的任務就是把紅軍的活動和全國的工人、農民、學生、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切活動匯合起來，成爲一個統一的民族革命戰綫。

民族統一戰綫

觀察了反革命和革命兩方面的形勢以後，我們就容易說明黨的策略任務了。

黨的基本的策略任務是什麼呢？不是別的，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綫。

當着革命的形勢已經改變的時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領導方式，也必須跟着改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任務，是變中國爲殖民地；我們的任務，是變中國爲獨立、自由和領土完整的國家。

實現中國的獨立自由是一個偉大的任務。這須同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革命勢力作戰。日本帝國主義是下了兇橫直進的決心的。國內豪紳買辦階級的反革命勢力，在目前還是大過人民的革命勢力。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勢力的事業，不是一天兩天可以成功的，必須準備花費長久的時間；不是少一點力量可以成功的，必須聚積雄厚的力量。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是比較過去更加衰弱了，中國的和世界的革命力量是比較過去更加增長了。這是正確的估計，這是一方面的估計。但是同時我們應當說，目前中國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暫時還是大於革命力量。這也是正確的估計，這是又一方面的估計。由於中國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產生了革命發展的不平衡。革命的勝利總是從那些反革命勢力比較薄弱的地方首先開始，首先發展，首先勝利；而在那些反革命勢力雄厚的地方，革命還是沒有起來，或者發展得很慢。這是中國革命在過去長時期內已經遇到的情形。在將來，可以想到，在某些階段裏，革命的總的形勢是更加發展了，但是不平衡狀態還會存在着。要把不平衡的狀態變到大體上平衡的狀態，還要經過很長的時間，還要花費很大的氣力，還要依靠黨的策略路線的正確。如果說，蘇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三〕是在三年頭裏完結了的話，那末中國共產黨領導

的革命戰爭，過去已經花去了很長的時間，而要最後地澈底地解決內外反革命勢力，我們還得準備再花一個應有的時間，像過去那樣地過分的性急是不行的。還得提出一個很好的革命策略，像過去那樣地老在狹小的圈子裏打轉，是幹不出大事情來的。不是說中國的事情只能慢吞吞地去幹，中國的事情要勇猛地去幹，亡國的危險不容許我們有一分鐘的懈怠。今後革命發展的速度，也一定比過去要快得多，因為中國的和世界的局面都是臨在戰爭和革命的新時期了。雖然如此，中國革命戰爭還是持久戰，帝國主義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規定了這個持久性。我們說，時局的特點，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來，中國處在新的全國大革命的前夜，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特點。這是事實，這是一方面的事實。現在我們又說，帝國主義還是一個嚴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狀態是一個嚴重的缺點，要打倒敵人必須準備作持久戰，這是現時革命形勢的又一個特點。這也是事實，這是又一方面的事實。這兩種特點，這兩種事實，都一齊跑來教訓我們，要求我們適應情況，改變策略，改變我們調動隊伍進行戰鬥的方式。目前的時局，要求我們勇敢地拋棄關門主義，採取廣泛的統一戰綫，防止冒險主義。不到決戰的時機，沒有決戰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進行決戰。

這裏不來說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關係，也不來說冒險主義在將來大的時局開展中可能發生的危險性，這點等到將來再說不遲。這裏只說統一戰綫的策略和關門主義的策略，是正相反對的兩個不同的策略。

一個要招收廣大的人馬，好把敵人包圍而消滅之。

一個則依靠單兵獨馬，去同強大的敵人打硬仗。

一個說，如果不足够地估計到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爲殖民地的行動能够變動中國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綫，就不能足够地估計到組織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綫的可能性。如果不足够地估計到日本反革命勢力、中國反革命勢力和中國革命勢力這幾方面的強點和弱點，就不會足够地估計到組織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綫的必要性；就不會採取堅決的辦法去打破關門主義；就不會拿着統一戰綫這個武器去組織和團聚千千萬萬民衆和一切可能的革命友軍，向着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賣國賊這個最中心的目標而攻擊前進，就不會拿自己的策略武器去射擊當前的最中心目標，而把目標分散，以至主要的敵人沒有打中，次要的敵人甚至同盟軍身上却吃了我們的子彈。這個叫做不會擇敵和浪費彈藥。這樣，就不能把敵人驅逐到狹小的孤立的陣地上去。這樣，就不能把敵人營壘中被裏脅的人們，過去是敵人而今日可能做友軍的人們，都從敵人營壘中和敵人戰綫上拉過來。這樣，就是在實際上幫助了敵人，而使革命停滯、孤立、縮小、降落，甚至走到失敗的道路上去。

一個則說，這些批評都是不對的。革命的力量是要純粹又純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筆直又筆直。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民族資產階級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對於富農，是一步也退讓不得。對於黃色工會，只有同它拚命。如果同蔡廷鍇握手的話，那必須在握手的瞬間罵他一句反革命。那有貓兒不吃油，那有軍閥不是反革命？知識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們是危險的。因此，結論：關門主義是唯一的法寶，統一戰綫是機會主義的策略。

同志們，統一戰綫的道理和關門主義的道理究竟那一個是對的呢？馬克思列寧主義到底贊成那一個呢？我堅決地回答：贊成統一戰綫，反對關門主義。人中間有三歲小孩子，三歲小孩子有許多道理都是對的，但是不能使他們管天下國家的大事，因為他們還不明白天下國家的道理。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革命隊伍中的幼稚病。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動的道路一樣，總是曲折的，不是筆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綫可能變動，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變動一樣。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綫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衆，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只有這樣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打垮，這是有目共見的真理。因此，只有統一戰綫的策略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策略。關門主義的策略則是孤家寡人的策略。關門主義『爲淵驅魚，爲叢驅雀』，把『千千萬萬』和『浩浩蕩蕩』都趕到敵人那一邊去，只博得敵人的喝采。關門主義在實際上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忠順的奴僕。關門主義的所謂『純粹』和『筆直』，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向之嘉獎的東西。我們一定不要關門主義，我們要的是制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賣國賊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綫。

如果說，我們過去的政府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聯盟的政府，那末，從現在起，應當改變爲除了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以外，還要加上一切其他階級中願意參加民族革命分子。

在目前，這個政府的基本任務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吞併中國。這個政府的成份將擴大到廣泛的範圍，不但那些只對民族革命有興趣而對土地革命沒有興趣的人，可以參加，就是那些同歐美帝國主義有關係，不能反對歐美帝國主義，却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人們，只要他們願意，也可以參加。因此，這個政府的綱領，應當是以適合於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這個基本任務爲原則，據此以適當地修改我們過去的政策。

現時革命方面的特點，是有了經過鍛鍊的共產黨，又有了經過鍛鍊的紅軍。這是一件極關重要的事。如果現時還沒有經過鍛鍊的共產黨和紅軍，那就將發生極大的困難。爲什麼？因爲中國的漢奸賣國賊是很多的，並且是有力量的，他們必然想出各種法子來破壞這個統一戰綫，用他們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來挑撥離間，用兵力來強壓，來各個擊破那些比較他們小的、願意離開賣國賊而同我們聯合起來打日本的力量。如果抗日政府抗日軍隊中缺乏共產黨和紅軍這個要素，這種情形是難於避免的。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敗，主要的原因就是由於共產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綫，不努力擴大自己的隊伍（工農運動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而只依仗其暫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其結果是帝國主義命令它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伸出千百隻手來，首先把蔣介石拉去，然後又把汪精衛拉去，使革命陷於失敗。那時的革命統一戰綫沒有中心支柱，沒有堅強的革命的武裝隊伍，四面八方都造起反來，共產黨只得

孤軍作戰，無力抵制帝國主義和中國反革命的各個擊破的策略。那時雖然有賀龍、葉挺一支軍隊，但還不是政治上堅強的軍隊，黨又不善於領導它，終歸失敗了。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在今天，這件事起了變化了，堅強的共產黨和堅強的紅軍都已經有了，而且有了紅軍的根據地。共產黨和紅軍不但在現在充當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發起人，而且在將來的抗日政府和抗日軍隊中必然要成爲堅強的台柱子，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所使用的拆台政策，不能達到最後的目的。沒有疑義，威迫利誘，縱橫捭闔的手段，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是一定要多方使用的，我們是要十分留神的。

當然，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廣泛的隊伍，我們不能希望每部分都有如同共產黨和紅軍一樣程度的鞏固。在他們的活動過程中，有些壞分子因爲受了敵人的影響退出統一戰綫的事情，是會發生的。但是我們不怕這些人退出去。一些壞人受敵人的影響退出去，一些好人却會受我們的影響加進來。只要共產黨和紅軍本身是存在的，發展的，那末，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必然也會是存在的，發展的。這就是共產黨和紅軍在民族統一戰綫中的領導作用。共產黨人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子了，他們能够善處自己，又能够善處同盟者。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能够用縱橫捭闔的手段來對付革命隊伍，共產黨也能够用縱橫捭闔的手段對付反革命隊伍。他們能够拉了我們隊伍中的壞分子跑出去，我們當然也能够拉了他們隊伍中的『壞分子』（對於我們是好分子）跑過來。假如我們能够從他們隊伍中多拉一些人出來，那敵人的隊伍就減少了，我們的隊伍就擴大了。總之，現在是兩個基本勢力相鬥爭，一切

中間勢力，不附屬於那一方面，就附屬於這一方面，這是一定的道理。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和蔣介石滅亡中國和出賣中國的政策，不能不驅使很多的力量跑到我們方面來，或者徑直加入共產黨和紅軍的隊伍，或者同共產黨和紅軍結成聯合戰綫。只要我們的策略不是關門主義，這個目的是能够達到的。

爲什麼要把工農共和國改變爲人民共和國呢？

我們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農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這個意義，是在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裏原來就包括了，因爲工人、農民佔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我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所規定的十大政綱^(三)，不但代表了工農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但是現在的情況，使得我們要把它這個口號改變一下，改變爲人民共和國。這是因爲日本侵略的情況變動了中國的階級關係，不但小資產階級，而且民族資產階級，有了參加抗日鬥爭的可能性。

那是沒有問題的，人民共和國不代表敵對階級的利益。相反，人民共和國同帝國主義的走狗豪紳買辦階級是處在正相反對的地位，它不把那些成份放在所謂人民之列。這和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僅僅代表最大的富翁，並不代表老百姓，並不把老百姓放在所謂『國民』之列，是一樣的。中國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農民，所以人民共和國應當首先代表工人和農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國去掉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中國自由獨立，去掉地主的壓迫，使中國離開半封建制度，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農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總括工農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利益。買辦階級和地主階級雖然也住在中國的土地上，可是他們是不顧民族利益的，他們的

利益是大多數人的利益相衝突的。我們僅僅離開他們這些少數人，僅僅同他們這些少數人相衝突，所以我們有權利稱我們自己是代表全民族的。

工人階級的利益同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也是有衝突的。要開展民族革命，對於民族革命的先鋒隊不給以政治上、經濟上的權利，不使工人階級能够拿出力量來對付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賣國賊，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如果參加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綫，那末，工人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就有了共同的利害關係。人民共和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時代並不廢除非帝國主義的、非封建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沒收民族資產階級的工商業，而且還鼓勵這些工商業的發展。任何民族資本家，只要他不贊助帝國主義和中國賣國賊，我們就要保護他。在民主革命階段，勞資間的鬥爭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法保護工人的利益，却並不反對民族資本家發財，並不反對民族工商業的發展，因為這種發展不利於帝國主義，而有利於中國人民。由此可知，人民共和國是代表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各階層人民的利益的。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以工農為主體，同時容納其他反帝國主義反封建勢力的階級。

讓這些人參加人民共和國的政府，不危險嗎？不危險的。工人農民是這個共和國的基本羣衆。給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其他擁護反帝反封建綱領的分子以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中說話做事的權利，給他們以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不能違背工農基本羣衆的利益。我們綱領的重要部分應當保護工農基本羣衆的利益。工農基本羣衆的代表在人民共和國政府中佔了大多數，共產黨在這個政府中的領

導和活動，都保證了他們進來不危險。中國革命的現時階段依然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不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是十分明顯的。只有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分子⁽³⁾，才瞎說中國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要革命就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這次革命沒有完成，而是失敗了。一九二七年至現在，我們領導的土地革命，也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革命，因為革命的任務是反帝反封建，並不是反資本主義。今後一個相當長時期中的革命還是如此。

革命的動力，基本上依然是工人、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現在則可能增加一個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轉變，那是將來的事。在將來，民主主義的革命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

國際援助

最後，需要講一點中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相互關係。

自從帝國主義這個怪物出世之後，世界的事情就聯成一氣了，要想割開也不可能了。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但是這不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國際援助；不，國際援助對於現代一切國家一切民族的革命鬥爭都是必要的。古人說：『春秋無義戰。』^{〔一〕}於今帝國主義則更加無義戰，只有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有義戰。全世界一切由人民起來反對壓迫者的戰爭，都是義戰。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義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各國人民的革命是義戰。中國的反鴉片戰爭^{〔二〕}，太平天國戰爭^{〔三〕}，義和團戰爭^{〔四〕}，辛亥革命戰爭^{〔五〕}，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戰爭，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戰爭，今天的抗日和討伐賣國賊的戰爭，都是義戰。在目前的全中國抗日高潮和全世界反法西斯高潮中，義戰將遍於全中國，全世界。凡義戰都是互相援助的，凡非義戰都是應該使之轉變成為義戰的，這就是列寧主義的路綫^{〔六〕}。我們的抗日戰爭需要國際人民的援助，首先是蘇聯人民的援助，他們也一定會援助我們，因為我們和他們是休戚相關的。過去一個時期內，中國革命力量和國際革命力量被蔣介石隔斷了，就這點上說，我們是孤立的。現在這種形勢已經改變了，變得對我們有利了。今後這種形勢還會繼續向有利的方面改變。我們不會再是孤立的了。這是中國抗日戰爭和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註釋〕

〔一〕袁世凱爲清朝末年北洋軍閥的頭子。一九一一年革命推翻清朝以後，他依靠反革命的武力和帝國主義的支持，又利用當時領導革命的資產階級的妥協性，篡奪了總統的職位，組織了代表大地主大買辦階級的第一個北洋軍閥政府。一九一五年他要做皇帝，因爲想取得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就承認了日本的旨在獨佔全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同年十二月，在雲南發生了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起義，隨即在各地得到響應。袁世凱於一九一六年六月死於北京。

〔二〕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袁世凱政府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五月七日，提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該要求全文共五號：前四號包括德國在山東所掠奪的權利的移讓，並要求增加日本在山東的新權利，日本在南滿洲和東蒙的土地租借權或所有權，居住權，工商經營權，建築鐵路和開採礦山的獨佔權，漢冶萍公司改爲中日合辦，沿海港灣島嶼概不讓予第三國等條款；第五號所列款項則要求攫取統治中國的政治、財政、警察、軍事的大權，並欲攫取湖北、江西和廣東之間的重要鐵路建築權。袁世凱除對第五號聲明「容日後協商」外，都加以承認。但因中國人民一致反對，日本的要求未能實行。

〔三〕一九二一年十一月，美國政府召集中、英、法、意、比、荷、葡、日八國代表，加上美國共九國，在華盛頓開會。這是一個美國與日本爭奪遠東霸權的會議。次年二月六日，根據美國所謂「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的意見，締結了九國公約。九國公約的作用，是造成帝國主義列強共同控制中國，並在實際上爲美帝國主義獨佔中國作準備的局面，來打消日本獨佔中國的計劃。

〔四〕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駐在中國東北境內的所謂「關東軍」襲取瀋陽。這時中國駐瀋陽及東北各地的軍隊（東北軍）接受蔣介石的「絕對不抵抗」的命令，撤退至山海關以南，使日軍迅速地佔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等省。中國人民習慣上稱日寇這次侵略的行動爲「九一八事變」。

〔五〕東北四省指當時中國東北部的遼寧、吉林、黑龍江、熱河四省，相當於現在的東北行政區所屬遼東、遼西、吉林、松江、黑龍江、熱河六省和內蒙古自治區大部。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先佔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一九三三年又侵佔熱河。

〔六〕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本唆使國民黨漢奸殷汝耕在河北省東部二十二個縣成立傀儡政權，名爲「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是爲「冀東事變」。

〔七〕外交談判，指當時蔣介石政府與日本政府所進行的關於所謂「廣田三原則」的談判。「廣田三原則」是當時日本外相廣田弘毅提出的所謂「對華三原則」，其內容是：一、中國取締一切排日運動；二、樹立中日「滿」經濟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廣田在日本議會演說稱：「中國政府業已承認帝國所提出之三原則。」

〔八〕在一九三五年，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開始新的高漲。北京學生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首先在十二月九日舉行愛國的示威，提出「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這個運動衝破了國民黨政府與日寇聯盟的長期恐怖統治，很快得到了全國人民的響應。人們稱爲「一二九運動」。全國各階級的關係由此很明顯地表現出新的變化，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成爲一切愛國人們共同公開主張的國是。蔣介石政府的賣國政策極大地被孤立了。

〔九〕毛澤東同志做這個報告的時候，蔣介石繼續其出賣東北的伎倆，正又在出賣華北，並繼續積極向紅軍作戰。因此，中國共產黨必須盡量揭露蔣介石這個賣國賊的真面目，也因此，中國共產黨在這時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還沒有包括蔣介石在內。但是毛澤東同志在這個報告內，已經說到了各帝國主義間的矛盾可能引起中國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的分化。後來，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在華北的進攻，與英美帝國主義的利益發生了嚴重的衝突，中國共產黨就認爲和英美帝國主義利益密切聯繫的蔣介石集團可能在其主子的命令下改變對日本的態度，因而採取逼迫蔣介石轉向抗日的政策。一九三六年五月，紅軍由山西回師陝北，即直接向南京國民政府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同年八月，中國共產黨中央又致國民黨中央一封信，要求組織兩黨共同反日的統一戰綫，並派遣代表進行談判。但蔣介石仍然拒絕共產黨的主張。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蔣介石在西安被國民黨內主張聯共抗日的軍人所扣留的時候，他才被迫接受共產黨關於停止內戰準備抗日的要求。

〔十〕蔡廷鍇當時是國民黨第十九路軍的一個軍長，兼該路軍的副總指揮，與陳銘樞蔣光鼐同爲該路軍的負責人。十九路軍原來在江西與紅軍作戰，九一八事變後調往上海。那時上海和全國人民抗日的高潮，給了十九路軍以很大影響。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夜，日本海軍陸戰隊向上海攻擊，十九路軍和上海人民在一起進行了抗戰。但是這個戰爭後來因爲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出賣而失敗。隨後，十九路軍又被蔣介石調到福建去和紅軍作戰。這時十九路軍的領導人物逐漸覺悟到和紅軍作戰是沒有出路的行爲。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軍將領聯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的一部分勢力，公開宣佈與蔣介石破

裂。他們在福建省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紅軍成立抗日反蔣的協定。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的兵力壓迫下失敗。此後蔡廷鍇等人逐步地轉入了與共產黨合作的立場。

(二) 一九二六年九月，當北伐的革命軍攻抵武漢時，馮玉祥率領他的軍隊在綏遠省宣佈脫離北洋軍閥的系統而參加革命。一九二七年初，其部隊由陝西出發，和北伐軍會同進攻河南省。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叛變後，馮玉祥亦參與反對共產黨的活動，但和蔣介石集團間始終存在着利害衝突。九一八事變後，他贊成抗日，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間，與共產黨合作，在張家口組織民衆抗日同盟軍。由於蔣介石勢力和日本侵略軍的雙重壓迫，這次抗日起義於八月間失敗。馮玉祥在晚年繼續採取與共產黨合作的立場。

(三) 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被蔣介石派到江西進攻紅軍。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該路軍一萬餘人在趙博生、董振堂等同志領導下，響應中共抗日號召，於江西寧都起義加入紅軍。

(四) 馬占山原爲國民黨東北軍的軍官，他的部隊駐在黑龍江。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侵略軍由遼寧向黑龍江推進時，該部曾進行抵抗。

(五) 胡漢民爲國民黨的著名政客，曾反對孫中山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政策，是一九二七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的同謀者。後因與蔣爭奪權利，被蔣監禁。九一八事變後被釋放，由南京到廣州，策動兩廣派軍閥勢力與蔣介石南京政府形成長期對立的局面。

(六) 「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即「中華人民對日作戰基本綱領」，由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四年提出，經宋慶齡等簽名公佈。綱領包括下列各項條款：(一)全體海陸空軍總動員對日作戰，(二)全體人民總動員，(三)全體人民總武裝，(四)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財產及賣國賊財產以解決抗日戰費，(五)成立工農兵學商代表選舉出來的全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六)聯合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敵人作友軍，與一切守善意中立的國家建立友誼關係。

(七) 兩廣派軍閥指廣東的陳濟棠、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

(八) 蔣介石匪幫把革命人民叫做「匪」，把他們自己用軍隊進攻和屠殺革命人民的行爲叫做「剿匪」。

(九) 任弼時同志，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和組織家之一。自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在黨的歷次大會上均被選爲中央委員，在一九三一年黨的六屆四中全會上，被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一九三三年，任湘贛邊區省委書

記兼紅軍第六軍團政治委員。紅六軍團與紅二軍團會合後，任二、六兩軍團組成的第二方面軍的政治委員。抗日戰爭初期任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一九四〇年參加中共中央書記處工作。一九四五年黨的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逝世於北京。

(二九) 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團原駐湘贛邊區根據地，一九三四年八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開始突圍轉移。同年十月，在貴州東部與賀龍同志率領的紅軍第二軍團會合，組成紅軍第二方面軍，開闢湘鄂川黔的革命根據地。

(三〇)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三、第五軍團（即紅軍第一方面軍，亦稱中央紅軍），從福建西部的長汀、寧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零都等地出發，開始戰略性的大轉移。紅軍經過福建、江西、廣東、湖南、廣西、貴州、四川、雲南、西康、甘肅、陝西等十一個省，走過終年積雪的高山，越過人跡罕至的草地，歷盡艱苦，擊潰敵人的多次圍追堵截，連續行軍兩萬五千華里（一萬二千五百公里），終於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勝利地到達陝西北部的革命根據地。

(三一) 川陝邊區的紅軍，即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一九三五年三月，第四方面軍離開川陝邊區根據地，向四川西康兩省的邊境轉移。同年六月，在四川西部的懋功地方與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合，組織左右兩路軍北上。同年九月，到達松潘附近毛兒蓋一帶地區後，在第四方面軍工作的張國燾違抗中共中央的命令，擅自率領左路軍南下，分裂紅軍。一九三六年六月，由湘鄂川黔邊區突圍，經湖南、貴州、雲南到達西康甘孜的紅軍第二方面軍，與第四方面軍會合。這時，第四方面軍的同志們違反了張國燾的意志，與第二方面軍一起作了北上的轉移。同年十月，第二方面軍全體和第四方面軍的一部分到達陝北，與紅軍第一方面軍勝利會師。

(三二) 張國燾，中國革命的叛徒。早年投機革命，參加中國共產黨。他在黨內錯誤極多，造成了極大的罪惡。其最著者爲一九三五年反對紅軍北上，主張紅軍向四川西康間少數民族區域退却的失敗主義和取消主義，並且進行公開的反黨反中央的背叛活動，自立僞中央，破壞黨和紅軍的統一，使紅軍第四方面軍蒙受了重大的損失。紅軍第四方面軍及其廣大幹部由於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耐心教育，迅速地回到了黨中央的正確領導之下，並在後來的鬥爭中起了光榮的作用；但張國燾本人則終於不可救藥，於一九三八年春季，隻身逃出陝甘寧邊區，並投入了國民黨特務集團。

(三三) 中央紅軍，指原來在江西福建區域發展起來而由中共中央所直接領導的紅軍，即紅軍第一方面軍。

(三四) 一九三五年七月，國民黨軍開始對陝甘革命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陝北紅軍第二十六軍先在東綫擊潰了敵人兩

個旅，將該綫敵人趕到黃河東面。同年九月，原在鄂豫皖根據地的紅軍第二十五軍，經陝南關東到達陝北，與陝北紅軍會合，成立紅軍第十五軍團。紅十五軍團在甘泉勞山戰役中消滅敵軍一一〇師大部，擊斃其師長，不久又將敵軍一〇七師的四個營消滅於甘泉榆林橋。於是敵人重新組織進攻，以董英斌（東北軍的一個軍長）帶五個師分兩路進攻，東邊一個師沿洛川、鄜縣大道北上，西邊四個師由甘肅的慶陽、合水沿葫蘆河向陝北鄜縣方面前進。同年十月，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十一月，中央紅軍和紅十五軍團共同殲滅敵軍一〇九師於鄜縣西南的直羅鎮，又於追擊中殲滅敵軍一〇六師一個團於黑水寺。這樣就澈底粉碎了敵人對陝甘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

〔五〕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間，中國南部紅軍的主力轉移時，曾經留下了一部分游擊部隊。這些游擊部隊，在八個省份內堅持了十四個地區的游擊戰爭。這些地區是：浙南地區，閩北地區，閩東地區，閩南地區，閩西地區，贛東北地區，贛邊地區，粵贛邊地區，湘南地區，湘贛邊地區，湘鄂贛邊地區，鄂豫皖邊地區，豫南桐柏山區和廣東省的瓊崖地區。

〔六〕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佔東北以後，中國共產黨號召人民武裝反抗，組織了抗日游擊隊和東北人民革命軍，援助了各種形式的抗日義勇軍。一九三四年後，一切東北抗日的隊伍，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成爲統一的東北抗日聯軍，以著名的共產黨員楊靖宇爲總指揮，長期堅持了東北的抗日游擊戰爭。冀東的抗日游擊戰爭，係指一九三五年五月發生於河北省東部的一次農民抗日起義。

〔七〕蘇聯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戰爭，係指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蘇聯人民反對英美法日波等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和平定白黨叛亂的戰爭。

〔八〕毛澤東同志在這裏所提出的人民共和國的政權性質及其各項政策，在抗日戰爭期間，已經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區完全實現了。因此，共產黨能够在敵後戰場領導人民對日寇進行勝利的戰爭。在日本投降以後爆發的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隨着戰爭的進展，人民解放區逐步擴張到了全中國，這樣就出現了統一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同志關於人民共和國的理想，就在全國範圍內實現了。

〔九〕在一九二八年七月間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定了下列的十大政綱：一、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二、沒收外國資本的企業和銀行；三、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四、推翻軍閥國民黨的政府；五、建立工農兵代表會議政府；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增加工資，失業救濟與社會保險等；七、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耕地歸農；八、改善兵

士生活，給兵士以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十、聯合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三) 托洛茨基集團，原是俄國工人運動中的一個反對列寧主義的派別。後來墮落成爲完全反革命的匪幫。關於這個叛徒集團的演變，斯大林同志於一九三七年，在聯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裏，作過如下的說明：『過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義是工人階級中這樣的政治派別之一，誠然，是一個反列寧主義的，因而也就是極端錯誤的政治派別，可是它當時總算是一個政治派別。……現時的托洛茨基主義，並不是工人階級中的政治派別，而是二夥無原則的和無思想的暗害者、破壞者、偵探間諜、殺人兇手的匪幫，是受外國偵探機關僱用而活動的工人階級死敵的匪幫。』在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遭受失敗之後，中國也出現了少數的托洛茨基分子，他們與陳獨秀等叛徒相結合，於一九二九年形成了一個反革命的小組織，散佈國民黨已經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等類的反革命宣傳，完全是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對人民的卑劣工具。中國的托洛茨基分子公開參加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在九一八事變後，他們接受托洛茨基匪賊的『不阻礙日本帝國佔領中國』的指令，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

(三) 『春秋無義戰』，語見『孟子』。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二二年—前四八一年），中國許多封建諸侯相互不間斷地進行爭權奪利的戰爭，所以孟子有此說法。

(三) 一八四〇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國因中國人反對鴉片貿易，藉口保護通商，派兵侵略中國，中國軍隊在林則徐領導下曾經進行了抵抗的戰爭。那時，廣州人民自發地組織了『平英團』，也使英國侵略者受了很大的打擊。

(三) 太平天國戰爭是發生於十九世紀中葉的反對滿清封建統治和民族壓迫的農民革命戰爭。一八五一年一月，這次革命的領導者洪秀全、楊秀清等，在廣西桂平縣的金田村起義，宣佈成立『太平天國』。一八五二年出廣西，經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於一八五三年攻克南京。隨後從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上，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軍在它佔領的地方都沒有建立起鞏固的根據地，建都南京後它的領導集團又犯了許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錯誤，因此不能抵抗清朝的反革命軍隊和英法侵略分子的聯合進攻，而在一八六四年失敗。

(三) 義和團戰爭，是一九〇〇年中國北部農民和手工業者羣衆，採取神秘主義的秘密結社的形態，武裝反對帝國主義的廣大的自發運動。八個帝國主義國家的聯合武裝力量佔領北京天津，極殘酷地鎮壓了這個運動。

(三) 見『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註三。

(三) 參看列寧『無產階級革命的軍事綱領』一文，和『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六章第三節。

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第一章 如何研究戰爭

第一節 戰爭規律是發展的

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戰爭的人不能研究和不能解決的問題。

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革命戰爭的人不能研究和不能解決的問題。

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這是任何指導中國革命戰爭的人不能研究和不能解決的問題。

我們現在是從事戰爭，我們的戰爭是革命戰爭，我們的革命戰爭是在中國這個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度裏進行的。因此，我們不但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戰爭的規律，還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大家明白，不論做什麼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關聯，就不知

道那件事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

戰爭——從有私有財產和有階級以來就開始了的、用以解決階級和階級、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一種最高的鬥爭形式。不懂得它的情形，它的性質，它和它以外事情的關聯，就不知道戰爭的規律，就不知道如何指導戰爭，就不能打勝仗。

革命戰爭——革命的階級戰爭和革命的民族戰爭，在一般戰爭的情形和性質之外，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質。因此，在一般的戰爭規律之外，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不懂得這些特殊的情形和性質，不懂得它的特殊的規律，就不能指導革命戰爭，就不能在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中國革命戰爭——不論是國內戰爭或民族戰爭，是在中國的特殊環境之內進行的，比較一般的戰爭，一般的革命戰爭，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特殊的性質。因此，在一般戰爭和一般革命戰爭的規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規律。如果不懂得這些，就不能在中國革命戰爭中打勝仗。

* 毛澤東同志的這部著作，是爲着總結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的經驗而寫的，當時曾在建立在陝北的紅軍大學作過講演。據著者說，本書只完成五章，尚有戰略進攻、政治工作及其他問題，因爲西安事變發生，沒有工夫再寫，就擱筆了。這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內在軍事問題上的一場大爭論的結果，是表示一個路線反對另一個路線的意見。對於這個路線上的爭論，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的遵義會議作出了結論，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意見，而否定了錯誤路線的意見。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移到陝北以後，毛澤東同志隨即在十二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講演，系統地解決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的政治路線上的問題。第二年，即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同志又寫了本書，系統地說明了有關中國革命戰爭戰略方面的諸問題。

所以，我們應該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也應該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最後，我們還應該研究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

有一種人的意見是不對的，我們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一般戰爭的規律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着反動的中國政府或反動的中國軍事學校出版的那些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這些條令僅僅是一般戰爭的規律，並且全是抄了外國的，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照抄來用，絲毫不變更其形式和內容，就一定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他們的理由是：過去流過血得來的東西，爲什麼要不得？他們不知道：我們固然應該尊重過去流血的經驗，但是還應該尊重自己流血的經驗。

又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已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只要研究俄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就得了，具體地說，只要照着蘇聯內戰的指導規律和蘇聯軍事機關頒佈的軍事條令去做就得了。他們不知道：蘇聯的規律和條令，包含着蘇聯內戰和蘇聯紅軍的特殊性，如果我們一模一樣地抄了來用，不允許任何的變更，也同樣是削足適履，要打敗仗。這些人的理由是：蘇聯的戰爭是革命的戰爭，我們的戰爭也是革命的戰爭，而且蘇聯是勝利了，爲什麼還有取捨的餘地？他們不知道：我們固然應該特別尊重蘇聯的戰爭經驗，因爲它是最近代的革命戰爭的經驗，是在列寧、斯大林指導之下獲得的；但是我們還應該尊重中國革命戰爭的經驗，因爲中國革命和中國紅軍又有許多特殊的情況。再有一種人的意見也是不對的，我們也早就批駁了這種意見了；他們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

七年的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最好的，我們應該學習它，具體地說，學北伐戰爭的長驅直進和奪取大城市。他們不知道：北伐戰爭的經驗是應該學習的，但是不應該刻板地抄用，因為我們現時戰爭的情況已經變化了。我們只應該採用北伐戰爭中那些在現時情況下還能適用的東西，我們應該按照現時情況規定我們自己的東西。

由此看來，戰爭情況的不同，決定着不同的戰爭指導規律，有時間、地域和性質的差別。從時間的條件說，戰爭和戰爭指導規律都是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有各個歷史階段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移用於不同的階段。從戰爭的性質看，革命戰爭和反革命戰爭，各有其不同的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從地域的條件看，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特別是大國家大民族均有其特點，因而戰爭規律也各有其特點，同樣不能呆板地移用。我們研究在各個不同歷史階段、各個不同性質、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戰爭的指導規律，應該着眼其特點和着眼其發展，反對戰爭問題上的機械論。

還不止此。對於一個指揮員來說，起初會指揮小兵團，後來又會指揮大兵團，這對於他是進步了，發展了。一個地方和許多地方也不相同。起初會在某一熟悉的地方作戰，後來在許多地方也會作戰，這對於一個指揮員又是進步了，發展了。因為敵我雙方的技術、戰術、戰略的發展，一個戰爭中各階段的情形也不相同。在低級階段會指揮的，到了高級階段也會指揮，這對於一個指揮員更是進步和發展了。只能適應於一定兵團、一定地方和戰爭發展的一定階段，這叫做沒有進步和沒有發展。有一種人，

抱着一技之長和一孔之見，再也沒有進步，這對革命雖則在一地一時有些作用，但是沒有大的作用。我們要求有大的作用的戰爭指導者。一切戰爭指導規律，依照歷史的發展而發展，依照戰爭的發展而發展；一成不變的東西是沒有的。

第二節 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戰爭

戰爭——這個人類互相殘殺的怪物，人類社會的發展終久要把它消滅的，而且就在不遠的將來會要把它消滅的。但是消滅它的方法只有一個，就是用戰爭反對戰爭，用革命戰爭反對反革命戰爭，用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民族反革命戰爭，用階級革命戰爭反對階級反革命戰爭。歷史上的戰爭，只有正義的和非正義的兩類。我們是擁護正義戰爭反對非正義戰爭的。一切反革命戰爭都是非正義的，一切革命戰爭都是正義的。人類的戰爭生活時代將要由我們之手而結束，我們所進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屬於最後戰爭的一部分。但是我們所面臨的戰爭，毫無疑義又是最大的和最殘酷的戰爭的一部分。最大的和最殘酷的非正義的反革命的戰爭，迫臨在我們的頭上，我們如果不起正義戰爭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就要遭受摧殘。人類正義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人類的旗幟，中國正義戰爭的旗幟是拯救中國的旗幟。人類的大多數和中國人的大多數所舉行的戰爭，毫無疑義地是正義的戰爭，是拯救人類拯救中國的至高無上的榮譽的事業，是把全世界歷史轉到新時代的橋樑。人類社會進步到消滅了階級，

消滅了國家，到了那時，什麼戰爭也沒有了，反革命戰爭沒有了，革命戰爭也沒有了，非正義戰爭沒有了，正義戰爭也沒有了，這就是人類的永久和平的時代。我們研究革命戰爭的規律，出發於我們要求消滅一切戰爭的志願，這是區別我們共產黨人和一切剝削階級的界綫。

第三節 戰略問題是研究戰爭全局的規律的東西

只要有戰爭，就有戰爭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國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一個獨立的游擊區、一個大的獨立的作戰方面，也可以是戰爭的一全局。凡屬帶有要照顧各方面和各階段的性質的，都是戰爭的全局。

研究帶全局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略學的任務。研究帶局部性的戰爭指導規律，是戰役學和戰術學的任務。

要求戰役指揮員和戰術指揮員了解某種程度的戰略上的規律，何以成爲必要呢？因爲懂得了全局性的東西，就更會使用局部性的東西，因爲局部性的東西是隸屬於全局性的東西的。說戰略勝利取決於戰術勝利的這種意見是錯誤的，因爲這種意見沒有看見戰爭的勝敗的主要和首先的問題，是對於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得好或關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階段的關照有了重要的缺點或錯誤，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說『一着不慎，滿盤皆輸』，乃是說的帶全局性的，即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一

着，而不是那種帶局部性的即對全局無決定意義的一着。下棋如此，戰爭也是如此。

全局和局部的關係。全局和局部是相輔相成，不能脫離局部而獨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有的時候，有些局部破壞了或失敗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響，就是因為這些局部不是對於全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戰爭中有些戰術上或戰役上的失敗或不成功，常常不至於引起戰爭全局的變壞，就是因為這些失敗不是有決定意義的東西。但若組成戰爭全局的多數戰役失敗了，或有決定意義的某一二個戰役失敗了，全局就立即起變化。這裏說的多數戰役和某一二個戰役，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戰爭歷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後吃了一個敗仗以至全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後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裏說的『連戰皆捷』和『許多敗仗』，都是局部性的，對於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裏說的『一個敗仗』和『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所有這些，都在說明關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和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和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

指揮全局的人不能只顧局部，而要顧全局。全局上。

然而全局性的東西，不能脫離局部而獨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構成的。有的時候，有些局部破壞了或失敗了，全局可以不起重大的影響，就是因為這些局部不是對於全局有決定意義的東西。戰爭中有些戰術上或戰役上的失敗或不成功，常常不至於引起戰爭全局的變壞，就是因為這些失敗不是有決定意義的東西。但若組成戰爭全局的多數戰役失敗了，或有決定意義的某一二個戰役失敗了，全局就立即起變化。這裏說的多數戰役和某一二個戰役，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戰爭歷史中有在連戰皆捷之後吃了一個敗仗以至全功盡棄的，有在吃了許多敗仗之後打了一個勝仗因而開展了新局面的。這裏說的『連戰皆捷』和『許多敗仗』，都是局部性的，對於全局不起決定作用的東西。這裏說的『一個敗仗』和『一個勝仗』，就都是決定的東西了。所有這些，都在說明關照全局的重要性。指揮全局的人，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擺在照顧戰爭的全局上面。主要地是依據情況，照顧部隊和兵團的組成問題，照顧兩個戰役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問題，照顧我方全部活動和敵方全部活動之間的關係問題，這些都是最吃力的地方，如果丟了這個去忙一些次要的問題，那就難免要吃虧了。

說到全局和局部的關係，不但戰略和戰役的關係是如此，戰役和戰術的關係也是如此。師的動作和團營動作的關係，連的動作和排班動作的關係，就是實例。任何一級的首長，應當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對於他所指揮的全局說來最重要最有決定意義的問題或動作上，而不應當放在其他的

問題或動作上。

說重要，說有決定意義，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況去規定，必須按照具體的情況去規定。作戰時選擇突擊方向和突擊點，要按照當前的敵情、地形和自己兵力的情況去規定。在給養豐富的地方要注意不使戰士吃得過飽，在給養不足的地方却要注意不使戰士餓肚。在白色區域，可以因為僅僅一個消息的走漏而使爾後的戰鬥失敗；在紅色區域，則走漏消息的問題常常不是最重要的。某些戰役，高級指揮員有親自參加之必要，其他則無此必要。一個軍事學校，最重要的問題，是選擇校長教員和規定教育方針。一個民衆大會，主要應注意動員民衆到會和提出恰當的口號。如此等等。總之，一個原則，就是注意於那些有關全局的重要的關節。

學習戰爭全局的指導規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為這種全局性的東西，眼睛看不見，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會懂得。但是全局是由局部構成的，有局部經驗的人，有戰役戰術經驗的人，如肯用心去想，就能明白那些更高級的東西。戰略問題，如所謂照顧敵我之間的關係，照顧各個戰役之間或各個作戰階段之間的關係，照顧有關全局的（有決定意義的）某些部分，照顧全盤情況中的特點，照顧前後方之間的關係，照顧消耗和補充，作戰和休息，集中和分散，攻擊和防禦，前進和後退，蔭蔽和暴露，主攻方面和助攻方面，突擊方面和箝制方面，集中指揮和分散指揮，持久戰和速決戰，陣地戰和運動戰，本軍和友軍，這些兵種和那些兵種，上級和下級，幹部和兵員，老兵和新兵，高級幹部和下級幹部，老幹部和新幹部，紅色區域和白色區域，老區和新

區，中心區和邊緣區，熱天和冷天，勝仗和敗仗，大兵團和小兵團，正規軍和游擊隊，消滅敵人和爭取羣衆，擴大紅軍和鞏固紅軍，軍事工作和政治工作，過去的任務和現在的任務，現在的任務和將來的任務，那種情況下的任務和這種情況下的任務，固定戰綫和非固定戰綫，國內戰爭和民族戰爭，這一歷史階段和那一歷史階段，等等問題的區別和聯繫，都是眼睛看不見的東西，但若用心去想一想，也都可以了解，都可以捉住，都可以精通。這就是說，能够把戰爭或作戰的一切重要的問題，都提到較高的原則性上去解決。達到這個目的，就是研究戰略問題的任務。

第四節 重要的問題在善於學習

爲什麼要組織紅軍？因爲要使用它去戰勝敵人。爲什麼要學習戰爭規律？因爲要使用這些規律於戰爭。

學習不是容易的事情，使用更加不容易。戰爭的學問拿在課堂上，或在書本中，很多人儘管講得一樣頭頭是道，打起仗來却有勝負之分。戰爭史和我們自己的戰爭生活，都證明了這一點。

那末，關鍵在那裏呢？

我們不能要求事實上的常勝將軍，這是從古以來就很少的。我們要求在戰爭過程中一般地打勝仗的勇敢而明智的將軍——智勇雙全的將軍。要達到智勇雙全這一點，有一種方法是要學的，學習的

時候要用這種方法，使用的時候也要用這種方法。

什麼方法呢？那就是熟識敵我雙方各方面的情況，找出其行動的規律，並且應用這些規律於自己的行動。

許多國家頒佈的軍事條令書上，都指示了『按照情況活用原則』的必要，又都指示了打敗仗時的處置方法。前者是不要指揮員因死用原則而主觀地犯錯誤；後者是當着指揮員主觀地犯了錯誤，或客觀情況起了非所預料的和不可抗的變化時，告訴指揮員怎樣去處置。

爲什麼主觀上會犯錯誤呢？就是因爲戰爭或戰鬥的部署和指揮不適合當時當地的情況，主觀的指導和客觀的實在情況不符合，不對頭，或者叫做沒有解決主觀和客觀之間的矛盾。人辦一切事情都難免這種情形，有比較地會辦和比較地不會辦之分罷了。事情要求比較地會辦，軍事上就要求比較地多打勝仗，反面地說，要求比較地少打敗仗。這裏的關鍵，就在於把主觀和客觀二者之間好好地符合起來。

舉戰術的例子來說。攻擊點選在敵人陣地的某一翼，而那裏正是敵人的薄弱部，突擊因而成功，這叫做主觀和客觀相符合，也就是指揮員的偵察、判斷和決心，和敵人及其配置的實在情形相符合。如果攻擊點選在另一翼，或中央，結果正碰在敵人的釘子上，攻不進去，就叫做不相符合。攻擊時機的適當，預備隊使用的不遲不早，以及各種戰鬥處置和戰鬥動作都利於我不利於敵，便是整個戰鬥中主觀指揮和客觀情況統統相符合。統統相符合的事，在戰爭或戰鬥中是極其少有的，這是因爲戰爭或

正確的判斷
性。

戰鬥的雙方是成羣的武裝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緣故，這和處置靜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然而只要做到指揮大體上適合情況，即在有決定意義的部分適合情況，那就是勝利的基礎了。

指揮員的正確的部署來源於正確的決心，正確的決心來源於正確的判斷，正確的判斷來源於周到的和必要的偵察，和對於各種偵察材料的聯貫起來的思索。指揮員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偵察手段，將偵察得來的敵方情況的各種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思索，然後將自己方面的情況加上去，研究雙方的對比和相互的關係，因而構成判斷，定下決心，作出計劃，——這是軍事家在作出每一個戰略、戰役或戰鬥的計劃之前的一個整個的認識情況的過程。粗心大意的軍事家，不去這樣做，把軍事計劃建立在一相情願的基礎之上，這種計劃是空想的，不符合於實際的。魯莽的專憑熱情的軍事家之所以不免於受敵人的欺騙，受敵人表面的或片面的情況的引誘，受自己部下不負責任的無真知灼見的建議的鼓動，因而不免於碰壁，就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任何軍事計劃，是應該建立於必要的偵察和敵我情況及其相互關係的周密思索的基礎之上的緣故。

認識情況的過程，不但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前，而且存在於軍事計劃建立之後。當執行某一計劃時，從開始執行起，到戰局終結止，這又是一個認識情況的過程，即實行的過程。此時，第一個過程中的東西是否符合於實況，需要重新加以檢查。如果計劃和情況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須依照新的認識，構成新的判斷，定下新的決心，把已定計劃加以改變，使之適合於新的情況。部分地改變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戰都是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間或有的。魯莽家不知改變，或不願改變，

只是一味盲幹，結果又非碰壁不可。

上面說的是一個戰略的行動，或一個戰役和戰鬥的行動。經驗多的軍人，假使他是虛心學習的，他摸熟了自己的部隊（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又摸熟了敵人的部隊（同樣，指揮員、戰鬥員、武器、給養等等及其總體）的脾氣，摸熟了一切和戰爭有關的其他的條件如政治、經濟、地理、氣候等等，這樣的軍人指導戰爭或作戰，就比較地有把握，比較地能打勝仗。這是在長時間內認識了敵我雙方的情況，找出了行動的規律，解決了主觀和客觀的矛盾的結果。這一認識過程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一種長時間的經驗，要了解和把握整個戰爭的規律是困難的。做一個真正能幹的高級指揮員，不是初出茅廬或僅僅善於在紙上談兵的角色所能辦到的，必須在戰爭中學習才能辦得到。

一切帶原則性的軍事規律，或軍事理論，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關於過去戰爭經驗的總結。這些過去的戰爭所留給我們的血的教訓，應該着重地學習它。這是一件事。然而還有一件事，即是從自己經驗中考證這些結論，吸收那些用得着的東西，拒絕那些用不着的東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東西。這後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這樣做，我們就不能指導戰爭。

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從戰爭學習戰爭——這是我們的主要方法。沒有進學校機會的人，仍然可以學習戰爭，就是從戰爭中學習。革命戰爭是民衆的事，常常不是先學好了再幹，而是幹起來再學習，幹就是學習。從『老百姓』到軍人之間有一個距離，但不是萬里長城，

而是可以迅速地消滅的，幹革命，幹戰爭，就是消滅這個距離的方法。說學習和使用不容易，是說學得澈底，用得純熟不容易。說老百姓很快可以變成軍人，是說此門並不難入。把二者總合起來，用得着中國一句老話：『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入門既不難，深造也是辦得到的，只要有心，只要善於學習罷了。

軍事的規律，和其他事物的規律一樣，是客觀實際（一）對於我們頭腦的反映，除了我們的頭腦以外，一切都是客觀實際的東西。因此，學習和認識的對象，包括敵我兩方面，這兩方面都應該看成研究的對象，只有我們的頭腦（思想）才是研究的主體。有一種人，明於知己，暗於知彼，又有一種人，明於知彼，暗於知己，他們都是不能解決戰爭規律的學習和使用的問題的。中國古代大軍事學家孫武子（二）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並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

戰爭是民族和民族、國家和國家、階級和階級、政治集團和政治集團之間互相鬥爭的最高形式；一切關於戰爭的規律，都是進行戰爭的民族、國家、階級、政治集團爲了爭取自己的勝利而使用的。戰爭的勝負，主要地決定於作戰雙方的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這是沒有問題的。然而不僅僅如此，還決定於作戰雙方主觀指導的能力。軍事家不能超過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外企圖戰爭的勝利，然而軍事家可以而且必須在物質條件許可的範圍內爭取戰爭的勝利。軍事家活動的舞台建築在客觀物質條件的上面，然而軍事家憑着這個舞台，却可以導演出許多有聲有色威武雄壯的活劇來。因

此，我們紅軍的指導者，在既定的客觀物質基礎即軍事、政治、經濟、自然諸條件之上，就必須發揮我們的威力，提挈全軍，去打倒那些民族的和階級的敵人，改變這個不好的世界。這裏就用得着而且必須用我們的主觀指導的能力。我們不許可任何一個紅軍指揮員變為亂撞亂碰的魯莽家；我們必須提倡每個紅軍指揮員變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壓倒一切的勇氣，而且有駕馭整個戰爭變化發展的能力。指揮員在戰爭的大海中游泳，他們不使自己沉沒，而要使自己決定地有步驟地達到彼岸。指導戰爭的規律，就是戰爭的游泳術。

以上是我們的方法。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戰爭

自一九二四年開始的中國革命戰爭，已經過去了兩個階段，即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階段和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的階段；今後則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這三個階段的革命戰爭，都是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敵人，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中國資產階級雖然在某種歷史時機可以參加革命戰爭，然而由於它的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經濟上的缺乏獨立性，不願意也不能領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徹底勝利的道路。中國農民羣衆和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是願意積極地參加革命戰爭，並願意使戰爭得到徹底勝利的。他們是革命戰爭的主力軍；然

而他們的小生產的特點，使他們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一部分失業羣衆則具有無政府思想），所以他們不能成爲戰爭的正確的領導者。因此，在無產階級已經走上政治舞台的時代，中國革命戰爭的領導責任，就不得不落到中國共產黨的肩上。在這種時候，任何的革命戰爭如果沒有或違背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那個戰爭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爲半殖民地的中國的社會各階層和各種政治集團中，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才最沒有狹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最具有組織性，而且也最能虛心地接受世界上先進的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經驗而用之於自己的事業。因此，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能够領導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克服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狹隘性，克服失業羣的破壞性，並且還能够克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如果共產黨的政策不犯錯誤的話），而使革命和戰爭走上勝利的道路。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基本地說，是在國際無產階級和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於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影響和政治合作之下進行的。然而當着革命和戰爭的緊急關頭，首先由於大資產階級的叛變，同時也由於革命隊伍中機會主義者的自動地放棄革命領導權，這次革命戰爭就失敗了。

一九二七年至現在的土地革命戰爭，是在新的情況之下進行的。戰爭的敵人不但是帝國主義，而且是大資產階級和大地主的聯盟。民族資產階級則做了大資產階級的尾巴。領導這個革命戰爭的惟有共產黨，共產黨已經形成了對於革命戰爭的絕對的領導權。共產黨的這種絕對的領導權，是使革命

戰爭堅持到底的最主要的條件。沒有共產黨的這種絕對的領導，是不能設想革命戰爭能有這樣的堅持性的。

中國共產黨是英勇堅決地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戰爭，在十五年的長歲月中⁽²⁾，在全國人民面前，表示了自己是人民的朋友，每一天都是爲了保護人民的利益，爲了人民的自由解放，站在革命戰爭的最前綫。

中國共產黨以自己艱苦奮鬥的經歷，以幾十萬英勇黨員和幾萬英勇幹部的流血犧牲，在全民族幾萬萬人中間起了偉大的教育作用。中國共產黨在革命鬥爭中的偉大的歷史成就，使得今天處在民族敵人侵入的緊急關頭的中國有了救亡圖存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有了一個爲大多數人民所信任的、被人民在長時間內考驗過因此選中了的政治領導者。現在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於爲人民所接受。沒有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十五年間的艱苦奮鬥，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

中國共產黨在革命戰爭中，除了犯過陳獨秀⁽³⁾右傾機會主義和李立三⁽⁴⁾『左』傾機會主義⁽⁵⁾兩個錯誤之外，還犯過了下述的兩個錯誤：其一，是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⁶⁾，這個錯誤使得土地革命戰爭受到了極端嚴重的損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不能戰勝敵人反而喪失了根據地削弱了紅軍的結果。這個錯誤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擴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義會議時糾正過來了。其二，是在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⁷⁾，這個錯誤發展到破壞了黨和紅軍的紀律，使一部分紅軍主力遭受了嚴重的損失；然而由於中央的正確領導，紅軍中黨員和指揮

員戰鬥員的覺悟，終於也把這個錯誤糾正過來了。所有這些錯誤，對於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和戰爭，當然是不利的，然而終於被我們克服，我們的黨和我們的紅軍是從這些錯誤的克服中鍛鍊得更加堅強了。

中國共產黨領導了、而且繼續領導着轟轟烈烈的光榮的勝利的革命戰爭。這個戰爭不但是解放中國的旗幟，而且是具有國際的革命意義的。世界的革命人民的眼睛都望着我們。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階段上，我們將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完成，也將給東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響。過去的革命戰爭證明，我們不但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政治路線，而且需要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正確的軍事路線。十五年的革命和戰爭，已經鍛鍊出來這樣一條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了。今後戰爭的新階段，我們相信，將使這樣的路線，根據新的環境，更加發展、充實和豐富起來，達到戰勝民族敵人之目的。歷史告訴我們，正確的政治的和軍事的路線，不是自然地平安地產生和發展起來的，而是從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傾機會主義作鬥爭，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不同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戰爭的有害的傾向作鬥爭，並且徹底地克服它們，正確路線的建設和革命戰爭的勝利，是不可能的。我在這本小冊子中時常提到錯誤方面的意見，就是爲了這個目的。

第三章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

第一節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不承認、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中國革命戰爭有其特點的人，把紅軍對國民黨軍隊的作戰，看做和一般戰爭相同，或和蘇聯內戰相同。列寧斯大林領導的蘇聯內戰的經驗是有世界的意義的。所有的共產黨，中國共產黨也同樣，都是以這個經驗和列寧斯大林對這個經驗的理論綜合作為指南的。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在我們的條件下機械地運用這個經驗。中國革命戰爭的許多方面都有其自己的不同於蘇聯內戰的特點。不估計到這種特點，或否認這種特點，當然是錯誤的。這點在我們的十年戰爭中已經完全證明了。

我們的敵人也曾犯過類似的錯誤。他們不承認和紅軍作戰需要有和其他作戰不同的戰略和戰術。他們依仗其各方面的優勢，輕視我們，固守其老一套的戰法。這是一九三三年敵人的第四次『圍剿』時期及其以前的情形，其結果就是招致了他們的歷次的失敗。首先在國民黨軍隊中提出在這個問題上的新意見的是國民黨的反動將軍柳維垣，後來有戴岳。最後他們的意見被蔣介石採納了。這就是蔣介石廬山軍官訓練團〔a〕及其在第五次『圍剿』中施行的反動的新軍事原則〔b〕產生的過程。

然而當着敵人改變其軍事原則使之適合於同紅軍作戰的情況的時候，我們隊伍中却出現了回到『老套』的人們。他們主張回到一般情況的方面去，拒絕了解任何的特殊情況，拒絕紅軍血戰史的經

驗，輕視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力量，輕視國民黨軍隊的力量，對敵人採用的反動的新原則視若無睹。結果，是喪失了除了陝甘邊區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據地，使紅軍由三十萬人降到了幾萬人，使中國共產黨由三十萬黨員降到了幾萬黨員，而在國民黨區域的黨組織幾乎全部喪失。總之，是受了一次極大的歷史性的懲罰。他們自稱爲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其實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沒有學到。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二）。我們的這些同志恰是忘記了這一點。

由此可知，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就不能指導中國革命戰爭，就不能引導中國革命戰爭走上勝利的途徑。

第二節 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

那末，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是什麼呢？

我以爲有四個主要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而又經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

這個特點，指出中國革命戰爭有發展和勝利的可能性。當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

中國游擊戰爭發生不久，湖南江西兩省邊界區域——井岡山的同志們中有些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這個疑問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指出來了（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二））。因為這是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不答覆中國革命根據地和中國紅軍能否存在和發展的問題，我們就不能前進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把這個問題又作了一次答覆。中國革命運動，從此就有了正確的理論基礎。

現在把這個問題分開來看一看：

中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微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嚴重的半封建經濟同時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業都市和停滯着的廣大農村同時存在，幾百萬產業工人和幾萬萬舊制度統治下的農民和手工業工人同時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軍閥和管理各省的小軍閥同時存在，反動軍隊中有隸屬蔣介石的所謂中央軍和隸屬各省軍閥的所謂雜牌軍這樣兩部分軍隊同時存在，若干的鐵路航路汽車路和普遍的獨輪車路、只能用腳走的路和用腳還不好走的路同時存在。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的不統一，影響到中國統治集團間的不統一。數國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和一國支配的殖民地是有區別的。

中國是一個大國——『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沒有迴旋的餘地。

中國是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準備好了紅軍的種子，準備好了紅軍的領導者即共產黨，又準備好了參加過一次革命的民衆。

所以我們說，中國是一個經過了一次革命的、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一個特點。這個特點，不但基本地規定了我們政治上的戰略和戰術，而且也基本地規定了我們軍事上的戰略和戰術。

○第二個特點是敵人的強大。

紅軍的敵人國民黨，它的情況是怎樣呢？它是奪取了政權而且相對地穩定了它的政權的黨。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國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軍隊——改造得和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現代國家的軍隊却大體相同，武器和其他軍事物資的供給比起紅軍來雄厚得多，而且其軍隊數量之多超過中國任何一個歷史時代的軍隊，超過世界任何一個國家的常備軍。它的軍隊和紅軍比較起來真有天壤之別。它控制了全中國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的樞紐或命脈，它的政權是全國性的政權。

中國紅軍是處在這樣強大的敵人的面前。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第二個特點。這個特點，使紅軍的作戰不能不和一般戰爭以及蘇聯內戰、北伐戰爭都有許多的不同。

○第三個特點是紅軍的弱小。

中國紅軍是產生於第一次大革命失敗之後，從游擊隊開始。不但處在中國的反動時期，而且處在世界上反動的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比較穩定的時期。

我們的政權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權，沒有任何的外間援助。革命根據地的經濟條

件和文化條件同國民黨區域比較是落後的。革命根據地只有鄉村和小城市。其區域開始是非常之小，後來也並不很大。而且根據地是流動不定的；紅軍沒有真正鞏固的根據地。

紅軍的數量是少的，紅軍的武器是差的，紅軍的糧食被服等物質供給是非常困難的。

這個特點和前一個特點是尖銳的對比。紅軍的戰略戰術，是在這種尖銳的對比上發生的。

第四個特點是共產黨的領導和土地革命。

這個特點是第一個特點的必然結果。這個特點產生了兩方面的情形。在一方面，中國革命戰爭雖然是處在中國和資本主義世界的反動時期，然而能够勝利的，因為它有共產黨的領導和農民的援助。根據地雖小却有很大的政治上的威力，屹然和龐大的國民黨政權相對立，軍事上給國民黨的進攻以很大的困難，因為我們有農民的援助。紅軍雖小却有強大的戰鬥力，因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人員是從土地革命中產生，爲着自己的利益而戰鬥的，而且指揮員和戰鬥員之間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則和國民黨成了尖銳的對比。國民黨是反對土地革命的，因此沒有農民的援助。其軍隊雖多，却不能使兵士羣衆和許多小生產者出身的下級幹部自覺地爲國民黨拚命。官兵之間在政治上是分歧的，這就減少了它的戰鬥力。

第三節 由此產生我們的戰略戰術

經過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經濟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國，強大的敵人，弱小的紅軍，土地革命——這是中國革命戰爭四個主要的特點。這些特點，規定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指導路線及其許多戰略戰術的原則。第一個特點和第四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可能發展和可能戰勝其敵人。第二個特點和第三個特點，規定了中國紅軍的不可能很快發展和不可能很快戰勝其敵人，即是規定了戰爭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話，還可能失敗。

這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兩方面。這兩方面同時存在着，即是說，既有順利的條件，又有困難的條件。這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根本規律，許多規律都是從這個根本的規律發生出來的。我們的十年戰爭史證明了這個規律的正確性。誰要是睜眼看不見這些根本性質的規律，誰就不能指導中國的革命戰爭，誰就不能使紅軍打勝仗。

很明顯的，正確地規定戰略方向，進攻時反對冒險主義，防禦時反對保守主義，轉移時反對逃跑主義；反對紅軍的游擊主義，却又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反對戰役的持久戰和戰略的速決戰，承認戰略的持久戰和戰役的速決戰；反對固定的作戰綫和陣地戰，承認非固定的作戰綫和運動戰；反對擊潰戰，承認殲滅戰；反對戰略方向的兩個拳頭主義，承認一個拳頭主義；反對大後方制度，承認小後方制度；反對絕對的集中指揮，承認相對的集中指揮；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流寇主義（一），承認紅軍是中國革命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反對土匪主義（二），承認嚴肅的政治紀律；反對軍閥主義，承認有限制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權的軍事紀律；反對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承認正確的幹部政策；反對孤

立政策，承認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最後，反對把紅軍停頓於舊階段，爭取紅軍發展到新階段——所有這些原則問題，都要求正確的解決。我們現在要講的戰略問題，就是要就中國革命戰爭的十年血戰史的經驗，好好地說明這些問題。

第四章 『圍剿』和反『圍剿』——中國內戰的主要形式

十年以來，從游擊戰爭開始的一天起，任何一個獨立的紅色游擊隊或紅軍的周圍，任何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周圍，經常遇到的是敵人的『圍剿』。敵人把紅軍看作異物，一出現就想把它捕獲。敵人總是跟着紅軍，而且總是把它圍起來。這種形式，過去十年是沒有變化的，如果沒有民族戰爭代替國內戰爭，那末，直到敵人變成弱小者、紅軍變成強大者那一天為止，這種形式也是不會變化的。

紅軍的活動，採取了反『圍剿』的形式。所謂勝利，主要地是說反『圍剿』的勝利，這就是戰略和戰役的勝利。反對一次『圍剿』是一個戰役，常常由大小數個以至數十個戰鬥組織而成。在一次『圍剿』沒有基本地打破以前，即使得到了許多戰鬥的勝利，還不能說戰略上或整個戰役上已經勝利了。十年的紅軍戰爭史，就是一部反『圍剿』史。

敵人的『圍剿』和紅軍的反『圍剿』，互相採用進攻和防禦這兩種戰鬥的形式，這是和古今中外的戰爭沒有兩樣的。然而中國內戰的特點，則在二者的長期的反覆。在一次『圍剿』中，敵人以進攻反

對紅軍的防禦，紅軍以防禦反對敵人的進攻，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一個階段。敵人以防禦反對紅軍的進攻，紅軍以進攻反對敵人的防禦，這是反『圍剿』戰役的第二個階段。任何的『圍剿』，都是包括這兩個階段的，而且是長期地反覆的。

說長期反覆，是說戰爭和戰鬥形式的反覆。這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圍剿』和反『圍剿』，是戰爭形式的反覆。敵以進攻對我防禦，我以防禦對敵進攻的第一階段，和敵以防禦對我進攻，我以進攻對敵防禦的第二階段，是每一次『圍剿』中戰鬥形式的反覆。

至於戰爭和戰鬥的內容，則不是簡單地反覆的，而是每次不同的。這也是事實，任何人一看就知的。這裏的規律，是『圍剿』和反『圍剿』的規模一次比一次大，情況一次比一次複雜，戰鬥一次比一次激烈。

然而不是沒有起落的。第五次『圍剿』之後，因為紅軍極大地削弱了，南方根據地全部喪失，紅軍移到了西北，不是如同在南方那樣處在威脅國內敵人的最重要的地位了，『圍剿』的規模、情況和戰鬥，就比較小些，簡單些，緩和些了。

紅軍的失敗是什麼呢？在戰略上說，只有反『圍剿』根本沒有成功，才叫做失敗，而且也只能叫做局部的和暫時的失敗。因為國內戰爭的根本的失敗，就是整個紅軍的覆滅，然而這樣的事實是沒有的。廣大根據地的喪失和紅軍的轉移，這是暫時的和局部的失敗，不是永遠的和全部的失敗，雖然這個局部是包括了黨和軍隊和根據地的百分之九十。這種事實，我們把它叫做防禦的繼續，而把敵人的

追擊叫做進攻的繼續。這就是說，在『圍剿』和反『圍剿』的鬥爭中，我們沒有由防禦轉到進攻，反而被敵人的進攻打破了我們的防禦，我們的防禦就變成了退却，敵人的進攻就變成了追擊。然而等到紅軍到達一個新的地區時，例如我們由江西等地移到了陝西，『圍剿』的反覆又出現了。所以我們說，紅軍的戰略退却（長征）是紅軍的戰略防禦的繼續，敵人的戰略追擊是敵人的戰略進攻的繼續。

中國國內戰爭和任何古今中外的戰爭一樣，基本的戰鬥形式只有攻防兩種。中國內戰的特點，是『圍剿』和反『圍剿』的長期地反覆和攻防兩種戰鬥形式的長期地反覆，並且包括着一次一萬多公里偉大的戰略轉移（長征），^{（四）}這樣一種東西在裏面。

所謂敵人的失敗，也是如此。他們的戰略失敗，就是他們的『圍剿』被我們打破，我們的防禦變成了進攻，敵人轉到防禦地位，必須重新組織才有再一次的『圍剿』。敵人沒有如同我們所謂一萬多公里的戰略轉移的那種情形，這是因為他們是全國性的統治者，他們比我們強大得多的緣故。然而部分的事情是有過的。若干根據地中被紅軍圍攻的白色據點內的敵人突圍而出，退却到白區裏去重新組織進攻，這樣的事是發生過的。如果內戰延長，紅軍勝利的範圍更廣大時，這種事情會多起來。但是他們的結果不能和紅軍相比，因為他們沒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間又不一致。他們如果也學紅軍的長途轉移，那是一定會被消滅的。

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線時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國內戰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國內戰發展中『圍剿』又『圍剿』、打破又打破的這種長期反覆的規律（那時已有湘贛邊區的三次『圍剿』，福建

的兩次『圍剿』等），因此在紅軍還幼小的時代就命令紅軍去打武漢，命令全國舉行武裝起義，企圖使全國革命迅速勝利。這就犯了『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也不相信『圍剿』反覆這一規律。在鄂豫皖邊區根據地則有所謂『偏師』^{（五）}說，那裏的一些領導同志認為第三次『圍剿』失敗後的國民黨不過是偏師了，要進攻紅軍，就得由帝國主義親身出馬擔當主力軍。在這個估計之下的戰略方針，就是紅軍打武漢。這和江西的一些同志號召紅軍打南昌，反對進行使各根據地聯成一片的工作，反對誘敵深入的作戰，把一省勝利放在奪取省城和中心城市的基點上，以及認為『反對五次『圍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等等，是在原則上一致的。這個『左』傾機會主義，種下了鄂豫皖邊區反對第四次『圍剿』、江西中央區反對第五次『圍剿』鬥爭中的錯誤路綫的根苗，使紅軍在敵人的嚴重的『圍剿』面前不得不處於無能的地位，給了中國革命以很大的損失。

跟否認『圍剿』反覆的『左』傾機會主義直接聯繫，而說紅軍根本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的一種意見，也是完全不正確的。

革命和革命戰爭是進攻的——這種說法當然有它的正確性。革命和革命戰爭從發生到發展，從小到大，從沒有政權到奪取政權，從沒有紅軍到創造紅軍，從沒有革命根據地到創造革命根據地，總是要進攻的，是不能保守的，保守主義的傾向是應該反對的。

革命和革命戰爭是進攻的，但是也有防禦和後退——這種說法才是完全正確的。爲了進攻而防

禦，爲了前進而後退，爲了向正面而向側面，爲了走直路而走彎路，是許多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所不可避免的現象，何況軍事運動。

上述兩個論斷中的前一論斷，在政治上說來可以是對的，移到軍事上就不對了。在政治上，也只是在某一種情況說來（革命前進時）是對的，移到另一種情況（革命退却時：全部退却，例如俄國在一九〇六年^(二)、中國在一九二七年；局部退却，例如俄國在一九一八年的布列斯特條約^(三)時）也就不對了。只有後一論斷，才是全部地正確的真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傾機會主義，機械地反對使用軍事防禦的手段，不過是一種非常幼稚的思想。

『圍剿』反覆的形式何時結束？據我看來，如果內戰延長的話，那是在敵我強弱對比起了根本變化之時。如果紅軍一旦改變到比自己的敵人更爲強大時，那末，這個反覆就結束了。那時是我們圍剿敵人，敵人則企圖反圍剿，但是政治和軍事的條件將不允許敵人獲得如同紅軍一樣的反『圍剿』的地位。那時，『圍剿』反覆這種形式，即使不說完全結束，但是一般的結束是可以斷言的。

第五章 戰略防禦

這個問題中，我想說明下列各問題：（一）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二）反『圍剿』的準備；（三）戰略退却；（四）戰略反攻；（五）反攻開始問題；（六）集中兵力問題；（七）運動戰；（八）速決戰；

第一節 積極防禦和消極防禦

為什麼從防禦說起呢？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國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綫失敗後，革命成了極深刻極殘酷的階級戰爭。敵人是全國的統治者，我們只有一點小部隊，因此，我們一開始就是和敵人的『圍剿』奮鬥。我們的進攻是密切地聯繫於打破『圍剿』的，我們發展的命運全看我們能不能打破『圍剿』。打破『圍剿』的過程往往是迂迴曲折的，不是徑情直遂的。首先而且嚴重的問題，是如何保存力量，待機破敵。所以，戰略防禦問題成為紅軍作戰中最複雜和最重要的問題。

在我們的十年戰爭中，對於戰略防禦問題，常常發生兩種偏向，一種是輕視敵人，又一種是為敵人所嚇倒。

由於輕視敵人，許多游擊隊失敗了，紅軍對若干次敵人的『圍剿』不能打破。

革命的游擊隊初起，領導者對於敵我形勢往往看得不正確。他們看見自己在一個地方用突然的武裝起義勝利了，或從白軍中講變出來了，一時的環境很順利，或者雖有嚴重的環境而看不到，因此往往輕視敵人。另一方面，對自己的弱點（沒有經驗，力量弱小），也不了解。敵強我弱，原是客觀地存在的現象，可是人們不願意想一想，一味只講進攻，不講防禦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禦的武裝，

因而把行動引到錯誤的方向。許多游擊隊因此失敗了。

紅軍因爲和這同樣的原因不能打破『圍剿』的例子，則有一九二八年廣東海陸豐區域的紅軍的失敗^(二)，以及一九三二年鄂豫皖邊區的紅軍，在所謂國民黨偏師說的指導之下，使得反對第四次『圍剿』喪失了措置裕如的能力的事實。

爲敵人嚇倒而受挫折的例子，是很多的。

和輕敵者相反，人們太看重了敵人，太看輕了自己，因而採取了非必要的退却方針，精神上同樣地解除了防禦的武裝。其結果或者是游擊隊失敗，或者是紅軍的某些戰役失敗，或者是根據地喪失。

喪失根據地的最顯著的例子，是在反對第五次『圍剿』中喪失了江西中央根據地。這裏的錯誤是從右傾的觀點產生的。領導者們畏敵如虎，處處設防，節節抵禦，不敢舉行本來有利的向敵人後方打去的進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結果喪失了整個根據地，使紅軍做了一萬二千多公里的長征。然而這種錯誤，往往有一種『左』傾輕敵的錯誤爲之先行。一九三二年進攻中心城市的軍事冒險主義，正是後來在對付敵人第五次『圍剿』中採取消極防禦路線的根源。

爲敵人嚇倒的極端的例子，是退却主義的『張國燾路線』。紅軍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在黃河以西的失敗^(三)，是這個路線的最後的破產。

積極防禦，又叫攻勢防禦，又叫決戰防禦。消極防禦，又叫專守防禦，又叫單純防禦。消極防禦實際上就是假防禦，只有積極防禦才是真防禦，才是爲了反攻和進攻的防禦。據我所知，任何一本有價值

的軍事書，任何一個比較聰明的軍事家，而且無論古今中外，無論戰略戰術，沒有不反對消極防禦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極防禦當法寶。然而世上偏有這樣的人，做出這樣的事。這是戰爭中的過失，是保守主義在軍事上的表現，我們應該堅決地反對它。

後起而且發展得很快的帝國主義國家，即德日兩國的軍事家中，積極地鼓吹戰略進攻的利益，反對戰略防禦。這種思想，是根本不合於中國革命戰爭的。德日帝國主義的軍事家們指出防禦的一個重要的弱點是不能振奮人心，反而使人心動搖。這是說的階級矛盾劇烈，而戰爭的利益僅僅屬於反動的統治階層乃至反動的當權政派的那種國家。我們的情況不同。在保衛革命根據地和保衛中國的口號下，我們能夠團結大多數人民萬眾一心地作戰，因為我們是被壓迫者和被侵略者。蘇聯內戰時期的紅軍也是在防禦形式之下戰勝敵人的。他們的戰爭不但在帝國主義各國組織白黨進攻時，是在保衛蘇維埃的口號下進行的，就是在十月起義的準備時期，也是在保衛首都的口號下進行軍事動員的。一切正義戰爭的防禦戰，不但有麻痺政治上異己分子的作用，而且可以動員落後的人民羣衆加入到戰爭中來。

馬克思說的武裝起義之後一刻也不應該停止進攻⁽¹⁾，這是說乘敵不備而突然起義的羣衆，應該不讓反動的統治者有保守政權或恢復政權的機會，趁此一瞬間把國內反動的統治勢力打個措手不及，而不要滿足於已得的勝利，輕視敵人，放鬆對於敵人的進攻，或者畏縮不前，坐失消滅敵人的時機，招致革命的失敗。這是正確的。然而不是說，敵我雙方已在軍事對抗中，而且敵人是優勢，當受敵人

壓迫時，革命黨人也不應該採取防禦手段。如果這樣想，那就是第一號的傻子。

我們過去的戰爭，整個地說來是向國民黨進攻，然而在軍事上採取了打破『圍剿』的形式。

在軍事上說來，我們的戰爭是防禦和進攻的交替的應用。對於我們，說進攻是在防禦之後，或說進攻是在防禦之前都是可以的，因為關鍵在於打破『圍剿』。『圍剿』沒有打破以前是防禦，『圍剿』一經打破就開始了進攻，僅僅是一件事情的兩個階段，而敵人的一次『圍剿』和它的又一次『圍剿』是腳接着的。這兩個階段中，防禦的階段比進攻的階段更為複雜，更為重要。這個階段包含着怎樣打破『圍剿』的許多問題。基本的原則是承認積極防禦，反對消極防禦。

從國內戰爭說，假如紅軍的力量超過了敵人時，那末，一般地就用不着戰略防禦了。那時的方針只是戰略的進攻。這種改變，依靠於敵我力量的總的變動。到了那時，剩下的防禦手段，只是局部的東西了。

第二節 反『圍剿』的準備

對於敵人的一次有計劃的『圍剿』，如果我們沒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準備，必然陷入被動地位。臨時倉卒應戰，勝利的把握是沒有的。因此，在和敵人準備『圍剿』同時，進行我們的反『圍剿』的準備，實有完全的必要。我們隊伍中曾經發生過的反對準備的意見是幼稚可笑的。

這裏有一個困難問題，容易發生爭論。就是，何時結束自己的進攻，轉入反「圍剿」的準備階段呢？因為當自己處在勝利的進攻中，敵人處在防禦地位時，敵人的「圍剿」準備是在秘密地進行的，我們難於知道他們將在何時開始進攻。我們準備反「圍剿」的工作開始早了，不免減少進攻的利益，而且有時會給予紅軍和人民以若干不良的影響。因為準備階段中的主要步驟，就是軍事上的準備退却，和爲着準備退却的政治上的動員。有時準備過早，會變爲等待敵人；等了好久而敵人未來，不得不重新發動自己的進攻。有時我們的重新進攻剛在開始，又恰好遇到了敵人進攻的開始，把自己處在困難地位。所以開始準備的時機的選擇，成爲一個重要問題。斷定這種時機，要從敵我雙方情況和二者間的關係着眼。爲着了解敵人的情況，須從敵人方面的政治、軍事、財政和社會輿論等方面搜集材料。分析這些材料的時候，要足夠地估計敵人的整個力量，不可誇大敵人過去失敗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估計到敵人內部的矛盾，財政的困難，過去失敗的影響等等。對自己方面，不可誇大過去勝利的程度，但也決不可不足夠地估計到過去勝利的影響。

但是開始準備的時機問題，一般地說來，與其失之過遲，不如失之過早。因為後者的損失較之前者爲小，而其利益，則是有備無患，根本上立於不敗之地。

準備階段中的主要的問題，是紅軍的準備退却，政治動員，徵集新兵，財政和糧食的準備，政治異己分子的處置等。

所謂紅軍的準備退却，就是說不要使紅軍向着不利於退却的方向，不要進攻得太遠了，不要使紅

軍過於疲勞。這是在敵人大舉進攻的前夜主力紅軍的必要的處置。這時紅軍的注意力，主要地要放在創造戰場，徵集資材，擴大自己和訓練自己的計劃上。

政治動員是反『圍剿』鬥爭中第一個重要問題。這即是說，明確、堅決而充分地告訴紅軍人員和根據地的人民，關於敵人進攻的必然性和迫切性，敵人進攻危害人民的嚴重性；同時，關於敵人的弱點，紅軍的優良條件，我們一定要勝利的志願，我們工作的方向等。號召紅軍和人民全體爲反對『圍剿』、保衛根據地而鬥爭。除開軍事秘密外，政治動員是必須公開的，而且力求普及於每一個可能擁護革命利益的人員。重要的關節是說服幹部。

徵集新兵須從兩方面出發：一方面顧到人民的政治覺悟程度和人口情況；又一方面顧到當時紅軍的情況和整個反『圍剿』戰役中紅軍消耗的可能限度。

財政和糧食問題，不待說對於反對『圍剿』是有重大意義的。要顧及『圍剿』時間的可能延長。應當計算，主要的是紅軍，再則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在整個反『圍剿』鬥爭中物資需要的最低限度。

對待政治異己分子，不可對他們不警戒；但也不可過於恐懼他們的叛變，而採取過分的警戒手段。對地主、商人、富農之間是應該有分別的，主要地是政治上向他們說明，爭取他們中立，並且組織民衆監視他們。只有對極少數最帶危險性的分子，才可以採用嚴峻手段，例如逮捕等。

反『圍剿』鬥爭勝利的程度，是和準備階段中任務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聯繫着的。由輕敵而發生的對於準備的放鬆，和由被敵人進攻所嚇倒而發生的驚惶失措，都是應該堅決反對的不良傾向。我們需

要的是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有秩序的工作。

第三節 戰略退却

戰略退却，是劣勢軍隊處在優勢軍隊進攻面前，因為顧到不能迅速地擊破其進攻，爲了保存軍力，待機破敵，而採取的一個有計劃的戰略步驟。可是，軍事冒險主義者則堅決反對此種步驟，他們的主張是所謂『禦敵於國門之外』。

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開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却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冲，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冲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脚踢翻了洪教頭(二)。

春秋時候，魯與齊(三)戰，魯莊公起初不待齊軍疲憊就要出戰，後來被曹劌阻止了，採取了『敵疲我打』的方針，打勝了齊軍，造成了中國戰史中弱軍戰勝強軍的有名的戰例。請看歷史家左丘明(四)的敘述：

『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

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勦曰：未可。齊人三鼓。勦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勦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四）

當時的情況是弱國抵抗強國。文中指出了戰前的政治準備——取信於民，敘述了利於轉入反攻的陣地——長勺，敘述了利於開始反攻的時機——彼竭我盈之時，敘述了追擊開始的時機——轍亂旗靡之時。雖然是一個不大的戰役，却同時是說的戰略防禦的原則。中國戰史中合此原則而取勝的實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漢成臯之戰（二五）、新漢昆陽之戰（二六）、袁曹官渡之戰（二七）、吳魏赤壁之戰（二八）、吳蜀彝陵之戰（二九）、秦晉淝水之戰（三〇）等等有名的大戰，都是雙方強弱不同，弱者先讓一步，後發制人，因而戰勝的。

廣：倒下去

我們的戰爭是從一九二七年秋天開始的，當時根本沒有經驗。南昌起義（三一）、廣州起義（三二）是失敗了，秋收起義（三三）在湘鄂贛邊界地區的紅軍，也打了幾個敗仗，轉移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地區。第二年四月，南昌起義失敗後保存的部隊，經過湘南也轉到了井岡山。然而從一九二八年五月開始，適應當時情況的帶着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已經產生出來了，那就是所謂「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這個十六字訣的軍事原則，立三路綫以前的中央是承認了的。後來我們的作戰原則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到了江西根據地第一次反「圍剿」時，「誘敵深入」的方針提出

來了，而且應用成功了。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於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地是超越了從前的樸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禦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却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後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罷了。

然而從一九三二年一月開始，在黨的『三次『圍剿』被粉碎後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那個包含着嚴重原則錯誤的決議發佈之後，『左』傾機會主義者就向着正確的原則作鬥爭，最後是撤消了一套正確原則，成立了另一整套和這相反的所謂『新原則』，或『正規原則』。從此以後，從前的東西不能叫做正規的了，那是應該否定的『游擊主義』。反『游擊主義』的空氣，統治了整整的三年頭。其第一階段是軍事冒險主義，第二階段轉到軍事保守主義，最後，第三階段，變成了逃跑主義。直到黨中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貴州的遵義召開擴大的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才宣告這個錯誤路綫的破產，重新承認過去路綫的正確性。這是費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呵！

起勁地反對『游擊主義』的同志們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地方。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嗎？並且不放棄土地又能打勝敵人不是更好些嗎？在敵區或在我區敵區交界地方去打勝敵人不是更好些嗎？過去的東西沒有任何的正確性，只是游擊隊使用的辦法。現在我們的國家已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作戰是國家和國家作戰，大軍和大

軍作戰。歷史不應重複，『游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裏產生的，而山裏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綫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蠟燭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後，則是大規模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

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以次變為拚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這裏單說戰略退却，江西叫做『誘敵深入』，四川叫做『收緊陣地』。從前的軍事理論家和實際家也無不承認這是弱軍對強軍作戰時在戰爭開始階段必須採取的方針。外國的軍事家就曾這樣說：『戰略守勢的作戰，大都先避不利的決戰，使至有利的情況始求決戰。』這是完全正確的，我們對此也沒有任何的增加。

戰略退却的目的是爲了保存軍力，準備反攻。退却之所以必要，是因爲處在強敵的進攻面前，若不退讓一步，則必危及軍力的保存。過去却有許多人堅決地反對退却，認爲這是『機會主義的單純防

禦路綫」。我們的歷史已經證明這個反對是完全錯誤的了。

準備反攻，須選擇和造成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若干條件，使敵我力量對比發生變化，然後進入反攻階段。

依我們的過去情形說來，大概須在退却階段中取得下列諸種條件中至少二種以上，才算是有利於我不利於敵，才好使自己轉入反攻。這些條件是：

- (一) 積極援助紅軍的人民；
- (二) 有利作戰的陣地；
- (三) 紅軍主力的全部集中；
- (四) 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
- (五) 使敵人疲勞沮喪；
- (六) 使敵人發生過失。

人民這個條件，對於紅軍是最重要的條件。這就是根據地的條件。並且由於這個條件，第四、第五、第六等條件也容易造成或發現。所以當敵人大舉進攻紅軍時，紅軍總是從白區退却到根據地來，因為根據地的人民是最積極地援助紅軍反對白軍的。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也有區別；對於封鎖消息、偵察、運輸、參戰等事，中心區的人民比較邊緣區為好。所以『退却終點』，在過去江西反對第一、二、三次『圍剿』時，都選在人民條件最好或較好的地區。根據地這個特點，使紅軍的作戰比較一

般的作戰起了很大的變化，也是使後來敵人不得不採取堡壘主義的主要原因。

退却的軍隊能够選擇自己所欲的有利陣地，使進攻的軍隊不得不就我範圍，這是內綫作戰的一個優良條件。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但是單有這個條件還不够，還要求別的條件和它配合。首先是人民的條件。再則還要求好打的敵人，例如敵人疲勞了，或者發生了過失，或者該路前進的敵人比較地缺乏戰鬥力。這些條件不具備時，雖有優良陣地，也只得置之不顧，繼續退却，以就自己所欲的條件。白區未嘗無優良的陣地，但無優良的人民條件。如果其他條件也還未造成或未發現時，紅軍便不得不向根據地退却。根據地的邊緣區和中心區的分別，也大體是如此。

除地方部隊和箝制兵力外，一切突擊兵力以全部集中為原則。當着我們向戰略上取守勢的敵人進攻時，紅軍往往是分散的。一旦敵人大舉向我進攻，紅軍就實行所謂『求心退却』。退却的終點，往往選在根據地中部；但有時也在前部，有時則在後部，依照情況來決定。這種求心退却，能够使全部紅軍主力完全集中起來。

弱軍對於強軍作戰的再一個必要條件，就是揀弱的打。然而當敵人開始進攻時，我們往往不知敵之分進各軍何部最強，何部次強，何部最弱，何部次弱，需要一個偵察的過程。往往需要許多時間，才能達此目的。戰略退却的所以必要，這也是一個理由。

如果進攻之敵在數量和強度上都超過我軍甚遠，我們要求強弱的對比發生變化，便只有等到敵人深入根據地，吃盡根據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圍剿』時蔣介石某旅參謀長所說的『肥的拖瘦，瘦

的拖死』，又如『圍剿』軍西路總司令陳銘樞所說的『國軍處處黑暗，紅軍處處明亮』之時，才能達到的目的。這種時候，敵軍雖強，也大大減弱了；兵力疲勞，士氣沮喪，許多弱點都暴露出來。紅軍雖弱，却養精蓄銳，以逸待勞。此時雙方對比，往往能達到某種程度的均衡，或者敵軍的絕對優勢改變到相對優勢，我軍的絕對劣勢改變到相對劣勢，甚至有敵軍劣於我軍，而我軍反優於敵軍的事情。江西反對第三次『圍剿』時，紅軍實行了一種極端的退却（紅軍集中於根據地後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戰勝敵人的，因為當時的『圍剿』軍超過紅軍十倍以上。孫子說的『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指的使敵疲勞沮喪，以求滅殺其優勢。

退却的最後一個要求，是造成和發現敵人的過失。須知任何高明的敵軍指揮員，在相當長時間中，要不發生一點過失，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乘敵之隙的可能性，總是存在的。敵人會犯錯誤，正如我們自己有時也弄錯，有時也授敵以可乘之隙一樣。而且我們可以人工地造成敵軍的過失，例如孫子所謂『示形』之類（示形於東而擊於西，即所謂聲東擊西）。要這樣做，退却的終點，就不能限定於某一地區。有時退到該地區還無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幾步，待敵發生可乘之『隙』。

退却所求的有利條件，大致如上所述。然而不是說，須待這些條件完全具備方能舉行反攻。要同時具備這些條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需要。但依據敵人當前情勢，爭取若干必要條件，是以弱敵強的內綫作戰軍隊所應該注意的，在這上面的反對的意見是不正確的。

決定退却終點究在何處，須以整個形勢作出發點。在局部形勢看來有利於我轉入反攻，如果不是

同時在全體形勢看來也對我有利時，則據此決定退却終點，就是不正確的。因為反攻的開始，必須計算到以後的變化，而我們的反攻總是從局部開始的。有時退却終點應該選在根據地的前部，例如江西第二次、第四次反『圍剿』，陝甘第三次反『圍剿』時。有時須在根據地的中部，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有時則在根據地的後部，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這些都是將局部形勢聯繫到整個形勢來決定的。江西第五次反『圍剿』，我軍全然不講退却，原因在於對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都不注意，實在是一種魯莽滅裂的幹法。形勢是由條件造成的，觀察局部形勢和整個形勢的聯繫，應從當時敵我雙方所具條件之見於局部的和見於全體的，是否在一定的限度上利於我之開始反攻以爲斷。

退却終點，在根據地可以大體上分爲前部、中部、後部三種。然而是不是根本拒絕在白區作戰呢？不是的。我們拒絕在白區作戰，僅僅指的對付敵軍大規模『圍剿』。敵我強弱懸殊，我們在保存軍力待機破敵的原則下，才主張向根據地退却，主張誘敵深入，因為只有這樣做才能造成或發現利於反攻的條件。如果情況並不這樣嚴重，或者情況的嚴重性簡直使紅軍連在根據地也無法開始反攻，或者反攻不利需要再退以求局勢之變化時，那末，把退却終點選在白區也是應該承認的，至少在理論上是應該承認的，雖然我們過去很少這種經驗。

白區退却終點大體上也可分爲三種：第一是在根據地前面，第二在根據地側面，第三在根據地後面。第一種終點，例如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如果紅軍沒有內部不統一和地方黨的分裂，即立三路綫和A B團^(三)兩個困難問題存在，是可以設想在吉安、南豐、樟樹三點之間集中兵力舉行反攻的。

因爲當時從贛撫兩河間（三）前進的敵人軍力，比起紅軍來優勢並不很大（十萬對四萬）。人民條件雖不如根據地，但陣地條件是有的，而且是可以乘敵分路前進時各個把他擊破的。第二種終點，例如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假如當時敵人進攻的規模沒有那樣大，而敵有一路從閩贛交界的建寧、黎川、泰寧前進，這一路的力量又適合於我們的攻擊時，也可以設想紅軍就在福建西部的白區集中，首先打破此敵，不必繞道千里走瑞金到興國。第三種終點，同樣例如上述江西第三次反『圍剿』時，假如敵之主力不是向西而是向南，我們也許被迫着退到會昌、尋鄔、安遠地區（那裏是白色區域），引敵更向南進，然後紅軍由南而北向根據地內部打去，這時北面根據地內部的敵軍當不是很多的了。但以上這些說明都是假定，沒有經驗，可以作爲特殊的東西看待，不可作一般原則看待。對於我們，當敵舉行大規模『圍剿』時，一般的原則是誘敵深入，是退却到根據地作戰，因爲這是使我們最有把握地打破敵人進攻的辦法。

主張『禦敵於國門之外』的人們，反對戰略退却，理由是退却喪失土地，危害人民（所謂『打爛鐵罐罐』），對外也產生不良影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則謂我退一步，敵之堡壘推進一步，根據地日蹙而無法恢復。如果說誘敵深入在以前是有用的，那末在堡壘主義的第五次『圍剿』是無用的。對付第五次『圍剿』，只能用分兵抵禦和短促突擊的方法。

回答這些意見是容易的，我們的歷史已經回答了。關於喪失土地的問題，常有這樣的情形，就是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這是『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原則。如果我們喪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戰勝

敵人，加恢復土地，再加擴大土地，這是賺錢生意。市場交易，買者如果不喪失金錢，就不能取得貨物；賣者如果不喪失貨物，也不能取得金錢。革命運動所造成的喪失是破壞，而其取得是進步的建設。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不願意喪失一部分土地，結果喪失了全部土地。阿比西尼亞的打硬仗，也得到喪失全國的結果，雖然阿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這一點。

危害人民的問題同此道理。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蠟燭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蠟燭罐罐。懼怕一時的不良的政治影響，就要以長期的不良影響做代價。十月革命後，俄國布爾塞維克如果依照「左派共產主義者」的意見拒絕對德和約時，新生的蘇維埃就有夭折的危險^(二六)。

這種看起來好像革命的「左」傾意見，來源於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革命急躁病，同時也來源於農民小生產者的局部保守性。他們看問題僅從一局部出發，沒有能力通觀全局，不願把今天的利益和明天的利益相聯結，把部分利益和全體利益相聯結，捉住一局部一時間的東西死也不放。對的，一切依照當時具體情況看來對於當時的全局和全時期有利益的、尤其是有決定意義的一局部和一時間，是應該捉住不放的，不然我們就變成自流主義，或放任主義。退却要有終點，就是這個道理。然而這絕不能依靠小生產者的近視。我們應該學習的是布爾塞維克的聰明。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於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

當然，戰略退却是有困難的。退却開始時機的選擇，退却終點的選擇，政治上對幹部和人民的說服，都是困難問題，都必須給予解決。

退却開始時機的問題是具有重要意義的。我們在江西第一次反『圍剿』時的退却，如果不恰在那種時機，即是說如果再遲，那至少我們勝利的程度是要受到影響的。退却過早和過遲，當然都有損失。但是一般地說來，過遲的損失較之過早為大。及時退却，使自己完全立於主動地位，這對於到達退却終點以後，整頓隊勢，以逸待勞地轉入反攻，有極大的影響。江西粉碎敵人第一次、第二次、第四次『圍剿』的戰役，都從容不迫地對付了敵人。惟獨第三次戰役，因為不料敵人經過第二次戰役那麼慘敗之後，新的進攻來得那麼快（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我們結束第二次反『圍剿』的作戰，七月一日蔣介石就開始了他們的第三次『圍剿』），紅軍倉卒地繞道集中，就弄得十分疲勞。如何選擇這個時機，全靠收集必要的材料，從敵我雙方大勢上去判斷，和前面說過的選擇準備階段的開始時機所用的方法一樣。

戰略退却，在幹部和人民還沒有經驗時，在軍事領導的權威還沒有達到把戰略退却的決定權集中到最少數人乃至一個人的手裏而為幹部所信服的地步時，說服幹部和人民的問題是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由於幹部沒有經驗，對於戰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圍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圍剿』的整期，在這個問題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難。第一次反『圍剿』時，由於立三路綫的影響，幹部的意見，在沒有被說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進攻。第四次反『圍剿』時，由於軍事冒險主義的影響，

幹部的意見是反對準備。第五次反『圍剿』時，幹部的意見開頭是繼續軍事冒險主義反對誘敵深入的觀點，後來是變成了軍事保守主義。張國燾路線不相信在藏人和回人^{〔七〕}地區不能建立我們的根據地，直待碰壁以後方才相信，也是實例。經驗對於幹部是必需的，失敗確是成功之母。但是虛心接受別人的經驗也屬必需，如果樣樣要待自己經驗，否則固執己見拒不接受，這就是十足的『狹隘經驗論』。我們的戰爭吃這種虧是不不少的。

人民由於沒有經驗而不相信戰略退却的必要，莫過於江西第一次反對『圍剿』的時候。當時吉安、興國、永豐等縣的地方黨組織和人民羣衆無不反對紅軍的退却。但是在有了這一次經驗之後，在後來的幾次反對『圍剿』時，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了。大家相信，根據地的損失，人民的吃苦，是暫時的，大家都有了紅軍能够打破『圍剿』的信心。然而人民的信任與否，密切地聯繫於幹部的信任與否，因此主要的和首先的任務，是說服幹部。

戰略退却的全部的作用，在於轉入反攻，戰略退却僅是戰略防禦的第一階段。全戰略的決定關鍵，在於隨之而來的反攻階段之能不能取勝。

第四節 戰略反攻

戰勝絕對優勢敵人的進攻，依靠於在戰略退却階段中所造成的、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比較敵人

開始進攻時起了變化的形勢，而這種形勢是由各種條件造成的。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

然而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和形勢的存在，還沒有使敵人失敗。這種條件和形勢，具備着決定勝敗的可能性，但還不是勝敗的現實性，還沒有實現兩軍的勝負。實現這個勝負，依靠兩軍的決戰。只有決戰，才能解決兩軍之間誰勝誰敗的問題。這就是戰略反攻階段的全任務。反攻是一個長過程，是防禦戰的最精彩最活躍的階段，也就是防禦戰的最後階段。所謂積極防禦，主要地就是指的一種帶決戰性的戰略的反攻。

條件和形勢，不僅僅在戰略退却階段中造成，在反攻階段中繼續地造成着。這時的條件和形勢，不完全和前一階段中的條件和形勢屬於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質。

可以是屬於同一形式和同一性質的，例如，此時敵軍的更加疲勞和減員，不過是前一階段中疲勞和減員的繼續。

但又必然地有完全新的條件和形勢出現。例如，敵軍打了一個或幾個敗仗，這時的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就不僅敵軍疲勞等等，而是增加了敵軍打敗仗這個新的條件了。形勢也起了新的變化。敵軍調動忙亂，舉措失當，兩軍優劣之勢，也就不同於前了。

假使一個到幾個敗仗不是屬於敵軍，而是屬於我軍，那末，條件和形勢的有利與否，也變到相反的方面。就是說，敵之不利減少，我之不利開始發生，以至擴大起來。這又是完全不同的不同於前的東西。

無論何方失敗，都直接地、迅速地引起失敗者方面的一種新的努力，就是企圖挽救危局的努力，使自己脫出這種新出現的不利於我有利於敵的條件和形勢，而重新創造出有利於我不利於敵的條件和形勢去壓迫對方。

勝利者方面的努力和這相反，力圖發展自己的勝利，給敵人更大的損害，務求增加或發展有利於我的條件和形勢，而務求不讓對方完成其脫出不利和挽回危局的企圖。

所以，不論在何方說來，決戰階段的鬥爭，是全戰爭或全戰役中最激烈、最複雜、最變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難、最艱苦的，在指揮上說來，是最不容易的時節。

反攻階段中，問題是很多的，主要的如反攻開始問題、集中兵力問題、運動戰問題、速決戰問題、殲滅戰問題等。

這些問題的原則，不論對於反攻說來，或對於進攻說來，在其基本性質上，是沒有區別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反攻就是進攻。

然而反攻不完全是進攻。反攻原則，是在敵人進攻時應用的。進攻原則，是在敵人防禦時應用的。在這個意義上，又都有若干的區別了。

因為這個理由，雖然這裏把作戰的許多問題統統說在戰略防禦的反攻部門中，而在戰略進攻部門中只說些另外的問題，以避重複，但我們應用時，却不可忽略其相同點，也不可忽略其差異點。

第五節 反攻開始問題

反攻開始問題，即所謂『初戰』或『序戰』問題。

許多資產階級軍事家都主張慎重初戰，不論在戰略防禦或戰略進攻皆然，而以防禦爲尤甚。我們過去，也曾經嚴重地提出了這個問題。江西反對敵人第一次至第五次『圍剿』的作戰給了我們以豐富的經驗，研究一下這些經驗不是沒有益處的。

第一次『圍剿』時，敵人以約十萬人之衆，由北向南，從吉安、建寧之綫，分八個縱隊向紅軍根據地進攻。當時的紅軍約四萬人，集中於江西省寧都縣的黃陂、小佈地區。

當時的情況是：（一）『進剿』軍不過十萬人，且均非蔣之嫡系，總的形勢不十分嚴重。（二）敵軍羅霖師防衛吉安，隔在贛江之西。（三）敵軍公秉藩、張輝瓚、譚道源三師進佔吉安東南、寧都西北的富田、東固、龍岡、源頭一帶。張師主力在龍岡，譚師主力在源頭。富田、東固兩地因人民受A B團欺騙一時不信任紅軍，並和紅軍對立，不宜選作戰場。（四）敵軍劉和鼎師遠在福建白區的建寧，不一定越入江西。（五）敵軍毛炳文、許克祥兩師進至廣昌寧都之間的頭陂、洛口、東韶一帶。頭陂是白區，洛口是游擊區，東韶有A B團，易走漏消息。且打了毛炳文許克祥再向西打，恐西面張輝瓚、譚道源、公秉藩三師集中，不易決勝，不能最後解決問題。（六）張、譚兩師是『圍剿』主力軍，『圍剿』軍總

司令江西主席魯滌平的嫡系部隊，張又是前綫總指揮。消滅此兩師，『圍剿』就基本上打破了。兩師各約一萬四千人，張師又分置兩處，我一次打一個師是絕對優勢。（七）張、譚兩師主力所在的龍岡、源頭一帶接近我之集中地，且人民條件好，能隱蔽接近。（八）龍岡有優良陣地。源頭不好打。如敵攻小佈就我，則陣地亦好。（九）我在龍岡方向能集中最大兵力。龍岡西南數十里之興國，尚有一個千餘人的獨立師，亦可迂迴於敵後。（一〇）我軍實行中間突破，將敵人的陣綫打開一缺口後，敵之東西諸縱隊便被分離為遠近之兩羣。基於以上理由，我們的第一仗就決定打而且打着了張輝瓚的主力兩個旅和一個師部，連師長在內九千人全部俘獲，不漏一人一馬。一戰勝利，嚇得譚師向東韶跑，許師向頭陂跑。我軍又追擊譚師消滅它一半。五天內打兩仗（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於是富田、東固、頭陂諸敵畏打紛紛撤退，第一次『圍剿』就結束了。

第二次『圍剿』時的情況是：（一）『進剿』軍二十萬人，何應欽為總司令，駐南昌。（二）和第一次『圍剿』時一樣，全部是蔣之非嫡系部隊。以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孫連仲的第二十六路軍、朱紹良的第八路軍為最強或較強，其餘均較弱。（三）A B團肅清，根據地人民全部擁護紅軍。（四）王金鈺的第五路軍從北方新到，表示恐懼，其左翼郭華宗、郝夢齡兩師，大體相同。（五）我軍從富田打起，向東橫掃，可在閩贛交界之建寧、黎川、泰寧地區擴大根據地，徵集資材，便於打破下一次『圍剿』。若由東向西打去，則限於贛江，戰局結束後無發展餘地。若打完再東轉，又勞師費時。（六）我軍人數較上次戰役時雖略減（三萬餘），然有四個月的養精蓄銳。基於以上理由，乃決找富田地區的王金鈺、

公秉藩（共十一個團）打第一仗。勝利後，接着打郭、打孫、打朱、打劉。十五天中（一九三一年五月十六日至三十日），走七百里，打五個仗，繳槍二萬餘，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圍剿』。當打王金鈺時，處於蔡廷鍇、郭華宗兩敵之間，距郭十餘里，距蔡四十餘里，有人謂我們『鑽牛角』，但終究鑽通了。主要因爲根據地條件，再加敵軍各部之不統一。郭師敗後，郝師星夜逃回永豐，得免於難。

第三次『圍剿』時的情況是：（一）蔣介石親身出馬任總司令，下分左右中三路總司令。中路何應欽，與蔣同駐南昌；右路陳銘樞，駐吉安；左路朱紹良，駐南豐。（二）『進剿』軍三十萬人。主力軍是蔣嫡系之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五個師，每師九團，共約十萬人。次是蔣光鼐、蔡廷鍇、韓德勤三師，四萬人。次是孫連仲軍，二萬人。餘均非蔣嫡系，較弱。（三）『進剿』戰略是『長驅直入』，大不同於第二次『圍剿』之『步步爲營』，企圖壓迫紅軍於贛江而消滅之。（四）第二次『圍剿』結束至第三次『圍剿』開始，爲時僅一個月。紅軍苦戰後未休息，也未補充（三萬人左右），又繞道千里回到贛南根據地西部之興國集中，時敵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況下，我們決定的第一個方針，是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後由西而東，向敵之後方聯絡綫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於無用之地，定此爲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爲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但我軍向富田開進之際，被敵發覺，陳誠、羅卓英兩師趕至。我不得不改變計劃，回到興國西部之高興圩，此時僅剩此一個圩場及其附近地區幾十個方里容許我軍集中。集中一天後，乃決計向東面興國縣東部之蓮塘、永豐縣南部之良村、寧都縣北部之黃

陂方向突進。第一天乘夜通過了蔣鼎文師和蔣、蔡、韓軍間之四十華里空隙地帶，轉到蓮塘。第二天和上官雲相軍（上官指揮他自己的——個師及郝夢齡師）前哨接觸。第三天打上官師爲第一仗，第四天打郝夢齡師爲第二仗，爾後以三天行程到黃陂打毛炳文師爲第三仗。三戰皆勝，繳槍逾萬。此時所有向西向南之敵軍主力，皆轉旗向東，集中視綫於黃陂，猛力並進，找我作戰，取密集的大包圍姿勢接近了我軍。我軍乃於蔣、蔡、韓軍和陳、羅軍之間一個二十華里間隙的大山中偷越過去，由東面回到西面之興國境內集中。及至敵發覺再向西進時，我已休息了半個月，敵則飢疲沮喪，無能爲力，下決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蔣光鼐、蔡廷鍔、蔣鼎文、韓德勤，消滅蔣鼎文一個旅、韓德勤一個師。對蔣光鼐、蔡廷鍔兩師，則打成對峙，讓其逃去了。

第四次『圍剿』時的情況是：敵分三路向廣昌進，主力在東路，西路兩師暴露於我面前，且迫近我之集中地。因此我得以先打其西路於宜黃南部地區，一舉消滅李明、陳時驥兩個師。敵從左路分出兩個師配合中路再進，我又得消滅其一個師於宜黃南部地區。兩役繳槍萬餘，這個『圍剿』就基本地打破了。

第五次『圍剿』，敵以堡壘主義的新戰略前進，首先佔領了黎川。我却企圖恢復黎川，禦敵於根據地之外，去打黎川以北敵之鞏固陣地兼是白區之硝石。一戰不勝，又打其東南之資溪橋，也是敵之鞏固陣地和白區，又不勝。爾後輾轉尋戰於敵之主力和堡壘之間，完全陷入被動地位。終第五次反『圍剿』戰爭一年之久，絕無自主活躍之概。最後不得不退出江西根據地。

上述第一次至第五次反『圍剿』時期我軍作戰的經驗，證明處在防禦地位的紅軍，欲打破強大的『進剿』軍，反攻的第一個戰鬥，關係非常之大。第一個戰鬥的勝敗給予極大的影響於全局，乃至一直影響到最後的一個戰鬥。因此得出下述的結論：

第一，必須打勝。必須敵情、地形、人民等條件，都利於我，不利於敵，確有把握而後動手。否則寧可退讓，持重待機。機會總是有的，不可牽爾應戰。第一次反『圍剿』時先想打譚道源，僅因敵不脫離源頭那個居高臨下的陣地，我軍兩度開進，却兩度忍耐撤回，過了幾天找到了好打的張輝瓚。第二次反『圍剿』時，我軍開進到東固，僅因等待王金鈺脫離其富田鞏固陣地，寧可冒犯走漏消息的危險，拒絕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議，迫敵而居，等了二十五天之久，終於達到了要求。第三次反『圍剿』雖是那樣急風暴雨的局面，千里回師，又被敵人發覺了我們迂迴其側後的計劃，但我們仍忍耐折回，改用中間突破，終於在蓮塘打着第一個好仗。第四次反『圍剿』時攻南豐不克，毅然採取了退却步驟，終於轉到敵之右翼，集中東韶地區，開始了宜黃南部的大勝仗。只有第五次反『圍剿』時全不知初戰關係之大，震驚於黎川一城之失，從挽救的企圖出發，北上就敵，於洵口不預期遭遇戰勝利（消滅敵一個師）之後，却不把此戰看作第一戰，不看此戰所必然引起的變化，而貿然進攻不可必勝的硝石。開脚一步就喪失了主動權，真是最蠢最壞的打法。

第二，初戰的計劃必須是全戰役計劃的有機的序幕。沒有好的全戰役計劃，絕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這就是說，即使初戰打了一個勝仗，若這個仗不但不於全戰役有利，反而有害時，則這個仗雖

勝也只算敗了（例如第五次『圍剿』時的洵口戰鬥）。因此在打第一仗之先，必須想到第二、第三、第四以至最後一仗大體上如何打法，我挨次的一仗勝了，敵軍全局將起如何變化，假若敗了，又將起如何變化。雖結果不見得乃至決不會盡如所期，然而必須依據雙方全局，仔細地切實地想明白。沒有全局在胸，是不會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

第三，還要想到下一戰略階段的文章。若只顧反攻，不顧反攻勝利後，或萬一反攻失敗後，下文如何做，依然未盡得戰略指導者的責任。戰略指導者當其處在一個戰略階段時，應該計算到往後多數階段，至少也應計算到下一個階段。儘管往後變化難測，愈遠看愈渺茫，然而大體的計算是可能的，估計前途的遠景是必要的。那種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導方式，對於政治是不利的，對於戰爭也是不利的。走一步應該看那一步的具體變化，據此以修改或發展自己戰略戰役計劃，不這樣做，就會弄出冒險直衝的錯誤。然而貫通全戰略階段乃至幾個戰略階段的、大體上想通了的、一個長時期的方針，是決不可少的。不這樣做，就會弄出遲疑坐困的錯誤，實際上適合了敵人的戰略要求，陷自己於被動地位。須知敵人的統帥部，是具有某種戰略眼光的。我們只有使自己操練得高人一等，才有戰略勝利的可能。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和張國燾路線的戰略指導之所以錯誤，主要地就在於沒有作到這一點。總之，退却階段時必須計算到反攻階段，反攻階段時必須計算到進攻階段，進攻階段時又須計算到退却階段。沒有這種計算，束縛於眼前的利害，就是失敗之道。

必須打勝，必須照顧全戰役計劃，必須照顧下一戰略階段；這是反攻開始，即打第一仗時，不可

忘記的三個原則。

第六節 集中兵力問題

集中兵力看來容易，實行頗難。人人皆知以多勝少是最好的辦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分分散兵力，原因就在於指導者缺乏戰略頭腦，爲複雜的環境所迷惑，因而被環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採取了應付主義。

無論處於怎樣複雜、嚴重、慘苦的環境，軍事指導者首先需要的是獨立自主地組織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敵逼迫到被動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復主動地位。如果不能恢復到這種地位，下文就是失敗。

主動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體的，物質的。這裏最重要的，是保存並集結最大而有活力的軍隊。防禦戰本來容易陷入被動地位，防禦戰大不如進攻戰之能够充分地發揮主動權。然而防禦戰是能够在被動的形式中具有主動的內容的，是能够由形式上的被動階段轉入形式上內容上的主動階段的。完全有計劃的戰略退却，在形式上是被逼出此的，在內容上是保存軍力，待機破敵，是誘敵深入，準備反攻。只有不肯退却，倉卒應戰（例如硝石戰鬥），表面上似乎在乎力爭主動，實際上是被動的。戰略反攻，則不但內容是主動的，形式上也放棄了退却時的被動姿態。對於敵軍說來，反攻是我軍強迫

它放棄主動權，同時即給以被動地位的努力。

要完全達到這種目的，集中兵力、運動戰、速決戰、殲滅戰，都是必要的條件。而集中兵力，是首先的和主要的。

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爲了改變敵我的形勢。第一，是爲了改變進退的形勢。過去是敵進我退，現在是企圖達到我進敵退之目的。集中兵力一戰而勝，這個目的在本戰鬥就達到了，也給予影響於全戰役。

第二，是爲了改變攻守的形勢。退却到退却終點，在防禦戰中基本上屬於消極階段，即『守』的階段。反攻則屬於積極階段，即『攻』的階段。雖然在整個戰略防禦中並沒有脫離防禦性質，然而反攻和退却相較，不但形式上，而且內容上，是起了變化的東西。反攻是戰略防禦和戰略進攻之間的過渡的東西，帶着戰略進攻前夜的性質，集中兵力就爲達此目的。

第三，是爲了改變內外綫的形勢。處於戰略上內綫作戰的軍隊，特別是處於被『圍剿』環境的紅軍，蒙受着許多的不利。但我們可以而且完全應該在戰役或戰鬥上，把它改變過來。將敵軍對我軍的一個大『圍剿』，改爲我軍對敵軍的許多各別的小圍剿。將敵軍對我軍的戰略上的分進合擊，改爲我軍對敵軍的戰役或戰鬥上的分進合擊。將敵軍對我軍的戰略上的優勢，改爲我軍對敵軍的戰役或戰鬥上的優勢。將戰略上處於強者地位的敵軍，使之在戰役或戰鬥上處於弱者的地位。同時，將自己戰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變爲戰役上或戰鬥上的強者的地位。這即是所謂內綫作戰中的外綫作戰，

『圍剿』中的圍剿，封鎖中的封鎖，防禦中的進攻，劣勢中的優勢，弱者中的強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動中的主動。從戰略防禦中爭取勝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

在中國紅軍的戰史中，這個問題常常成爲重要的爭論問題。一九三〇年十月四日吉安之役，不待兵力完全集中就實行開進和攻擊，幸而敵人（鄧英師）自己逃走了，我們的攻擊本身並沒有奏效。

從一九三二年開始，有所謂『全綫出擊』的口號，要求從根據地的東西南北四面出擊。這不但在戰略防禦時不對，就是在戰略進攻時也是不對的。在整個敵我對比的形勢沒有根本改變的時候，無論戰略或戰術，都有防禦和進攻、箝制和突擊的兩方面，事實上絕少所謂『全綫出擊』。全綫出擊的口號，是伴隨軍事冒險主義而來的軍事平均主義。

軍事平均主義者到一九三三年，有所謂『兩個拳頭打人』的說法，把紅軍主力分割爲二，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求勝。那時的結果是一個拳頭置於無用，一個拳頭打得很疲勞，而且沒有當時可能取得的最大勝利。照我的意見，在有強大敵軍存在的條件下，無論自己有多少軍隊，在一個時間內，主要的使用方向只應有一個，不應有兩個。我不反對作戰方向有兩個或兩個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一個時間內，只應有一個。中國紅軍以弱小者的姿態出現於內戰的戰場，其迭挫強敵震驚世界的戰績，依賴於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無論那一個大勝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以一當十，以十當百』，是戰略的說法，是對整個戰爭整個敵我對比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確實是如此。不是對戰役和戰術而言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決不應如此。無論在反攻或進攻，我們總是集結大力打敵一部。一

九三一年一月的江西寧都縣東韶地區打譚道源的作戰，一九三一年八月的江西興國縣高興圩地區打十九路軍的作戰，一九三二年七月廣東南雄縣水口圩地區打陳濟棠的作戰，一九三四年三月江西黎川縣圍村地區打陳誠的作戰，都吃了兵力不集中的虧。如像水口圩和圍村這一類的仗，本來一般算作勝仗，而且還算作大勝仗的（前者擊潰陳濟棠二十個團，後者擊潰陳誠十二個團），然而我們歷來就不歡迎這種勝仗，在某種意義上簡直還可以說它是敗仗。因為沒有繳獲或繳獲不超過消耗，在我們看來是很少意義的。我們的戰略是『以一當十』，我們的戰術是『以十當一』，這是我們制勝敵人的根本法則之一。

軍事平均主義，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圍剿』時，發展到了極點。『六路分兵』，『全綫抵禦』，以為可以制敵，結果為敵所制，原因在於懼怕喪失土地。集中主力於一個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箝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損失。然而這是暫時的局部的損失，其代價是突擊方向取得了勝利。突擊方向勝利了，箝制方向的損失就可以恢復了。敵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圍剿』都使我們遭受了土地的損失，特別是在敵人第三次『圍剿』時江西紅軍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了，然而結果我們的土地不但都恢復了，而且還擴大了。

由於看不見根據地人民的力量，常常發生懼怕紅軍遠離根據地的錯誤心理。這種心理在一九三二年江西紅軍遠出打福建的漳州時，一九三三年第四次反『圍剿』戰役勝利後紅軍轉向福建進攻時，都會發生過。前者懼怕整個根據地被佔，後者懼怕根據地的一部被佔，而反對集中兵力，主張分兵把

守，結果都證明不對。在敵人看來，一方面根據地使他們畏進，一方面打到白區去的紅軍是他們的主要的危險物。敵軍的注意力總是向着主力紅軍所在地，拋開主力紅軍不顧而專向根據地，是很少這種事情的。在紅軍實行防禦時，敵人的注意力也還是集中於紅軍。縮小根據地的計劃是敵人整個計劃的一部分；但是如果紅軍集中主力消滅其一路，敵軍統帥部就不得不把他們的注意力和他們的軍力更大地向着紅軍。所以，敵人縮小根據地的計劃，也是能够破壞的。

『堡壘主義的五次「圍剿」時期我們不能集中作戰，只能分兵防禦從事短促突擊』，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敵人三里五里一進，十里八里一推的堡壘主義作戰法，完全是紅軍自己的節節抗禦促成的。如果我軍在內綫放棄節節抗禦的戰法，再在必要和可能時轉向敵人的內綫打去，局面必然是另外一種。集中兵力的法則，正是戰勝堡壘主義的工具。

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並不包括放棄人民的游擊戰爭在內。立三路綫主張廢棄小的游擊戰爭，『一枝槍也集中到紅軍中去』，早已證明是不對的了。人民的游擊戰爭，從整個革命戰爭的觀點看來，和主力紅軍是互爲左右手，只有主力紅軍而無人民的游擊戰爭，就像一個獨臂將軍。根據地的人民條件，具體地說來，特別是對於作戰說來，就是有武裝起來了的人民。敵人視爲畏途，主要地也在這一點。

置紅軍的支隊於次要的作戰方向也是必要的，不是一切都要集中。我們主張的集中兵力，是建立在保證對於戰場作戰的絕對或相對優勢的原則上。對於強敵，或關係緊要的戰場作戰，應以絕對優勢

的兵力臨之；例如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日第一次反『圍剿』的第一仗，集中四萬人打張輝瓚的九千人。對於弱敵或不關緊要的戰場作戰，臨之以相對優勢的兵力也就够了；例如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九日第二次反『圍剿』的最後一戰，向建寧打七千人的劉和鼎師，紅軍只用了一萬多人。

也不是說每次都要優勢兵力。在某種情況下，也可以用相對劣勢或絕對劣勢兵力出現於戰場。相對劣勢，例如某一區域僅僅有一支不大的紅軍（不是有兵而不集中），爲着打破某一優勢敵人的進攻，在人民、地形或天候等條件能給我們以大的援助時，以游擊隊或小支隊箝制其正面及一翼，紅軍集中全力突然襲擊其另一翼的一部分，當然也是必要的，並且是可以勝利的。當我襲擊其一翼的一部分時，兵力的對比仍適用以優勢對劣勢、以多勝少的原則。絕對劣勢，例如游擊隊襲擊白軍大隊伍，僅僅是襲擊其一小部分，同樣適用上述的原則。

集中大軍於一個戰場作戰，受限制於地形、道路、給養、駐處等的說法，也應分別情形去看。這些限制，對於紅軍和白軍是有程度上的區別的，因爲紅軍較之白軍能够忍受更大的困難。

我們是以少勝多的——我們向整個中國統治者這樣說。我們又是以多勝少的——我們向戰場上作戰的各個局部的敵人這樣說。這件事情已經不是什麼秘密，敵人一般地都摸熟我們的脾氣了。然而敵人不能取消我們的勝利，也不能避免他們的損失，因爲何時何地我們這樣做，他們不曉得。這一點我們是保守秘密的。紅軍的作戰一般是奇襲。

第七節 運動戰

運動戰，還是陣地戰？我們的答覆是：運動戰。在沒有廣大兵力，沒有彈藥補充，每一個根據地打來打去僅只有一支紅軍的條件下，陣地戰對於我們是基本上無用的。陣地戰，對於我們，不但防禦時基本本地不能用它，就是進攻時也同樣不能用。

由於敵人強大和紅軍技術貧弱所發生的紅軍作戰的顯著特點之一，就是沒有固定的作戰綫。

紅軍的作戰綫，服從於紅軍的作戰方向。作戰方向不固定，影響到作戰綫不固定。大方向雖在一個時期中是不變更的，然而大方向內的小方向則是隨時變更的，一個方向受了限制，就得轉到另一個方向去。一個時期之後大方向也受了限制，就連這種大方向也得變更了。

革命的內戰時期，作戰綫不能固定，就在蘇聯也有過這種情形。蘇聯軍隊和我們的軍隊不同的地方，在於其不固定的程度不如我們之甚。一切戰爭也不能有絕對固定的作戰綫，勝負進退的變化不許可如此。但是相對固定的作戰綫往往見之於一般的戰爭。惟獨敵我強弱懸殊像處在目前階段的中國紅軍這樣的軍隊，則是例外。

作戰綫的不固定，影響到根據地領土的不固定。時大時小時縮時伸是經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發生。這種領土的流動性，完全是來源於戰爭的流動性。

戰爭和領土的流動性，影響到根據地各種建設工作也發生流動性。若干年月的建設計劃是不能設想的。計劃改變的頻繁，是我們家常便飯的事情。

承認這種特點，對於我們是有益處的。從這個特點出發，規定我們的日程，不要幻想有進無退的戰爭，不要震驚於領土和軍事後方的暫時的流動，不要企圖建立長時期的具體計劃。把我們的思想、工作適應於情況，準備坐下，又準備走路，不要把乾糧袋丟掉了。只有在現在的流動生活中努力，才能爭取將來的比較地不流動，才能爭取最後的穩定。

統治着第五次反『圍剿』時期的所謂『正規戰爭』的戰略方針，否認這種流動性，反對所謂『游擊主義』。反對流動的同志們要裝作一個大國家的統治者來辦事，結果是得到了一個異乎尋常的大流動——二萬五千華里的長征。

我們的工農民主共和國是一個國家，但是今天還是一個不完全的國家。今天我們還處在內戰的戰略防禦時期，我們的政權距離一個完全的國家形態還很遠，我們軍隊的數量和技術較之敵人還差得遠，我們的領土還很小，我們的敵人時時刻刻想要消滅我們才快活。從這個上面規定我們的方針，不是一般地反對游擊主義，而是老老實實地承認紅軍的游擊性。在這裏怕羞是沒有用的。相反，游擊性正是我們的特點，正是我們的長處，正是我們戰勝敵人的工具。我們應該準備拋棄游擊性，但是今天還不能拋棄。游擊性在將來一定是可羞的和必須拋棄的東西，但在今天却是寶貴的和必須堅持的東西。

『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這就是今天我們的運動戰的通俗的解釋。天下也沒有只承認打不承認走的軍事家，不過不如我們走得這麼厲害罷了。對於我們，走路的时间通常多於作戰的时间，平均每月打得一個大仗就算是好的。一切的『走』都是爲着『打』，我們的一切戰略戰役方針都是建立在『打』的一個基本點上。然而在我們面前有幾種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當面的敵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當面敵人雖不多，但它和鄰近敵人十分密接，也有時不好打；第三，一般地說來，凡不孤立而佔有十分鞏固陣地之敵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決戰鬥時，不好再繼續打。以上這些時候，我們都是準備走的。這樣的走是許可的，是必須的。因爲我們承認必須的走，是在首先承認必須的打的條件之下。紅軍的運動戰的基本特點，就在這裏。

基本的是運動戰，並不是拒絕必要的和可能的陣地戰。戰略防禦時，我們箝制方面某些支點的固守，戰略進攻時遇着孤立無援之敵，都是應該承認用陣地戰去對付的。採取這樣的陣地戰制勝敵人的經驗，我們過去已經不少；很多的城市、堡壘、寨子，被我們打開，某種程度的敵人野戰陣地被我們突破。以後還要增加這一方面的努力，補足我們這一方面的弱點。我們完全應該提倡那種在情況需要而且許可下的陣地攻擊和陣地防禦。我們所反對的，僅僅是在今天採取一般的陣地戰，或者把陣地戰和運動戰平等看待，這些才是不能許可的。

紅軍的游擊性，沒有固定作戰綫，根據地的流動性，根據地建設工作的流動性，十年戰爭中一點也沒有變化嗎？有變化的。從井岡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圍剿』前爲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和

流動性是很大的，紅軍還在幼年時代，根據地還是游擊區。從第一次反『圍剿』到第三次反『圍剿』爲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中游擊性和流動性就縮小了許多，方面軍已經建立，包含幾百萬人口的根據地已經存在。從第三次反『圍剿』後至第五次反『圍剿』爲第三個階段，游擊性流動性更縮小了。中央政府與革命軍事委員會已經建立。長征是第四個階段。由於錯誤地否認小游擊和小流動，就來了一個大游擊和大流動。目前是第五個階段。由於沒有戰勝第五次『圍剿』和大流動，紅軍和根據地都大大地縮小了，但又已經在西北立住了腳根，鞏固了並發展了陝甘寧邊區根據地。紅軍主力三個方面軍已經統一指揮，此事爲前此所未有。

依戰略的性質說，也可以說井岡山時期至第四次反『圍剿』時期爲一階段，第五次反『圍剿』時期爲又一階段，長征至今爲第三階段。第五次反『圍剿』時人們錯誤地否定了以前本來是正確的方針，我們今天又正確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圍剿』時人們的錯誤方針，復活了從前的正確方針。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圍剿』時的一切，也不是復活從前的一切。復活的是從前優良的東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圍剿』時的錯誤的東西。

游擊主義有兩方面。一方面是非正規性，就是不集中、不統一、紀律不嚴、工作方法簡單化等。這些東西是紅軍幼年時代本身帶來的，有些在當時還正是需要的。然而到了紅軍的高級階段，必須逐漸地自覺地去掉它們，使紅軍更集中些，更統一一些，更有紀律些，工作更周密些，就是說使之更帶正規性。在作戰指揮上，也應逐漸地自覺地減少那些在高級階段所不必要的游擊性。在這一方面拒絕前

進，固執地停頓於舊階段，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於大規模作戰的。

另一方面是運動戰的方針，是現在還需要的戰略和戰役作戰的游擊性，是無法阻止的根據地的流動性，是根據地建設計劃的靈活變更性，是在紅軍建設上的不要不適時宜的正規化。在這一方面拒絕歷史事實，反對保留有用的東西，貿然地脫離現階段，盲目地跑向可望不可即的、在當前沒有現實意義的所謂『新階段』，同樣是不許可的，是有害的，是不利於當前作戰的。

我們現在是處在紅軍技術和組織的下一新階段的前夜。我們應該準備轉變到新階段去。不作這種準備是不對的，是不利於將來的戰爭的。在將來，紅軍的技術和組織條件改變了，紅軍建設進到了新階段，紅軍的作戰方向和作戰綫的比較固定就出現了；陣地戰增加了；戰爭的流動性、領土和建設的流動性，大大減少了，到最後，也就會消滅了；現在限制着我們的東西，如像優勢的敵人及其據守的鞏固陣地，就不能限制我們了。

我們現在一方面反對『左』傾機會主義統治時期的錯誤的辦法，另一方面也反對復活紅軍幼年時代的許多在現時不需要的非正規性。但是我們要堅決地恢復紅軍一路來用以打勝仗的許多可寶貴的建軍原則和戰略戰術原則。我們要把所有一切過去的優良的東西都總結起來，成為有系統的更發展的更豐富的軍事路綫，以便爭取在今天戰勝敵人，並且準備在將來轉變到新階段去。

運動戰的實行方面，問題是很多的，例如偵察、判斷、決心、戰鬥部署、指揮、隱蔽、集中、開進、展開、攻擊、追擊、襲擊、陣地攻擊、陣地防禦、遭遇戰、退却、夜戰、特種戰鬥、避強打弱、圍城打援、

伴攻、防空、處在幾個敵人之間、超越敵人作戰、連續作戰、無後方作戰、養精蓄銳之必要等等。這些問題在紅軍戰史中都表現了許多的特點，戰役學中應當有條理地敘述到，應當給以總結，我在這裏就不說了。

第八節 速決戰

戰略的持久戰，戰役和戰鬥的速決戰，這是一件事的兩方面，這是國內戰爭的兩個同時並重的原則，也可以適用於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

因為反動勢力的雄厚，革命勢力是逐漸地生長的，這就規定了戰爭的持久性。在這上面性急是要吃虧的，在這上面提倡『速決』是不正確的。幹了十年的革命戰爭，對於別的國家也許是值得驚奇的，對於我們却好似八股文章還只作了破題、承題和起講〔三〕，許多熱鬧文章都還在後面。往後的發展，在一切內外條件的影響下，無疑地將比過去有大大地增高速度的可能。因為國際和國內的環境已經起了變化，而且會有更大的變化要到來，可以說我們已經脫離了過去的那種慢慢發展的孤軍作戰的景況。然而不應該打算明天就會成功。『滅此朝食』的氣概是好的，『滅此朝食』的具體計劃是不好的。因為中國的反動勢力，是許多帝國主義支持的，國內革命勢力沒有聚積到足以突破內外敵人的主要陣地以前，國際革命勢力沒有打破和箝制大部分國際反動勢力以前，我們的革命戰爭依然是持久的。從

這一點出發，規定我們長期作戰的戰略方針，是戰略指導的重要方針之一。

戰役和戰鬥的原則與此相反，不是持久而是速決。在戰役和戰鬥上面爭取速決，古今中外都是相同的。在戰爭問題上，古今中外也都無不要求速決，曠日持久總是認為不利。惟獨中國的戰爭不能不以最大的忍耐性對待之，不能不以持久戰對待之。有人在立三路線時期譏笑我們的做法爲『打拳戰術』（說的是打過來打過去才能奪取大城市），譏笑我們要待頭髮白了才能看見革命的勝利。這種表現急性病的情緒，早已證明是不對了。但是他們的批評意見如果不是放在戰略問題上而是放在戰役和戰鬥的問題上，則是非常之對的。原因在於：第一，紅軍的武器尤其是彈藥沒有來源；第二，白軍有很多支部隊，紅軍只一支部隊，打破一次『圍剿』要準備迅速的連續的作戰；第三，白軍各個雖然分進，但多是比較地密集，打它們中間的一個如果不能迅速地解決戰鬥，其餘各個就都來了。爲了這些理由，不能不實行速決戰。對於我們，幾小時，一天或兩天解決一個戰鬥是經常的。只有在『圍城打援』的方針下，目的不在打圍敵，而在打援敵，對圍敵作戰是準備着相當地持久的，但對援敵仍然是速決。戰略防禦時固守箝制方面的據點，戰略進攻時打孤立無援之敵，消滅根據地中的白色據點，這些時候也常常給予戰役或戰鬥以持久方針。然而這些持久戰，只是幫助而並不妨礙主力紅軍的速決戰。

速決戰不是心裏想要如此做就做得成功的，還須加上許多具體的條件。主要的條件是準備充足，不失時機，集中優勢兵力，包圍迂迴戰術，良好陣地，打運動中之敵，或打駐止而陣地尚不鞏固之敵。不解決這些條件，而求戰役或戰鬥的速決，是不可能的。

打破一次『圍剿』屬於一個大戰役，依然適用速決原則，而不是持久原則。因為根據地的人力、財力、軍力等項條件都不許可持久。

但在一般的速決原則之下，反對不正當的急躁性是必要的。一個革命根據地的最高軍事政治領導機關，估計到根據地的這些條件，估計到敵方情況，不為敵之其勢洶洶所嚇倒，不為尚能忍耐的困難所沮喪，不為某些挫折而灰心，給予必要的耐心和持久，是完全必要的。江西打破第一次『圍剿』，從初戰到結束只有一星期，打破第二次『圍剿』只有半個月，打破第三次『圍剿』就熬上了三個月，第四次是三星期，第五次就熬了整整的一年。但是第五次沒有打破『圍剿』而被迫突圍時，還表現了不應有的倉卒從事。依情況還可以熬上兩三個月，用以休整軍隊。假如這樣，又假如突圍後的領導稍為聰明一點，情況便將有很大的不同。

雖然如此，仍然不破壞我們所說的力爭縮短全戰役時間的原則。除了戰役戰鬥計劃力爭集中兵力和運動戰等條件、務期在內綫（在根據地）消滅敵之有生力量、迅速解決『圍剿』以外，當『圍剿』已經證明無法在內綫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綫，轉入我之外綫即敵之內綫去解決這個問題。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將要成為經常的作戰手段。第五次反『圍剿』進行兩個月之後，當福建事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於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禦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

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並援助福建人民政府，——這種方法是必能確定地援助它的。此計不用，第五次『圍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時候，雖已不利於出浙江，但還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戰略進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進，不是經湖南向貴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進，調動江西敵人至湖南而消滅之。此計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圍剿』的希望就最後斷絕，剩下長征一條路了。

第九節 殲滅戰

『拚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對於幾乎一切都取給於敵方的紅軍，基本的方針是殲滅戰。只有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圍剿』和發展革命根據地。給敵以殺傷，是作爲給敵以殲滅的手段而採取的，否則便沒有意義。因給敵以殺傷而給我以消耗，又因給敵以殲滅而給我以補充，這樣就不但抵償了我軍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軍的力量。擊潰戰，對於雄厚之敵不是基本上決定勝負的東西。殲滅戰，則對任何敵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響。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

對於第一、二、三、四次『圍剿』，我們的方針都是殲滅戰。每次殲滅的敵人對於全敵不過是一部分，然而『圍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圍剿』時，採取了相反的方針，實際上是幫助敵人達到了他們

的目的。

殲滅戰和集中優勢兵力，採取包圍迂迴戰術，同一意義。沒有後者，就沒有前者。人民贊助、良好陣地、好打之敵，出其不意等條件，都是達到殲滅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擊潰有意義，乃至讓敵逃去有意義，只是對於全戰鬥或全戰役中我軍主力對確定之敵舉行殲滅性的作戰而說的，否則便沒有什麼意義。這又是一種有所失對有所得而有意義的場合。

我們建立軍事工業，須使之不助長依賴性。我們的基本方針是依賴帝國主義和國內敵人的軍事工業。倫敦和漢陽的兵工廠，我們是有權利的，並且經過敵人的運輸隊送來。這是真理，並不是笑話。

〔註釋〕

〔一〕「實際」這一個概念，按照中國文字，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真實的情況，一種是指人們的行動（也即一般人所說的實踐）。毛澤東同志在他的著作中，應用這一個概念，時常是雙關的。

〔二〕孫武子即孫武，公元前五世紀時的中國著名軍事學家，著「孫子」十三篇。本文引語見「孫子」卷三「謀攻」篇。

〔三〕從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到一九三六年毛澤東同志著此文時，正是十五週年。

〔四〕陳獨秀原為北京大學教授，因編輯「新青年」雜誌出名。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人之一，由於他在五四運動時代的聲名以及黨在初創時期的幼稚，當了黨的總書記。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最後一個時期，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形成了投降主義的路綫。當時的「投降主義分子，自願放棄對於農民羣衆、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尤其是放棄對於武裝力量的領導權，使那次革命遭到了失敗」（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陳獨秀及其他一小部分投降主義者，對於革命前途悲觀失望，變成了取消主義者，採取了托洛茨基主義的反動立場，並和托洛茨基分子相結合，成立了反黨的小組織，因而在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驅逐出黨。陳獨秀死於一九四二年。

於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請參看「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兩文題解，和本書第二卷「共產黨人」發刊詞一文。

（五）李立三「左」傾機會主義，是指一九三〇年六月以後約四個月時間內以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主要領導者李立三同志爲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通稱爲「立三路線」。立三路線的特點，就是違反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方針，否認革命需要準備羣衆的力量和革命發展的不平衡，認爲毛澤東同志在長時期中用主要注意力創造農村根據地，以農村包圍城市，以根據地來推動全國革命高潮的思想，是所謂「極端錯誤的」「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而主張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李立三同志在這種錯誤路線下定出了立即組織全國各中心城市武裝起義的冒險計劃。立三路線同時不承認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認爲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而中國革命又必須在世界革命的總爆發中才能成功；也不承認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爲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即是實行社會主義轉變的開始，並因此規定了若干不適合時宜的「左」傾冒險政策。毛澤東同志反對這一個錯誤的路線，全黨廣大的幹部和黨員也要求糾正這一個路線。李立三同志本人，在一九三〇年九月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上承認了當時被指出的錯誤，接濟就離開了中央的領導地位。因爲立三同志在長時期中改正了自己的錯誤觀點，所以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又選他做中央委員。

（六）一九三〇年九月舉行的黨的六屆三中全會，以及其後一時期的黨中央，對於停止立三路線作了許多有積極作用的措施。但在六屆三中全會以後，黨內一部分沒有實際革命鬥爭經驗的同志，以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二同志爲首，却起來反抗中央的措施。他們在當時發表的名爲「兩條路線」又名爲「爲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的小冊子中，特別強調地宣稱當時黨內主要的危險不是「左」傾機會主義，而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把「批評」立三路線的「右」當作其活動的資本。他們提出了一個在新的形態下，繼續、恢復或發展立三路線及其他「左」傾思想和「左」傾政策的新的政治綱領，而與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路線相對立。毛澤東同志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書，主要地是爲批判這個新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軍事方面所犯錯誤而作的。這個新的「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內的統治，是從一九三一年一月間黨的六屆四中全會起，到一九三五年一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集的政治局會議結束這一錯誤路線的領導而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新領導時爲止。這次「左」傾錯誤路線在黨內統治的時間特別長久（四年），給予黨和革命的損失特別重大，其惡果，就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紅軍的根據地都損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使數千萬革命根據地的人民受了國民黨的摧殘，推遲了中國革命

的進展。犯過這個「左」傾路線錯誤的同志，在長期體驗中，絕大多數都已經認識了和改正了自己的錯誤，並且做了許多有益於黨和人民的工作。這些同志和其他廣大同志在一起，在共同的政治認識的基礎上，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互相團結起來了。一九四五年四月間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於這個錯誤路線的各方面，作了詳細的總結。

〔七〕參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二和註三。

〔八〕廬山軍官訓練團是蔣介石訓練反共軍事幹部的組織，創辦於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九江縣的廬山。該團輪流調集蔣軍軍官，由德國、意國和美國的軍事教官施以法西斯主義的軍事的和政治的訓練。

〔九〕這裏所說的第五次「圍剿」的新軍事原則，主要地是指蔣介石匪幫的碉堡推進、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

〔一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共產主義」一文。在該文中列寧批評匈牙利共產黨員貝拉·貢說：「他拋開了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

〔一一〕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即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湘贛邊區共產黨在寧岡縣茅坪召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一二〕見「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註二和註三。

〔一三〕「土匪主義」，指無紀律、無組織、無明確的政治目標的搶掠行為。

〔一四〕指紅軍由江西到陝北的二萬五千華里的長征。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二〇。

〔一五〕「偏師」，即不是主力軍，而只是軍隊的担任側翼的一部分。

〔一六〕指俄國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起義失敗後，革命由高漲時期轉入逐漸退落的時期。參看「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三章第五、第六兩節。

〔一七〕布列斯特條約是蘇俄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和德國訂立的和約。這是在當時敵人的力量顯然超過革命力量的情況下，為了使剛才成立而還沒有自己軍隊的蘇維埃共和國不受德帝國主義的打擊，而採取的暫時退却。這個和約的簽訂，使蘇維埃共和國贏得了時間去鞏固無產階級的政權，調整經濟，建立紅軍，使無產階級保持了對農民的領導，集聚力量的，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擊潰白軍和英美法日波各國武裝干涉者。

〔一八〕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廣東海陸豐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舉行第三次起義，佔領海豐陸豐及附近地區，組織紅軍，建立工農民主政權。後因犯輕敵的錯誤而失敗。

〔一九〕一九三六年秋季，紅四方面軍與紅二方面軍會合後，從西康東北部出發，作北上的轉移。張國燾這時候仍然堅持反

黨，堅持他一貫的退却主義和取消主義。同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後，張國燾命令紅四方面軍的前鋒部隊二萬餘人，組織西路軍，渡黃河向青海西進。西路軍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戰爭中受到打擊而基本失敗，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敗。

(二〇) 見馬克思致顧格曼論巴黎公社的信。

(二一) 『水滸傳』是中國描寫農民戰爭的著名小說，相傳爲公元十四世紀元末明初時人施耐庵所作。林冲、柴進都是書中的英雄人物。洪教頭是柴進家裏的一個武術教師。

(二二) 魯國和齊國是中國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二二年—前四八一年）的兩個封建國家。齊是大國，在今山東省的中部，魯國較小，在今山東省的南部。魯莊公，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前六六二年魯國的國君。

(二三) 左丘明，中國周朝著名編年史『左傳』的作者。本文中引的一段文章見『左傳』莊公十年。

(二四) 『肉食者』指做官的。『又何間焉』，是『何必廁身其間』的意思。『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一句中，犧牲玉帛是祀神的禮物，加是虛報的意思。魯莊公說他據實報告祭品，表示他對神守信用。『忠之屬也。可以一戰』，忠是盡力做好本分的事。曹刿的意思是說：一個國君對獄訟處置得合乎情理，便會得到人民擁護，所以可以作戰。『公將鼓之』和『齊人三鼓』的『鼓』，都是說鳴鼓指揮士兵衝鋒。『登軾而望之』的『軾』是車前供給乘者扶手的橫木，因爲在車上位置最高，所以登軾望遠。

(二五) 成臯故城在今河南省成臯縣西北境，爲古代軍事重地。公元前二〇三年，漢王劉邦和楚王項羽曾相持於此。當時項羽接連攻下滎陽、成臯，劉邦幾乎潰不成軍。但後來劉邦終於等待到楚軍在汜水半渡的時機，大破楚軍，復取成臯。

(二六) 昆陽故城在今河南省葉縣境內。公元二三年，劉秀（東漢光武帝）在這裏擊破王莽的軍隊。這次戰爭雙方軍力強弱懸殊：劉秀只有八九千人，而王莽有四十餘萬人。但劉秀利用王莽的將軍王尋、王邑輕敵懈怠，用精兵三千突破王莽軍隊的中堅，乘銳進擊，大破敵軍。

(二七) 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縣東北。公元二〇〇年，曹操軍隊和袁紹軍隊戰於此處。當時袁紹擁軍十萬，而曹操兵少糧盡。但曹操利用袁軍的輕敵無備，實行輕兵偷襲，燒了袁軍的輜重。袁軍慌亂，曹軍出擊，殲滅了袁軍主力。

(二八) 吳指孫權方面而言，魏指曹操方面而言。赤壁在湖北省嘉魚縣東北的長江南岸。公元二〇八年，曹操率兵五十餘萬，號稱八十萬，進攻孫權。孫權和曹操的敵人劉備聯合，出兵三萬，利用曹軍有疫疾，又不習水戰，用火攻燒曹軍船隻，大破曹軍。

(二九) 彝陵在今湖北宜昌縣東。公元二二二年，吳將陸遜在這裏大敗蜀漢的劉備。這次戰爭開始，劉備軍連戰皆捷，進到彝陵，已入吳境五六百里。陸遜守七八月不戰，直待劉備「兵疲意沮，計不復生」，利用順風放火，大破蜀軍。

(三〇) 公元三八三年，東晉將軍謝玄大敗秦主苻堅於安徽淝水。當時苻堅有步兵六十餘萬，騎兵二十七萬，衛隊三萬餘騎，東晉只有水陸軍八萬。在兩軍隔淝水對峙的時候，晉軍將領利用了敵軍的驕傲自恃，要求淝水以北的秦軍讓出一片戰場來，以便晉軍渡水決戰。秦軍果然應允，但一退即不可遏止，晉軍乘機渡水攻擊，大敗秦軍。

(三一)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國共產黨爲反對蔣介石汪精衛的反革命，繼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事業，在江西省城南昌領導了有名的起義。參加這個起義的有三萬多人的武裝部隊，領導人有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等同志。起義軍於八月五日按原來計劃退出南昌，進至廣東潮州、汕頭時，遭受挫敗。起義軍的一部分後來由朱德、陳毅、林彪等同志率領轉戰到井岡山，和毛澤東同志領導的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會合。

(三二) 見「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夠存在？」註八。

(三三) 一九二七年九月，湖南江西邊界地區修水、萍鄉、平江、瀏陽等縣的人民武裝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舉行著名的秋收起義，成立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毛澤東同志率領這支軍隊到井岡山，在那裏建立了湘贛邊區革命根據地。

(三四) A B團是當時國民黨潛伏在紅色區域的反革命特務組織。A B是英文 Anti-Bolshevik (反布爾塞維克) 的簡寫。

(三五) 指江西省的中部贛江和東部撫水的中間地區。

(三六) 參看列寧「關於立刻單獨媾和並簽訂割地和約問題的提綱」、「寄談與怪論」、「嚴重的教訓與嚴重的責任」、「關於戰爭與和平問題的報告」等著作，和「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七章第七節。

(三七) 這裏所說的藏人、回人，是指西康一帶的藏族和甘肅青海新疆等省的回族。

(三八) 八股文是十五世紀到十九世紀中國封建皇朝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特殊文體。八股文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等部分組成。「破題」共二句，說破題目的要義。「承題」用三句或四句，承接破題的意義而說明之。「起講」概說全體，爲議論的開始。「入手」爲起講後入手之處。起股、中股、後股和束股這四個段落才是正式的議論，中股爲全篇文字的重心。在這四個段落中，每一段落都有兩股兩相比偶的文字，合共有八股，所以叫作八股文，亦稱爲八比。毛澤東同志這裏是說寫作八股文由一部分到另一部分的展開過程，用以比喻革命發展的各種階段。但在通常的場合，毛澤東同志則用八股文這類東西去比喻和諷刺教條主義。

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蔣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張學良楊虎城二將軍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進行內戰的軍隊撤離陝甘兩省，這是蔣介石氏轉變其十年錯誤政策的開始(一)。這對於指揮內戰、製造分裂、並欲在這次事變中置蔣氏於死地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二)的陰謀，給了一個打擊。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的失望，已顯而易見。蔣氏此種覺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國民黨願意結束其十年錯誤政策的一種表示。

蔣介石氏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洛陽發表了一個聲明，即所謂『對張楊的訓詞』，內容含糊糊塗，曲折折，實爲中國政治文獻中一篇有趣的文章。蔣氏果欲從這次事變獲得深刻的教訓，而爲建立國民黨的新生命有所努力，結束其傳統的對外妥協、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錯誤政策，將國民黨引導到和人民願望不相違背的地位，那末，他就應該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開闢將來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現其誠意。十二月二十六日的聲明，是不能滿足中國人民大眾的要求的。

蔣氏聲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讚揚的，即他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說他在西安對

於張楊所提出的條件沒有簽字，但是願意採納那些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為未簽字而不守信用。我們將在蔣氏撤兵後看他是否確守信義，是否實行他所允諾的條件。這些條件是：（一）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逐親日派，容納抗日分子；（二）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聯合紅軍抗日；（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五）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係；（六）其他具體的救國辦法。這些條件的實行，首先需要確守信義，並且需要一些勇氣。我們將於蔣氏今後的行動表現中考察之。

然而蔣氏聲明中又有西安事變係受『反動派』包圍的話。可惜蔣氏沒有說明他所謂『反動派』究竟係一些什麼人物，也不知道蔣氏字典中的『反動派』三字作何解釋。但是西安事變的發動，確係受下列數種勢力的影響：（一）張楊部隊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二）全國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漲；（三）國民黨左派勢力的發展；（四）各省實力派的抗日救國的要求；（五）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主張；（六）世界和平陣綫的發展。這些都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蔣氏所說的『反動派』，不是別的，就是這些勢力，不過人們叫作革命派，蔣氏則叫作『反動派』罷了。蔣氏在西安曾說了將要認真抗日的話，當不至一出西安又肆力攻擊革命勢力，因為不但信義問題關係蔣氏及其一派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實際的政治道路上，在蔣氏及其一派面前橫着一種已經膨脹起來而不利於他們的勢力，這就是西安事變中欲置蔣氏於死地的所謂討伐派。因此，我們勸蔣氏將其政治字典修改一下，將『反動派』三字改為革命派三字，改得名副其實，較為妥當。

蔣氏應當記憶，他之所以能够安然離開西安，除西安事變的領導者張楊二將軍之外，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和平解決，並爲此而作了種種努力，全係由民族生存的觀點出發。設使內戰擴大，張楊長期禁錮蔣氏，則事變的進展徒然有利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在這種情形下，共產黨堅決揭破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討伐派汪精衛^(一)、何應欽^(二)等的陰謀，堅決主張和平解決這次事變，這和張楊二將軍及宋子文氏^(三)等國民黨人的主張可謂不謀而合。這就是全國人民的主張，因爲現在的內戰是人民所痛惡的。

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今後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全國人民將不容許蔣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餘地。蔣氏如欲在抗日問題上徘徊，推遲其諾言的實踐，則全國人民的革命浪潮勢將席捲蔣氏以去。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蔣氏及其一派必須深切注意。

蔣氏倘能一洗國民黨十年反動政策的污垢，澈底地改變他的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的基本錯誤，而立即走上聯合各黨各派一致抗日的戰綫，軍事上政治上俱能實際採取救國步驟，則共產黨自當給他以贊助。共產黨早已於八月二十五日致國民黨書中將此種贊助的諾言許給蔣氏和國民黨了^(四)。共產黨的『言必信，行必果』，十五年來全國人民早已承認。全國人民信任共產黨的言行，實高出於信任國內任何黨派的言行。

〔註釋〕

〔一〕以張學良爲首的國民黨東北軍及以楊虎城爲首的國民黨第十七路軍，因受中國紅軍及人民抗日運動的影響，同意中國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要求蔣介石聯共抗日。蔣加以拒絕，而且更加倒行逆施，積極佈置「剿共」軍事，並在西安屠殺抗日青年。張楊乃聯合行動逮捕蔣介石。這就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著名的西安事變。當時蔣介石被迫接受聯共抗日的條件，乃被釋放回南京。

〔二〕指在西安事變時候南京國民政府內部主張對張學良楊虎城實行「討伐」的那一部分和蔣介石爭權奪利的親日派，這些人以汪精衛、何應欽爲首，他們藉西安事變準備發動大規模內戰，以便利日寇的進攻，並乘機奪取蔣介石的統治地位。

〔三〕上海愛國領袖是指上海抗日愛國運動的七個領導者，即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他們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蔣介石政府拘捕，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才被釋放。

〔四〕汪精衛是當時國民黨中親日派的領袖。從一九三一年起，他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貫主張妥協。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離開重慶，公開投降日寇，組織南京傀儡政府。

〔五〕何應欽，國民黨軍閥，是國民黨中另一親日派首領。在西安事變中，他積極籌謀掀起內戰，部署國民黨軍沿隴海路進攻陝西，並曾計劃轟炸西安，炸斃蔣介石，以便取蔣的地位而代之。

〔六〕宋子文爲親美派。由於當時美日兩帝國主義在遠東爭霸的矛盾，他根據美國的利益，對於西安事變，也主張和平解決。

〔七〕這封信對於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和當時的國民黨二中全會，作了義正詞嚴的批判，同時申明瞭中國共產黨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準備重新建立國共合作的政策。以下是原信的主要部分：「貴黨二中全會所說的『集中統一』，實在未免本末倒置。須知十年以來的內戰和不統一，完全是因爲貴黨和貴黨政府依賴帝國主義的誤國政策，尤其是「九一八」以來一貫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在貴黨和貴黨政府「攘外必先安內」的口號之下，進行了連年不絕的內戰，舉行了無數次對於紅軍的圍攻，不遺餘力地鎮壓了全國人民的愛國運動和民主運動。直至最近，還是放棄東北和華北不顧，忘記日本帝國主義是中國的 최대敵人，而把一切力量反對紅軍和從事貴黨自己營壘之間的內爭，用一切力量攔阻紅軍的抗日去路，搗亂紅軍的抗

日後方，漠視全國人民的抗日要求，剝奪全國人民的自由權利。愛國有罪，冤獄遍於國中，賣國有賞，漢奸彈冠相慶。以這種錯誤政策來求集中和統一，真是緣木求魚，適得其反。我們現在正告諸位先生，如果你們不根本改變自己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把仇恨之心放到日本帝國主義身上去，而依舊放在自己同胞身上的話，那末你們即欲勉強維持現狀，也是不可能的，集中統一以及所謂「現代國家」的說法，更是完全的空談。全國人民現在所要的是抗日救國的集中統一，而不是媚外殘民的集中統一。全國人民現在熱烈要求一個真正救國救民的政府，要求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全國人民要求一個爲他們自己謀利益的民主共和國。這個政府的主要綱領，必須：第一，是能够抵抗外侮的。第二，是能够給予人民以民主權利的。第三，是能够發展國民經濟，減輕以至免除人民生活上的痛苦的。如果要說「現代國家」，這些綱領才是殖民地和平殖民地的中國在現時代所真正要求的。全國人民現在正以熱烈的願望和堅毅的決心，爲實現這樣的目標而鬥爭。而貴黨和貴黨政府的政策，則與此種全國人民的願望背道而馳，以此而求人民的信任，是決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紅軍，今特鄭重宣言：我們贊助建立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贊助召集由普選權選舉出來的國會，擁護全國人民和抗日軍隊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擁護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我們宣佈：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紅色區域即可成爲全中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色區域人民的代表，將參加全中國的國會，並在紅色區域實行和全中國一樣的民主制度。我們認爲貴黨二中全會所決定組織的國防會議，以及貴黨和貴黨政府正在召集中的國民大會，是不能完成集中統一抗日救亡的任務的。依照貴黨二中全會所通過的國防會議條例看來，則國防會議的組織，只限於貴黨和貴黨政府當權執政的少數官員，國防會議的任務，是僅充貴黨政府的諮詢機關。這種會議之不能有任何的成就和不能取得人民的任何信任，是十分明顯的。而諸位先生所要召集的國民大會，依據貴黨政府所通過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和「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看來，也同樣地不能有什麼成就和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因爲這種國民大會僅僅是貴黨和貴黨政府少數官員們所操縱的機關，是這些官員們的附屬品和裝飾品。這樣的國防會議和國民大會，同本黨所主張的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即國防會議），中華民主共和國和它的國會，是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我們認爲抗日救國的國防會議，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各界各武裝隊伍的代表，構成真正能够決定抗日救國大計的權力機關，並從這一會議中產生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而國民大會也必須是全國人民普選出來的國會，是中華民主共和國的最高權力機關。只有這樣的國防會議和全國國會，才能是全國人民所歡迎、擁護和參加的，才能把救國救民的偉大事業，放在堅固不拔的基礎之上。否則任何好聽的名詞，均決然無補實際，決然不爲全國人民所同意。

貴黨和貴黨政府歷來所召集的各種會議的失敗，就是最好的明證。貴黨二中全会宣言又說：「險阻之來，本可意計，斷不因國事之艱虞，而自懈其應盡之職責。」「本黨對於國家興亡，必當盡其心思才力，貫徹始終。」誠然，貴黨是中國最大部分領土中的統治的政黨，一切過去實施的政治責任，不能不由貴黨負擔。在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府之下，國民黨決不能逃避其責任。尤其是九一八事變以來，貴黨違背全國民意，違背全民族利益，執行了絕對錯誤的政策，得到了喪失幾乎半個中國的結果，這個責任是絕對不能推諉於任何別人的。在我們和全國人民看來，半個中國由貴黨而淪亡，決不能不譴責貴黨以恢復領土主權的責任。同時，貴黨中許多有良心的分子，現在也確然憬悟於亡國的可怕和民意的不可侮，而開始了新的轉變，開始了對於自己黨中禍黨禍國分子的憤怒和不滿。中國共產黨完全同情於這種新的轉變，熱烈地歡迎這些有愛國心的有良心的中國國民黨黨員的志氣和覺悟，歡迎他們在民族危亡面前願意犧牲奮鬥和勇於革新的精神。我們知道，在貴黨中央和各省黨部中，中央和各省政府中，在教育界，在科學界，在藝術界，在新聞界，在實業界，在婦女界，在宗教界，在醫藥界，在警察界，在各種民衆團體，尤其在廣大的軍隊、國民黨的新舊黨員和各級領袖中，實在有很多覺悟和愛國的人士，並且這樣的人還在日益增加着，這是非常可喜的現象。中國共產黨隨時準備着和這些國民黨人攜手，組織堅固的民族統一戰綫，去反對全民族的最大敵人——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希望這些國民黨員能够在國民黨中迅速形成一種支配的勢力，去壓倒那些不顧民族利益，實際成爲日本帝國主義代理人，實際成爲親日漢奸的最壞和最可恥的國民黨員——那些侮辱孫中山先生的國民黨員，恢復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義精神，重振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和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去「貫徹」革命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的「始終」，「貫徹」孫中山先生革命遺囑的「始終」。我們希望他們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愛國領袖和愛國人民一道，堅決地担负繼承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的責任，堅決地爲驅逐日本帝國主義，挽救中國於危亡而鬥爭，爲全國人民的民主權利而鬥爭，爲發展中國國民經濟解除最大多數人民的痛苦而鬥爭，爲實現中華民主共和國及其民主國會民主政府而鬥爭。中國共產黨向一切中國國民黨人宣言：假如你們真正這樣幹的時候，我們堅決地贊助你們，我們願意同你們結成一個堅固的革命的統一戰綫，如像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國偉大的革命時期兩黨結成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的偉大的統一戰綫一樣，因爲這是今日救亡圖存的唯一正確的道路。」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

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

(一) 由於中日矛盾成爲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和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形勢的新的發展階段。

(二) 中國很久以來就是處在兩種劇烈的基本的矛盾中——帝國主義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的矛盾。一九二七年以國民黨爲代表的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出賣民族利益於帝國主義，造成了工農政權和國民黨政權尖銳對立，以及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不能不由中國共產黨單獨負擔的局面。

(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特別是一九三五年華北事變以來的形勢，使這些矛盾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甲、由一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變爲特別突出特別尖銳的日本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日本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帝國主義實行了完全征服中國的政策。因此，便把若干其他帝國主義和中國的矛盾推入次要的地位，而在這些帝國主義和日本帝國主義之間，擴大了矛盾的裂口。因此，便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中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世界的和平陣綫相結合的任務。這就是說，中國不但應當和中國人民的始終一貫的良友蘇聯相聯合，而且應當按照可能，和那些在現時願意保持和平而反對新的侵略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建立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關係。我們的統一戰綫應當以抗日爲目的，不是同時反對一切帝國主義。

乙、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係，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任務。我們的統一戰綫是包括資產階級及一切同意保衛祖國的人們的，是舉國一致對外的。這個任務不但必須完成，而且是可能完成的。

丙、中日矛盾變動了全國人民大眾（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小資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情況和政策。人民更大規模地起來爲救亡而鬥爭。共產黨發展了在『九一八』後在三個條件（停止進攻革命根據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權利，武裝人民）下和國民黨中願意同我們合作抗日的部分訂立抗日協定的政策，成爲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統一戰綫的政策。這就是我黨一九三五年八月宣言^①，十二月決議^②，一九三六

* 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集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

年五月放棄『反蔣』口號⁽¹⁾，八月致國民黨書⁽²⁾，九月民主共和國決議⁽³⁾，十二月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二月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⁴⁾等等步驟之所由來。

丁、由於帝國主義勢力範圍政策和中國半殖民地經濟狀況而來的中國軍閥割據和軍閥內戰，在中日矛盾面前也起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贊助這種割據和內戰，以便利其獨佔中國。若干其他帝國主義爲了它們自己的利益，暫時地贊助中國的統一與和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則以極大的努力反對內戰與分裂，爭取和平與統一。

戊、中日民族矛盾的發展，在政治比重上，降低了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的地位，使它們變爲次要和服從的東西。但是國內階級間的矛盾和政治集團間的矛盾本身依然存在，並沒有減少或消滅。中國和日本以外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亦然。因此，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下列的任務：適當地調整國內國際在現時可能和必須調整的矛盾，使之適合於團結抗日的總任務。這就是中國共產黨要求和平統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與反對日本的外國進行談判種種方針之所由來。

(四)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時，告一段落。此階段內的重大事變，是學生界、文化界、輿論界的救亡運動，紅軍的進入西北，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上海和青島的反日罷工⁽⁵⁾，英國對日政策之趨向比較的強硬⁽⁶⁾，兩廣事變⁽⁷⁾，綏遠戰爭和援綏運動⁽⁸⁾，南京在中日談判中的比較強硬的

態度〔三〕，西安事變，最後是南京國民黨的三中全會〔三〕。這些事變，統統都是圍繞着中國和日本對立這一基本矛盾的，都是直接圍繞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這個歷史要求的。這一階段的革命基本任務，是爭取國內和平，停止國內的武裝衝突，以便團結一致，共同抗日。共產黨在此階段內提出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號召，這一號召是基本上實現了，這就構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實際組成上的第一個必要條件。

（五）國民黨的三中全會，由於其內部有親日派的存在，沒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確和澈底的轉變，沒有具體地解決問題。然而由於人民的逼迫和國民黨內部的變動，國民黨不能不開始轉變它過去十年的錯誤政策，這即是由內戰、獨裁和對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轉變，而開始接受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政策，這種初步轉變，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是表現出來了。今後的要求是國民黨政策的澈底轉變。這就需要我們和全國人民更大地發展抗日和民主的運動，進一步地批評、推動和督促國民黨，團結國民黨內的主張和平、民主、抗日的分子，推動動搖猶豫分子，排除親日分子，才能達到目的。

（六）目前的階段，是新時期的第二個階段。前一階段和這一階段都是走上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的過渡階段。如果前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和平，則這一階段的任務主要地是爭取民主。必須知道，爲了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沒有國內和平固然不行，沒有國內民主也不行。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看不清民主任務的重要性，降低對於爭取民主的

努力，我們將不能達到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

爲民主和自由而鬥爭

(七)對於中國本部的侵略，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加緊準備着。和希特勒、墨索里尼在西方加緊準備的強盜戰爭相呼應，日本在東方正在用盡一切氣力在確定的步驟上準備一舉滅亡中國的條件——國內軍事的、政治的、經濟的、思想的條件，國際外交條件，中國親日勢力的扶植。所謂『中日提携』的宣傳和某些外交步驟的緩和，正是出於戰爭前夜日本侵略政策的戰術上的必要。中國正迫近着判定自己存亡的關頭，中國的救亡抗戰，必須用跑步的速度去準備。我們並不反對準備，但反對長期準備論，反對文恬武嬉飽食終日的亡國現象，這些都是實際上幫助敵人的，必須迅速地清除乾淨。

(八)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教育上的國防準備，都是救亡抗戰的必需條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緩的。而爭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則爲保證抗戰勝利的中心一環。抗戰需要全國的和平與團結，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抗戰需要人民的動員，沒有民主自由，便無從進行動員。沒有鞏固的和平與團結，沒有人民的動員，抗戰的前途便會蹈襲阿比西尼亞的覆轍。阿比西尼亞主要地是因爲封建制度的統治，不能鞏固內部的團結，不能發動人民的積極性，所以失敗了。中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及其任務的完成，沒有民主是不行的。

(九)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爲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這方面，應從改變國民大會的選舉和召集上違反民主的辦法，實行民主的選舉和保證大會的自由開會做起，直到制定真正的民主憲法，召集真正的民主國會，選舉真正的民主政府，執行真正的民主政策爲止。只有這樣做，才能真正地鞏固國內和平，停止國內的武裝敵對，增強國內的團結，以便舉國一致抗禦外敵。可能有這種情況發生，不待我們改革完畢，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就到來了。因此，爲着隨時能够抵抗日本的進攻並澈底地戰勝之，我們必須迅速地進行改革，並準備在抗戰的過程中進到澈底改革的程度。全國人民及各黨派的愛國分子，必須拋棄過去對於國民大會和制定憲法問題的冷淡，而集中力量於這一具體的帶着國防意義的國民大會運動和憲法運動，嚴厲地批判當權的國民黨，推動和督促國民黨放棄其一黨派一階級的獨裁，而執行人民的意見。今年的幾個月內，全國必須發起一個廣大的民主運動，這運動的當前目標，應當放在國民大會和憲法的民主化的完成上。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當前幾個月內，全國人民的民主運動，必須爭取這一任務的某種最低限度的完成，釋放政治犯、開放黨禁等等，都包括在內。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和人民的自由權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綱領上的重要部分，同時也是建立真正的堅實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必要條件。

(一〇)我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托洛茨基派，對於中國的和平統一、

民主自由和對日抗戰的每一個步驟，都竭盡全力來破壞。當我們過去力爭和平統一的時候，他們就竭力挑撥內戰和分裂。當我們現在和最近將來力爭民主自由的時候，他們無疑地又要來破壞。其總目標，就在使我們保衛祖國的抗戰任務不能成功，而使他們滅亡中國的侵略計劃達到目的。今後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中，不但要向國民黨頑固派和人民中的落後成份努力做宣傳鼓動和批評的工作，而且要針對着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充任日本侵華走狗的親日派和托洛茨基派的陰謀，作盡量的揭破和堅決的鬥爭。

(一一)爲了和平、民主和抗戰，爲了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綫，中國共產黨曾在致國民黨三中全会電中向他們保證下列四項：(1)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受南京中央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2)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徹底的民主制度；(3)停止武力推翻國民黨的方針；(4)停止沒收地主的土地。這些保證，是必需的和許可的。因爲只有如此，才能根據民族矛盾和國內矛盾在政治比重上的變化而改變國內兩個政權敵對的狀態，團結一致，共同赴敵。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實行這種讓步是爲了去換得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和抗戰。然而讓步是有限度的。在特區和紅軍中共產黨領導的保持，在國共兩黨關係上共產黨的獨立性和批評自由的保持，這就是讓步的限度，超過這種限度是不許可的。讓步是兩黨的讓步：國民黨拋棄內戰、獨裁和對外不抵抗政策，共產黨拋棄兩個政權敵對的政策。我們以後者換得前者，重新與國民黨合作，爲救亡而奮鬥。如果說這是共產黨的投降，那只是阿Q主義(二)和

惡意的污蔑。

(一二) 共產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覆：是同意的（否）。三民主義有它的歷史變化。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義，曾經因為孫先生與共產黨合作加以堅決執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勝利的革命的旗幟。但是一九二七年國民黨排斥共產黨（清黨運動）和反共戰爭，實行相反的政策，招致革命的失敗，陷民族於危險的地位，於是三民主義也就失去了人民的信仰。現在民族危機極端嚴重，國民黨已不能照舊不變地統治下去，因而全國人民和國民黨中的愛國分子，又有兩黨合作的迫切要求。因此，重新整頓三民主義的精神，在對外爭取獨立解放的民族主義、對內實現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和增進人民幸福的民生主義之下，兩黨重新合作，並領導人民堅決地實行起來，是完全適合於中國革命的歷史要求，而應為每一個共產黨員所明白認識的。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中國共產黨有自己的政治經濟綱領。其最高的綱領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這是和三民主義有區別的。其在民主革命時期的綱領，亦比國內任何黨派為徹底。但是共產黨的民主革命綱領，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所宣佈的三民主義的綱領，基本上是不相衝突的。因此，我們不但不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地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要求國民黨和我們一道實行三民主義，而且號召全國人民實行三民主義。我們認為，共產黨、國民黨、全國人民，應當共同一致為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這三大目標而奮鬥。

(一三) 我們過去的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是否錯了？沒有錯的。資產階級尤其是大資產階級既然退出革命，而且投靠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變為人民的敵人，則革命的動力便只剩下了無產階級、農民和城市中的小資產階級；革命的政黨，便只剩下了共產黨；革命的組織責任，便不得不落在唯一的革命政黨共產黨的肩上。僅僅共產黨繼續高舉革命的旗幟，保持革命的傳統，提出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且為此口號而艱苦奮鬥了許多年。工農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不是違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而是堅決地執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任務的。我們在實際鬥爭中沒有一項政策不適合這種任務。我們的政策，包括沒收地主土地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在內，並沒有超出資本主義範疇內私有財產制的界限以外，並沒有實行社會主義。新的民主共和國所包括的成份是什麼呢？它包括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及一切國內同意民族和民主革命的分，它是這些階級的民族和民主革命的聯盟。這裏的特點是包括了資產階級，這是因為資產階級在今天的環境下，又有重新參加抗日的可能，所以無產階級政黨不應該拒絕他們，而應該招致他們，恢復和他們共同鬥爭的聯盟，以利於中國革命的前進。爲了停止國內的武裝衝突，共產黨願意停止使用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準備在新的民主共和國建設過程中，用立法和別的適當方法去解決土地問題。中國土地屬於日本人，還是屬於中國人，這是首先待解決的問題。既是在保衛中國的大前提之下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那末，由暴力沒收方法轉變到新的適當方法，就是完全必要的。

工農民主共和國口號，過去的提出和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確的。

(一四)爲了建立民族統一戰綫共同對敵，國內的某些矛盾，必須給予適當的解決，其原則是應當有助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增強和擴大，而不是使其削弱和縮小。在民主革命階段內，國內階級間、黨派間、政治集團間的矛盾和鬥爭是無法避免的，但是可以而且應該停止那些不利於團結抗日的鬥爭（國內戰爭，黨派敵對，地方割據，一方面封建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壓迫，一方面暴動政策和不利於抗日的過高的經濟要求等等），而保存那些有利於團結抗日的鬥爭（批評的自由，黨派的獨立性，人民政治條件和經濟條件的改善等等）。

(一五)在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總任務之下，紅軍和抗日根據地的任務是：（1）使紅軍適合抗日戰爭的情況，應即改組爲國民革命軍，並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戰爭中的模範兵團。（2）根據地改爲全國的一個組成部分，實行新條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和搗亂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範區。（3）在此區域內實行必要的經濟建設，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4）實行必要的文化建設。

我們的領導責任

(一六)在某種歷史環境能够參加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封建制度的中國資產階級，由於它在經濟上政治上的軟弱性，在另一種歷史環境就要動搖變節，這一規律，在中國歷史上已經證明了。因此，

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歷史已判定不能經過資產階級的領導，而必須經過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夠完成。並且只有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的堅持性和徹底性，才能克服資產階級的那種先天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而使革命不至於流產。使無產階級跟隨資產階級呢，還是使資產階級跟隨無產階級呢？這個中國革命領導責任的問題，乃是革命成敗的關鍵。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經驗，表明了當資產階級追隨着無產階級的政治領導的時候，革命是如何地前進了；及至無產階級（由共產黨負責）在政治上變成了資產階級的尾巴的時候，革命又是如何地遭到了失敗。這種歷史不應當重複了。依現時的情況說來，離開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戰的目的就不能實現，祖國就不能保衛，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就不能成功。在今天，以國民黨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還帶着很多的被動性和保守性，對於共產黨發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在長久的時期中表示不敢接受，就是證據。這種情況，加重了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治領導責任。抗日救國的總參謀部的職務，共產黨是責無旁貸和義不容辭的。

（一七）無產階級怎樣經過它的政黨實現對於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呢？首先，是根據歷史發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號，和爲了實現這種口號而提出關於每一發展階段和每一重大事變中的動員口號。例如我們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這樣的基本口號，又提出了『停止內戰』、『爭取民主』、『實現抗戰』的口號，作爲全國人民一致行動的具體目標，沒有這種具體目標，是無所謂政治領導的。第二，是按照這種具體目標在全國行動起來時，無產階級，特別是它

的先鋒隊——共產黨，應該提起自己的無限的積極性和忠誠，成爲實現這些具體目標的模範。在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民主共和國的一切任務而奮鬥時，共產黨員應該作到最有遠見，最富於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會情況，依靠羣衆的多數，得到羣衆的擁護。第三，在不失掉確定的政治目標的原則上，建立與同盟者的適當的關係，發展和鞏固這個同盟。第四，共產黨隊伍的發展，思想的統一性，紀律的嚴格性。共產黨對於全國人民的政治領導，就是由執行上述這些條件去實現的。這些條件是保證自己的政治領導的基礎，也就是使革命獲得徹底的勝利而不被同盟者的動搖性所破壞的基礎。

(二八)和平實現與兩黨合作成立之後，過去在兩個政權敵對路綫下的鬥爭方式、組織方式和工作方式，應當有所改變。這種改變，主要是從武裝的轉到和平的，非法的轉到合法的。這種轉變是不容易的，需要重新學習。重新訓練幹部，成爲主要的一環。

(一九)關於民主共和國的性質和前途的問題，許多同志已提出來了。我們的答覆是：其階級性是各革命階級的聯盟，其前途可能是走向社會主義。我們的民主共和國，是在執行民族抗戰任務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建立起來的，是在國際新環境之下（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世界革命新時期的前夜）建立起來的。因此，按照社會經濟條件，它雖仍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性質的國家，但是按照具體的政治條件，它應該是一個工農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聯盟的國家，而不同於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因此，它的前途雖然有走上資本主義方向的可能，但是同時又有轉變到社會

主義方向的可能，中國無產階級政黨應該力爭這後一個前途。

(二〇) 向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同時又向尾巴主義作鬥爭，是執行黨的任務的必要條件。我們黨在民衆運動中，有嚴重的關門主義、高慢的宗派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傳統傾向，這是一個妨礙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和爭取多數羣衆的惡劣的傾向。在每一個具體的工作中肅清這個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們的要求是依靠多數和照顧全局。陳獨秀尾巴主義的復活是不能容許的，這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在無產階級隊伍中的反映。降低黨的立場，模糊黨的面目，犧牲工農利益去適合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要求，將必然引導革命趨於失敗。我們的要求是實行堅決的革命政策，爭取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徹底勝利。爲了達到克服上述這些不良傾向的目的，在全黨中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爲只有這種理論，才是引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的指南針。

〔註釋〕

(一)『華北事變』，指一九三五年日寇侵略華北和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政府在華北辱國喪權的一連串事件。是年五月，日寇向國民黨政府提出要求，在華北的統治權，六月國民黨政府在華北的代表何應欽與日寇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簽訂協定，接受了這個要求，是即所謂『何梅協定』。按照這個協定，中國在河北和察哈爾的主權大部喪失。十月日寇又在河北省的香河指使漢奸暴動，佔據縣城。十一月又策動漢奸進行所謂『華北五省自治運動』，並成立冀東漢奸『防共自治政府』。國民黨政府指派宋哲元等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寇關於『華北政權特殊化』的要求。

(二)這是指中國共產黨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發出的宣言。其要點如下：『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間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當有「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真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當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爲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紅軍的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爲，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携手共同救國。」「共產黨願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堂、民族武裝自衛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爲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這種國防政府，應當設法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由工農軍政商學各界，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以及國外僑胞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在民主條件下選出的代表）的代表機關，以便更具體地討論關於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共產黨絕對盡力贊助這一全民代表機關的召集，並絕對執行這一機關的決議。」「抗日聯軍應由一切願意抗日的部隊合組而成。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這種總司令部或由各軍抗日長官及士兵選出代表組成，或由其他形式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體人民公意而定。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以盡抗日救國的天職。爲了使國防政府真能擔當起國防重任，爲了使抗日聯軍真能担負起抗日重責，共產黨號召全體同胞：有錢的出錢，有槍的出槍，有糧的出糧，有力的出力，有專門技能的貢獻專門技能，以便我全體同胞總動員，並用一切新舊式武器，武裝起千百萬民衆來。」

（三）這是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舉行的政治局會議所通過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這個決議對於當時中國內外的形勢、階級間的變化和黨的政策，作了完整的分析和決定。以下是這個決議的一部分：「目前的形勢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中國的行動，震動了全中國與全世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階級、階層、政黨以及武裝勢力，重新改變了與正在改變着它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民族革命戰綫與民族反革命戰綫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黨的策略路綫，是在於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隊伍，什麼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綫（下層的與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其走狗

蔣介石。當然，不同的個人，不同的團體，不同的社會階級與階層，不同的武裝隊伍，他們參加反日的民族革命，各有他們不同的動機與立場。有的是爲了保持他們原有的地位，有的是爲了要爭取運動的領導權使運動不至超出他們所容許的範圍之外，有的真是爲了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正因爲他們的動機與立場各有不同，有的在鬥爭開始時就要動搖叛變的，有的會在中途消極或退出戰線的，有的願意奮鬥到底的。但是，我們的任務，是在不但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的革命力量，而且要團結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國人民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不使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參加到反日的戰線上去。這就是黨的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總路線。只有按照這種路線，我們才能動員全國人民的力量去對付全國人民的公敵：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蔣介石。中國工人階級與農民，依然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動力。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革命的知識分子，是民族革命中最可靠的同盟者。工農小資產階級的堅固聯盟，是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與漢奸賣國賊的基本力量。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與軍閥，不管他們怎樣不同意土地革命與紅色政權，在他們對於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鬥爭採取同情，或善意中立，或直接參加之時，對於反日戰線的開展都是有利的。因爲這就使他們離開了總的反革命力量，而擴大了總的革命力量。爲達到此目的，黨應該採取各種適當的方法與方式，爭取這些力量到反日戰線中來。不但如此，即在地主買辦階級營壘中間，也不是完全統一的，由於中國過去是許多帝國主義互相競爭的結果，產生了各國帝國主義在中國互相競爭的賣國賊集團，他們中間的矛盾與衝突，黨亦應使用許多的辦法使某些反革命力量暫時處於不積極的反對反日戰線的地位。對於日本帝國主義以外的其他帝國主義的策略也是如此。黨在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人民的力量以反對全中國人民的公敵時，應該堅決不動搖地同反日統一戰線內部一切動搖、妥協、投降與叛變的傾向做鬥爭。一切破壞中國人民反日運動者，都是漢奸賣國賊，應該羣起而攻之。共產黨應該以自己澈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也只有共產黨領導之下，反日運動才能得到澈底的勝利。對反日戰爭中的廣大民衆，應該滿足他們基本利益的要求（農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貧民、知識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滿足了他們的要求，才能動員更廣大的羣衆走進反日的陣地上去，才能使反日運動得到持久性，才能使運動走到澈底的勝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黨在反日戰爭中的領導權。」請參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

〔四〕參考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紅軍要求南京政府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該電全文如下：「南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全體海陸空軍，全國各黨、各派、各團體、各報館，一切不願意當亡國奴的同胞們：自從中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中

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渡河東征以來，所向皆捷，全國響應。但正當抗日先鋒軍佔領同蒲鐵路，積極準備東出河北與日本帝國主義直接作戰之時，蔣介石竟以十師以上兵力開入山西，協同閻錫山氏阻攔紅軍抗日去路，並命令張學良楊虎城兩氏及陝北軍隊向陝甘紅色區域挺進，擾亂我抗日後方。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本當集中全力消滅蔣氏攔阻抗日去路的部隊，以達到對日直接作戰之目的。但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一再考慮，認為國難當前，雙方決戰，不論勝負屬誰，都是中國國防力量的損失，而為日本帝國主義所稱快。且在蔣介石、閻錫山兩氏的部隊中，不少願意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愛國軍人，目前接受兩氏的命令，攔阻紅軍抗日去路，實係違反自己良心的舉動。因此，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進行抗日戰爭，為了堅決履行我們每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為了促進蔣介石氏及其部下愛國軍人們的最後覺悟，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然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諸公進言，在亡國滅種緊急關頭，理應翻然改悔，以「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的精神，在全國範圍、首先在陝甘晉停止內戰，雙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體辦法。此不僅諸公之幸，實亦民族國家之福。如仍執迷不悟，甘為漢奸賣國賊，則諸公的統治，必將最後瓦解，必將為全國人民所唾棄所傾覆。語云：「千夫所指，無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願諸公深思熟慮之。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全國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黨派、人民，贊助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促進會，派遣代表隔斷雙方火綫，督促並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

（五）見「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註七。

（六）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所通過的「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和毛澤東同志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國的口號。隨後，根據情況的需要，黨採取了迫蔣抗日的政策，估計人民共和國這個口號不會為蔣介石集團所接受，於是在一九三六年八月致國民黨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國的口號。接着又在同年九月黨中央所作的「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中，對於民主共和國的口號作了具體的說明。兩個口號形式上雖有不同，實質上却是一致的。以下是一九三六年九月黨中央決議中關於民主共和國問題的兩節：「中央認為在目前形勢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因為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的最好方法，而且這也是從廣大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綫的口號。民主共和國是較之一

部分領土上的工農民主專政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因此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徹底勝利。同時，民主共和國不但能够使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提高他們的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而且也給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共產黨爲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以自由活動的舞臺。因此，中國共產黨宣佈：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並且宣佈：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依據普選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紅色區域即將成爲它的一個組成部分，紅色區域人民將選派代表參加國會，並將在紅色區域內完成同樣的民主制度。『中央肅重指出：只有繼續開展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擴大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加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綫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極大地鞏固紅色政權與紅軍，同一切喪權辱國及削弱民族統一戰綫力量的言論行動進行堅決的鬥爭，我們才能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給民主共和國的实现準備前提。沒有艱苦的持久的鬥爭，沒有全中國人民的發動與革命的高漲，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在爲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過程中，應該使這個民主共和國從實行本黨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開始，一直到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務徹底的完成。』

〔七〕此電於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發出，原文如下：『中國國民黨三中全会諸先生鑒：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方針得以實現，實爲國家民族之福。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会，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爲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貴黨三中全会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本黨爲着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黨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證：（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民主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行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綫之共同綱領。』

〔八〕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上海的日本紗廠與中國紗廠共二十六廠，四萬五千餘工人，舉行大罷工。十二月，青島各日本紗廠工人，爲響應上海工人，也全體罷工。上海工人獲得勝利，自十一月起增加工資百分之五，廠方無故不准開除工人，不得打罵工人。青島工人遭受了日本海軍陸戰隊的鎮壓。

〔九〕自一九三三年日寇侵佔山海關進入華北以後，特別是自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以後，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北華中的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

利益，直接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打擊，因此英美就開始改變對於日本的態度，並給蔣介石政府的對日政策以影響。當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的時候，英國曾經表示主張拒絕日本關於不利於它在華利益的要求，甚至表示只要蔣介石政府還能繼續統治中國人民，就不妨和共產黨採取某種形式的聯合，以便打擊日本的侵略政策。

(一〇) 廣西軍閥李宗仁白崇禧，廣東軍閥陳濟棠等在一九三六年六月間假借「抗日救國」的口號，聯合反蔣。同年八月，這個事變被蔣介石用分化利誘等手段所瓦解。

(一一) 一九三六年八月，日偽軍開始侵犯綏遠。十一月，駐綏的中國軍隊進行抵抗，全國人民進行了援綏運動。

(一二) 一九三五年「何梅協定」以後，由於中國人民抗日潮流的壓力，和由於英美帝國主義對日政策比較強硬的影響，南京國民政府對於日本採取了比較強硬的態度。在一九三六年九月至十二月的談判中，國民政府曾用拖延的辦法，使談判未獲結果而停頓。

(一三) 指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國民黨中央在南京所舉行的一次會議。

(一四) 阿Q是中國偉大作家魯迅的著名小說「阿Q正傳」中的主角。魯迅在這一個角色身上描寫出一種習慣於用自已安慰自己的方法，在任何情形下都自以為是勝利者即「精神勝利」者的典型。

(一五) 這裏所說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指他所提出的關於民族、民權、民生三個問題的原則和綱領，並不指他的宇宙觀或理論體系。共產黨人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中同意孫中山的綱領的基本方面，而和他合作，但並不同意他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宇宙觀或理論體系。在宇宙觀或理論體系上，在民族問題或其他問題的理論觀點上，作為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人是和孫中山完全不同的。請參看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

(一六) 國民黨在一九二四年由孫中山改組後，變成了各階級的革命聯盟，中國共產黨人當時曾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叛變革命後，在全國各地屠殺共產黨員以及國民黨內許多真正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左派分子，國民黨稱之為「清黨運動」。從此國民黨變成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政黨。

(一七) 這裏是指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黨中央的機會主義領導所造成的情況。

爲爭取千百萬羣衆

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

(一九三七年五月七日)

同志們！對於我的報告——『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經這幾天的討論，除了個別同志提出了不同意見之外，大家都已表示同意。他們這些不同的意見，頗帶重要性，因此我的結論，首先就來討論這些意見，然後再說到一些其他的問題。

和平問題

我們黨爲國內和平而鬥爭，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了。國民黨三中全会後，我們說和平已經取得，『爭取和平』的階段已經過去，新的任務是『鞏固和平』，並指出這是同『爭取民主』相關聯的——用爭取民主去鞏固和平。我們的這種意見，按照幾個同志的說法却不能成立。他們的結論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動搖於兩者之間的。因爲他們說：『日本後退了』，南京更動搖了，民族矛盾下降，國內矛盾

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

上升。』根據這種估計，當然無所謂新階段和新任務，情況回到舊階段，或者還不如。這種意見，我以為是不對的。

我們說和平取得了，並不是說和平鞏固了，相反，我們說它是不鞏固的。和平實現與和平鞏固是兩件事。歷史暫時地走回頭路是可能的，和平發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於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親日派的存在。然而西安事變後和平實現是事實，這種情況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進攻的基本方針，蘇聯和英美法的贊助和平，中國人民的逼迫，共產黨在西安事變中的和平方針及停止兩個政權敵對的政策，資產階級的分化，國民黨的分化等等），不是蔣介石一個人所能決定和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須同多方面勢力作戰，並且必須同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靠攏，才能成功。沒有問題，日本帝國主義和親日派還在企圖使中國繼續內戰。和平沒有鞏固，正是因為這一點。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結論不是回到『停止內戰』或『爭取和平』的舊口號去，而是前進一步，提出『爭取民主』的新口號，只有這樣才能鞏固和平，也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抗戰。為什麼提出『鞏固和平』、『爭取民主』、『實現抗戰』這樣三位一體的口號？為的是把我們的革命車輪推進一步，為的是情況已經允許我們進一步了。如果否認新階段和新任務，否認國民黨的『開始轉變』，並且邏輯的結論也將不得不否認一年半以來一切為爭取和平而鬥爭的各派勢力努力的成績，那末，只是把自己停頓在舊位置，一步也沒有前進。

* 這是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所作的結論。

爲什麼這些同志作出這種不妥當的估計呢？原因在於他們觀察時局不從根本之點出發，而從許多局部和一時的現象（佐藤外交，蘇州審判〔三〕，壓制罷工，東北軍東調〔四〕，楊虎城出洋〔五〕等等）出發，於是形成一幅暗淡的畫圖。我們說國民黨已經開始轉變，但我們同時即說國民黨並沒有徹底轉變。國民黨的十年反動政策，要它徹底轉變而不用我們和人民的新的更多更大的努力，這是不能設想的事情。不少號稱『左』傾的人們，平日痛罵國民黨，在西安事變中主張殺蔣和『打出潼關去』〔六〕，及至和平剛剛實現又發現蘇州審判等事，就用驚詫的口氣發問道：『爲什麼蔣介石又這樣幹？』這些人們須知：共產黨員和蔣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個人，而是處於一個黨派、一個階級裏頭的分了。共產黨有本領把革命逐步地推向前進，但沒有本領把全國的壞事在一個早晨去掉乾淨。蔣介石或國民黨已經開始了他們的轉變，但沒有全國人民的更大努力，也決不會在一個早晨把他們的十年污濁洗掉得乾淨。我們說運動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戰，但不是說不經努力能够把內戰、獨裁和不抵抗的舊毒掃除乾淨。舊毒，污濁，革命進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頭路，只有鬥爭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長期的鬥爭和努力。

『他們是一心要破壞我們。』對的，他們總是在企圖破壞我們，我完全承認這種估計的正確，不估計這一點就等於睡覺。但問題在破壞的方式是否有改變。我以爲是有了改變的。從戰爭和屠殺的政策改變到改良和欺騙的政策，從硬的政策改變到軟的政策，從軍事政策改變到政治政策。爲什麼有這種改變？資產階級和國民黨處在日本帝國主義面前不得不暫時向無產階級找同盟軍，也和我們向資

產階級同盟軍一樣。觀察問題應從這一點出發。國際上，法國政府由仇蘇變為聯蘇，同此道理。我們在國內的任務，也從軍事的變到政治的。我們不需要陰謀詭計，我們的目的在團結資產階級和國民黨中一切同情抗日的分子，共同戰勝日本帝國主義。

民主問題

『強調民主是錯誤的，僅僅應該強調抗日；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民主運動；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來一個「一二九」就對了。』

讓我首先發出一點問題：能够在過去階段中（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運動到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說，多數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嗎？過去強調和平是錯了嗎？沒有抗日的直接行動就不能有和平運動嗎（西安事變和國民黨三中全會正在綏遠抗戰結束之後，現在也還沒有綏遠抗戰或「一二九」）？誰人不知：要抗日就要和平，無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條件。前一階段一切直接間接的抗日行動（從「一二九」起到國民黨三中全會止）都圍繞着爭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階段的中心一環，是抗日運動在前一階段中的最本質的東西。

對於抗日任務，民主也是新階段中最本質的東西，為民主即是為抗日。抗日與民主互為條件，抗日與和平、民主與和平互為條件一樣。民主是抗日的保證，抗日能給予民主運動發展以有利條件。

新階段中，我們希望有、也將會有許多直接的間接的反日鬥爭，這些將推動對日抗戰，也有助於民主運動。然而歷史給予我們的革命任務，中心的本質的東西是爭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錯的嗎？我以爲是不错的。

『日本退後了，英日向著平衡，南京更動搖了。』這是一種不了解歷史發展規律而發生的不適當的憂慮。日本如因國內革命而根本後退，這是有助於中國革命的，是我們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戰綫崩潰的開始，爲什麼還憂慮？然而究竟還不是這樣，佐藤外交是大戰的準備，大戰在我們面前。英國的動搖政策只能落得無結果，這是英國和日本的不同利害決定了的。南京如果是長期動搖，便變爲全國人民之敵，也爲南京的利益所不許。一時的後退現象，不能代替總的歷史規律。因此不能否認新階段，也不能否認民主任務的提出。況且無論什麼情況，民主的口號都能適應，民主對於中國人是缺乏而不是多餘，這是人人明白的。何況實際情況已經表明，指出新階段和提出民主任務，是向抗戰接近一步的東西。時局已經前進了，不要把它拉向後退。

『爲什麼強調國民大會？』因爲它是可能牽涉到全部生活的東西，因爲它是從反動獨裁到民主的橋樑，因爲它帶着國防性，因爲它是合法的。收復冀東察北、反對走私、反對『經濟提携』等等，如像同志們所提出的，都是很對的，但這絲毫不與民主任務和國民大會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東西是國民大會和人民自由。

日常的反日鬥爭和人民生活鬥爭，要和民主運動相配合，這是完全對的，也是沒有任何爭論的。

但目前階段裏中心和本質的東西，是民主和自由。

革命前途問題

有幾個同志發出了這個問題，我的答覆只能是簡單的。

兩篇文章，上篇與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堅決地領導民主革命，是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條件。我們是爲着社會主義而鬥爭，這是和任何革命的三民主義者不相同的。現在的努力是朝着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然而放鬆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產黨員。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主張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方向去。民主革命中將有幾個發展階段，都在民主共和國號下面。從資產階級佔優勢到無產階級佔優勢，這是一個鬥爭的長過程，爭取領導權的過程，依靠着共產黨對無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對農民、對城市小資產階級覺悟程度組織程度的提高。

無產階級的堅固的同盟者是農民，其次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同我們爭領導權的是資產階級。

對資產階級的動搖和不徹底性的克服，依靠羣衆的力量和正確的政策，否則資產階級將反過來克服無產階級。

不流血的轉變是我們所希望的，我們應該力爭這一着，結果將看羣衆的力量如何而定。

我們是革命轉變論者，不是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者（△）。我們主張經過民主共和國的一切必要的階段，到達於社會主義。我們反對尾巴主義，但又反對冒險主義和急性病。

因為資產階級參加革命的暫時性而不要資產階級，指聯合資產階級的抗日派（在半殖民地）為投降主義，這是托洛茨基主義的說法，我們是不能同意的。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抗日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的橋樑。

幹部問題

指導偉大的革命，要有偉大的黨，要有許多最好的幹部。在一個四億五千萬人的中國裏面，進行歷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領導者是一個狹隘的小團體是不行的，黨內僅有一些委瑣不識大體、沒有遠見、沒有能力的領袖和幹部也是不行的。中國共產黨早就是一個大政黨，經過反動時期的損失它依然是一個大政黨，它有了許多好的領袖和幹部，但是還不够。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幹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羣衆領袖。這些幹部和領袖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有政治遠見，有工作能力，富於犧牲精神，能獨立解決問題，在困難中不動搖，忠心耿耿地為民族、為階級、為黨而工作。黨依靠着這些人而聯繫黨員和羣衆，依靠着這些人對於羣衆的堅強領導而達到打倒敵人的目的。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個人英雄主義和風頭主義，不要懶惰和消極性，不要自高自大的

宗派主義，他們是大公無私的民族階級的英雄，這就是共產黨員、黨的幹部、黨的領袖應該有的性格和作風。我們死去的若干萬數的黨員，若干千數的幹部和幾十個最好的領袖遺留給我們的精神，也就是這些東西。我們無疑地應該學習這些東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但是還不够，還要作爲一種任務，在全黨和全國發現許多新的幹部和領袖。我們的革命依靠幹部，正像斯大林所說的話：『幹部決定一切。』⁽²⁾

黨內民主問題

要達到這種目的，黨內的民主是必要的。要黨有力量，依靠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去發動全黨的積極性。在反動和內戰時期，集中制表現得多一些。在新時期，集中制應該密切聯繫於民主制。用民主制的實行，發揮全黨的積極性。用發揮全黨的積極性，鍛鍊出大批的幹部，肅清宗派觀念的殘餘，團結全黨像鋼鐵一樣。

大會的團結和全黨的團結

大會中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經過說明已經歸於一致了；過去中央路綫和個別同志領導的退却路綫之間的分歧，也已經解決了⁽³⁾，表示了我們的黨已經團結得很堅固。這種團結是當前民族和

民主革命的最重要的基礎；因爲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只有經過全階級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

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

我們的正確的政治方針和堅固的團結，是爲着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這個目的。無產階級、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廣大羣衆，有待於我們宣傳、鼓動和組織的工作。資產階級抗日派的和我們建立同盟，也還待我們的進一步工作。把黨的方針變爲羣衆的方針，還須要我們長期堅持的、百折不撓的、艱苦卓絕的、耐心而不怕麻煩的努力。沒有這樣一種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組成、鞏固及其任務的完成，民主共和國在中國的實現，絲毫也不能離開這一爭取羣衆的努力。如果經過這種努力而爭取千百萬羣衆在我們領導之下的話，那我們的革命任務就能够迅速地完成。我們的努力將確定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並實現全部的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

〔註釋〕

〔一〕西安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爲要推動國民黨當局破壞當時已開始實現的中國國內和平和正在逐漸形成中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就在表面上暫時採取和緩姿態。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及一九三七年三月日寇曾兩次唆使偽內蒙古自治政府通電擁護南京的國民黨政府。日本外相佐藤更出面拉攏蔣介石，詭稱要改變過去日本對中國的關係，協助中國的統一與復興。另一方面，日本又由財閥兒玉謙次等組織所謂「經濟考察團」來華，詭稱協助中國「完成現代國家之組織」。所謂「佐藤外交」

爲爭取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綫而鬥爭

以及有些被日本帝國主義這種假象所迷惑的人們所認為的「日本後退」，就是指的這一套侵略陰謀。

(二)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國民黨政府逮捕了當時在上海領導抗日救國運動的領袖沈鈞儒等七人，一九三七年四月蘇州的國民黨高等法院檢察官對沈等提出「公訴」。國民黨當局仍然繼續其原來把一切愛國運動都叫做「危害民國」的反動老調子，所加於沈等的「罪狀」，也就叫做「危害民國」。

(三) 西安事變前，東北軍原駐陝(西)甘(肅)邊境，與陝北紅軍直接接觸，因此深受紅軍的影響，結果舉行了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三月國民黨反動派爲了隔離紅軍與東北軍的關係，並乘機分裂東北軍內部，強令東北軍東調至河南和安徽。

(四) 楊虎城爲發動西安事變的西北軍事領袖，與張學良齊名，當時號爲「張楊」。張學良在釋放蔣介石後送蔣回南京，即被扣留。一九三七年四月，楊虎城也被國民黨反動派迫令去職出國。楊於抗戰爆發後回國準備參加抗日工作，也被蔣介石長期監禁，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人民解放軍迫近重慶的時候，終在集中營內遇害。

(五) 潼關是陝西、河南、山西交界處的軍事重地。西安事變時，國民黨的部隊主要駐在潼關以東，當時某些號稱「左」傾的人們(張國燾是其中之一)主張「打出潼關去」，即是說向國民黨部隊進攻。這種主張是和黨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相反的。

(六) 法帝國主義在俄國十月革命後長期地執行了仇視蘇聯的政策。在十月革命以後不久，法國政府即積極參加了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〇年的十四個國家對於蘇聯的武裝干涉，並且在這次干涉失敗後，仍然繼續執行孤立蘇聯的反動政策。直到一九三五年五月，由於蘇聯和平外交在法國人民中的影響，由於法西斯德國對於法國的威脅，法國才與蘇聯締結了互助協定。但是法國反動政府後來並未忠實執行這個條約。

(七) 參看馬克思、恩格斯「共產黨宣言」第四部分，列寧「社會民主黨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第十二、十三兩部分，「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要讀本」第三章第三節。

(八) 參看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第三部分，「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第二部分，「論列寧主義底幾個問題」第三部分。

(九) 見一九三五年五月斯大林在紅軍學院學生畢業典禮大會上的演說。其原文如下：「人材、幹部是世界上所有一切寶貴資本中最寶貴最有決定意義的資本。必須了解：在我們現時的條件下，「幹部決定一切」。」

(十) 指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黨中央路線和張國燾退却路線之間的分歧。參看「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註二。毛澤東同志在這裏所說的「分歧……已經解決了」，係指紅四方面軍與中央紅軍的會合。至於後來張國燾公開叛黨，墮落爲反革命，那已不是領導路線上的問題，而只是個人的叛變行動了。

實 踐 論

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

(一九三七年七月)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的缺點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生產力是生產的基礎，生產決定分配，分配決定消費，消費決定生產，這就是生產力、生產關係、分配、消費的循環。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在沒有階級的社會中，每個人以社會一員的資格，同其他社會成員協力，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在各種階級的社會中，各階級的社會成員，則又以各種不同的方式，結成一定的生產關係，從事生產活動，以解決人類物質生活問題。這是人的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

人的社會實踐，不限於生產活動一種形式，還有多種其他的形式，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

藝術的活動，總之社會實際生活的一切領域都是社會的人所參加的。因此，人的認識，在物質生活以外，還從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與物質生活密切聯繫），在各種不同程度上，知道人和人的各種關係。其中，尤以各種形式的階級鬥爭，給予人的認識發展以深刻的影響。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社會的生產活動，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因此，人們的認識，不論對於自然界方面，對於社會方面，也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級向高級發展，即由淺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歪曲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在我們黨內，曾經有一部分教條主義的同志長期拒絕中國革命的經驗，否認「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個真理，而只生吞活剝馬克思主義書籍中的隻言片語，去嚇唬人們。還有另一部分經驗主義的同志長期拘守於自身的片斷經驗，不了解理論對於革命實踐的重要性，看不見革命的全局，雖然也是辛苦地——但却是盲目地在工作。這兩類同志的錯誤思想，特別是教條主義思想，曾經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使得中國革命受了極大的損失，而教條主義者却是披著馬克思主義的外衣迷惑了廣大的同志。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是為着用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觀點去揭露黨內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特別是教條主義這些主觀主義的錯誤而寫的。因為重點是揭露看輕實踐的教條主義這種主觀主義，故題為「實踐論」。毛澤東同志曾以這篇論文的觀點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過講演。

只有認識實踐才足
以說明其理性的根據。
只有實踐才能完成
統一時期未能完成的
功。
馬克思是說：知識的
本質，是實踐性、實踐性。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實際的情形是這樣的，只有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物質生產過程中，階級鬥爭過程中，科學實驗過程中），人們達到了思想中所預想的結果時，人們的認識才被證實了。人們要想得到工作的勝利即得到預想的結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於客觀外界的規律性，如果不合，就會在實踐中失敗。人們經過失敗之後，也就從失敗取得教訓，改正自己的思想使之適合於外界的規律性，人們就能變失敗為勝利，所謂『失敗者成功之母』，『吃一塹長一智』，就是這個道理。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把實踐提到第一的地位，認為人的認識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排斥一切否認實踐重要性、使認識離開實踐的錯誤理論。列寧這樣說過：『實踐高於（理論的）認識，因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還有直接現實性的品格。』（二）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辯證唯物論有兩個最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它的階級性，公然申明辯證唯物論是為無產階級服務的；再一個是它的實踐性，強調理論對於實踐的依賴關係，理論的基礎是實踐，又轉過來為實踐服務。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的觀點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三）。

然而人的認識究竟怎樣從實踐發生，而又服務於實踐呢？這只要看一看認識的發展過程就會明瞭的。

原來人在實踐過程中，開始只是看到過程中各個事物的現象方面，看到各個事物的片面，看到各

個事物之間的外部聯繫。例如有些外面的人們到延安來考察，頭一、二天，他們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觸了許多的人，參加了宴會、晚會和羣衆大會，聽到了各種說話，看到了各種文件，這些就是事物的現象，事物的各個片面以及這些事物的外部聯繫。這叫做認識的感性階段，就是感覺和印象的階段。也就是延安這些各別的事物作用於考察團先生們的感官，引起了他們的感覺，在他們的腦子中生起了許多的印象，以及這些印象間的大概的外部的聯繫，這是認識的第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人們還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論理（即合乎邏輯）的結論。

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覆了多次，於是在人們的腦子裏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概念這種東西已經不是事物的現象，不是事物的各個片面，不是它們的外部聯繫，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質，事物的全體，事物的內部聯繫了。概念同感覺，不但是數量上的差別，而且有了性質上的差別。循此繼續，使用判斷和推理的方法，就可產生出合乎論理的結論來。『三國演義』上所謂『眉頭一皺計上心來』，我們普通說話所謂『讓我想一想』，就是人在腦子中運用概念以作判斷和推理的工夫。這是認識的第二個階段。外來的考察團先生們在他們集合了各種材料，加上他們『想了一想』之後，他們就能夠作出『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政策是徹底的、誠懇的和真實的』這樣一個判斷了。在他們作出這個判斷之後，如果他們對於團結救國也是真實的話，那末他們就能夠進一步作出這樣的結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綫是能夠成功的。』這個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人們對於一個事物的整個認識過程中是更重要的階段，也就是理性認

識的階段。認識的真正任務在於經過感覺而到達於思維，到達於逐步了解客觀事物的內部矛盾，了解它的規律性，了解這一過程和那一過程間的內部聯繫，即到達於論理的認識。重複地說，論理的認識所以和感性的認識不同，是因為感性的認識是屬於事物之片面的、現象的、外部聯繫的東西，論理的認識則推進了一大步，到達了事物的全體的、本質的、內部聯繫的東西，到達了暴露周圍世界的內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圍世界的總體上，在周圍世界一切方面的內部聯繫上去把握周圍世界的發展。

這種基於實踐的由淺入深的辯證唯物論的關於認識發展過程的理論，在馬克思主義以前，是沒有一個人這樣解決過的。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第一次正確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唯物地而且辯證地指出了認識的深化的運動，指出了社會的人在他們的生產和階級鬥爭的複雜的、經常反覆的實踐中，由感性認識到論理認識的推移的運動。列寧說過：『物質的抽象，自然規律的抽象，價值的抽象以及其他等等，一句話，一切科學的（正確的、鄭重的、非瞎說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認識過程中兩個階段的特性，在低級階段，認識表現為感性的，在高級階段，認識表現為論理的，但任何階段，都是統一的認識過程中的階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質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離的，它們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不能在封建社會就預先認識資本主義社會

感性認識和理性認識是性質不同的，但這是統一於實踐的基礎。
感覺不能立刻理解，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點也不能離開實踐。無論何人要認識什麼事物，除了同那個事物接觸，即生活於（實踐於）那個事物的環境中，是沒有法子解決的。

的規律，因為資本主義還未出現，還無這種實踐。馬克思主義只能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馬克思不能在自由資本主義時代就預先具體地認識帝國主義時代的某些特異的規律，因為帝國主義這個資本主義最後階段還未到來，還無這種實踐，只有列寧和斯大林才能擔當此項任務。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們的理論，除了他們的天才條件之外，主要地是他們親自參加了當時的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的實踐，沒有這後一個條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在技術不發達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話，在技術發達的現代雖然可以實現這句話，然而真正親知的是天下實踐着的人，那些人在他們的實踐中間取得了『知』，經過文字和技術的傳達而到達於『秀才』之手，秀才乃能間接地『知天下事』。如果要直接地認識某種或某些事物，便只有親身參加於變革現實、變革某種或某些事物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觸到那種或那些事物的現象，也只有在親身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的鬥爭中，才能暴露那種或那些事物的本質而理解它們。這是任何人實際上走着的認識路程，不過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說些反對的話罷了。世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識裏手』，有了道聽途說的一知半解，便自封為『天下第一』，適足見其不自量而已。知識的問題是一個科學問題，來不得半點的虛偽和驕傲，決定地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誠實和謙遜的態度。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組織同性質，你就得實行物理學和化學的實驗，變革原子的情況。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你就得參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從直接經驗發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經驗，事實上多數的知識都是間接經驗的東西，這就

从知识直接经验
何知识即不能直接
直接经验的。

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識。這些知識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經驗的東西，如果在古人外人直接經驗時是符合於列寧所說的條件：『科學的抽象』，是科學地反映了客觀的事物，那末這些知識是可靠的，否則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個人的知識，不外直接經驗的和間接經驗的兩部分。而且在我為間接經驗者，在人則仍為直接經驗。因此，就知識的總體說來，無論何種知識都是不能離開直接經驗的。任何知識的來源，在於人的肉體感官對客觀外界的感覺，否認了這個感覺，否認了直接經驗，否認親自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他就不是唯物論者。『知識裏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是在這個地方。中國人有一句老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句話對於人們的實踐是真理，對於認識論也是真理。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

爲了明瞭基於變革現實的實踐而產生的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認識的逐漸深化的運動，下面再舉出幾個具體的例子。

無產階級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認識，在其實踐的初期——破壞機器和自發鬥爭時期，他們還只在感性認識的階段，只認識資本主義各個現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聯繫。這時，他們還是一個所謂『自在的階級』。但是到了他們實踐的第二個時期——有意識有組織的經濟鬥爭和政治鬥爭的時期，由於實踐，由於長期鬥爭的經驗，經過馬克思、恩格斯用科學的方法把這種種經驗總結起來，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用以教育無產階級，這樣就使無產階級理解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理解了社會階級的剝削關係，理解了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這時他們就變成了一個『自爲的階級』。

中國人民對於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鬥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並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前後才開始的。

我們再來看戰爭。戰爭的領導者，如果他們是一些沒有戰爭經驗的人，對於一個具體的戰爭（例如我們過去十年的土地革命戰爭）的深刻的指導規律，在開始階段是不了解的。他們在開始階段只是身歷了許多作戰的經驗，而且敗仗是打得很多的。然而由於這些經驗（勝仗，特別是敗仗的經驗），使他們能够理解貫串整個戰爭的內部的東西，即那個具體戰爭的規律性，懂得了戰略和戰術，因而能够有把握地去指導戰爭。此時，如果改換一個無經驗的人去指導，又會要在吃了一些敗仗之後（有了經驗之後）才能理解戰爭的正確的規律。

常常聽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務時說出來的一句話：沒有把握。爲什麼沒有把握呢？因爲他對於這項工作的內容和環境沒有規律性的了解，或者他從來就沒有接觸過這類工作，或者接觸得不多，因而無從談到這類工作的規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況和環境給以詳細分析之後，他就覺得比較地有了把握，願意去做這項工作。如果這個人在這項工作中經過了一個時期，他有了這項工作的經驗了，而他又是一個肯虛心體察情況的人，不是一個主觀地、片面地、表面地看問題的人，他就能夠自己做出應該怎樣進行工作的結論，他的工作勇氣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觀地、

片面地和表面地看問題的人，跑到一個地方，不問環境的情況，不看事情的全體（事情的歷史和全部現狀），也不觸到事情的本質（事情的性質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內部聯繫），就自以爲是地發號施令起來，這樣的人是沒有不跌交子的。

由此看來，認識的過程，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於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於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於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

理性認識的階段
才及感性認識

這裏有兩個要點必須着重指明。第一個，在前面已經說過的，這裏再重複說一說，就是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的問題。如果以爲理性認識可以不從感性認識得來，他就是一個唯心論者。哲學史上有所謂『唯理論』一派，就是只承認理性的實在性，不承認經驗的實在性，以爲只有理性靠得住，而感覺的經驗是靠不住的，這一派的錯誤在於顛倒了事實。理性的東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於它來源於感性，否則理性的東西就成了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只是主觀自生的靠不住的東西了。從認識過程的秩序說來，感覺經驗是第一的東西，我們強調社會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意義，就在於只有社會實踐才能使人的認識開始發生，開始從客觀外界得到感覺經驗。一個閉目塞聽、同客觀外界根本絕緣的人，是無所謂認識的。認識開始於經驗——這就是認識論的唯物論。

（第二）是認識有待於深化，認識的感性階段有待於發展到理性階段——這就是認識論的辯證法（三）。如果以爲認識可以停頓在低級的感性階段，以爲只有感性認識可靠，而理性認識是靠不住的，這便是

重複了歷史上的『經驗論』的錯誤。這種理論的錯誤，在於不知道感覺材料固然是客觀外界某些真實性的反映（我這裏不來說經驗只是所謂內省體驗的那種唯心的經驗論），但它們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東西，這種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沒有反映事物本質的。要完全地反映整個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質，反映事物的內部規律性，就必須經過思考作用，將豐富的感覺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的改造製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論的系統，就必須從感性認識躍進到理性認識。這種改造過的認識，不是更空虛了更不可靠了的認識，相反，只要是在認識過程中根據於實踐基礎而科學地改造過的東西，正如列寧所說乃是更深刻、更正確、更完全地反映客觀事物的東西。庸俗的事務主義家不是這樣，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於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

理性認識依賴於感性認識，感性認識有待於發展到理性認識，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哲學上的『唯理論』和『經驗論』都不懂得認識的歷史性或辯證性，雖然各有片面的真理（對於唯物的唯理論和經驗論而言，非指唯心的唯理論和經驗論），但在認識論的全體上則都是錯誤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對於一個小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事物或一件工作的認識）是如此，對於一個大的認識過程（例如對於一個社會或一個革命的認識）也是如此。

然而認識運動至此還沒有完結。辯證唯物論的認識運動，如果只到理性認識為止，那末還只說到問題的一半。而且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說來，還只說到非十分重要的一半。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認

問題，在於不以爲然，
看，心也手改是無用

認知的作用，
兩個飛躍。

之實踐補充其作用也
此說

爲十分重要的問題，不在於懂得了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因而能够解釋世界，而在於拿了這種對於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去能夠地改造世界。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然而馬克思主義看重理論，正是，也僅僅是，因爲它能够指導行動。如果有了正確的理論，只是把它空談一陣，束之高閣，並不實行，那末，這種理論再好也是沒有意義的。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認識的能動作用，不但表現於從感性的認識到理性的認識之能動的飛躍，更重要的還須表現於從理性的認識到革命的實踐這一個飛躍。抓住了世界的規律性的認識，必須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實踐中去，再用到生產的實踐、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以及科學實驗的實踐中去。這就是檢驗理論和發展理論的過程，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繼續。理論的東西之是否符合於客觀真理性這個問題，在前面說的由感性到理性之認識運動中是沒有完全解決的，也不能完全解決的。要完全地解決這個問題，只有把理性的認識再回到社會實踐中去，應用理論於實踐，看它是否能够達到預想的目的。許多自然科學理論之所以被稱爲真理，不但在於自然科學家們創立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爲爾後的科學實踐所證實的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爲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爲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辯證唯物論之所以爲普遍真理，在於經過無論什麼人的實踐都不能逃出它的範圍。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

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所謂實踐是真理的標準，所謂『生活、實踐底觀點，應該是認識論底首先的和基本的觀點』⁽⁷⁾，理由就在這個地方。斯大林說得好：『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同樣，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爲指南，就會變成盲目的實踐。』⁽⁸⁾

說到這裏，認識運動就算完成了嗎？我們的答覆是完成了，又沒有完成。社會的人們投身於變革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實踐中（不論是關於變革某一自然過程的實踐，或變革某一社會過程的實踐），由於客觀過程的反映和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使得人們的認識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體上相應於該客觀過程的法則性的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然後再應用這種思想、理論、計劃或方案於該同一客觀過程的實踐，如果能夠實現預想的目的，即將預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在該同一過程的實踐中變爲事實，或者大體上變爲事實，那末，對於這一具體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例如，在變革自然的過程中，某一工程計劃的實現，某一科學假想的證實，某一器物的製成，某一農產的收穫，在變革社會過程中某一罷工的勝利，某一戰爭的勝利，某一教育計劃的實現，都算實現了預想的目的。然而一般地說來，不論在變革自然或變革社會的實踐中，人們原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毫無改變地實現出來的事，是很少的。這是因爲從事變革現實的人們，常常受着許多的限制，不但常常受着科學條件和技術條件的限制，而且也受着客觀過程的發展及其表現程度的限制（客觀過程的方面及本質尚未充分暴露）。在這種情形之下，由於實踐中發現前所未料的情況，因而部分地改變思想、理論、計劃、方案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變的事也是有的。即是說，原定的

思想、理論、計劃、方案，部分地或全部地不合於實際，部分錯了或全部錯了的事，都是有的。許多時候須反覆失敗過多次，才能糾正錯誤的認識，才能到達於和客觀過程的規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够變主觀的東西爲客觀的東西，即在實踐中得到預想的結果。但是不管怎樣，到了這種時候，人們對於在某一發展階段內的某一客觀過程的認識運動，算是完成了。

然而對於過程的推移而言，人們的認識運動是沒有完成的。任何過程，不論是屬於自然界的和屬於社會的，由於內部的矛盾和鬥爭，都是向前推移向前發展的，人們的認識運動也應跟着推移和發展。依社會運動來說，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如同上面已經說到的，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革命時期情況的變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黨人的認識不能隨之而急速變化，就不能引導革命走向勝利。

然而思想落後於實際的事是常有的，這是因爲人的認識受了許多社會條件的限制的緣故。我們反對革命隊伍中的頑固派，他們的思想不能隨變化了的客觀情況而前進，在歷史上表現爲右傾機會主義。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鬥爭已將客觀過程推向前進了，而他們的認識仍然停止在舊階段。一切頑固黨的思想都有這樣的特徵。他們的思想離開了社會的實踐，他們不能站在社會車輪的前頭充任嚮導的工作，他們只知跟在車子後面怨恨車子走得太快了，企圖把它向後拉，開倒車。

我們也反對『左』翼空談主義。他們的思想超過客觀過程的一定發展階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則把僅在將來有現實可能性的理想，勉強地放在現時來做，離開了當前大多數人的實踐，離開了當前的現實性，在行動上表現爲冒險主義。

唯心論和機械唯物論，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都是以主觀和客觀相分裂，以認識和實踐相脫離爲特徵的。以科學的社會實踐爲特徵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不能不堅決反對這些錯誤思想。馬克思主義者承認，在絕對的總的宇宙發展過程中，各個具體過程的發展都是相對的，因而在絕對真理的長河中，人們對於在每個一定發展階段上的具體過程的認識只具有相對的真理性。無數相對的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客觀過程的發展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人的認識運動的發展也是充滿着矛盾和鬥爭的發展。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後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社會實踐中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是無窮的，人的認識的發生、發展和消滅的過程也是無窮的。根據於一定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以從事於變革客觀現實的實踐，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們對於客觀現實的認識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我們的結論是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反對一切離開具體歷史的『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

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

其政黨的肩。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爲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鬥爭，包括實現下述的任務：改造客觀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係。地球上已經有一部分實行了這種改造，這就是蘇聯。他們還正在促進這種改造過程。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也都在或將要通過這樣的改造過程。所謂被改造的客觀世界，其中包括了一切反對改造的人們，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過強迫的階段，然後才能進入自覺的階段。世界到了全人類都自覺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時候，那就是世界的共產主義時代。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覆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

〔註釋〕

〔一〕 此段引自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二〕 參看馬克思「費爾巴哈論綱」和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二章第六節。

〔三〕 此段引自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四〕裏手，湖南方言，內行的意思。

〔五〕參看列寧在「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所說：「爲了理解，必須在經驗上開始理解，研究，從經驗升高到一般。」

〔六〕引自列寧「做什麼？」第一章第四節。

〔七〕引自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參看該書第二章第六節。

〔八〕引自斯大林「論列寧主義基礎」。參看該書第三部分。

〔九〕參看列寧「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第二章第五節。

矛盾論

(一九三七年八月)

事物的矛盾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唯物辯證法的最根本的法則。列寧說：『就本來的意義講，辯證法是研究對象的本質自身中的矛盾。』〔二〕列寧常稱這個法則為辯證法的本質，又稱之為辯證法的核心〔三〕。因此，我們在研究這個法則時，不得不涉及廣泛的方面，不得不涉及許多的哲學問題。如果我們將這些問題都弄清楚了，我們就在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辯證法。這些問題是：兩種宇宙觀；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蘇聯哲學界在最近數年中批判了德波林學派的唯心論，這件事引起了我們的極大的興趣。德波林的唯心論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極壞的影響，我們黨內的教條主義思想不能說和這個學派的作風沒有關係。因此，我們現在的哲學研究工作，應當以掃除教條主義思想為主要的目標。

一 兩種宇宙觀

在人類的認識史中，從來就有關於宇宙發展法則的兩種見解，一種是形而上學的見解，一種是辯證法的見解，形成了互相對立的兩種宇宙觀。列寧說：『對於發展（進化）所持的兩種基本的（或兩種可能的？或兩種在歷史上常見的？）觀點是：（一）認為發展是減少和增加，是重複；（二）認為發展是對立的統一（統一物分成兩個互相排斥的對立，而兩個對立又互相關聯着）。』^{〔一〕}列寧說的就是這兩種不同的宇宙觀。

形而上學，亦稱玄學。這種思想，無論在中國，在歐洲，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間內，是屬於唯心論的宇宙觀，並在人們的思想中佔了統治的地位。在歐洲，資產階級初期的唯物論，也是形而上學的。由於歐洲許多國家的社會經濟情況進到了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階段，生產力、階級鬥爭和科學均發展到了歷史上未有過的水平，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歷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因而產生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於是，在資產階級那裏，除了公開的極端露骨的反動的唯心論之外，還出現了庸俗的進化論，出來對抗唯物辯證法。

* 這篇哲學論文，是毛澤東同志繼『實踐論』之後，爲了同一的目的，即爲了克服存在於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曾在延安的抗日軍事政治大學作過講演。在收入本書的時候，作者作了部分的補充、刪節和修改。

所謂形而上學的或庸俗進化論的宇宙觀，就是用孤立的、靜止的和片面的觀點去看世界。這種宇宙觀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態和種類，都看成是永遠彼此孤立和永遠不變化的。如果說有變化，也只是數量的增減和場所的變更。而這種增減和變更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內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於外力的推動。形而上學家認為，世界上各種不同事物和事物的特性，從它們一開始存在的時候就是如此。後來的變化，不過是數量上的擴大或縮小。他們認為一種事物永遠只能反覆地產生為同樣的事物，而不能變化為另一種不同的事物。在形而上學家看來，資本主義的剝削，資本主義的競爭，資本主義社會的個人主義思想等，就是在古代的奴隸社會裏，甚至在原始社會裏，都可以找得出來，而且會要永遠不變地存在下去。說到社會發展的原因，他們就用社會外部的地理、氣候等條件去說明。他們簡單地從事物外部去找發展的原因，否認唯物辯證法所主張的事物因內部矛盾引起發展的學說。因此，他們不能解釋事物的質的多樣性，不能解釋一種質變為他種質的現象。這種思想，在歐洲，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是機械唯物論，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則有庸俗進化論。在中國，則有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的思想，曾經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近百年來輸入了歐洲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則為資產階級所擁護。

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主張從事物的內部、從一事物對他事物的關係去研究事物的發展，即把事物的發展看做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運動，而每一事物的運動都和它的周圍其他事物互相聯繫着和互相影響着。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

的內部，在於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這種矛盾性，因此引起了事物的運動和發展。事物內部的這種矛盾性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聯繫和互相影響則是事物發展的第二位的原因。這樣，唯物辯證法就有力地反對了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論和庸俗進化論的外因論或被動論。這是清楚的，單純的外部原因只能引起事物的機械的運動，即範圍的大小，數量的增減，不能說明事物何以有性質上的千差萬別及其互相變化。事實上，即使是外力推動的機械運動，也要通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動物的單純的增長，數量的發展，主要地也是由於內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樣，社會的發展，主要地不是由於外因而是由於內因。許多國家在差不多一樣的地理和氣候的條件下，它們發展的差異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個國家吧，在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的情形下，社會的變化却是很大的。帝國主義的俄國變為社會主義的蘇聯，封建的閉關鎖國的日本變為帝國主義的日本，這些國家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長期地被封建制度統治的中國，近百年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現在正在變化到一個自由解放的新中國的方向去，中國的地理和氣候並沒有變化。整個地球及地球各部分的地理和氣候也是變化着的，但以它們的變化和社會的變化相比較，則顯得很微小，前者是以若干萬年為單位而顯現其變化的，後者則在幾千年、幾百年、幾十年、甚至幾年或幾個月（在革命時期）內就顯現其變化了。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自然界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自然界內部矛盾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主要地是由於社會內部矛盾的發展，即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新舊之間的矛盾，由於這些矛盾的發展，推動了社會的前進，推動了新舊社會的代謝。唯物

辯證法是否排除外部的原因呢？並不排除。唯物辯證法認為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雞蛋因得適當的溫度而變化為雞子，但溫度不能使石頭變為雞子，因為二者的根據是不同的。各國人民之間的互相影響是時常存在的。在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在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各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的互相影響和互相激動，是極其巨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不只是開創了俄國歷史的新紀元，而且開創了世界歷史的新紀元，影響到世界各國內部的變化，同樣地而且還特別深刻地影響到中國內部的變化，但是這種變化是通過了各國內部和中國內部自己的規律性而起的。兩軍相爭，一勝一敗，所以勝敗，皆決於內因。勝者或因其強，或因其指揮無誤，敗者或因其弱，或因其指揮失宜，外因通過內因而引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國大資產階級戰敗了無產階級，是通過中國無產階級內部的（中國共產黨內部的）機會主義而起作用的。當着我們清算了這種機會主義的時候，中國革命就重新發展了。後來，中國革命又受了敵人的嚴重的打擊，是因為我們黨內產生了冒險主義。當着我們清算了這種冒險主義的時候，我們的事業就又重新發展了。由此看來，一個政黨要引導革命到勝利，必須依靠自己政治路線的正確和組織上的鞏固。

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在歐洲，在古代就產生了。但是古代的辯證法帶着自發的樸素的性質，根據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還不可能有完備的理論，因而不能完全解釋宇宙，後來就被形而上學所代替。生活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期的德國著名哲學家黑格爾，對於辯證法曾經給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他的辯證法却是唯心的辯證法。直到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的活動家馬克思和恩格斯

綜合了人類認識史的積極的成果，特別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合理部分，創造了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這個偉大的理論，才在人類認識史上起了一個空前的大革命。後來，經過列寧和斯大林，又發展了這個偉大的理論。這個理論一經傳到中國來，就在中國思想界引起了極大的變化。

這個辯證法的宇宙觀，主要地就是教導人們要善於去觀察和分析各種事物的矛盾的運動，並根據這種分析，指出解決矛盾的方法。因此，具體地了解事物矛盾這一個法則，對於我們是非常重要的。

二 矛盾的普遍性

爲了敘述的便利起見，我在這裏先說矛盾的普遍性，再說矛盾的特殊性。這是因爲馬克思主義的偉大的創造者和繼承者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他們發現了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已經把唯物辯證法應用在人類歷史的分析和自然歷史的分析的許多方面，應用在社會的變革和自然的變革（例如在蘇聯）的許多方面，獲得了極其偉大的成功，矛盾的普遍性已經被很多人所承認，因此，關於這個問題只需要很少的話就可以說明白；而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則還有很多的同志，特別是教條主義者，弄不清楚。他們不了解矛盾的普遍性即寓於矛盾的特殊性之中。他們也不了解研究當前具體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對於我們指導革命實踐的發展有何等重要的意義。因此，關於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應當着重地加以研究，並用足夠的篇幅加以說明。爲了這個緣故，當着我們分析事物矛盾的法則

的時候，我們就先來分析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然後再着重地分析矛盾的特殊性的問題，最後仍歸到矛盾的普遍性的問題。

矛盾的普遍性或絕對性這個問題有兩方面的意義。其一是說，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其二是說，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

恩格斯說：『運動本身就是矛盾。』（三）列寧對於對立統一法則所下的定義，說它就是『承認（發現）自然界（精神和社會兩者也在內）的一切現象和過程都含有互相矛盾、互相排斥、互相對立的趨向』（四）。這些意見是對的嗎？是對的。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鬥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展。沒有什麼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

矛盾是簡單的運動形式（例如機械性的運動）的基礎，更是複雜的運動形式的基礎。

恩格斯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如果簡單的機械的移動本身包含着矛盾，那末，物質的更高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着矛盾。……生命首先就在於：生物在每一個瞬間是它自身，但却是別的什麼。所以，生命也是存在於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並自行解決的矛盾；這一矛盾一停止，生命亦即停止，於是死就來到。同樣，我們看到了，在思維的範圍以內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並且我們看到了，例如，人的內部無限的認識能力與此種認識能力僅在外部被局限的而且認識上也被局限的個別人們身上的實際的實現二者之間的矛盾，是在人類世代的無窮的——至少對於我們，實際上是無窮的——連續系列之中，是在無窮的前進運動之中解決的。』

『高等數學的主要基礎之一，就是矛盾……』

『就是初等數學，也充滿着矛盾。……』(C)

列寧也這樣說明過矛盾的普遍性：『在數學中，正和負，微分和積分。

在力學中，作用和反作用。

在物理學中，陽電和陰電。

在化學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會科學中，階級鬥爭。』(C)

戰爭中的攻守，進退，勝敗，都是矛盾着的現象。失去一方，他方就不存在。雙方鬥爭而又聯結，組成了戰爭的總體，推動了戰爭的發展，解決了戰爭的問題。

人的概念的每一差異，都應把它看作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客觀矛盾反映入主觀的思想，組成了概念的矛盾運動，推動了思想的發展，不斷地解決了人們的思想問題。

黨內不同思想的對立和鬥爭是經常發生的，這是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新舊事物的矛盾在黨內的反映。黨內如果沒有矛盾和解決矛盾的思想鬥爭，黨的生命也就停止了。

由此看來，不論是簡單的運動形式，或複雜的運動形式，不論是客觀現象，或思想現象，矛盾是普遍地存在着，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這一點已經弄清楚了。但是每一過程的開始階段，是否也有矛盾存在呢？是否每一事物的發展過程具有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呢？

從蘇聯哲學界批判德波林學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學派有這樣一種見解，他們認為矛盾不是一開始就在過程中出現，須待過程發展到一定的階段才出現。那末，在那一時間以前，過程發展的原因不是由於內部的原因，而是由於外部的原因了。這樣，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學的外因論和機械論去了。拿這種見解去分析具體的問題，他們就看見在蘇聯條件下富農和一般農民之間只有差異，並無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見。在分析法國革命時，他們就認為在革命前，工農資產階級合組的第三等級中，也只有差異，並無矛盾。德波林學派這類見解是反馬克思主義的。他們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異中就已經包含着矛盾，差異就是矛盾。勞資之間，從兩階級發生的時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僅僅還沒有激化而已。工農之間，即使在蘇聯的社會條件下，也有差異，它們的差異就是矛盾，僅僅不會激化成爲對抗，不取階級鬥爭的形態，不同於勞資間的矛盾；它們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形成鞏固的聯盟，並在由社會主義走向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地解決這個矛盾。這是矛盾的差別性的問題，不是矛盾的有無的問題。矛盾是普遍的、絕對的，存在於事物發展的一切過程中，又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

新過程的發生是什麼呢？這是舊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份讓位於新的統一和組成此統一的對立成份，於是新過程就代替舊過程而發生。舊過程完結了，新過程發生了。新過程又包含着新矛盾，開始它自己的矛盾發展史。

事物發展過程的自始至終的矛盾運動，列寧指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模範地作了這樣的分

析。這是研究任何事物發展過程所必須應用的方法。列寧自己也正確地應用了它，貫徹於他的全部著作中。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的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裏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基本的、最常見的、最平常的、碰到億萬次的關係——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在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之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之中）暴露了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後的敘述又向我們表明了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各個部分總和的自始至終的發展（增長與運動兩者）。』

列寧說了上面的話之後，接着說道：『這應該是一般辯證法的……敘述（以及研究）方法。』^{（2）}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學會這個方法，才能正確地分析中國革命的歷史和現狀，並推斷革命的將來。

三 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發展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每一事物發展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前面已經說過了。現在來說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

這個問題，應從幾種情形中去研究。

首先是各種物質運動形式中的矛盾，都帶特殊性。人的認識物質，就是認識物質的運動形式，因為除了運動的物質以外，世界上什麼也沒有，而物質的運動則必取一定的形式。對於物質的每一種運

動形式，必須注意它和其他各種運動形式的共同點。但是，尤其重要的，成爲我們認識事物的基礎的東西，則是必須注意它的特殊點，就是說，注意它和其他運動形式的質的區別。只有注意了這一點，才有可能區別事物。任何運動形式，其內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這種特殊的矛盾，就構成一事物區別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這就是世界上諸種事物所以有千差萬別的內在的原因，或者叫做根據。自然界存在着許多的運動形式，機械運動、發聲、發光、發熱、電流、化分、化合等等都是。所有這些物質的運動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又是本質上互相區別的。每一物質的運動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質，爲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規定。這種情形，不但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在社會現象和思想現象中也是同樣地存在着。每一種社會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

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因此，對於某一現象的領域所特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例如，數學中的正數和負數，機械學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學中的陰電和陽電，化學中的化分和化合，社會科學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階級和階級的互相鬥爭，軍事學中的攻擊和防禦，哲學中的唯心論和唯物論、形而上學觀和辯證法觀等等，都是因爲具有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質，才構成了不同的科學研究的對象。固然，如果不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普遍的原因或普遍的根據；但是，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無從確定一事物不同於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質，就無從發現事物運動發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據，也就無從辨別事物，無從區分科學研究的領域。

就人類認識運動的秩序說來，總是由認識個別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擴大到認識一般的事物。

人們總是首先認識了許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質，然後才有可能更進一步地進行概括工作，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當着人們已經認識了這種共同的本質以後，就以這種共同的認識爲指導，繼續地向着尚未研究過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各種具體的事物進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質，這樣才可以補充、豐富和發展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而使這種共同的本質的認識不致變成枯槁的和僵死的東西。這是兩個認識的過程：一個是由特殊到一般，一個是由一般到特殊。人類的認識總是這樣

循環往覆地進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環（只要是嚴格地按照科學的方法）都可能使人類的認識提高一步，使人類的認識不斷地深化。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就是，一方面，不懂得必須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認識各別事物的特殊的本質，才有可能充分地認識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認識諸種事物的共同的本質；另一方面，不懂得在我們認識了事物的共同的本質以後，還必須繼續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過的或者新冒出來的具體的事物。我們的教條主義者是懶漢，他們拒絕對於具體事物做任何艱苦的研究工作，他們把一般真理看成是憑空出現的東西，把它變成爲人們所不能夠捉摸的純粹抽象的公式，完全否認了並且顛倒了這個人類認識真理的正常秩序。他們也不懂得人類認識的兩個過程的互相聯結——由特殊到一般，又由一般到特殊，他們完全不懂得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

不但要研究每一個大系統的物質運動形式的特殊的矛盾性及其所規定的本質，而且要研究每一個物質運動形式在其發展長途中的每一個過程的特殊的矛盾及其本質。一切運動形式的每一個實在

的非臆造的發展過程內，都是不同質的。我們的研究工作必須着重這一點，而且必須從這一點開始。

不同質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質的方法才能解決。例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用社會主義革命的方法去解決；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決；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戰爭的方法去解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矛盾，用農業集體化和農業機械化的方法去解決；共產黨內的矛盾，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去解決；社會和自然的矛盾，用發展生產力的方法去解決。過程變化，舊過程和舊矛盾消滅，新過程和新矛盾發生，解決矛盾的方法也因之而不同。俄國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所解決的矛盾及其所用以解決矛盾的方法是根本上不相同的。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嚴格地遵守的一個原則。教條主義者不遵守這個原則，他們不了解諸種革命情況的區別，因而也不了解應當用不同的方法去解決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種自以爲不可改變的公式到處硬套，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將本來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壞。

爲要暴露事物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在其總體上、在其相互聯結上的特殊性，就是說暴露事物發展過程的本質，就必須暴露過程中矛盾各方面的特殊性，否則暴露過程的本質成爲不可能，這也是我們作研究工作時必須十分注意的。

一個大的事物，在其發展過程中，包含着許多的矛盾。例如，在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有中國社會各被壓迫階級和帝國主義的矛盾，有人民大眾和封建制度的矛盾，有無產階級和資產階

級的矛盾，有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矛盾等等，情形是非常複雜的。這些矛盾，不但各有各的特殊性，不能一律看待，而且每一矛盾的兩方面，又各有其特點，也是不能一律看待的。我們從事中國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個矛盾的總體上，即矛盾的相互聯結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從矛盾的各個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總體。所謂了解矛盾的各個方面，就是了解它們每一方面各佔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種具體形式和對方發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關係，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後，又各用何種具體的方法和對方作鬥爭。研究這些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事情。列寧說：馬克思主義的最本質的東西，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就在於具體地分析具體的情況（三〇）。就是說的這個意思。我們的教條主義者違背列寧的指示，從來不用腦筋具體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說來，總是空洞無物的八股調，在我們黨內造成了一種極壞的作風。

研究問題，忌帶主觀性、片面性和表面性。所謂主觀性，就是不知道客觀地看問題，也就是不知道用唯物的觀點去看問題。這一點，我在『實踐論』一文中已經說過了。所謂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問題。例如：只了解中國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產黨一方，不了解國民黨一方，只了解無產階級一方，不了解資產階級一方，只了解農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順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難情形一方，只了解過去一方，不了解將來一方，只了解個體一方，不了解總體一方，只了解缺點一方，不了解成績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

了解革命的公開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話，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點。這就叫做片面地看問題。或者叫做只看見局部，不看見全體，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這樣，是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務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確地發展黨內的思想鬥爭的。孫子論軍事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一)他說的是作戰的雙方。唐朝人魏徵說過：『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二)也懂得片面性不對。可是我們的同志看問題，往往帶片面性，這樣的人就往往碰釘子。『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三)，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熱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佈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裏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列寧說：『要真正地認識對象，就必須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聯繫和「媒介」。我們決不會完全地作到這一點，可是要求全面性，將使我們防止錯誤，防止僵化。』^(四)我們應該記得他的話。表面性，是對矛盾總體和矛盾各方的特點都不去看，否認深入事物裏面精細地研究矛盾特點的必要，僅僅站在那裏遠遠地望一望，粗枝大葉地看到一點矛盾的形相，就想動手去解決矛盾（答覆問題、解決糾紛、處理工作、指揮戰爭）。這樣的做法，沒有不出亂子的。中國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的同志們所以犯錯誤，就是因為他們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觀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片面性、表面性也是主觀性，因為一切客觀事物本來是互相聯繫的和具有內部規律的，人們不去如實地反映這些情況，而只是片面地或表面地去看它們，不認識事物的互相聯繫，不認識事物的內部

規律，所以這種方法是主觀主義的。

不但事物發展的全過程中的矛盾運動，在其相互聯結上，在其各方情況下，我們必須注意其特點，而且在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也有其特點，也必須注意。

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及爲此根本矛盾所規定的過程的本質，非到過程完結之日，是不會消滅的；但是事物發展的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的階段，情形又往往互相區別。這是因爲事物發展過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質和過程的本質雖然沒有變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長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採取了逐漸激化的形式。並且，被根本矛盾所規定或影響的許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暫時地或局部地解決了，或者緩和了，又有些是發生了，因此，過程就顯出階段性來。如果人們不去注意事物發展過程中的階段性，人們就不能適當地處理事物的矛盾。

例如，自由競爭時代的資本主義發展爲帝國主義，這時，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根本矛盾着的階級的性質和這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本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兩階級的矛盾激化了，獨佔資本和自由資本之間的矛盾發生了，宗主國和殖民地的矛盾激化了，各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即由各國發展不平衡的狀態而引起的矛盾特別尖銳地表現出來了，因此形成了資本主義的特殊階段，形成了帝國主義階段。列寧主義之所以成爲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因爲列寧和斯大林正確地說明了這些矛盾，並正確地作出了解決這些矛盾的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和策略。

拿從辛亥革命開始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的情形來看，也有了若干特殊階段。特別是在

資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和在無產階級領導時期的革命，區別爲兩個很大不同的歷史階段。這就是：由於無產階級的領導，根本地改變了革命的面貌，引出了階級關係的新調度，農民革命的大發動，反帝國主義和反封建主義的革命徹底性，由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的可能性，等等。所有這些，都是在資產階級領導革命時期不可能出現的。雖然整個過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質，過程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質（其反面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並沒有變化；但是，在這長時間中，經過了辛亥革命失敗和北洋軍閥統治，第一次民族統一戰綫的建立和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統一戰綫破裂和資產階級轉入反革命，新的軍閥戰爭，土地革命戰爭，第二次民族統一戰綫建立和抗日戰爭等等大事變，二十多年間經過了幾個發展階段。在這些階段中，包含着有些矛盾激化了（例如土地革命戰爭和日本侵入東北四省），有些矛盾部分地或暫時地解決了（例如北洋軍閥的被消滅，我們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有些矛盾重新發生了（例如新軍閥之間的鬥爭，南方各革命根據地喪失後地主又重新收回土地）等等特殊的情形。

研究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不但必須在其聯結上、在其總體上去看，而且必須從各個階段中矛盾的各個方面去看。

例如國共兩黨。國民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綫時期，因爲它實行了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援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所以它是革命的、有朝氣的，它是各階級的民主革命的聯盟。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變到了與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資產階級的反動集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後又

開始向停止內戰、聯合共產黨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這個方面轉變。這就是國民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當然有種種的原因。中國共產黨方面，在第一次統一戰綫時期，它是幼年的黨，它英勇地領導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但在對於革命的性質、任務和方法的認識方面，却表現了它的幼年性，因此在這次革命的後期所發生的陳獨秀主義能够起作用，使這次革命遭受了失敗。一九二七年以後，它又英勇地領導了土地革命戰爭，創立了革命的軍隊和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它也犯過冒險主義的錯誤，使軍隊和根據地都受了很大的損失。一九三五年以後，它又糾正了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了新的抗日的統一戰綫，這個偉大的鬥爭現在正在發展。在這個階段上，共產黨是一個經過了兩次革命的考驗、有了豐富的經驗的黨。這些就是中國共產黨在三個階段上的特點。形成這些特點也有種種的原因。不研究這些特點，就不能了解兩黨在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特殊的相互關係：統一戰綫的建立，統一戰綫的破裂，再一個統一戰綫的建立。而要研究兩黨的種種特點，更根本的就必須研究這兩黨的階級基礎以及因此在各個時期所形成的它們和其他方面的矛盾的對立。例如，國民黨在它第一次聯合共產黨的時期，一方面有和國外帝國主義的矛盾，因而它反對帝國主義；另一方面有和國內人民大眾的矛盾，它在口頭上雖然允許給予勞動人民以許多的利益，但在實際上則只給予很少的利益，或者簡直什麼也不給。在它進行反共戰爭的時期，則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合作反對人民大眾，一筆勾銷了人民大眾原來在革命中所爭得的一切利益，激化了它和人民大眾的矛盾。現在抗日時期，國民黨和日本帝國主義有矛盾，它一面要聯合共產黨，同時它對共產黨和國內人民並不放鬆其

在的抗日時期，由於國民黨表示抗日，它對國民黨和國內封建勢力，也就採取了緩和的政策。由於這些情況，所以或者造成了兩黨的聯合，或者造成了兩黨的鬥爭，而且即使在兩黨聯合的時期也有又聯合又鬥爭的複雜的情況。如果我們不去研究這些矛盾方面的特點，我們就不但不能了解這兩個黨各各和其他方面的關係，也不能了解兩黨之間的相互關係。

由此看來，不論研究何種矛盾的特性——各個物質運動形式的矛盾，各個運動形式在各個發展過程中的矛盾，各個發展過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個發展過程在其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以及各個發展階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研究所有這些矛盾的特性，都不能帶主觀隨意性，必須對它們實行具體的分析。離開具體的分析，就不能認識任何矛盾的特性。我們必須時刻記得列寧的話：對於具體的事物作具體的分析。

這種具體的分析，馬克思、恩格斯首先給了我們以很好的模範。

當馬克思、恩格斯把這事物矛盾的法則應用到社會歷史過程的研究的時候，他們看出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看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以及由於這些矛盾所產生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及思想等上層建築之間的矛盾，而這些矛盾如何不可避免地會在各種不同的階級社會中，引出各種不同的社會革命。

馬克思把這一法則應用到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結構的研究的時候，他看出這一社會的基本矛盾在

於生產的社會性和佔有制的私人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表現於在各別企業中的生產的有組織性和在全社會中的生產的無組織性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的階級表現則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

由於事物範圍的極其廣大，發展的無限性，所以，在一定場合爲普遍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爲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場合爲特殊性的東西，而在另一一定場合則變爲普遍性。資本主義制度所包含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佔有制的矛盾，是所有有資本主義的存在和發展的各國所共有的東西，對於資本主義說來，這是矛盾的普遍性。但是資本主義的這種矛盾，乃是一般階級社會發展在一定歷史階段上的東西，對於一般階級社會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說來，這是矛盾的特殊性。然而，當着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社會這一切矛盾的特殊性解剖出來之後，同時也就更進一步地、更充分地、更完全地把一般階級社會中這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的普遍性闡發出來了。

由於特殊的事物是和普遍的事物聯結的，由於每一個事物內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即存在於特殊性之中，所以，當着我們研究一定事物的時候，就應當去發現這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內部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兩方面及其互相聯結，發現一事物和它以外的許多事物的互相聯結。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書中說明列寧主義的歷史根源的時候，他分析了列寧主義所由產生的國際環境，分析了在帝國主義條件下已經發展到極點的資本主義的諸矛盾，以及這些矛盾使無產階級革命成爲直接實踐的問題，並造成了直接衝擊資本

主義的良好條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爲什麼俄國成爲列寧主義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國當時是帝國主義一切矛盾的集合點以及俄國無產階級所以能够成爲國際的革命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的原因。這樣，斯大林分析了帝國主義的矛盾的普遍性，說明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又分析了沙俄帝國主義在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說明俄國成了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策略的故鄉，而在這種特殊性中間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這種分析，給我們提供了認識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聯結的模範。

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地列寧和斯大林，他們對於應用辯證法到客觀現象的研究的時候，總是指導人們不要帶上任何的主觀隨意性，而必須從客觀的實際運動所包含的具體的條件，去看出這些現象中的具體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體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體的相互關係。我們的教條主義者因爲沒有這種研究態度，所以弄得一無是處。我們必須以教條主義的失敗爲鑑戒，學會這種研究態度，捨此沒有第二種研究法。

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關係，就是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的關係。其共性是矛盾存在於一切過程中，並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矛盾即是運動，即是事物，即是過程，也即是思想。否認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認了一切。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絕對性。然而這種共性，即包含於一切個性之中，無個性即無共性。假如除去一切個性，還有什麼共性呢？因爲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個性。一切個性都是有條件地暫時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對的。

這一共性個性、絕對相對的道理，是關於事物矛盾的問題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於拋棄了辯證法。

四 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還有兩種情形必須特別地提出來加以分析，這就是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在複雜的事物的發展過程中，有許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種是主要的矛盾，由於它的存在和發展，規定或影響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發展。

例如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矛盾着的力量是主要的矛盾；其他的矛盾力量，例如，殘存的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農民小資產者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無產階級和農民小資產者的矛盾，自由資產階級和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法西斯主義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相互間的矛盾，帝國主義和殖民地的矛盾，以及其他的矛盾，都爲這個主要的矛盾力量所規定、所影響。

半殖民地的國家如中國，其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關係呈現着複雜的情況。

當着帝國主義向這種國家舉行侵略戰爭的時候，這種國家的內部各階級，除開一些叛國分子以

外，能够暫時地團結起來舉行民族戰爭去反對帝國主義。這時，帝國主義和這種國家之間的矛盾成爲主要的矛盾，而這種國家內部各階級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眾之間這個主要矛盾在內），便都暫時地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中國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戰爭和目前的中日戰爭，都有這種情形。

然而在另一種情形之下，則矛盾的地位起了變化。當着帝國主義不是用戰爭壓迫而是用政治、經濟、文化等比較溫和的形式進行壓迫的時候，半殖民地國家的統治階級就會向帝國主義投降，二者結成同盟，共同壓迫人民大眾。這種時候，人民大眾往往採取國內戰爭的形式，去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階級的同盟，而帝國主義則往往採取間接的方式去援助半殖民地國家的反動派壓迫人民，而不採取直接行動，顯出了內部矛盾的特別尖銳性。中國的辛亥革命戰爭，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一九二七年以後的十年土地革命戰爭，都有這種情形。還有半殖民地國家各個反動的統治集團之間的內戰，例如在中國的軍閥戰爭，也屬於這一類。

當着國內革命戰爭發展到從根本上威脅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內反動派的存在的時候，帝國主義就往往採取上述方法以外的方法，企圖維持其統治；或者分化革命陣綫的內部，或者直接出兵援助國內反動派。這時，外國帝國主義和國內反動派完全公開地站在一個極端，人民大眾則站在另一極端，成爲一個主要矛盾，而規定或影響其他矛盾的發展狀態。十月革命後各資本主義國家援助俄國反動派，是武裝干涉的例子。一九二七年的蔣介石的叛變，是分化革命陣綫的例子。

然而不管怎樣，過程發展的各個階段中，只有一種主要的矛盾起着領導的作用，是完全沒有疑義的。

由此可知，任何過程如果有多數矛盾存在的話，其中必定有一種是主要的，起着領導的、決定的作用，其他則處於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過程，如果是存在着兩個以上矛盾的複雜過程的話，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這個主要矛盾，一切問題就迎刃而解了。這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社會告訴我們的方法。列寧和斯大林研究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總危機的時候，列寧和斯大林研究蘇聯經濟的時候，也告訴了這種方法。萬千的學問家和實行家，不懂得這種方法，結果如墮煙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決矛盾的方法。

不能把過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須把它們區別爲主要的和次要的兩類，着重於捉住主要的矛盾，已如上述。但是在各種矛盾之中，不論是主要的或次要的，矛盾着的兩個方面，又是否可以平均看待呢？也是不可以的。無論什麼矛盾，矛盾的諸方面，其發展是不平衡的。有時候似乎勢均力敵，然而這只是暫時的和相對的情形，基本的形態則是不平衡。矛盾着的兩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謂矛盾起主導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

然而這種情形不是固定的，矛盾的主要和非主要的方面互相轉化着，事物的性質也就隨着起變化。在矛盾發展的一定過程或一定階段上，主要方面屬於甲方，非主要方面屬於乙方；到了另一發展

我們常常說『新陳代謝』這句話。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依事物本身的性質和條件，經過不同的飛躍形式，一事物轉化爲他事物，就是新陳代謝的過程。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爲一系列的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上升爲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變成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而一當新的方面對於舊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時候，舊事物的性質就變化爲新事物的性質。由此可見，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變化，事物的性質也就隨着起變化。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主義已從舊的封建主義社會時代的附庸地位，轉化成了取得支配地位的力量，社會的性質也就由封建主義的變爲資本主義的。在新的資本主義社會時代，封建勢力則由原來處在支配地位的力量轉化爲附庸的力量，隨着也就逐步地歸於消滅了，例如英法諸國就是如此。隨着生產力的發展，資產階級由新的起進步作用的階級，轉化爲舊的起反動作用的階級，以至於最後被無產階級所推翻，而轉化爲私有的生產資料被剝奪和失去權力的階級，這個階級也就要逐步歸於消滅了。人數比資產階級多得多，並和資產階級同時生長，但被資產階級統治着的無產階級，是一個新的力量，它由初期的附屬於資產階級的地位，逐步地壯大起來，成爲獨立的和在歷史上起主導作用的

階級，以至最後奪取政權成爲統治階級。這時，社會的性質，就由舊的資本主義的社會轉化成了新的社會主義的社會。這就是蘇聯已經走過和一切其他國家必然要走的道路。

就中國的情形來說，帝國主義處在形成半殖民地這種矛盾的主要地位，壓迫中國人民，中國則由獨立國變爲半殖民地。然而事情必然會變化，在雙方鬥爭的局勢中，中國人民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所生長起來的力量必然會把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爲獨立國，而帝國主義則將被打倒，舊中國必然要變爲新中國。

舊中國變爲新中國，還包含着國內舊的封建勢力和新的人民勢力之間的情況的變化。舊的封建地主階級將被打倒，由統治者變爲被統治者，這個階級也就會要逐步歸於消滅。人民則將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由被統治者變爲統治者。這時，中國社會的性質就會起變化，由舊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會變爲新的民主的社會。

這種互相轉化的事情，過去已有經驗。統治中國將近三百年的滿清帝國，曾在辛亥革命時期被打倒；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同盟會，則曾經一度取得了勝利。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戰爭中，共產黨和國民黨聯合的南方革命勢力，曾經由弱小的力量變得強大起來，取得了北伐的勝利；而稱雄一時的北洋軍閥則被打倒了。一九二七年，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力量，受了國民黨反動勢力的打擊，變得很小了；但因肅清了自己內部的機會主義，就又逐步地壯大起來。在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根據地內，農民由被統治者轉化爲統治者，地主則作了相反的轉化。世界上總是這樣以新的代替舊的，總

是這樣新陳代謝、除舊布新或推陳出新的。

革命鬥爭中的某些時候，困難條件超過順利條件，在這種時候，困難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順利是其次要方面。然而由於革命黨人的努力，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難，開展順利的新局面，困難的局面讓位於順利的局面。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失敗後的情形，中國紅軍在長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現在的中日戰爭，中國又處在困難地位，但是我們能够改變這種情況，使中日雙方的情況發生根本的變化。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順利也能轉化為困難，如果是革命黨人犯了錯誤的話。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勝利，變為失敗了。一九二七年以後在南方各省發展起來的革命根據地，至一九三四年都失敗了。

研究學問的時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當着我們剛才開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無知或知之不多的情況，和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之間，互相矛盾着。然而由於努力學習，可以由無知轉化為有知，由知之不多轉化為知之甚多，由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盲目性改變為能够自由運用馬克思主義。

有人覺得有些矛盾並不是這樣。例如，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生產力是主要的，理論和實踐的矛盾，實踐是主要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經濟基礎是主要的，它們的地位並不互相轉化。這是機械唯物論的見解，不是辯證唯物論的見解。誠然，生產力、實踐、經濟基礎，一般地表現為主要的決定的作用，誰不承認這一點，誰就不是唯物論者。然而，生產關係、理論、上層建築這些方

面，在一定條件之下，又轉過來表現其爲主要的決定的作用，這也是必須承認的。當着不變更生產關係，生產力就不能發展的時候，生產關係的變更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着如同列寧所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五〕}的時候，革命理論的創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決定的作用。當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樣）要做，但是還沒有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的時候，確定方針、方法、計劃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決定的東西。當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築阻礙着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於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爲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爲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於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築對於經濟基礎的反作用。這不是違反唯物論，正是避免了機械唯物論，堅持了辯證唯物論。

在研究矛盾特殊性的問題中，如果不研究過程中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以及矛盾之主要的方面和非主要的方面這兩種情形，也就是說不研究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那就將陷入抽象的研究，不能具體地懂得矛盾的情況，因而也就不能找出解決矛盾的正確的方法。這兩種矛盾情況的差別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沒有絕對地平衡發展的東西，我們必須反對平衡論，或均衡論。同時，這種具體的矛盾狀況，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發展過程中的變化，正是表現出新事物代替舊事物的力量。對於矛盾的各種不平衡情況的研究，對於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爲革命政黨正確地決定其政治上和軍事上

五 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

在懂得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問題之後，我們必須進而研究矛盾諸方面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問題。

同一性、統一性、一致性、互相滲透、互相貫通、互相依賴（或依存）、互相聯結或互相合作，這些不同的名詞都是一個意思，說的是如下兩種情形：第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每一種矛盾的兩個方面，各以和它對立着的方面爲自己存在的前提，雙方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第二、矛盾着的雙方，依據一定的條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轉化。這些就是所謂同一性。

列寧說：『辯證法是這樣的一種學說：它研究對立怎樣能够是同一的，又怎樣成爲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爲同一的，——爲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二六）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過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來是互相排斥、互相鬥爭、互相對立的。世界上一切事物的過程裏和人們的思想裏，都包含着這樣帶矛盾性的方面，無一例外。單純的過程只有一對矛盾，複雜的過程

程則有一對以上的矛盾。各對矛盾之間，又互相成爲矛盾。這樣地組成客觀世界的一切事物和人們的思想，並推使它們發生運動。

如此說來，只是極不同一，極不統一，怎樣又說是同一或統一呢？

原來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在。假如沒有和它作對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條件。試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們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獨立地存在嗎？沒有生，死就不見；沒有死，生也不見。沒有上，無所謂下；沒有下，也無所謂上。沒有禍，無所謂福；沒有福，也無所謂禍。沒有順利，無所謂困難；沒有困難，也無所謂順利。沒有地主，就沒有佃農；沒有佃農，也就沒有地主。沒有資產階級，就沒有無產階級；沒有無產階級，也就沒有資產階級。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就沒有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沒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也就沒有帝國主義的民族壓迫。一切對立的成份都是這樣，因一定的條件，一面互相對立，一面又互相聯結、互相貫通、互相滲透、互相依賴，這種性質，叫做同一性。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條件具備着不同一性，所以稱爲矛盾。然而又具備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聯結。列寧所謂辯證法研究『對立怎樣能够是同一的』，就是說的這種情形。怎樣能够呢？因爲互爲存在的條件。這是同一性的第一種意義。

然而單說了矛盾雙方互爲存在的條件，雙方之間有同一性，因而能够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這樣就够了嗎？還不够。事情不是矛盾雙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還在於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轉化。這就是說，事物內部矛盾着的兩方面，因爲一定的條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轉化了去，向

着它的對立方面所處的地位轉化了去。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第二種意義。

爲什麼這裏也有同一性呢？你們看，被統治的無產階級經過革命轉化爲統治者，原來是統治者的資產階級却轉化爲被統治者，轉化到對方原來所佔的地位。蘇聯已經是這樣做了，全世界也將要這樣做。試問其間沒有在一定條件之下的聯繫和同一性，如何能够發生這樣的變化呢？

曾在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定階段上起過某種積極作用的國民黨，因爲它的固有的階級性和帝國主義的引誘（這些就是條件），在一九二七年以後轉化爲反革命，又由於中日矛盾的尖銳化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綫政策（這些就是條件），而被迫着贊成抗日。矛盾着的東西這一個變到那一個，其間包含了一定的同一性。

我們實行過的土地革命，已經是並且還將是這樣的過程，擁有土地的地主階級轉化爲失掉土地的階級，而曾經是失掉土地的農民却轉化爲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有無、得失之間，因一定條件而互相聯結，二者具有同一性。在社會主義條件之下，農民的私有制又將轉化爲社會主義農業的公有制，蘇聯已經這樣做了，全世界將來也會這樣做。私產和公產之間有一條由此達彼的橋樑，哲學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轉化、互相滲透。

鞏固無產階級的專政或人民的專政，正是準備着取消這種專政，走到消滅任何國家制度的更高階段去的條件。建立和發展共產黨，正是準備着消滅共產黨和一切政黨制度的條件。建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進行革命戰爭，正是準備着永遠消滅戰爭的條件。這許多相反的東西，同時却是相成的

東西。

大家知道，戰爭與和平是互相轉化的。戰爭轉化爲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轉化爲戰後的和平，中國的內戰現在也停止了，出現了國內的和平。和平轉化爲戰爭，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國共合作轉化爲戰爭，現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轉化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爲什麼是這樣？因爲在階級社會中戰爭與和平這樣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條件下具備着同一性。

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聯繫着，不但在一定條件之下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互相轉化，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義。列寧所謂『怎樣成爲同一的（怎樣變成同一的），——在怎樣的條件之下它們互相轉化，成爲同一的』，就是這個意思。

『爲什麼人的頭腦不應當把這些對立看作死的、凝固的東西，而應當看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呢？因爲客觀事物本來是如此的。客觀事物中矛盾着的諸方面的統一或同一性，本來不是死的、凝固的，而是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暫時的、相對的東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條件向它們的反面轉化着。這種情況，反映在人們的思想裏，就成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的宇宙觀。只有現在的和歷史上的反動的統治階級以及爲他們服務的形而上學，不是把對立的事物當作生動的、有條件的、可變動的、互相轉化的東西去看，而是當作死的、凝固的東西去看，並且把這種錯誤的看法到處宣傳，迷惑人民羣衆，以達其繼續統治的目的。共產黨人的任務就在於揭露反動派和形而上學的錯誤思想，宣傳事物的本來的辯證法，促成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

所謂矛盾在一定條件下的同一性，就是說，我們所說的矛盾乃是現實的矛盾，具體的矛盾，而矛盾的互相轉化也是現實的、具體的。神話中的許多變化，例如『山海經』中所說的『夸父追日』〔一〕，『淮南子』中所說的『羿射九日』〔二〕，『西遊記』中所說的孫悟空七十二變〔三〕和『聊齋志異』〔四〕中的許多鬼狐變人的故事等等，這種神話中所說的矛盾的互相變化，乃是無數複雜的現實矛盾的互相變化對於人們所引起的一種幼稚的、想像的、主觀幻想的變化，並不是具體的矛盾所表現出來的具體的變化。馬克思說：『任何神話都是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隨着這些自然力之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五〕這種神話中的（還有童話中的）千變萬化的故事，雖然因為它們想像出人們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們的喜歡，並且最好的神話具有『永久的魅力』（馬克思），但神話並不是根據具體的矛盾之一定的條件而構成的，所以它們並不是現實之科學的反映。這就是說，神話或童話中矛盾構成的諸方面，並不是具體的同一性，只是幻想的同一性。科學地反映現實變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

為什麼雞蛋能够轉化為雞子，而石頭不能够轉化為雞子呢？為什麼戰爭與和平有同一性，而戰爭與石頭却没有同一性呢？為什麼人能生人不能生出其他的東西呢？沒有別的，就是因為矛盾的同一性要在一定的必要的條件之下。缺乏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就沒有任何の同一性。

為什麼俄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同年十月的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直接地聯繫着，而法國資產階級革命沒有直接地聯繫於社會主義的革命，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終於失敗

了呢？爲什麼蒙古和中亞細亞的遊牧制度又直接地和社會主義聯繫了呢？爲什麼中國的革命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前途，可以和社會主義直接聯繫起來，不要再走西方國家的歷史老路，不要經過一個資產階級專政的時期呢？沒有別的，都是由於當時的具體條件。一定的必要的條件具備了，事物發展的過程就發生一定的矛盾，而且這種或這些矛盾互相依存，又互相轉化，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同一性的問題如此。那末，什麼是鬥爭性呢？同一性和鬥爭性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列寧說：『對立的統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條件的、一時的、暫存的、相對的。互相排斥的對立的鬥爭則是絕對的，正如發展、運動是絕對的一樣。』（三）

列寧這段話是什麼意思呢？

一切過程都有始有終，一切過程都轉化爲它們的對立物。一切過程的常住性是相對的，但是一種過程轉化爲他種過程的這種變動性則是絕對的。

無論什麼事物的運動都採取兩種狀態，相對地靜止的狀態和顯著地變動的狀態。兩種狀態的運動都是由事物內部包含的兩個矛盾着的因素互相鬥爭所引起的。當着事物的運動在第一種狀態的時候，它只有數量的變化，沒有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好似靜止的面貌。當着事物的運動在第二種狀態的時候，它已由第一種狀態中的數量的變化達到了某一個最高點，引起了統一物的分解，發生了性質的變化，所以顯出顯著地變化的面貌。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見的統一、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處在量變狀態中所顯現的面貌。而統一物的

分解、團結、聯合、調和、均勢、相持、僵局、靜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狀態的破壞，變到相反的狀態，便都是事物在質變狀態中，在一種過程過渡到他種過程的變化中所顯現的面貌。事物總是不斷地由第一種狀態轉化爲第二種狀態，而矛盾的鬥爭則存在於兩種狀態中，並經過第二種狀態而達到矛盾的解決。所以說，對立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相對的，而對立的互相排除的鬥爭則是絕對的。

前面我們曾經說，兩個相反的東西中間有同一性，所以二者能够共處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够互相轉化，這是說的條件性，即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矛盾的東西能够統一起來，又能够互相轉化；無此一定條件，就不能成爲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轉化。由於一定的條件才構成了矛盾的同一性，所以說同一性是有條件的、相對的。這裏我們又說，矛盾的鬥爭貫串於過程的始終，並使一過程向着他過程轉化，矛盾的鬥爭無所不在，所以說矛盾的鬥爭性是無條件的、絕對的。

有條件的相對的同一性和無條件的絕對的鬥爭性相結合，構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運動。

我們中國人常說：『相反相成。』^(三三)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這句話是辯證法的，是違反形而上學的。『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鬥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而鬥爭性即寓於同一性之中，沒有鬥爭性就沒有同一性。

在同一性中存在着鬥爭性，在特殊性中存在着普遍性，在個性中存在着共性。拿列寧的話來說，叫做『在相對的東西裏面有着絕對的東西』^(三四)。

六 對抗在矛盾中的地位

在矛盾的鬥爭性的問題中，包含着對抗是什麼的問題。我們回答道：對抗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矛盾鬥爭的一切形式。

在人類歷史中，存在着階級的對抗，這是矛盾鬥爭的一種特殊的表現。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的矛盾，無論在奴隸社會也好，封建社會也好，資本主義社會也好，互相矛盾着的兩階級，長期地並存於一個社會中，它們互相鬥爭着，但要待兩階級的矛盾發展到了一定的階段的時候，雙方才取外部對抗的形式，發展為革命。階級社會中，由和平向戰爭的轉化，也是如此。

炸彈在未爆炸的時候，是矛盾物因一定條件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的時候。待至新的條件（發火）出現，才發生了爆炸。自然界中一切到了最後要採取外部衝突形式去解決舊矛盾產生新事物的現象，都有與此相彷彿的情形。

認識這種情形，極為重要。它使我們懂得，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捨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共產黨人必須揭露反動派所謂社會革命是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等等欺騙的宣傳，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革命論，使人民懂得，這不但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整個人類的歷史和蘇聯的勝利，都證明了這個科學

的真理。

但是我們必須具體地研究各種矛盾鬥爭的情況，不應當將上面所說的公式不當地套在一切事物的身上。矛盾和鬥爭是普遍的、絕對的，但是解決矛盾的方法，即鬥爭的形式，則因矛盾的性質不同而不相同。有些矛盾具有公開的對抗性，有些矛盾則不是這樣。根據事物的具體發展，有些矛盾是由原來還非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爲對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則由原來是對抗性的，而發展成爲非對抗性的。

共產黨內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如前所說，在階級存在的時候，這是階級矛盾對於黨內的反映。這種矛盾，在開始的時候，或在個別的問題上，並不一定馬上表現爲對抗性的。但隨着階級鬥爭的發展，這種矛盾也就可能發展爲對抗性的。蘇聯共產黨的歷史告訴我們：列寧、斯大林的正确思想和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還沒有表現爲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爲對抗的了。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也有過這樣的情形。我們黨內許多同志的正確思想和陳獨秀、張國燾等人的錯誤思想的矛盾，在開始的時候也沒有表現爲對抗的形式，但隨後就發展爲對抗的了。目前我們黨內的正確思想和錯誤思想的矛盾，沒有表現爲對抗的形式，如果犯錯誤的同志能够改正自己的錯誤，那就不會發展爲對抗性的東西。因此，黨一方面必須對於錯誤思想進行嚴肅的鬥爭，另一方面又必須充分地給犯錯誤的同志留有自己的覺悟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過火的鬥爭，顯然是不適宜的。但如果犯錯誤的人堅持錯誤，並擴大下去，這種矛盾也就存在着發展爲對抗性的東西的可能性。

經濟上城市和鄉村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面（那裏資產階級統治的城市殘酷地掠奪鄉村），在中國的國民黨統治區域裏面（那裏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買辦大資產階級所統治的城市極野蠻地掠奪鄉村），那是極其對抗的矛盾。但在社會主義國家裏面，在我們的革命根據地裏面，這種對抗的矛盾就變為非對抗的矛盾，而當到達共產主義社會的時候，這種矛盾就會消滅。

列寧說：『對抗和矛盾斷然不同。在社會主義下，對抗消滅了，矛盾存在着。』（三）這就是說，對抗只是矛盾鬥爭的一種形式，而不是它的一切形式，不能到處套用這個公式。

七 結 論

說到這裏，我們可以總起來說幾句。事物矛盾的法則，即對立統一的法則，是自然和社會的根本法則，因而也是思維的根本法則。它是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相反的。它對於人類的認識史是一個大革命。按照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看來，矛盾存在於一切客觀事物和主觀思維的過程中，矛盾貫串於一切過程的始終，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個側面各有其特點，這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矛盾着的事物依一定的條件有同一性，因此能够共居於一個統一體中，又能够互相轉化到相反的方面去，這又是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然而矛盾的鬥爭則是不斷的，不管在它們共居的時候，或者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都有鬥爭的存在，尤其是在它們互相轉化的時候，鬥爭的表現更為

顯著，這又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當着我們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和相對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和矛盾方面的主要的和非主要的區別；當着我們研究矛盾的普遍性和鬥爭性的時候，要注意矛盾的各種不同的鬥爭形式的區別；否則就要犯錯誤。如果我們經過研究真正懂得了上述這些要點，我們就能夠擊破違反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則的不利於我們的革命事業的那些教條主義的思想；也能够使有經驗的同志們整理自己的經驗，使之帶上原則性，而避免重複經驗主義的錯誤。這些，就是我們研究矛盾法則的一些簡單的結論。

〔註 釋〕

〔一〕引自列寧「哲學筆記」：「黑格爾『哲學史』第一卷『伊里亞學派的哲學』一節摘要」。

〔二〕見列寧「關於辯證法問題」：「統一物之分而爲二以及我們對其各矛盾部分的認識，是辯證法的本質。」又見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可以把辯證法簡要地規定爲關於對立的統一的學說。這樣一來，辯證法的核心就被抓住，可是這需要解釋和發揮。」

〔三〕引自列寧「關於辯證法問題」。

〔四〕孔子學派在漢代的著名代表者董仲舒（公元前一二九年—前一二四年）曾經對漢武帝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道」爲中國古代哲學家的通用語，它的意義是「道路」或「道理」，可作「法則」或「規律」解說。

〔五〕見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二節「辯證法。量與質」。

〔六〕見列寧「關於辯證法問題」。

〔七〕引自恩格斯「反杜林論」第一編第十二節「辯證法。量與質」。

〔八〕引自列寧「關於辯證法問題」。

〔九〕引自列寧「關於辯證法問題」。

〔一〇〕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共產主義」一文。參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註一〇。

(一) 見「孫子」卷三「謀攻」篇。

(二) 魏徵(公元五八〇年—六四三年)，唐代初期的政治活動家和歷史家。本文引語見「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二。

(三) 「水滸傳」是指寫北宋末年一次農民戰爭的小說。宋江是該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祝家莊在農民戰爭根據地梁山泊的附近，該莊的統治者爲一個大惡霸地主叫祝朝奉。

(四) 引自列寧「再論職工會、時局及托洛茨基、布哈林之錯誤」。

(五) 見列寧「做什麼？」第一章第四節。

(六) 引自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

(七) 「山海經」是中國戰國時代(公元前四〇三年—前二二一年)的一部著作。夸父是「山海經」上記載的一個神人。據說：「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海外北經」)

(八) 羿是中國古代傳說中的英雄，「射日」是關於他善射的著名故事。據漢朝人劉安(公元前二世紀時的貴族)所輯「淮南子」一書說：「堯之時，十日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猥獯、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脭蛇，皆爲民害。堯乃使羿……上射十日而下殺猥獯……萬民皆喜。」東漢人王逸(公元二世紀時的著作家)關於屈原詩篇「天問」的註釋說：「淮南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命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留其一日。」

(九) 「西遊記」是公元十六世紀中國的一部神話小說。孫悟空是「西遊記」上的主角，他是一個神猴，有七十二變的法術，無論鳥獸蟲魚草木器物或人類，他都能够隨意變化。

(十) 「聊齋志異」是公元十七世紀清朝人蒲松齡收集民間傳說寫成的一本小說集，共短篇小說四百三十一篇，大部分是敘述神仙狐鬼的故事。

(十一) 引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論」。

(十二) 引自列寧「關於辯證法問題」。

(十三) 這句話始見於班固(公元一世紀時中國著名歷史家)所著「前漢書」卷三十「藝文志」，以後就頗爲流行。班固的原文如下：「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讎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辟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

(十四) 見列寧「關於辯證法問題」。

(十五) 見列寧對布哈林的「過渡期經濟學」的評註。

